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上 册

(征求意见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上 册

(征求意见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 年 • 北京

内部发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上册

(征求意见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9印张 3插页 448千字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 193 定价: 1.80元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列 宁 语 录

沒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不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机会主义决裂，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就是欺骗。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编者说明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积极参加反修防修斗争,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我们把我系1972年10月编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初稿)进行了修改。

这次修改,我们力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突出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概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历史经验。因此对原讲义(初稿)的章节作了较大的调整,大部分进行了改写,还增写了简要注释、大事年表,附了少数照片和地图。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写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共六章。下册从十月革命后写到目前,正在修改中。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修改时间仓促,这本修改稿在内容和体例上仍然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现在作为征求意见稿印出来,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这次修改过程中,我们到北京的一些工厂、学校和有关部门,征求了工农兵和专业人员的意见;学习和参考了兄弟院校编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我们还派出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进行开门编书的实践。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也下厂参加了这次开门编书的实践。在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厂、社、校三结合的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班,对原讲义(初稿)逐章进行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还有几名工

人师傅脱产与下厂教师和商务印书馆同志相结合，共同进行了讲义的具体修改工作。对于该厂党委和工人师傅、社会上广大工农兵和专业人员的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75年4月

目 录

前言	1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21
第一节 19 世纪 30—40 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诞生	22
一、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早期的工人运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22
二、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	27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33
第二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52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建立	52
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战斗纲领	60
第三节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68
一、法国二月革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及其意义	68
二、德国三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	76
三、1848 年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85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91
第二章 第一国际时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	106
第一节 19 世纪 50—60 年代初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第一国际在斗争中建立·····	107
一、19 世纪 50—60 年代初期欧美各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	107
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成就，《资本论》初稿完成的伟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11
三、马克思、恩格斯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的巨大成就·····	118
四、1863 年波兰人民反对沙俄霸权统治的民族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摧毁沙俄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光辉思想·····	124
五、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国际纲领和路线的制定·····	127
第二节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132
一、蒲鲁东主义的产生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132
二、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斗争。第一国际关于波兰问题的正确立场·····	142
三、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的激烈斗争。第一国际 1866 年日内瓦	

代表大会粉碎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	146
四、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尖锐斗争。第一国际 1868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152
第三节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	158
一、19 世纪 50 — 60 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联主义的出现·····	158
二、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关于工人运动道路和领导权问题的尖锐斗争·····	163
三、在无产阶级参加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	168
四、19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在爱尔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173
第四节 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巴枯宁阴谋集团被粉碎·····	179
一、19 世纪 60 年代末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	179
二、第一国际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篡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189
三、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派对国际的猖狂进攻。第一国际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斗争的胜利·····	196
四、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集团的疯狂反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斗争·····	203

五、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209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	219
第一节 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220
一、普法战争的爆发与9月4日革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革命策略·····	220
二、9月4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投降活动的斗争·····	230
三、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236
第二节 巴黎无产阶级为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241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诞生及其革命措施·····	241
二、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和国际对公社的支持。凡尔赛反革命集团勾结各国反动派猖狂进行复辟活动·····	256
三、巴黎工人和革命群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复辟的英勇斗争·····	263
第三节 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269
一、巴黎公社革命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269
二、《法兰西内战》的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基本经验的总结·····	271

第四章 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第二国际前

期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28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哥达纲领批判》的伟大意义·····	288
一、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及其危害·····	288
二、19 世纪 6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与成长·····	293
三、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运动统一问题上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哥达纲领批判》的伟大历史意义·····	299
第二节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斗争。德国《非常法令》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313
一、杜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	313
二、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根本分歧。《反杜林论》的伟大意义·····	320
三、《非常法令》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在理论战线上打退资产阶级的新进攻·····	33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在欧美各国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为欧美各国党的革命化而斗争·····	341
一、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建立·····	341
二、法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主义同“可能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344

三、19 世纪 70—90 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社会劳工党宗派主义的批判·····	347
四、英国 80—90 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对英国社会党人的宗派主义和费边社改良主义的批判·····	351
第四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前期活动。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斗争·····	356
一、第二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356
二、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废除后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	367
三、90 年代法、德等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376
第五章 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387
第一节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而斗争·····	388
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388
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392
三、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	

主义的斗争·····	402
四、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415
第二节 俄国 1905 年革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高潮和低潮时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斗争·····	421
一、俄国 1905 年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	421
二、俄国 1905 年革命的历史意义。对 1905 年革命两种根本不同的估计·····	433
三、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437
四、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伟大意义·····	443
第三节 战争危机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455
一、20 世纪初期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和亚洲的觉醒·····	455
二、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列宁团结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巴塞尔大会的反战宣言·····	464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背叛和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教训·····	472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	

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表	480
一、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及其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480
二、列宁和各国左派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	492
三、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498
四、列宁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反对考茨基主义而斗争。国际社会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	503
第六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514
第一节 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辉煌胜利。《国家与革命》的伟大意义	515
一、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515
二、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武装起义路线。《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伟大意义	527
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革命向全国发展	542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548
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措施。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	548
二、苏维埃政权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伟大胜利	558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发表·····	565
第三节 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	576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576
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共同道路·····	580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年表（1848—1920年）·····	592

插 图

卡尔·马克思(1882年)·····	3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	39
第一国际时期(1864—1876)国际工人运动·····	128—129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147
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264—265
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国际工人运动·····	360—361
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	374
1920年5月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剧院广场向出发到前线去反击白匪军的士兵讲话·····	405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部分同志合影·····	408
弗·伊·列宁 1918年10月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562

目 录

前言.....	1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21
第一节 19 世纪 30—40 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诞生.....	22
一、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早期的工人运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22
二、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	27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33
第二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52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建立.....	52
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战斗纲领.....	60
第三节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68
一、法国二月革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及其意义.....	68
二、德国三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	76
三、1848 年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85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91
第二章 第一国际时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	106
第一节 19 世纪 50—60 年代初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第一国际在斗争中建立·····	107
一、19 世纪 50—60 年代初期欧美各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	107
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成就，《资本论》初稿完成的伟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11
三、马克思、恩格斯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的巨大成就·····	118
四、1863 年波兰人民反对沙俄霸权统治的民族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摧毁沙俄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光辉思想·····	124
五、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国际纲领和路线的制定·····	127
第二节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132
一、蒲鲁东主义的产生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132
二、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斗争。第一国际关于波兰问题的正确立场·····	142
三、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的激烈斗争。第一国际 1866 年日内瓦	

代表大会粉碎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	146
四、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尖锐斗争。第一国际 1868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152
第三节 第一国际时期, 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	158
一、19 世纪 50 — 60 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同工联主义的出现·····	158
二、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关于工人运动道路和领导权问题的尖锐斗争·····	163
三、在无产阶级参加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	168
四、19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在爱尔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173
第四节 第一国际后期, 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巴枯宁阴谋集团被粉碎·····	179
一、19 世纪 60 年代末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	179
二、第一国际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篡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189
三、巴黎公社失败后, 巴枯宁派对国际的猖狂进攻。第一国际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斗争的胜利·····	196
四、海牙代表大会后, 巴枯宁集团的疯狂反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斗争·····	203

五、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209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	219
第一节 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220
一、普法战争的爆发与9月4日革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革命策略·····	220
二、9月4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投降活动的斗争·····	230
三、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236
第二节 巴黎无产阶级为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241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诞生及其革命措施·····	241
二、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和国际对公社的支持。凡尔赛反革命集团勾结各国反动派猖狂进行复辟活动·····	256
三、巴黎工人和革命群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复辟的英勇斗争·····	263
第三节 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269
一、巴黎公社革命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269
二、《法兰西内战》的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基本经验的总结·····	271

第四章 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第二国际前

期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28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哥达纲领批判》的伟大意义·····	288
一、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及其危害·····	288
二、19 世纪 6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与成长·····	293
三、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运动统一问题上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哥达纲领批判》的伟大历史意义·····	299
第二节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斗争。德国《非常法令》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313
一、杜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	313
二、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根本分歧。《反杜林论》的伟大意义·····	320
三、《非常法令》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在理论战线上打退资产阶级的新进攻·····	33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在欧美各国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为欧美各国党的革命化而斗争·····	341
一、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建立·····	341
二、法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主义同“可能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344

三、19 世纪 70—90 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社会劳工党宗派主义的批判·····	347
四、英国 80—90 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对英国社会党人的宗派主义和费边社改良主义的批判·····	351
第四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前期活动。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斗争·····	356
一、第二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356
二、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废除后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	367
三、90 年代法、德等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376
第五章 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387
第一节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而斗争·····	388
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388
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392
三、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	

主义的斗争·····	402
四、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415
第二节 俄国 1905 年革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高潮和低潮时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斗争·····	421
一、俄国 1905 年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	421
二、俄国 1905 年革命的历史意义。对 1905 年革命两种根本不同的估计·····	433
三、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437
四、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伟大意义·····	443
第三节 战争危机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455
一、20 世纪初期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和亚洲的觉醒·····	455
二、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列宁团结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巴塞尔大会的反战宣言·····	464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背叛和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教训·····	472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	

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表.....	480
一、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及其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480
二、列宁和各国左派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	492
三、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498
四、列宁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反对考茨基主义而斗争。国际社会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	503
 第六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514
第一节 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辉煌胜利。《国家与革命》的伟大意义.....	515
一、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515
二、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武装起义路线。《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伟大意义.....	527
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革命向全国发展.....	542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548
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措施。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	548
二、苏维埃政权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伟大胜利.....	558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发表·····	565
第三节 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	576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576
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共同道路·····	580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年表（1848—1920年）·····	592

插 图

卡尔·马克思(1882年)·····	3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	39
第一国际时期(1864—1876)国际工人运动·····	128—129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147
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264—265
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国际工人运动·····	360—361
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	374
1920年5月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剧院广场向出发到前线去反击白匪军的士兵讲话·····	405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部分同志合影·····	408
弗·伊·列宁 1918年10月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562

前 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联合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为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和胜利的历史。这部历史是从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及其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开始，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

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体经历了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至巴黎公社。这是风暴和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十分尖锐，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用什么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工人运动应该走什么道路？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宇宙观和完整的社会革命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①可是，马克思主义刚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页。

刚诞生的时候,只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①,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它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864年,第一国际(1864—1876年)诞生了。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确立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到了这个时期的末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②共产主义运动由西欧一角扩展到东欧、北美十几个国家。1869年,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进行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精神的产物,“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③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二个时期(1872年至19世纪末),即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第二国际前期。同第一个时期相区别的是,这个时期“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④,是无产阶级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资本主义已经由它的上升阶段开始向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已经结束,在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这个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克思主义逐步与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去作未来的战斗。

①②④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438页。

③ 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45页。

围绕着党的理论基础、党的纲领和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以及德、法等国内的机会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广泛地传播开来。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成长壮大。1889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建立了。

但是，“和平”发展时期滋长了右倾机会主义。它们迷信资产阶级民主，宣扬“社会和平”，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恩格斯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第二国际前期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到了第二国际后期，共产主义运动便由欧美扩展到亚洲、大洋洲、拉美和南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二十几个国家建立起来。

第三个时期(19世纪末至1917年)，即从第二国际的后期到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三大矛盾更加激化，无产阶级冲击资本主义制度、武装夺取政权已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亚洲觉醒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兴起。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由于马克思主义已战胜了工人运动中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派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便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钻进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修正主义逆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并泛滥开来。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头子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攻击、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绝大多数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纷纷投向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国际遭到了破产。

列宁在新的时代里，在领导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

实践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①

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沿着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②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入了新的阶段。

第四个时期（1918年至30年代后期），即十月革命胜利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西方无产者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建立起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各国共产党普遍建立，并在此基础上于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1919—1943年）。第三国际时期，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世界上六大洲的六十多个国家开展起来。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要不要巩固和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各国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两个问题是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新的课题，也是这个时期以及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问题。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②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下同），第278页。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联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了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并在同考茨基主义以及其他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中，捍卫了年轻的苏维埃红色政权。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伟大事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领导苏联共产党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猖狂进攻，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战胜了陈独秀、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明了象中国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道路，英明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第五个时期（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初期。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先后发动并逐步扩大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引起革命，加速革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继续高涨，反法西斯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这时，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败法西斯侵略；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利用战争形势，发展革命势力，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

面对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股右倾投降主义逆流。这个右倾投降主义，在大战中，以白劳德为代表，表现为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向资产阶级投降；在大战结束后，以多列士、

陶里亚蒂为代表，表现为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放弃斗争，害怕胜利，向资产阶级“缴枪”，断送了革命成果。

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顶住了右倾投降主义逆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又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最终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胜利。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防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

第六个时期(1953年至现在)，即从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在反修斗争中蓬勃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甘心于失败，妄图以武装入侵与“和平演变”的反革命两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适应国际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疯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侵略扩张，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当成自己的附属国，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的泛滥。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退了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

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航向。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次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夺取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正在发展，全世界六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反修斗争中建立、成长和壮大起来。第三世界已经觉醒，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动力，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洪流奔腾前进，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波澜壮阔，越南、柬埔寨人民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则是危机重重，内外交困，“无可奈何花落去”。“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

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伟大而艰巨的斗争，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这个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助于我们学懂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搞清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按照其客观规律发展的。这个规律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历史上这个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助于我们领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和吸取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

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尽管其表现形式、手法不尽相同，但其反动的阶级本质和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他们那一套反动理论观点和路线，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一般都是从老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那里拣来的破烂货。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助于深入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路线，特别是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自觉地捍卫和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是建立在不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推行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其路线也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助于我们反对和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增强世界观改造的自觉性，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我们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对于我们搞好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支援世界革命，为在地球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都有重大的意义。

①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8页。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群众解放斗争的科学。它是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给国际无产阶级指明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和光辉灿烂的前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先是在西欧的英、法、德等国确立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9世纪30—40年代，西欧的工人运动已发展到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进行有组织的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斗争。这就使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成为迫切需要，同时又为它的产生提供了坚固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在批判地吸取人类先进思想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同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两条路线的坚决斗争中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同时，就把它与工人运动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工人运动。1847年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及其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制定，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结合，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国际无产阶级刚刚得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武装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参加了欧洲

1848年革命，并且以新的革命斗争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19世纪30—4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诞生

一、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早期的工人运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在西欧各国逐步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三个阶段。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迅速了。18世纪60年代，由于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引起了产业革命，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劳动，机械化的工厂逐步代替了手工业工场。英国首先进行了产业革命，在它的影响下，法国、德国、还有比利时、瑞士等国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先后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

恩格斯说：“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时产生的，他们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靠剥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随着机器的广泛采用，工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简单附属品。资本家采取大幅度降低工资、尽量延长劳动时间、不断增强劳动强度、廉价雇佣童工、女工等办法榨取广大工人的血汗，使无产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使大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7页。

多数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而盲目地拼命地扩大生产,而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很低,结果便爆发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年第一次先在英国爆发了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以后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循环重复一次。经济危机象“社会瘟疫”一样,使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这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①

但是,“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②当时工人们把贫困和失业归咎于机器的采用,于是斗争便采取了捣毁机器的形式。在英国,1769年布来克浦的哈克里夫工厂的工人就捣毁了新发明的纺纱机。到19世纪初,破坏机器曾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法国在19世纪20、30年代产业革命初期也发生过类似的运动。这一时期,在德国的佐林根、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也出现了工人捣毁机器的风潮。那时,工人们还不能够把机器和使用机器来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别;他们的斗争还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孤立的,还局限在个别工厂和个别地区,斗争的锋芒只是对准个别资本家。

然而,破坏机器的运动遭到政府和资本家的残酷镇压,而且它并不能阻止机器的更广泛采用。斗争实践迫使工人进而采取罢工运动的形式,为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下同),第32页。

②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5页。

济斗争。在斗争中，工人们建立了互助会、工会等组织。1794—1796年间，在英国的羊毛加工业工人、缝纫业工人中建立了第一批工人团体。尽管英国政府于1799—1800年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也阻止不了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813年，苏格兰纺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1816年，格拉斯哥纺织工人工会成立。1818年，兰开夏纺织工人和苏格兰矿工又举行了大罢工。1824年，政府被迫取消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此后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起来。20年代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蒸汽机制造工人联合会和木工联合会。法国工人也冲破了法国政府1791年颁布的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的法律，在19世纪上半叶举行了多次罢工。在1815至1830年之间，大部分行业的工人都建立了互助会的组织，当会员发生疾病、事故、失业、遭到雇主罚款时，就给予帮助。德国的工人运动在30年代遭到专制政府的残酷迫害，于是有很多工人被迫逃往英、法、瑞士等国，他们在国外成立了不少工人协会。总之，工人们通过自发的经济斗争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行动，互相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才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密切注意。于是，反映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情绪，并幻想建立一个消除贫富对立的美好社会的思潮，便应运而生。这就是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其主要代表是：法国的昂利·圣西门(1760—1825)、沙尔·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三人。他们虽出身于贵族或商人的家庭，但是他们受到早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¹的乌托邦思想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巴贝夫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经历和对周围社会环境的接触使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罪恶。他们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文明制度”，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

了宝贵的材料；并揭示了后来用科学方法证明是正确的一些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他们的思想归纳起来，突出的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和罪恶现象。圣西门把资本主义社会叫做“本末倒置的世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不合理性，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处于最贫困、受压迫的地位；相反，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却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他把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看作是社会的最大祸害。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作了更为辛辣的讽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灾难和死亡之上。他说在这个社会里，医生希望病人多，卖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粮食投机者希望发生旱灾和饥荒。他认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是对全体人民的陷阱。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比圣西门和傅立叶又前进一步。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批判没有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欧文明确讲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是由“分不开的三种祸害”——私有制度、宗教制度和婚姻制度产生的，而其中私有制度又是敌对、欺骗、舞弊、卖淫、贫困、犯罪和痛苦的根源。他说：私有制把人变成魔鬼，把世界变成地狱；当私有制还存在的时候，人类要获得幸福是不可能的。欧文生活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英国，所以他的批判更为深刻些。

第二，设想了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圣西门提出，在未来的社会里“人人应当劳动”。他预言在未来社会里，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对人的政治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傅立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悲惨的遭遇，第一次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准。他和欧文都主张，在未来社会中男女一律平等，婚姻应该自

由，建立一夫一妻制。他还预言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竞争将为竞赛所代替，劳动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成为乐生要素，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傅立叶和欧文都提出，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和劳动教育，消灭城乡对立以及组织生产协作社作为改造社会基层单位等宝贵见解。欧文比傅立叶彻底，他认为在未来的劳动公社里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应为集体所有。三位空想家还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未来社会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圣西门认为未来社会每个人是按照才能和资本来分配，傅立叶主张按照劳动、才能和资本来分配。欧文则反对按资本分配，也不同意给人们的才干以特殊报酬，他更进一步阐发了按劳分配的设想。他组织过示范性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失败后又组织“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市场管理人收到劳动者交来的产品以后，根据专家的估价发给他劳动券，券上载明生产这件产品耗费了多少劳动时间。持有这种劳动券的人可以在欧文主办的市场上换取他个人需要的其它任何相等劳动时间的各种物品。欧文幻想用这种劳动券代替货币就可以消灭资本家的不劳而获。

三位空想家的学说，为以后产生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但是，他们也有致命的缺点和错误：

首先，他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了解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而是主观地企图将资本主义制度抛弃。

其次，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从“正义”、“理性”出发，幻想用和平的方法，组织各种试验，以扩大影响，呼吁和依靠当时的统治者和有产者的援助来实现他们理想的美好社会计划。

最后，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埋葬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他们只是把无产阶级看成受苦最深的阶级而给予同情，没有看到它的伟大历史作用。

所以，他们的学说是空想的。这一方面是受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还刚刚开始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① 另一方面是受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限制。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把自己看成是整个社会历史的代表；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看成是绝对的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这些主观和客观原因使他们没有摆脱空想的境界。因此，“**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②

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伟大历史任务就落到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上了。

二、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

19世纪30年代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日益发展，无产阶级虽然已经展开了有组织经济斗争，但是，由于当时西欧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还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同盟军。到19世纪30—4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人运动也发展到新水平，进入新时期。这时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展开独立的政治运动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1831年和1834年法国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就是最明显的标志。

法国1830年7月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波旁王

^{①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416页。

朝的复辟时期，政权由地主贵族手里转到大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手里，建立了“七月王朝”。在革命中流血牺牲的无产阶级却一无所获，它的经济状况反而比过去更加恶化。这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于是爆发了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大规模起义。

里昂的丝织工人深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工作15—18小时，而得到的工资只相当于一磅多面包的价钱，女工和童工的工资则更少。工人们曾多次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停止向手工作坊定货，广大工人面临失业和饥饿的威胁。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831年11月21日举行罢工。当军警进行镇压时，工人举行了起义，他们高呼“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手持腰刀、长矛、棍棒和步枪，经过3天激烈战斗，占领了里昂市，拘禁了省长。工人们在告市民书中宣布：“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这是起义工人对政权问题提出的第一次不十分明确的要求。由于工人在政治上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只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机构——工人委员会，所以12月3日，政府从巴黎调来6万军队，终于把里昂工人的起义镇压下去。

1834年4月9日，里昂工人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是为了抗议政府逮捕工人互助会的领袖和颁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工人们提出了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使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这次起义得到巴黎、马赛等重要城市工人的积极响应。起义工人同反动军警经过6天激烈的巷战，由于寡不敌众，最后还是遭到镇压。

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揭开了工人运动史上新的一页，标志着法国工人已经在斗争中提出政权问题，开始走上独立政治运动的道路。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工人掀起的宪章运动是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走上独立政治运动道路的另一鲜明例证。

1640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向贵族妥协而告终的。长期以来,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势力不大,广大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更是处于无权地位。为此,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的声浪日高。1832 年议会不得不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然而它只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加强了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这就迫使工人用自己的独立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利。

1836 年 6 月,出现了“伦敦工人协会”的组织。1837 年,“伦敦工人协会”起草了一份致国会的请愿书,提出 6 点要求:凡年满 21 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給薪俸;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38 年 5 月 8 日,这个请愿书公布了,被命名为《人民宪章》。这个请愿书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和响应,到 1839 年,在这个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有 125 万人以上。为了领导这个运动,英国工人还在各地组织了宪章派团体,并且于 1840 年 7 月成立了统一各地宪章派团体的独立政党宪章派全国协会,称为宪章党。“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①

宪章运动从 19 世纪 30 年代中叶到 40 年代为止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只是提出了争取普选权的要求。1839 年 7 月,国会否决了请愿书,并大肆搜捕宪章运动领导人,宣布禁止一切集会,这次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1840 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在业工人工资下降 55%,农业受灾,全国普遍饥荒,因此,在 40 年代初第二次出现宪章运动的高潮。这次提出的请愿书,除坚持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97 页。

人民宪章原有的要求外，还提出了废除贫民法，限制工作日，实行政教分离等新的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多达 300 余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请愿书强烈谴责压制舆论和侵犯自由的警察专横，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1842 年 5 月 2 日，第二次请愿书仍遭到议会否决。于是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表示抗议。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动纲领和斗争策略，罢工于同年 9 月遭到了镇压，1,500 多名积极分子被捕，宪章运动转入低潮。在 1847 年的经济危机和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宪章运动第三次形成高潮。全国宪章协会恢复活动，筹备第三次请愿。第三次请愿书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应享有优先权，人民则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 500 万人。工人群众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格拉斯哥工人群众高呼“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1848 年 4 月 3 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4 月 10 日在伦敦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护送宪章运动代表团到议会递交请愿书。4 月 10 日，游行群众遭到政府武装的镇压。5 月 13 日，政府又下令解散全国宪章派协会。请愿书也被议会所拒绝。随着法国 1848 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欧洲反动势力的反扑，宪章运动也终告失败。

宪章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没有一个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政党的领导。在宪章党内部也存在两条路线的对立。一是以洛维特为首的“道义派”，主张仅仅使用合法斗争的手段，反对使用暴力，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幻想依靠道义的力量去争取普选权；一是以奥康瑞尔为首的“暴力派”，主张采取武装起义的手段。然而“道义派”在宪章运动中始终占统治地位，路线的错误是宪章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会吸引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

众参加政治斗争，并且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恩格斯说：“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①列宁指出：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②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是一次直接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并且更进一步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问题。当时德国由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所以工人受到了工厂主、包买商和封建主的重重压迫和剥削。40年代初，工厂主为了和英国商品竞争，不顾工人死活，大幅度地降低工资以减少生产成本，使大量工人生活极端困苦。当时工人们编了一首名为《血腥的屠杀》的歌谣，愤怒控诉厂主和包买商的剥削罪行，称他们是吃人的野兽，揭露他们贪婪残忍的欲望就是“剥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衣，榨尽穷人的所有”。马克思称赞这支歌曲说：“这是一个勇敢的斗争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③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织工们唱着这支歌谣，发动了对厂主的英勇斗争。起义的工人发出了反对私有制社会的呼声，他们捣毁了工厂和企业主的住宅，销毁了帐簿和财产契据，并用斧子和石头同前来镇压起义的军队展开了搏斗，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经过两天的浴血奋战，起义被大批政府军警镇压下去。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虽然是自发的，然而他们的斗争目标极其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

②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811页。

③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鲜明地对准了私有制，对准了资本剥削。“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①

英、法、德三国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当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争夺政权的斗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②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就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阶级基础；而且，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当时流行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学说，不但不能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正确的道路，反而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在批判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③“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所作的科学的、精辟的论述。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③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3—264页。

④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5页。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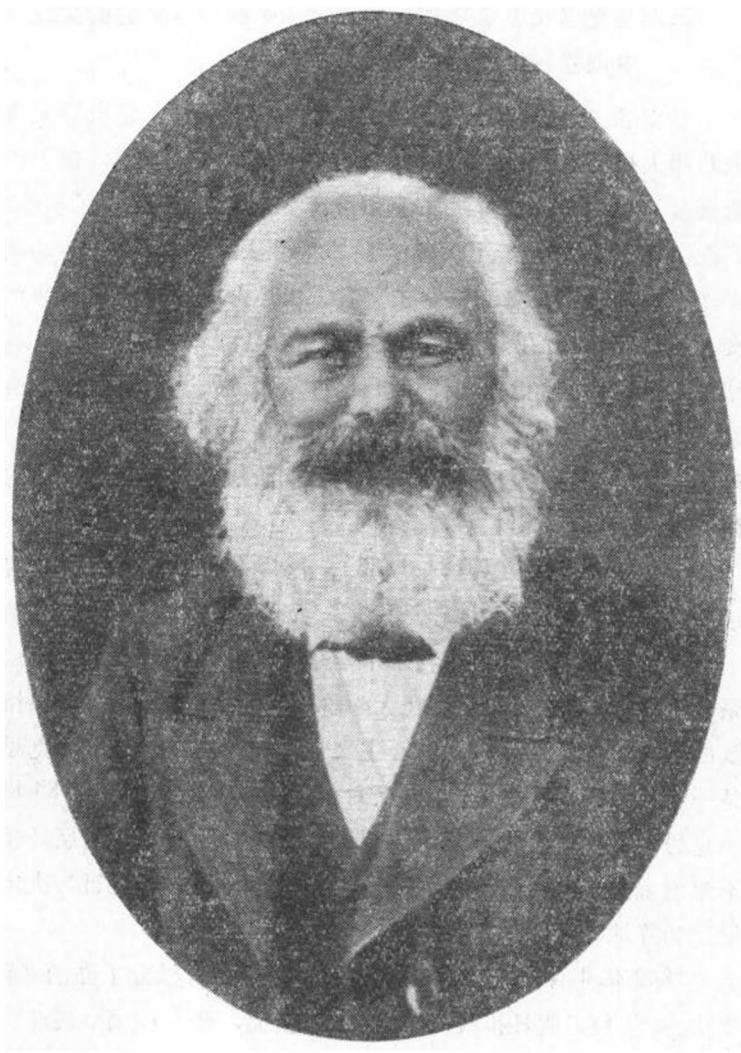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们所以能够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于他们亲自参加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深入了解社会，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认识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由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时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作斗争中，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①

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

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随即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在大学阶段，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信奉过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同时在政治上马克思又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他本想到波恩大学任教，鉴于普鲁士反动政府不断迫害进步教授，他不得不转向报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决定以报刊为阵地，开始了对旧世界的批判。

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激进的资产阶级分子办的《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即《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被聘为该报主编。在马克思的主持和影响下，《莱茵报》很快成了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有力工具。他在办报过程中，十分重视深入社会，了

^①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卡尔·马克思(1882年)

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广泛接触工农的生活和斗争,捍卫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在《莱茵报》上,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痛斥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坚决捍卫农民劳苦大众的利益。1843年3月底,《莱茵报》由于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而被普鲁士反动政府查封。阶级斗争的实践,给予了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强有力的推动,使马克思认识到他原来相信的黑格尔关于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国家应该体现理性的原则等观念是错误的。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了国家和法律都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经济利益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这就促使马克思起来批判黑格尔哲学,促使他转向研究经济关系,从而研究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清算黑格尔唯心主义有很大启示。费尔巴哈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马克思形成唯物主义思想有较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后来说的:“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费尔巴哈在自然观方面虽然是唯物主义者,而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却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曾指出:“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②马克思认为,只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才能使哲学成为真理。马克思正是遵循着这一条道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研究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他发现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一切都是头足倒置的。“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做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③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束缚,立足于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② 《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

现实社会,研究经济关系问题,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①马克思把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在研究国家生活时,注意研究各种关系的客观性,从中找出必然的规律性。他反对以空论家的姿态向世界宣布一套现成的新原理,而坚定地认为,新哲学的任务不在于“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马克思正是满怀着这种信念,开始了新的战斗。

在《莱茵报》被查封后,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迫害,1843年11月,马克思迁居到了法国巴黎。当时巴黎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在这里,马克思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特意选定在工人区居住,和工人群众建立广泛的密切的联系,经常深入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工人们也把马克思看作自己的知心人,常到他家作客、请教,往往畅谈直至深夜。同时,马克思还同法国民粹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同德国流亡者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以及法国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他经常出席法、德两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集会并发表演说。

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马克思还继续进行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哲学,并着手系统地研究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由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广泛进行科学研究,使他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未来社会的真正创造者。如果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曾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理性国家上,那末现在他把希望转向无产阶级了。1844年2月,他在与

^{①②}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416页。

黑格尔左派分子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新观点。马克思论证了人类要从私有制和金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实现“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他主张对一切剥削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①；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公开申明自己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这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对1844年德国爆发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并从中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对待这次起义的不同态度，使他和卢格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卢格极力贬低这次起义的意义，并且诬蔑德国工人除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厂、自己住的那个地区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靠他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却从这次起义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斗争的前景，并且指出：“一个有思想爱真理的人，在看到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爆发的时候，他所应该做的不是在这一事件上为人之师，而是研究这一事件的特殊性质”。^④马克思根据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1820年11月28日诞生

①②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5、9页。

④⑤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4、488页。

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纺织厂资本家的家庭。他的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1837年，恩格斯中学尚未毕业就被父亲送到巴门的商业营业所当办事员，一年后，又被送到不来梅，在他父亲朋友的一家大公司里任职。但是，恩格斯对“生意经”根本不感兴趣，对家庭和工商界的庸俗习气十分厌恶，而工人生活的凄惨景象却震动了他的心弦。他在故乡和不来梅都注意深入考察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对劳动人民的境遇怀着深厚的同情，对于资本家和上层社会则深恶痛绝。他尖锐揭露工厂里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不仅摧残童工的健康，而且也威胁成年工人的生命，“疾病蔓延”，“五个人就会有三个人因肺结核死去”，“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①这种鲜明的态度和感情，充分反映了恩格斯与旧家庭和旧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决心。

1841年秋，恩格斯到柏林服义务兵役。当时柏林大学的学术争论和思想斗争非常活跃，这引起了恩格斯的强烈兴趣。他在柏林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研究军事以外，还抽空到柏林大学去旁听，并积极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但是，和马克思一样，他从来不是黑格尔的无条件崇拜者。恩格斯在积极参加当时哲学界的斗争中，写了许多论文，批判当时极端反动和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²，指出他违背科学、用神秘主义代替理智、庇护宗教、替君主专制作宣传的反动实质。恩格斯这些论文和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一样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的精神，这是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著作的显著区别。

恩格斯是在英国认识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者的。1842年11月，他在父亲安排下到了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与别人合办的工厂中工作。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发达

^① 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499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

的国家,也是无产阶级发展最迅速、最典型的地方。所以恩格斯到英国之后,便把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他经常深入到工人贫民区,亲身了解工人人们的苦难和斗争。正象他自己后来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所写的:“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①恩格斯还多次出席工人的集会、宪章派的会议和群众大会,同宪章派的左翼领袖乔治·哈尼³等建立了联系,积极支持宪章运动,为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写稿,还在欧文派的报纸上向英国工人介绍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哲学。同时,恩格斯还结识了德国流亡工人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⁴(约1812—1870)、亨利希·鲍威尔⁵以及约瑟夫·莫尔⁶(1812—1849)等。这些活动,使恩格斯加深了对无产阶级的认识。

这时期,恩格斯还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研究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他猛烈抨击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反动,腐化堕落,指出在英国社会中到处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欺骗人民的陈旧偏见。“这里对一切问题都只有两种答案——辉格党⁷的答案和托利党⁸的答案”。^②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英国宪章派的“合法革命”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把一切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7页。

都搞糟了。他在总结英国工人 1842 年 8 月罢工失败的教训时指出：“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①

革命斗争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使恩格斯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并形成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在 1844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揭露了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商业危机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指明了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矛盾的根源，认为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②

根据在英国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在 1845 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阐明了无产阶级是极少偏见的、革新的、进步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实质上是保守的，它“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③，而无产阶级是未来的希望，“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④，他们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已从自发阶段进到有组织阶段，正是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推动它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还总结了英国宪章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重要原理。列宁后来指出，这种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四十年代参加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居住在不同的国度里，

① 恩格斯：《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50—551 页。

②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21 页。

③④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12、529 页。

⑤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7 页。

参加了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分别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科学研究，他们几乎同时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许多一致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就为他们两人合作、共同制定完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立场、世界观的转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广泛深入接触工人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正是在阶级斗争的推动和启示下，他们批判了自己旧的信仰，进而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学说，才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总之，没有革命的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恩格斯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更不可能产生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1844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伟大友谊，开始了他们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行斗争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并对它进行根本的革命改造。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改造，去其糟粕，吸取精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空前的大革命。

德国的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的主要代表是黑格尔(1770—1831)和费尔巴哈(1804—1872)。黑格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有一种永恒的“绝对精神”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实事物的源泉。黑格尔还把这种头足倒置的哲学自诩为绝对真理，是所谓“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同时，他还认为普鲁士君主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也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最高成果,从而暴露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为普鲁士专制制度效劳的阶级实质。但是,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它的方法是相矛盾的。他在论证“绝对精神”的发展中,包含有相互联系、相互转化、质量互变以及内在矛盾等辩证的思想,提出了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是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最初也是黑格尔左派。后来他和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决裂了,树立起唯物主义的旗帜。他认为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真实世界;人的意识和思维是物质实体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成为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然而,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时连他的辩证思想也抛弃了,他的哲学具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同时,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又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利用了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根本改造,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三种伟大发现,即动植物有机细胞结构的发现,能量转换法则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推翻形而上学的统治,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由于自然科学的这些成就,促进了唯物辩证法自然观的形成,“**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体系,从费尔巴哈哲学中批判地吸取了它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它的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变更和发展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

的创立，就推翻了社会历史科学中唯心主义的统治。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源泉。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荒谬地把资本家也看成是商品价值的创造者，这就不能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真正来源，从而掩盖了资本家剥削的实质。他们还认为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同自由竞争一样，是自然不变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的合理部分，抛弃了他们的阶级偏见和错误观点，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从商品关系背后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指出工人所得工资只是他们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剩余价值则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这就彻底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①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的发现，为无产阶级认识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真正地位，奋起谋求解放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19世纪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抨击和对未来社会的宝贵设想，为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但是，由于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空想的，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因此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这一任务得以顺利实现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页。

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① 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它开始产生时候起，就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同反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假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揭露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所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创立的过程，是一个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作斗争的过程。

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头目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在他们创办的《文学总汇报》上，鼓吹一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极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鲍威尔一伙极端仇视人民群众，他们把一切革命力量诬蔑为非批判的群众，是历史前进的阻力，只有他们的“批判”才是唯一积极的因素。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自命不凡的批判家，是创造历史的极少数的英雄。他们诬蔑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工人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他们鼓吹“为了创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他们还狂吠什么历史上一切活动的失败都是因为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热情，群众是精神的敌人，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批判鲍威尔之流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为此，他们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在1845年出版了。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作了彻底的批判，特别打击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论证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著名原理，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针对鲍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威尔的反动谬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这一著名原理。鲍威尔一伙把历史的事业说成是“救世主”的创作,不过是基督教创世说的变种。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入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替资本家生产财富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生产了贫困。因此,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②这种生活条件,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预示出来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③只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列宁指出,在这里,“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④这本书,“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⑤

1845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移居到了布鲁塞尔。他们同各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建立广泛的通讯联系,积极参加激进派和无产阶级的组织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和组织的准备。恩格斯后来回顾说:“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⑥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45页。

④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9页。

⑤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⑥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193页。

这一工作是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进行的。

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1844年，这一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在德国形成并流行起来。他们抛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积极因素，宣扬费尔巴哈的超阶级的“人”，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们鼓吹用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用“爱”来解放人类，创造“爱的世界”。他们说：“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①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主张阶级调和，他们虽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但根本不理解无产阶级的作用和任务，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提出要维护一切“人”的利益。他们胡说：“工人越认识到自己的状况，他们就对社会变得越加危险”，不应当破坏“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的协调”，“要避免革命”。这一流派自命不凡，硬说它负有使命要向世界揭示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他们宣扬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领域本身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意识”。^②因此他们不问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把在资产阶级已掌握了政权的法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口号和词句，硬搬到德国来，空喊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实际上保护了当

① 转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0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6页。

时德国的反动封建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在他的《唯一者反其所有物》一书中,极力宣扬绝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鼓吹一套以“我”为世界旋转中心的利己主义,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的唯一本质;他反对一切国家,主张靠个人暴动来建立无政府的、利己主义的联盟。他诬蔑和丑化无产阶级,胡说现存社会关系的一切罪恶归根到底在于:“市民和工人相信金钱的‘真理’。”所以施蒂纳是社会主义运动凶恶的敌人。他叫喊反对费尔巴哈的不彻底性,但并没有比费尔巴哈前进一步,他是一个“两眼朝天,把他的世俗的臀部对着世俗的世界”^①的人。

对于这种反动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思潮都利用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消极东西,而且更加倒退,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必须重新研究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评价,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斗争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中。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大约是1845年春天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以后写的。1888年才被恩格斯发现并稍加整理后首次发表。在这个文件中,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第一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轻视革命实践的直观唯物主义,强调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即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还批判了费尔巴哈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抽象地、非历史地考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1页。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察人，指出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就把唯物主义应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了。在《提纲》中，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旧唯物主义不能看到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②（指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编者）这就说明，新旧唯物主义，决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观点，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 worldview。

这样，马克思就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两个最基本的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所以恩格斯后来指出，这个《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巨著，进一步发展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基本思想，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作了彻底的清算，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揭露了当时在德国十分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理。他们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

①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8—19页。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的制约。”^① 所以“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 人们的生产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意识、观念；离开了生产实践，意识、观念便是神秘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又论证了生产方式在人们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总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前提的，而一定的生产关系又是为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所要求和决定。一定的生产力就会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③ 所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生产关系也产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中，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前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他们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且，“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④ 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没有危及私有制的存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要求彻底

①②③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5、25、81—82页。

消灭私有制。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并且对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政治和思想等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所存在的经济关系来决定的。“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①他们特别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②

马克思、恩格斯还初次探讨和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作用问题,认为国家是随着私有制产生而产生的,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同以前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④,而共产主义革命则要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他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⑤

①②③④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52、69、76、77页。

从上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蒲鲁东作斗争中,马克思于1847年4月写成了《哲学的贫困》一书,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且特别阐明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马克思后来在追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形成时写道:“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①

1847年底,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而写成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同时也首次对党的纲领和策略作了全面的阐述。《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

第二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建立

西欧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的、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深刻理解工人运动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所以在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时,就十分注意使自己的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努力为建立共产主义政党而斗争。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

当时，已有一些工人的政治组织，如英国的宪章派，法国的“四季社”⁹以及德国的“正义者同盟”等。然而，这些组织深受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不可能直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政党。因此当时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通过斗争，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使党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所以整个建党过程，就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是革命的组织原则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为此目的，马克思、恩格斯 1846 年初在比利时首都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它的任务是：通过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的通讯，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了解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批判错误观点，逐步统一认识，以便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下，把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为建党作好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该通讯委员会选出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菲利浦·日果¹⁰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个人建立联系。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建立了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通讯网，把英、法、德、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如德国的威廉·沃尔弗¹¹、约瑟夫·魏德迈¹²、斐迪南·沃尔弗¹³以及“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等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帮助下，加深了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成为建党的重要骨干。

经过通讯委员会对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组织的调查了

^① 《恩格斯致格罗桑·特利尔》（1889 年 12 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21 页。

解,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造“正义者同盟”上面。在实现这一任务中,围绕着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同魏特林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836年,最初是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成员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它的指导思想是魏特林的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后来又受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的阶级调和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口号是超阶级观点的“人人皆兄弟”。该同盟的宣言写道:“我们希望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希望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得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希望大家共同承受社会的重负、苦难、欢乐、喜悦,……为此目的,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它企图用密谋手段和发动少数人起义的办法来达到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目的。它的章程规定,泄露“同盟”的秘密,要处以死刑。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宣传性、半密谋性的团体。它与当时法国革命家布朗基¹⁴所领导的“四季社”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四季社”的德国分部。1839年5月12日,“正义者同盟”参加了“四季社”在巴黎领导的以密谋方式发动的一次起义,结果遭到失败。“同盟”领导人沙佩尔和鲍威尔被捕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沙佩尔、鲍威尔和“同盟”的其他一些成员到了伦敦,又把“同盟”恢复起来。自从“同盟”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伦敦以后,它的活动范围有了扩大,在英、法、德和瑞士相继建立了支部,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工人组织。这是其他工人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重要条件。“同盟”的部分盟员和领导者吸取巴黎起义的失败教训,对布朗基的密谋策略已感到失望;强大的英国宪章运动也促使“同盟”的领导人抛弃手工业者的狭隘性和一些错误理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情况使得他们有可能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为改造“同盟”进行了十分艰巨的工作。为了把“同盟”引上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要求“同盟”的领导人和

进步盟员注意研究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参加实际斗争中,逐步摆脱空想共产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①马克思、恩格斯曾先后向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的工人教育协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过《雇佣劳动与资本》、《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波兰问题》等报告,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同盟”盟员树立了把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他们还通过书信、报刊和会议等多种形式,批判错误思想,对盟员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帮助,争取那些进步的盟员。

和魏特林作斗争,是改造“同盟”的决定性一步。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生于贫苦家庭,当过裁缝,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837年加入“正义者同盟”。他在1838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或《人类的本来面目及其未来》)和1842年发表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他以辛辣尖刻的笔调,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②另一方面,他主张实行“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必须“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③这种绝对平等的观点是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魏特林的学说,对于德国初期的工人运动曾起过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对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④魏特林的学说是反映刚刚破产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手工业者的情绪,所以很快就被“正义者同盟”接受作为自

①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

②③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3、268页。

④ 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己的指导思想。但魏特林的学说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在理论方面，他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因此他所理想的“共有共享制社会”是空想的；在实践方面，他不是引导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斗争，而是搞兴办集体食堂等空想的试验；在策略方面，他不是依靠无产阶级，而是依靠小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并且主张依靠少数人暴动，立刻实现共产主义，并且还反对德国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民主革命。马克思认为，如果按照魏特林这种理论和策略办事，必然会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起初，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寄予很大希望，让他参加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十分耐心地帮助他，极力争取把他提高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水平上来。但魏特林却以“伟大人物”自居，“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自以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①，因而拒绝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在1846年3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马克思对魏特林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驳斥了他的宗派思想，分析了密谋活动的危害，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不应该是宗派密谋的道路，而应该广泛开展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马克思还指出，必须抛弃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德国的无产阶级应当参加消灭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斗争。可是，魏特林仍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并在5月11日的会议上公开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辩护。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出，魏特林不可能提高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水平上来，如果继续同他合作，必然有害于工人运动，于是，就坚决同他决裂，并通知各地通讯委员会，号召他们同魏特林及其拥护者作斗争。“正义者同盟”伦敦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页。

3
运动的
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巴黎的领导人艾韦贝克¹⁵和在德国的魏德迈等人，都表示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共产主义战胜了在“正义者同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对以赫斯¹⁶、格律恩¹⁷、克利盖¹⁸等人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展开了批判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这种以“仁爱”、“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反动思想，对“正义者同盟”仍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海尔曼·克利盖打着“同盟”的旗号，在美国进行蛊惑性的宣传，说如果在北美划出14亿英亩土地，无偿地分给贫困者，在这些土地上就将建立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

1846年5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了克利盖的问题，并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在《通告》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克利盖把关于“爱”的胡言乱语冒充为共产主义，“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①，这种荒诞的宣传，“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②马克思、恩格斯还揭露了克利盖谬论的阶级实质，指出它所代表的只是那些想逃脱破产命运、希望在美国碰上运气的小资产者，至于共产主义工人则绝不会跟着克利盖踏上那“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还将《反克利盖的通告》分发给在各地的“同盟”领导人。由于这一革命文件的传播，终于使“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③

①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③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页。

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是在巴黎展开的。当时“正义者同盟”巴黎各小组受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格律恩的影响很大，而巴黎又是“同盟”的主要据点之一。因此，必须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展开斗争，把巴黎的盟员争取过来。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重托，亲自去巴黎进行这一工作。

1846年8月，恩格斯到达巴黎后，参加了巴黎“正义者同盟”的组织活动。他在工人集会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向工人讲解德国的历史和现状，并批判格律恩及其追随者，以提高工人觉悟。斗争相当激烈。有一次辩论继续了3个夜晚。恩格斯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揭露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市侩实质。为了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为了人类的幸福”的博爱思想划清界限，恩格斯在辩论中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共产主义下了一个简短精辟的定义，指出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是：“（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①辩论的结果，会议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定义。这表明在“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战胜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中，使“同盟”领导人受到了教育，他们表示，要摒弃其他流派的思想，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斗争中，还出现了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领导者（如普芬德¹⁹、埃卡留斯²⁰等）。这就为改组“正义者同盟”创造了思想条件。1847年春，

^①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委员会的第三封信，1846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

约瑟夫·莫尔遵照“正义者同盟”的决定，携带由“同盟”各领导人签署的正式委托书，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对“同盟”进行改组，并声明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正确，表示“同盟”将摆脱陈旧的观点和宗派主义的密谋策略，马克思的学说“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①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就改变了过去拒绝参加“同盟”的态度，接受邀请，同意参加改组“同盟”，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

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章程。马克思由于经济困难没有出席，恩格斯则代表巴黎支部出席了大会。会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抛弃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从此，这个口号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战斗口号。

大会通过了由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两个主要起草人所拟定的新章程。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②这表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已成为“同盟”的指导思想。章程对盟员的条件，作了6项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同盟”盟员必须承认共产主义，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必须参加“同盟”的某一个支部。章程的其他条文也都贯穿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充分体现了革命政党的正确的组织原则，从而消除了以前那种组织上的宗派性和密谋的传统方式。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开除魏特林及

①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其拥护者出盟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同盟进一步团结起来。最后，选举了中央机构的成员，并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共产主义杂志》。这次大会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改组“同盟”的路线取得了胜利。

1847年11月底至12月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代表布鲁塞尔和巴黎“同盟”组织出席了大会。会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经过10多天的激烈辩论，大会不仅最后批准了上次大会所拟定的新章程，并且委托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草拟“同盟”的纲领，作为党的宣言公布出来。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共产党宣言》。

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 战斗纲领

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①“这部著作以……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②它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丰富内容。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目的和任务，革命的依靠力量，革命的道路等作了科学的规定和论证。它是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作斗争的产物，又是对这一斗争的科学总结。因此，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战斗性和科学性。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3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以下主要观点。

(一)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就是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 证明共产主义革命是合乎规律的、不可抗拒的, 是一定要胜利的。列宁曾经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 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 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①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这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一切社会一样, 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小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 资产阶级就同封建阶级进行反复的斗争,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 经过复辟和反复辟的长期斗争, 资产阶级才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 扫除了落后的封建关系,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所以,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 资产阶级只是用新的剥削形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旧的剥削形式, 它是建立在残酷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产品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日益尖锐化, 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

^①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3卷,第603页。

机在不断扩大和加深。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样,“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①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它固有的矛盾,无法消除经济危机,要消除经济危机,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②

(二) 共产主义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实现。

《共产党宣言》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地位和阶级特性决定的。

首先,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③,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大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它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团结的精神。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是一切被剥削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它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其次,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剥削,使无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下层,它经济地位低下,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政治权利,受压迫最深,所以它最仇恨私有制和一切形式的剥削;它没有私有包袱,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无产阶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0、36、34页。

来”。^①他们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②

最后，无产阶级是一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只有彻底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使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都得到解放，才能彻底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其它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也只有它才能代表其它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领导他们去进行推翻资本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③所以，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而且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④

（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由之路。

《共产党宣言》总结了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恩格斯说：“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部分就可以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5、58页。

④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3卷，第603页。

读到。”^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产生的时候开始的。斗争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愈到后来，斗争就越尖锐。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团结，越来越提高自己的觉悟。资产阶级同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一样，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运用手中一切武器，特别是国家政权来镇压无产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仅仅依靠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手段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

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③无产阶级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④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初次明确表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就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迅速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实现共产主义。这就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⑤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就是私有制关系，是产生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经济根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废除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清除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85页。

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8、44页。

一切剥削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使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物质力量，逐步达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传统的观念是反映私有制的私有观念，也是维护私有制的思想武器。而传统观念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自行消失，特别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会长期腐蚀和影响人们，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但要在经济领域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长期的斗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彻底破除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和传统习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还要进行教育革命，“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①，要“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②，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③，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④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国家才会逐步消亡。

（四）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说，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⑤但是，从内容上说，无产阶级革命从来就是国际性的。这是因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⑥这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要求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民族的压迫实质上是阶级的压迫，所以，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必须相互援助，相互支持，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宣言》强调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

①②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1、45、35页。

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²¹①《宣言》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²²②团结战斗的号召，一直鼓舞着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胜利斗争。团结战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

（五）共产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领导力量。

《共产党宣言》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论述了党的性质、特点、任务和策略原则，从而说明了共产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全世界历史使命的领导力量。

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才能够作为独立的统一的阶级而行动；才能够自觉地去冲击资本主义；才能够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无阶级的新社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自觉代表者，它没有任何与整个阶级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共产党又是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能率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宣言》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²³③共产党革命路线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²⁴④这就是说，共产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坚持不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3、58、37页。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
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①党的最终
目的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
各种私有观念，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宣言》还论述了共产党的策略原则。共产党在反对现存社会
制度的革命斗争中，必须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始
终代表整个运动的未来，不忘最终目标。共产党人为了反对当前
主要的敌人，在同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联合、团结和协议时，要
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
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②，决不放
弃对各式各样同盟者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要同他们划清界限，保
持自己的独立性。《宣言》还根据德国当时的社会阶级情况和无产
阶级革命的任务，提出无产阶级在德国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君主制的斗争，并积极准备在推翻封建统治阶级之后，坚持不断
革命，立即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这里包含了由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总之，《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各项基本原理，为无产阶级政党
制定了一个革命的纲领、路线和策略，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解放的道
路。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事件。
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资产阶级辩护士们正极力宣扬资本
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时，马克思、恩格斯就科学地指明并庄严宣布：
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给无产阶级的斗
争以强大的精神武器，给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以沉重打击，充分体现
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反潮流精神。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7、58页。

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①《宣言》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雏形——“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西欧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毛主席指出：“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②从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便成为亿万劳动群众奋斗的目标。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各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革命原则指导下，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是《共产党宣言》确定的革命纲领和路线不断战胜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的革命原则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路明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宣言》基本思想指导下，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第三节 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 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法国二月革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及其意义

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化，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了。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各种阶级矛盾激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革命的具体任务也就有所不同：法国是要求铲除封建

①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2页。

②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5页。

残余,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德国是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英国是争取普选权,改革选举制度;意大利是要求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则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1845—1846年,欧洲大陆的农业歉收和1847年蔓延整个欧洲的工商业和财政危机,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1848年初,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等国家,都相继爆发了革命。法国是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法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给整个欧洲革命进程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

1848年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较之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这次革命的主导力量,使这次革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法国革命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历史特点。二月革命后不久,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又使阶级斗争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它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搏斗。

法国二月革命前的奥尔良王朝是金融贵族的专政,它只代表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矿山和森林主以及资本主义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金融贵族的腐朽统治下,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处于无权地位,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也只有少数的议席。由于生产和经营畅销商品的专利权完全为金融贵族所掌握,这就严重地威胁和损害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大资本竞争和交易所投机活动的排挤、欺压下,大批小资产者纷纷破产。广大农民由于高利贷的盘剥和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生活极端困苦。无产阶级的境遇更为悲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失业者不断增加。所有这一切,

普遍地激起了对奥尔良王朝的愤懑情绪。

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要求政府降低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把王朝改为共和国，以便扩大自己在政府中的权力。他们原定在1848年2月22日举行的“宴会”²¹，虽然旨在鼓吹改良，但也遭到政府禁止，这件事就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线。自由资产阶级屈服于政府的禁令，不敢行动。但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人民在22日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政府随即调兵镇压，工人构筑街垒进行抵抗。23日，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同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在英勇战斗的武装工人面前，政府的国民自卫军开始动摇。国王路易-菲利浦迫于形势，不得不罢免政府首脑基佐，企图以另组新阁的阴谋来愚弄群众，缓和矛盾，以便重新纠集力量来消灭革命。而资产阶级则准备妥协，大肆宣扬革命已经胜利，鼓吹停止战斗。但是工人斗志更旺，24日，分散的街垒战斗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奥尔良王朝，二月革命获得了胜利。

巴黎的武装工人是推翻奥尔良王朝的主要力量。可是在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11名成员有7人属资产阶级共和派，2人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的代表只有2名。政府一切重要职位都被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垄断，作为工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²²只落得个空头委员。路易·勃朗（1811—1882）实际是一个以社会主义词句装饰起来的机会主义者。他认为劳动者遭受剥削和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主张由国家成立生产协会和社会工厂，借助国家贷款，根据生产协会和社会工厂的协议进行生产，逐步和平地兼并和排挤资本主义企业，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一切改良只有通过说服和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他在临时政府中鼓

吹阶级调和，散布改良幻想，完全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对革命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

临时政府的活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敌视无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施展了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以便争取时间，积蓄反革命力量，解除工人武装，并用挑拨离间的手法把无产阶级孤立起来。

在手执武器的工人的逼迫之下，临时政府为了掩饰它的反革命阴谋，作了一些表面上的让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废除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宣布实行普选权；保证工人有“劳动权”并缩短工时等。同时还根据工人提出的“组织劳动”、成立劳动部的要求，设立了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常设委员会（因会址设在卢森堡宫，又名卢森堡委员会），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分任正副主席。但是，这个委员会完全是个徒有其名的虚设机构，它既无实际权力，又无活动经费。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是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①但无产阶级却以为他们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国”已经实现了。这说明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还不高，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也还是模糊的。

资产阶级为了孤立和打击无产阶级，消除无产阶级在二月街垒战中获得的政治威望，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掩盖下，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拼凑和掌握反革命武装，加强镇压的力量。先是通过改组国民自卫军解除了工人武装，随后又招募大批流氓无产者组成了24,000人的别动队，作为它的反动支柱。接着，临时政府又大量起用旧时的反动政客，借以纠集反动势力，充实官僚机构；并以废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

除死刑之名，使奥尔良王朝的一切重大罪犯都逍遥法外。

为了分化无产阶级和离间工农关系，临时政府假借满足工人对“劳动权”的要求和实现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计划，设立了“国家工厂”，收容了 10 万失业工人，把他们按半军事组织编制起来，驱使他们从事繁重而效率极低的土工劳动，发给他们微不足道的工资。资产阶级认为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控制大量失业工人，防止他们起来革命；又可以丑化社会主义，分化无产阶级，利用“国家工厂”的工人去反对他们的阶级兄弟。但是这个挑拨阴谋却失败了。同时，临时政府又以养活“国家工厂”的工人为借口，把主要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负担的直接税提高 45%，即一法郎税款增加 45 生丁附加税（实际上增加的税收都用来供养官吏、警察和别动队），煽起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这样，在“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①，从而达到了资产阶级力图离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罪恶目的。

资产阶级就是采用这些阴险、狡猾、欺骗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以及除无产阶级以外的各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孤立了无产阶级。阶级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新的变化。于是，资产阶级公开露出狰狞面目，采用挑衅策略，阴谋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4 月间，资产阶级在卢昂城残酷镇压了工人起义。5 月，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由于制宪会议选出的政府，排除了原来仅有的两名工人代表，使工人群众更加愤怒。5 月 15 日，工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结果遭到镇压。随之，工人斗争所获得的一切成果都被剥夺殆尽，卢森堡委员会被解散，革命俱乐部被查封，许多工人活动家被捕入狱。6 月 21 日，资产阶

^①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8 页。

级政府宣布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者编入军队，实际上就是要解散国家工厂。“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①22日，工人们没有理睬路易·勃朗的“如果工人拿起武器，共和国就要灭亡”的说教，他们构筑街垒，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要求解散立宪议会，在人民参加下制定宪法，并且提出了建立“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在激烈的街垒战中，4万名极端缺少武器的起义者面对着20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队。起义者视死如归，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经过了5天的浴血奋战，最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随之而来的是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对起义者的野蛮屠杀和疯狂迫害。有3,000多人被杀害，不经审讯即遭放逐的达15,000人。那些受审的起义者，在法庭上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硬骨头精神，他们蔑视残暴的敌人，大义凛然地说：“你们屠杀吧！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马克思指出：“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②

六月起义的失败，是由于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和明确的战斗纲领；没有经费和缺少武器，实力对比过分悬殊；而且无产阶级是处在没有农民支持的孤立无援地位。

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着深刻的意义。首先，六月起义“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性质”。^③“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②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页。

③ 恩格斯：《6月23日事件的详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31页。

斗。”^①它第一次把法国社会真正划分为两大敌对的营垒，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明朗化了。二月革命时，工人们还相信能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自己解放。现在，革命的教训宣告了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其次，六月起义揭穿了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虚伪本质。六月流血事件证明，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时，“自由、平等、博爱”的格言就会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②挂着“自由、平等、博爱”招牌的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无限制的专制统治。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因此，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③最后，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在二月革命中的行动证明，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在1848年革命中是臭名远扬的，因为他从阶级斗争的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立场，用‘社会主义’词句装饰起来，而实际上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④路易·勃朗所鼓吹的那一套改良主义谬论，对无产阶级只能起到麻痹的作用。巴黎六月起义给了这些改良主义谬论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无产阶级英勇战斗的革命本色。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法国革命走向低潮。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象二月革命前那样只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之

①⑧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417页。

②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0页。

④ 列宁：《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第14页。

间进行。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全部反动政策，表面上加强了它的统治，实际上它的统治基础极其薄弱。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被镇压，使它失去了捍卫共和制的坚强力量；由于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强压榨，也很快失掉了他们的支持。同时，各种保皇势力趁无产阶级起义被镇压的机会，迅速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秩序党，狂热地进行着推翻共和国的复辟活动。这样，共和党和秩序党之间的斗争就展开了。

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统选举中，由于农民具有强烈的“拿破仑观念”²³和对共和党的不满，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宠儿，镇压六月起义的剑子手卡芬雅克失败落选；而法国以前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儿、政治骗子路易·波拿巴（1808—1873）却赢得了农民的绝大部分选票，当选为总统。这样，政权就开始转移到君主派手中，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灭亡的开始。

波拿巴上台后，力图称帝。他一面搜罗流氓、骗子、无业游民，成立反动组织“十二月十日会”，到处进行笼络人心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大量起用镇压六月起义的剑子手，用巨款收买军官和士兵，任用亲信为巴黎卫戍司令，大力扩充警察机构，加强自己的行政权力，完成了一个拥有 50 万官吏和 50 万军队的庞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善于看风使舵的路易·波拿巴，眼看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就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发动政变，调集 7、8 万武装占据巴黎各军事要点，逮捕所有反对他的议员，解散立法国民议会，延长总统任期，并进而于 1852 年 12 月 2 日废除共和，宣布恢复帝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遂告灭亡，代替它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 年）的统治。波拿巴帝制的性质，是以军阀势力为支柱、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从 1848 年至 1849 年的革命风暴所引起的动荡不安的法国政局，在延续 3 年之后，终以帝制代替共和而告结束。

二、德国三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

在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三月革命。

19 世纪 40 年代末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产业革命阶段。但是，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国家的不统一（分裂为 36 个各自为政的邦国），却使它在经济上落后于英、法两国。在整个工业中，手工业生产占绝对优势；在广大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消灭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实现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爆发前，无产阶级已拥有 70 万人的队伍，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实现国家的统一。尤其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境内建立了大约 30 个小组或支部，它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德国资产阶级则因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在革命中必然背叛革命。

1848 年 2 月底 3 月初，在邻近法国的南部诸邦如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首先爆发了人民革命运动。3 月 13 日，奥地利首府维也纳爆发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府，奥皇被迫免了首相梅特涅²⁴，答应成立有自由资产阶级参加的内阁，并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在维也纳起义的推动下，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进而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革命群众在全城筑起街垒，同军队进行了 16 小时的激烈战斗，普鲁士国王被迫让步，答应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改组政府，撤退城内驻军，柏林的三月起义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却乘机攫取了政治权力，以大富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新

内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民在街垒战中“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①封建势力则以表面的让步，改头换面地保持下来。

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继续发展，赶快把革命从街头引进议会厅里去。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这个自命负有统一德国使命的议会，从成立起就为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掌握，使它成为从事空谈和繁琐辩论的场所。“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im Luftreich des Traums*）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②封建反动势力在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掩护下，得以重整旗鼓，转入反攻。

随着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德国封建反动势力也转入进攻。德国各地不断爆发的起义先后遭到镇压。1848年11月，普鲁士国王改组政府，强行解散正在制定宪法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完全恢复了君主专制的统治。1849年3月，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全德的帝国宪法，并选举普鲁士国王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这个宪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因此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帝位，并向各邦发出拒绝承认帝国宪法的通告，接着镇压了在各地掀起的护宪运动，法兰克福议会被解散，各邦又恢复了封建的反动统治。1848年3月开始的德国革命遂告结束。

德国革命开始不久，马克思、恩格斯便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下简称《要求》），这个文件是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行动纲领。它把《共产党宣言》

① 恩格斯：《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8、540页。

所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的基本原则具体化了。

《要求》规定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① 为了把德国建成一个统一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要求》还规定了各项民主改革的措施：如实行普选权，保证工人代表参加议会；建立人民武装，使军队同时成为劳动大军；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普及国民教育；官员薪金一律平等；废除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切封建义务，等等。这些措施把国家的统一和民主任务结合起来了。

《要求》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所以它规定了许多过渡性的措施，主要是：没收封建领地和其他封建财产为国家所有，并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将一切矿山、矿井、银行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保证工人不致失业；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等等。实行这些措施，就能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要求》的上述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和利益。它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后来，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对德国革命的要求时指出，这个政权“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②

为了实现上述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德国国内阶级力量对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97 页。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20 页。

比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国际环境的特点，拟定了一条革命路线。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和叛卖行径，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起码应当成为民主派中的彻底革命派；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变行为，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者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达到推翻封建贵族的反动统治；同时，联合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沙皇俄国，以巩固革命的胜利。

为了直接领导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秘密地回到了德国。他们选择了工业最发达、工人较多并有出版自由的莱茵省省会科伦，作为活动的基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也迁到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贯彻革命路线，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斗争策略。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大部分还是手工业工人，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当时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无产阶级只能以民主派的彻底革命派的身份进行活动，就是说要打起民主派左翼的旗号，采取同民主派联合的策略，以便团结广大群众，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无产阶级同民主派合作时，必须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进行斗争；工人在参加民协协会时，应反对其“溶化政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恩格斯后来指出：“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①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创办大型日报，掌握斗争的工具，

①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

是指导“同盟”盟员活动和教育广大革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好形式。为此，他们在克服了各种困难之后，终于在1848年6月1日出版了大型日报——《新莱茵报》。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和其他许多著名的“同盟”成员都参加了编辑部工作。这个报纸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面貌出现的，但它到处都显出无产阶级性质。《新莱茵报》从创刊起，就成了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战斗纲领和策略路线的有力武器。这个编辑部成了无产阶级真正的战斗司令部。

《新莱茵报》揭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和幻想，指出柏林三月街垒战斗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那些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了可以坐享胜利果实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善良愿望。

《新莱茵报》还不断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变行为。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深刻而精辟地剖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①马克思、恩格斯还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为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把它看成是“清谈馆”，是“老太婆议会”；并且告诫革命群众不要相信议会无力的决议能够扭转乾坤，强调指出：“我们的基础不是法制的基础，而是革命的基础”。^②

《新莱茵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1848年3月至12月，以西里西亚为中心爆发了强大的农民运动。《新莱茵报》还连续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沃尔弗所写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组文章。沃尔弗出身农奴家庭，从小就对封建奴役有切身体验。他在文章中揭露了容克地主贪婪的掠夺本性和虚伪无耻的罪恶行

①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二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2页。

②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18页。

径。文章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地主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他们的钱财和土地的。文章揭露的事实,对农民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受到普遍的欢迎。

《新莱茵报》还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声援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第一声枪响,它就站在起义者方面,表示坚决的声援。它对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表示坚决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研究总结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无产阶级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看作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认为当时德国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革命目标应当是争取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碎障碍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量的战场。”^①无产阶级将要在在这个战场上认清自己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利用共和国所争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充分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组成自己的独立政党,并争取实现革命的领导权,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贯彻这条革命的策略路线,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当时领导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以及“工人兄弟会”的斯蒂凡·波尔恩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无产阶级的全部任务只是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使失业者就业,使工伤残废者得到救济,而不要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不要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他主张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待法兰克福议会来解决一切问题,企图使无产阶级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左”倾路线的代表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他曾经主张进行合法斗

①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0页。

爭，断言只要工人在立法机构中取得席位便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确立“自由、博爱和劳动”。可是在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中，哥特沙克的幻想破灭了。从此，他走上另一个极端，无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完全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拒绝同民主派结成联盟，拒绝参加选举，认为工人阶级参加民主运动是“机会主义”，要求立刻建立“工人共和国”。哥特沙克以“科伦工人联合会”为中心，进行分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由于他们的努力，柏林和科伦的工人组织开始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还被选为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教给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策略，是把斗争推进到最高形式的策略，是引导农民跟着无产阶级走，而不是引导无产阶级跟着自由派叛卖者走的策略。”^①“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②

1849年5月，在南德和西德各邦掀起了革命的余波——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接连发生了武装起义。在这个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农民参加了战斗，先进的无产阶级仍然走在运动的最前列。马克思和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城乡劳动人民中展开鼓动工作，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武装，制造弹药，支持起义地区。恩格斯则亲自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他负责筹集部队的粮食和弹药，亲自训练战士，并英勇地参加了4次战斗，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和勇敢顽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各地的起

① 列宁：《沿着老路走去》，《列宁全集》第15卷，第29页。

② 列宁：《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4页。

义很快就失败了。反革命势力乘机封禁《新莱茵报》，并下令驱逐马克思。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用红色油墨印成的最后一期报纸对工人写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①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流亡于伦敦。他们立即着手整顿“共产主义者同盟”，重新改组“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吸收奥古斯特·维利希²⁵、康拉德·施拉姆²⁶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等人参加“同盟”的工作。

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和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②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应该是组织和训练自己的队伍，长期积蓄革命力量，为将来革命作好准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斗争策略，“共产主义者同盟”必须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工作，从思想上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从组织上加强无产阶级的队伍，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

但是，在革命转变的关头，“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策略分歧和斗争。中央委员会成员维利希和沙佩尔竟同空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到一起，把革命仅仅看成是一小群革命家的意志的表现，相信密谋和暴动万能，准备采取直接行动，组织新的起义。他们极力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在1850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严肃批判了维利希和沙佩尔所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策略，强调指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科伦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

出同他们的分歧是原则性的：“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指《共产党宣言》。——编者）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他们“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①；他们的冒险主义活动，必然会为反动派迫害革命者制造借口，从而使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危害。可是，维利希、沙佩尔等人不但毫无悔改，反而进行分裂活动，非法地成立了自己的“中央”。至此，“同盟”中央终于被迫分裂。马克思根据决议，委托“同盟”科伦区域委员会组织新的中央，并通过决议将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开除出去。1851年5月10日，科伦中央委员会的特使诺特荣克²⁷在莱比锡遭到逮捕，他随身携带的“同盟”中央的秘密文件也落入警察手中。以后又有10个盟员和支部负责人被捕，有人成了叛徒。普鲁士警察局就借机无耻地组织了所谓“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²⁸。此后，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同盟”伦敦区部同欧洲大陆各国的联系即被切断，“同盟”实际已不存在。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

“同盟”从成立到解散仅仅5年多的时间，经受了革命斗争的严酷考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同盟”和过去一切密谋宗派组织根本不同，它具有公开的、明确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有严密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它是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雏形，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②它是团结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形式，为以后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树立了榜样，培养了干部。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

①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17、618页。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页。

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战斗活动，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青春”。^②

三、1848年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长期分别受着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前的意大利，是一个在政治上分裂为8个小邦的封建专制国家。各邦在不同程度上受着奥地利的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因此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奥地利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完成国家的统一。

从1848年1月起，意大利人民就发动了反对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同年秋季，革命运动在民主共和派领袖朱泽培·马志尼²⁹和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朱泽培·加里波第³⁰的领导下，又获得了新的进展，全国展开了反对王权暴政、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运动。1849年2月，罗马共和国宣布成立，并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但是，由于教皇和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反奥斗争的极力阻挠；由于以马志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软弱和动摇，不敢用革命的方式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而且斗争双方的力量悬殊；因此，1849年7、8月间，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反革命联军的袭击下，加里波第虽然率部英勇抵抗，罗马共和国终于遭到覆灭，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

^{①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6、186—187页。

的革命斗争遂告失败。

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枪声未停，同受奥地利压迫的匈牙利人民又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1848年3月15日，布达佩斯人民在青年爱国诗人裴多菲(1823—1849)的领导下，起义获得了胜利，并且成立了以温和自由派鲍蒂扬尼伯爵为首的匈牙利独立内阁。自由主义贵族反对派的著名领袖拉约什·科苏特(1802—1894)也参加了内阁。新内阁立即着手实行民主改革，取消政治特权，实行普选制，在农民群众的压力下，废除了劳役地租以及其他一些封建义务。但是，奥地利政府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在镇压了维也纳人民的5月暴动之后，便于同年9月宣布不承认匈牙利内阁，并派兵进攻匈牙利。匈牙利人民在科苏特的领导下，组织了“保卫祖国委员会”，抗击侵略者。经过反复的顽强战斗，直至1849年4月间，匈牙利人民终于取得反攻的胜利，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继而解放了匈牙利全境。恩格斯指出：匈牙利斗争的胜利，具有弱小民族战胜强大民族的“真正的革命性质”。^①匈牙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胜利，引起了欧洲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俄国沙皇被奉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法国二月革命发生后，俄国大量调动军队，在普鲁士边界集中15万，在波兰集中12万，这次它又直接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的革命。在奥皇的请求下，1849年5月8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发表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反动宣言。27日，他打着维护“世界秩序和安宁”的旗号，派兵14万入侵匈牙利，完全暴露了沙皇俄国国际宪兵的凶相。在俄奥联军的打击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终于失败。

1848年革命前的捷克，也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它工业比较发达，资产阶级占优势，但也仍然保存有农奴制残余。捷克革

^①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3页。

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奥地利的统治，消灭农奴制残余，实现民族独立。

1848年3月间，捷克人民奋起斗争，首都布拉格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状况。农民运动随之而起，要求废除封建义务。奥地利政府被迫答应给失业工人以补助，并颁布免除农民劳役地租的法令。6月，布拉格爆发武装起义，反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但是，由于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起义者孤立无援，终于失败。

与此同时，奥属的南方斯拉夫人（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起而要求使用自己的语言，取消封建赋税，成立自治政府。

捷克是西方和南方斯拉夫人民族运动的中心。但是，捷克自由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问题上采取了投降主义的立场，因此在布拉格六月起义失败后，捷克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就完全掌握在捷克自由资产阶级的手中。他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并实现自己的统治，极力阻挠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力图把运动拉到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道路上去。他们公开出卖民族利益，主张保持奥地利帝国的完整。

革命前的波兰，处于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统治下。长期以来，波兰人民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1848年，波兰各地再次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3月，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克拉科夫、加里西亚和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兹南等地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政治自由和民族平等，恢复1772年前即俄、普、奥第一次瓜分波兰前的疆界，要求武装人民，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平分土地。但是，由于小贵族、自由派资产阶级夺取了运动的领导权，主张走和平请愿的合法道路，根本不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阻碍了运动的发展。普鲁士反动政府慑于波兰人民斗争的压力，曾经许下进行“民族改组”的甜蜜诺言，但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派兵镇压人民起义运动。由于波兰资产阶级和小贵族的屈服投降，由于没解决土地问题而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到4月间，波兰的民族起义就被普军完全镇压下去。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王国也有活跃的革命运动，但由于沙皇的残酷镇压而被扼杀。

1848年欧洲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虽然失败了，却表现了被压迫民族的巨大革命威力，并使运动超出民族的范围而具有全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大力声援和支持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在他们所主办的《新莱茵报》上，报导了这些民族解放战争的情况，揭露了俄、普、奥等国反动势力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凶残面目。同时，他们还研究和总结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密切关系，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纲领和策略的基本思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欧洲的情况，科学地揭示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深刻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欧、东欧形成了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奥地利帝国和俄国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在这种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压迫弱小民族；而在每一民族内部又存在着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近代以来，当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高度发展时，中欧、东欧的一些被压迫民族则仍处在“封建殖民地”的落后状态。随着这些被压迫民族内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人民的觉醒，他们便开始进行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所以当时的中欧，尤其是东欧就成为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发源地。1848年欧洲革命唤醒和促进了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自己民族权利的斗争，因而形成了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次民族独立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说明了：“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

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①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是无产阶级制定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无产阶级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民族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运动。由于当时欧洲的历史条件,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反动的神圣同盟的三霸,是反动势力的靠山,是民族压迫的祸首,尤其是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因此,反对三霸的斗争,特别是反对沙俄的斗争是当时欧洲各被压迫民族的首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根据对三霸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的民族运动和反动的民族运动的主要标志。当时波兰、意大利、匈牙利的民族运动之所以是进步的、革命的,就是因为它们反对俄、普、奥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恩格斯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压迫者,因为俄罗斯政府也象压迫波兰人一样地压迫着我们。无论是解放德国,无论是解放波兰,其首要条件是根本改变德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把俄罗斯赶过德涅斯特河和德维纳河。”^② 这些民族运动之所以是进步的、革命的,还因为它们把反对外国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反对国内封建势力、实行民主改革的斗争结合起来了。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民族斗争必须服从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利益,只有这种民族独立运动才具有进步作用和巨大的生命力。

同这种进步的民族运动相反,发源于捷克和南方斯拉夫人并受到沙皇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是反动的民族运动。捷克自由派资产阶级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是为了投靠哈布斯堡王朝,向奥皇表示忠诚,极力主张奥地利帝国的完整,以便在奥皇的卵翼下享有一些自治权利。恩格斯指出:“泛斯拉夫主义的实现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22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7页。

只能是俄国对奥地利的庇护。”^① 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② 泛斯拉夫主义正好适合沙皇俄国侵略政策的目的，适合它扩张领土的野心。由此可见，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运动既与欧洲民主运动总的利益相违背，也不符合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真正利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捷克人民反对奥地利的统治、布拉格举行起义的时候，曾经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声援；但是，当自由资产阶级把运动拉上泛斯拉夫主义道路以后，就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领导的进步的民族运动也有它阶级的局限性，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③ 他们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国际主义纲领和策略的基本思想。早在革命前夕，他们就根据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压迫另一些民族的根本原因，根据俄、普、奥瓜分波兰，并置普、奥于俄国控制之下的痛苦经验，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原则，即“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④ 这一著名论断所包括的内容和要求是：(1)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大力开展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2)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对压

①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9页。

②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1页。

③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9—290、287—288页。

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种有力的支持；(3)民族压迫实质是阶级压迫，只有消灭产生民族矛盾的阶级压迫，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彻底摆脱民族压迫的道路。可见，民族解放的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为条件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欧洲的无产阶级都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并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责无旁贷的崇高国际主义义务。

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各民族的自由分离和自由联盟的原则。为了贯彻这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实质上是民族改良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同时，也反对了德国人的狭隘爱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恩格斯指出，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利益”作幌子，推行它吞并波兰的反动政策；宣扬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的“优越感”，制造他们同波兰人的不和，以便在波兰人中建立德国人的统治。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德国人的任何民族偏见，德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支持波兰独立的同时首先推翻国内的反动统治，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才能实现国际主义的政策。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运动的理论、纲领和策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唯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①它完全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推动了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为后来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席卷全欧的轰轰烈烈的 1848 年革命失败了。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退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44 页。

让；无产阶级虽然充当了这次革命运动的主力，但由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都不高，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把革命进行到底。

1848年革命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正是从它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次革命的意义作了恰当的评价。马克思认为，这次革命是一场“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①这场阶级斗争又集中地表现在欧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上。革命的整个进程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②，而资产阶级却与反动势力相勾结，调转枪口血腥地屠杀工人群众，把昨天的敌人当作朋友，把最初的同盟者看成敌人。所以，马克思认为，今后历史的发展都要以无产阶级的成败为转移，无产阶级将成为决定历史命运的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将要由无产阶级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来完成。

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有利于欧洲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事业的发展，并为各国无产阶级走向国际联合，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恩格斯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③

1848年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更直接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无产阶级通过这次革命实践，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马克思主义被证明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科学真理。列宁后来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1页。

②③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21、22页。

指出：“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它证明了“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①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本能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鼓舞者。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②革命失败后，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准备新的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写成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无情地回击了反动派的无耻谰言，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着重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和策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不断革命。

1848年欧洲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分析法、德革命的进程时，马克思以形象的比喻得出结论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③又说：“**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④恩格斯说：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⑤这种由阶级矛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②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④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30页。

⑤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

盾的激化所引起的革命,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进程和速度。只有革命,才能真正教育人民,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只有革命才能使革命的阶级抛弃幻想,明确前进的方向,找到前进的力量;也只有革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革命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对于革命的阶级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马克思根据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革命失败了,但“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①“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② 1848年革命运动对无产阶级最深刻的教育,就是使他们懂得了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要取得自身的解放,就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如何对待群众革命运动,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与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时指出:“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③ 资产阶级总是利用群众运动去谋它阶级的私利,一当群众运动越出资产阶级利益许可的范围,它就咒骂和镇压群众运动。

恩格斯在分析小资产阶级对待群众革命运动态度时指出:这个阶级平时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3页。

② 马克思:《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5页。

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一旦群众起来，它就惊恐万状、顾虑重重；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战斗的地步，它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①

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根本相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都亲身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从理论上、策略上积极指导群众的伟大战斗，以最大的热情歌颂群众的英勇行动。在事变之后，他们又以冷静的科学态度，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引导群众循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在1848年革命中，每个阶级的行动都暴露了各自的阶级本性。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切社会改良主义者对革命所抱的有限目的，以及他们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妥协性、动摇性，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②“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③ 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④

① 参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30页。

②③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4、385、39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光辉思想，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无产阶级在实现民主革命任务的基础上，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还要不断革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①因此，无产阶级不但在一国范围内要不断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要热情支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所以真正的不断革命论者，必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坚持不断革命的精神，就能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防止或克服蜕化变质的危险，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精力，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

（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基本力量。

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德两国的革命都充分证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总是离间工农关系，争夺农民，使无产阶级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马克思根据这个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说：“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②马克思又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争取到农民作为自己的同

①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

盟军,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 185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分析德国革命时又强调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②

马克思还论证了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他指出,由于农民阶级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使它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可靠基础。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有正确的农民政策,那末,在资本主义打击下面临破产的农民就必然会“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③

要实现工农联盟,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阶级路线。恩格斯对德国农村各阶层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富裕的农民”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则是农村中最积极的革命力量,能够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④

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是不能分割的。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会有工农联盟;工农联盟的建立,是以农民承认并接受无产阶级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为前提条件的。

(三) 群众起义、人民战争是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主要形式。

革命是一种暴力。马克思说:“如果我在演说中号召革命,那末我用不着再加上一句:‘你们要用暴力反抗官员’”。^⑤ 1848年革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9页,注①。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

④ 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7页。

⑤ 马克思:《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0页。

命时期的群众起义、人民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为暴力革命提供了最有力和最基本的形式。恩格斯认为，这些斗争形式是小民族战胜大民族，弱小的军队抵抗装备精良组织较好军队的唯一方法。面对着比较强大的敌人，如果仅仅依靠军队的普通战争，是不能取胜的。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时期，不仅亲自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而且着重地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军事问题。他总结了暴力革命的基本形式，尤其是对怎样进行武装起义，使起义获得胜利，作了理论性的概括，阐明了武装起义的原理。

武装起义是群众性的革命暴力行动，是刚刚拿起武器并往往居于劣势的革命群众，同训练有素、力量强大的反动军警之间一场特殊的战争。因此，要使起义获得胜利，就必须在事前作好充分准备，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恩格斯说：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第一，起义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要把起义当作儿戏，轻率地“玩弄起义”；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第三，必须“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第四，“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第五，“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①，以壮大起义者的声势和力量。只有遵循这些原则，起义才有可能获得胜利。

群众对敌斗争的革命热情、勇敢、果断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在武装起义中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说：“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85—586 页。

的毅力，谁就能取得胜利。”^① 恩格斯极端鄙视那些胆小、怕死鬼，称这种人为可耻的逃兵和懦夫。

恩格斯不仅奠定了武装起义的原理，而且还对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提出了“集中兵力”^②、“迅速行动”^③和“积极防御”^④等著名作战原则。恩格斯这些宝贵指示，对无产阶级以后的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用暴力彻底粉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对无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要争得解放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但是对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进一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 1848 年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经验，在国家问题上又进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用以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演进的全部历史过程表明，曾经加速封建制度崩溃而起过一定历史作用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纯粹是镇压劳动人民的完全反动的国家了。不管资产阶级国家采取什么政治形式，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都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流血换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愚弄群众的工具，“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

① 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0 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 年 9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182 页。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61 页。

④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296 页。

叙的话来表达,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①“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②

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加强自己的反动国家机器。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后,法国资产阶级为了镇压无产阶级,进一步加强其国家机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也起了变化。以前,当人民革命力量还不大时,资产阶级的内部争执曾使国家行政权力受到一定限制,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的地位。现在,政府却具有了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

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还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决定的。资产阶级和过去一切剥削阶级一样,“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③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它同资产阶级革命有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当集中一切力量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建立起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他在给路易·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416页。

②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下同),第3—4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

件。”^①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著作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他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进程，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任务和实际内容。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③马克思这段话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在一切领域、一切阶段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半途而废。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全人类，才能使全人类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各国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级的宝贵财富。他们亲自参加革命实践,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事后又以冷静的科学态度总结革命的经验,鼓舞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战斗,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活动指明了方向。

第一章 注 释

1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发表《乌托邦》一书,主张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人人都热心公共利益,人人都参加劳动的“乌托邦”。——第24页。

2 威廉·弗里德里希·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者。他创立了反动的神秘的“启示哲学”,宣扬信仰高于理性,宗教高于科学。他是为普鲁士封建统治服务的反动分子。——第38页。

3 乔治·朱利安·哈尼(1817—1897),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主张不仅通过议会,而且要采取武装斗争来争取宪章的实现,反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控制宪章运动的企图。他是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后,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站在一起,采取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第40页。

4 卡尔·沙佩尔(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革命时期,他积极贯彻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路线,曾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时,他是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首领之一。他后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从1856年起重新和马克思接近,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40页。

5 亨利希·鲍威尔是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皮鞋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后失踪。——第40页。

6 约瑟夫·莫尔(1813—1849),钟表匠,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曾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不幸光荣牺牲。——第40页。

7 辉格党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1679—1682年间形成。它虽然宣布要实行“自由的、开明的原则”,实际上和封建贵族、金融巨头勾结在一起,垄断了英国的政治。辉格是英语的音译,原意指英格兰强盗;后又指顽固的长老会徒,这是托利党对它的贬称。——第40页。

8 托利党是英国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政党。该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成立,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托利是英语的音译,原意指爱尔兰“歹徒”——反英游击队,这是辉格党对它的贬称。——第40页。

9 “四季社”是布朗基领导的法国秘密革命团体,1837年成立。成员按“星期”、“月”、“季”组织起来,四个“季”则组成一“年”;参加者多是手工业工人。它主张密谋暴动的策略,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第53页。

10 菲利浦·日果(1820—186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40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3页。

11 威廉·沃尔弗(“鲁普斯”)(1809—1864),出身农奴家庭,是最早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之一,参加过1848年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实朋友。马克思称他是“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页)——第53页。

12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出生于德国,1848年革命后移居美国;早年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后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一批最忠实的战友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第53页。

13 斐迪南·沃尔弗(1812—1895),德国政论家,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革命时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第53页。

14 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他主张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专政,但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建立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不考虑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客观形势,幻想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达到目的。他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巴黎公社时期他被囚于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布朗基的一生大半是在狱中度过。——第54页。

15 奥古斯特·艾韦贝克(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

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第57页。

16 莫泽斯·赫斯(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60年代是拉萨尔分子；曾出席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第57页。

17 卡尔·格律恩(1817—1887)，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革命时期他采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曾任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后在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当文学史、哲学史教授。——第57页。

18 海尔曼·克利盖(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他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鼓吹一套荒诞的伤感主义的“爱”的梦呓，疯狂地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第57页。

19 卡尔·普芬德(1818—187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画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他1845年侨居伦敦，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任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年和1870—1872年)。——第58页。

20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1818—1889)，裁缝工人，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总书记(1867—1871)。1872年以前他基本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支持马克思，1872年春蜕变成成为英国工联改良派的领袖。——第58页。

21 “宴会”是法国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各个资产阶级政治集团以谋求改革为名，公开举办宴会，鼓吹改良，争权夺利。——第70页。

22 阿尔伯(1815—1895)，真名亚历山大·马丁，法国工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奥尔良王朝)时期，他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二月革命后为临时政府成员。——第70页。

23 “拿破仑观念”是指法国人数众多的小农对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的怀念和迷信。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农民得到了土地，拿破仑统治时期巩固了农民土地的私有制。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还给他们，所以他们抱着天真的幻想把选票投给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使他当上了总统。——第75页。

24 克雷门斯·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公爵,反动政客,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年)和首相(1821—1848年),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76页。

25 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原为普鲁士军官,后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革命时,他率部参加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首领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第83页。

26 康拉德·施拉姆(1822—1858)出身于普鲁士一个富商的家庭,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他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斗争。——第83页。

27 彼得·诺特荣克(1823左右—1866),德国裁缝工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他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第84页。

28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是普鲁士政府在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以所谓“进行叛国性密谋”的罪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进行审讯,判处7名被告3年至6年的徒刑。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鲁士反动政府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挑衅行为和卑鄙伎俩进行了彻底的揭露。——第84页。

29 朱泽培·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50年代积极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他企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第85页。

30 朱泽培·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年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独立战争中,他率领义勇军英勇战斗;1849年4—6月为罗马共和国国防方面的主要负责人。50至60年代,他领导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而斗争。——第85页。

第二章 第一国际时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

从欧洲 1848 年革命失败后至第一国际末期，世界仍然处在“**风暴和革命时期**”。^①在这个时期里，西欧北美各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美许多国家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欧亚许多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涨，并在斗争中于 1864 年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成立的目的：“**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②。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

但是，在第一国际初期，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之一，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并未占统治地位。当时在各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英国的工联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以及稍后出现在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巴枯宁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大肆宣扬其宗派观点，公开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竭力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阻碍着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和发展。因此，在第一国际时期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前期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38 页。

②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14 页。

(1864—1869年)主要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第一国际后期(1869—1876年)主要进行了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同时还进行了反对工联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第一次大的路线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激烈斗争,基本上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派别,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广泛传播开来,逐步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大大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①

第一节 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 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第一国际 在斗争中建立

一、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阶级矛盾和民族 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

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处在一个政治反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工人运动从暂时的低潮重新转向高涨的时期。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政治上的反动笼罩了整个欧洲。英、法、德、意等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到处与封建反动势力相勾结,扼杀民主,镇压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暂时转

^①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49页。

入低潮。当时工人阶级的处境，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①然而马克思确信乌云只是暂时的，革命的曙光必将重新到来。他科学地预言道：“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②

1848 年革命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进一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加之最新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交通运输工具的逐步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因而大大促进了西欧北美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夺得了世界工业的霸权。1860 年，英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 36%。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也很迅速，到 1860 年，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已分别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 17% 和 16%。英、法、德、美四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煤产量，1850 年为 6,870 万吨，1860 年增至 12,450 万吨，1870 年已达 19,620 万吨。这四个国家的生铁产量，1850 年为 348 万吨，1860 年增至 615 万吨，1870 年已达 1,023 万吨。随着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 19 世纪 60 年代，欧洲的产业工人已达 874 万，手工业工人则有 1123.5 万；同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就促进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的不断提高。

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末，欧洲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857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使无产阶级的处境更加恶化，促进了阶级斗争的发展。由于沙皇俄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1 页。

②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88 页。

国在克里米亚战争¹（1853—1856）的失败而引起的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削弱了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同时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的扩张，使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因此，进入60年代，欧美许多国家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欧亚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蓬勃发展起来了。1859年，意大利²、德国³爆发了重新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1861—1865年，美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南方奴隶主叛乱的南北战争⁴。1863年，波兰人民发动了反对沙俄统治的民族起义。1851—1864年，中国发生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1857—1859年，印度人民举行了反英起义⁵，等等。国际上这一系列重大的革命事件，推动了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从低潮转向高涨。

60年代初，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已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历史道路”^①，工人运动日益蓬勃发展。

英国工人运动随着欧洲民主运动的高涨和1857年经济危机的侵袭又趋活跃。1859年7月，伦敦建筑工人在其它行业工人的积极支援下，顽强地举行了大罢工，打破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长期沉寂的局面。通过这次罢工，增强了英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推动英国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国内外的政治斗争。

法国工人运动克服了反动年代遭受的巨大困难，在1857年经济危机之后也开始复苏。1863年，在巴黎、马赛等地成立了细木工会、炼铁工人联合会。1864年，经过一系列罢工斗争，法国工人迫使波拿巴第二帝国政府废除了禁止工人罢工、集会和结社的反动法律。法国工人群众也积极参加了政治斗争和国际斗争。

德国工人运动到60年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推动，德国工人日益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迫切要求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控制下摆脱出来，进行独

①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0页。

立的政治斗争。1862年2月,莱比锡的先进工人毅然退出了资产阶级创办的工人教育协会,单独成立了“前进”工人政治协会。1863年5、6月,先后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

美国工人运动这时也有了显著的发展。1857年,在纽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进入6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活动和斗争逐步展开。1863年初,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

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等国,到了60年代,工人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并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和罢工斗争。

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以下的主要特点:

无产阶级从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叛卖性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阶级组织,并走上了独立政治斗争的道路。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中,还日益认识到加强国际团结和联合斗争的必要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剥削的加深,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资产阶级用从外国输入廉价劳动力的办法来破坏本国罢工运动,因而使各国工人阶级日益认识到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和互相支援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资产阶级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对国内外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残酷镇压,更增强了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共同愿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使“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①

当时,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2页。

想。恩格斯指出：“在 1864 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①这就是说，当时马克思主义仅仅在少数先进工人中传播，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在各国工人运动中还占统治地位，有强大的影响。

上述特点表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和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排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愿望从组织上固定下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沿着正确的革命路线前进，已成为这一时期的革命要求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洞察了这一客观要求，为促进国际工人运动的胜利发展，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成就，《资本论》初稿完成的伟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欧洲 1848 年革命失败后，鉴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为了彻底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给马克思主义奠定全面坚实的理论基础，阐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和胜利前途，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经验、写了一系列光辉著作之后，从 50 年代起重新全力投入了一度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当时恩格斯在谈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时，对马克思说：“从长远考虑，在反动势力嚣张的情况下”，“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来捍卫我们的立场”，“如果你用政治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蜚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②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 年 9 月 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12 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 年 2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211 页。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为了完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横眉冷对阶级敌人施加的疯狂政治迫害和一些流亡者败类散布的卑鄙人身攻击，不顾个人和家庭的贫病交迫，夜以继日地从事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在185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①“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②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经过多年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果，是他第一次系统阐述剩余价值学说，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开端。1861—1863年，马克思继续探讨近代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写了23本政治经济学笔记。1863年中至1865年底，马克思完成了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在内的全部《资本论》草稿。1867年9月14日，经过马克思反复修琢定稿的《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人类社会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马克思所以能够完成这项伟大的科学理论研究工作，除了他个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勤奋、刻苦、认真的科学精神外，还同恩格斯给予的同志般的巨大支持和无私帮助分不开的。1867年8月16日，当马克思看完了《资本论》第1卷的最末一张校样后，怀着无比喜悦和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19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26页。

的”。^①在马克思还没有把《资本论》的其余各卷整理完毕病逝后，恩格斯又忠实地担负起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的艰巨工作。经过恩格斯认真研究和精心整理，《资本论》第2卷、第3卷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由此可见，《资本论》实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战斗的成果与革命友谊的结晶。恩格斯在临终前委托考茨基整理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资本论》的第4卷出版。但考茨基违背恩格斯的遗嘱，把它当作独立著作，于1904、1905和1910年分三卷出版。现在仍把它作为《资本论》第4卷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资本论》第1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资本化。第2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对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形态变化及其周转加以考察，揭示了资本运动和资本积累的规律。第3卷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揭示出以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分配的规律。这三卷《资本论》是一个具有严密结构的、有机的科学整体。恩格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象红线一样也贯穿着所评论的这本书全部”。^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基本的、最常见的现象——商品交换的详尽分析，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8—32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③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杜塞尔多夫日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4页。

——剩余价值的生产，论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最深刻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①“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②因此，在资本出现后，不仅所有的生产物都成了商品，就连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马克思从商品交换的分析中，从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的研究中，发现“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一定的生产活动，……是有用劳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劳动力的单纯支出，是凝结的抽象劳动。前者生产使用价值，后者生产交换价值，只有后者才能在量上作比较”。^③马克思关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的发现，彻底地揭开了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全面地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分析了劳动力使用过程中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他指出，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由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的血汗少得多。这二者之间的差额表明，每一个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所做的劳动分作两部分：他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偿还资本家支付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或有酬劳动；但在此后，他必须继续劳动，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劳动，叫做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这种“剩余劳

①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56页。

③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5页。

动,便是剩余价值、利润的源泉,是资本继续不断增殖的源泉”。^① 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是马克思毕生的“第二个重要发现”。^② 它彻底弄清楚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露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秘密;戳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谎言;论证了资本家也和奴隶主、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所不同的只在于资本家阶级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更加伪善、残酷罢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分析,论证了在资本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壮大丁推翻资本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③而这种转化只能在流通领域才能实现。因此,资本家在把商品投入市场出卖后以利润形式获得的剩余价值,是决不会全部消费掉的,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的积累,为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要实现扩大再生产,仅仅增加生产资料部分是不行的,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还必须增加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这样,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增长,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将随着那些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相继破产加入无产者行列而壮大起来,成为推翻资本统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马克思的这一科学分析,就为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伟大力量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1—272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7页。

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如同先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运用事物矛盾的法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①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造成对生产的巨大破坏,加深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激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与斗争,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马克思指出: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无产阶级将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资本论》是内容极其丰富深刻的“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③,也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④它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全副理论武装”。^⑤所以《资本论》的问世,“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⑥,

①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3页。

②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

③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④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第50页。

⑤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195页。

⑥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7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2—543页。

是“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① 它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具有伟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② 因而《资本论》一出版，立即受到各国工人的热烈欢迎，“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③

但是，《资本论》出版以来到今天，却一直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新老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拼命反对、歪曲和诋毁。从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布伦坦诺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施坦、考茨基，莫不如此。叛徒林彪也步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后尘，诬蔑《资本论》“是在图书馆里写的”，胡说《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其险恶用心是说，“时代不同”，《资本论》已经“过时”，不值得也不需要再学习它了。这完全是恶毒的歪曲和狂吠。《资本论》是马克思积 25 年精心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结晶，是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阶级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而且还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

① 《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1864 年 10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25 页。

②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9 页。

③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6 页。

统一规律，这一普遍规律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适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帝国主义的矛盾，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百多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指南的不朽的伟大经典著作《资本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林彪妄图通过否定《资本论》这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①，以达到其诋毁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罪恶用心，是丝毫无损于《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只能进一步暴露出他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嘴脸。

三、马克思、恩格斯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的巨大成就

欧洲 1848 年革命失败以后，在反动势力嚣张、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一些流亡在英国伦敦等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们悲观颓废，终日空谈，散布流言，拨弄是非，彼此争吵。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与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截然相反，革命意志坚定不移，对革命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马克思、恩格斯顶逆流，战恶浪，勇敢地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为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除了从事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外，还进行了顽强的革命实践活动。

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初的革命低潮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利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它报刊，就当时的国际重大事件发表了一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8 页。

系列政论文章,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殖民主义罪恶;极力主张用革命战争推翻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沙皇专制制度,消除沙俄对欧洲的影响,实现欧洲各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统一;热情支持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积极教育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起来斗争。

恩格斯自1850年11月迁居英国曼彻斯特以后,在从事商业以资助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对军事学、历史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等专门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军事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恩格斯直接参加过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的革命战争的实践,又研究了19世纪50—60年代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使恩格斯明确地认识到军事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把研究军事问题看作是自己的特殊责任。恩格斯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①恩格斯以很大的精力具体研究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7—1859年英法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镇压印度人民起义的战争、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1861年开始的美国内战等重大战争,写了一系列卓越的军事论文,在军事史、军事理论、军队组织、战略战术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理论性结论。

恩格斯在军事著作中第一次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军队的性质、状况、战术和战斗力首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他指出,当时俄国军队在编制、训练、技术和战术方面的落后状况,是俄国的经济落后、封建农奴制关系和沙皇反动专制制度造成的结果。他预见到在无产阶级

^①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6页。

革命胜利后的新社会，随着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将创造出不可摧毁的庞大军事力量和新的战略战术。“这些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在力量、技巧和机智方面，这些兵士一定会超过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兵士。”^① 恩格斯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全民武装、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② “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③ 恩格斯总结了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他指出，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兵力，“集中兵力总是重要的”^④，“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⑤ 他认为，进攻是夺取主动权的行动，一般能获得更大胜利。“‘攻击’这一术语，就其总的战略意义来说，是指在任何一次大小战斗或决战中夺取主动权的行动”^⑥；“在敌人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⑦ 他反对消极的防御，主张积极的防御。“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⑧ “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⑨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军事著作以及他的卓越的军事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

①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4页。

②⑧ 恩格斯：《步枪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

③ 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05页。

④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9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2页。

⑤ 恩格斯：《步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57页。

⑥ 恩格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1页。

⑦ 恩格斯：《战况没有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80页。

⑨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6页。

这些著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表明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杰出的伟大军事科学家。马克思对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恩格斯在参加巴登战役以后，对军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写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①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 1854 年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⁶ 认为它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等文章中，高度赞扬西班牙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毅力和巨大作用，深刻揭露了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特点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争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② 马克思在总结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过去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了农民群众，使农村居民在斗争中成了“消极的旁观者”。^③ 他强调说，如果革命政党不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会把农民群众排斥于革命之外，从而使农民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所利用，使革命遭到失败。这就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写了许多重要的论文，论述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英勇斗争及其巨大意义。他们无情地揭露沙俄和英、法等国侵略中国的

①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 年 2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62 页。

② 马克思：《埃斯帕特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401 页。

③ 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670 页。

罪行，严厉地谴责沙俄利用英、法侵略中国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领土的强盗行径和卑鄙伎俩。马克思指出：“约翰牛（指英国。——编者）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①恩格斯指出：“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尽管它正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挺身而出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②；“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③马克思、恩格斯揭穿并痛斥了无恶不作、到处屠杀中国人民的殖民主义者反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什么“暴行”的强盗逻辑，热情地支持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④马克思、恩格斯还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恩格斯指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明，“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⑤马克思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⑥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②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39页。

④⑤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21—22页。

⑥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在革命低潮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各方面的组织准备。他们在英国先进工人中积极进行宣传和教育,尽量争取职工会活动家和宪章派的左翼领袖哈尼、琼斯⁷等人,设法通过这些人去影响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他们特别注意培养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想方设法同分散在各地的革命老战士建立联系,把原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埃卡留斯、列斯纳⁸、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鼓舞他们的斗志,教育他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革命理论,掌握战斗的武器,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卜克内西在回忆这个时期马克思对他们热情而又严格的教导时写道:“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我们……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努力积累知识,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①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各国革命组织联合活动的范例和经验。1854年秋,根据琼斯的提议,英国宪章派为欢迎法国流亡者,加强与欧洲大陆民主派的友好,反对君主们的联盟,成立了“欢迎和抗议委员会”。许多流亡的外国团体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不久就改名为“国际委员会”,由琼斯担任主席。1856年5月,“国际委员会”发表了《致世界各民族》的宣言,一方面说明该会的纲领和宗旨,另一方面阐述扩大该会的计划,即成立在全世界城市中设有“国际委员会”的“国际协会”,以便各国的革命者都能参加活动。同年8月,“国际委员会”为实现上述计划,与英、法、德、波等国的革命团体联合成立了“国际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李卜克内西、列斯纳都被选为该会的领导人。“国际协会”虽然在1859年下半年停止了活动,但是它所体现的国际团结的思想和它的组织形式,却为第一国际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益的经验。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低潮时期进行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为第一国际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条件。

四、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俄霸权统治的民族起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摧毁沙俄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光辉思想

直接促成第一国际诞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1863年波兰人民奋起反对沙皇俄国霸权统治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①

波兰建国于公元965年，在历史上曾于1772、1793和1795年三次被当时的列强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长期遭受外国侵略者的宰割、奴役和压迫。英雄的波兰人民为了摆脱外国列强的霸权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曾前赴后继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世纪60年代初，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由于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影响，波兰各被占领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重新高涨。1862年上半年，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为主体的各种不同的团体，联合组成了以埃·邓波夫斯基为首的中央民族委员会，作为领导民族起义的机关。1863年1月22日，在中央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下，手工业工人、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发动了反对沙俄霸权统治的民族起义，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和民主问题的要求，并成立了临时国民政府。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震动了普鲁士在波兰的反动统治。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害怕发动农民，因而基本农民群众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内因。但更主要的是，沙俄和普鲁士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6页。

不甘心放弃波兰，他们相互勾结，沙俄于1863年中出动了10倍于波兰起义者的侵略军，进行极其残酷的血腥镇压，使起义遭到失败。个别起义队伍英勇不屈，一直坚持斗争到1864年底。

波兰人民的这次反沙俄的民族起义，引起欧洲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强烈反响。他们满腔热情地声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愤怒声讨沙俄政府血腥镇压波兰起义者的残暴罪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利益出发，一贯十分重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高度评价波兰人民的革命精神，坚决支持波兰民族的正义斗争。他们写了许多重要论文，如《论波兰》、《论波兰问题》、《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等，阐述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与欧洲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摧毁沙俄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光辉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沙俄是波兰民族和欧洲各族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恢复波兰的独立就能摧毁沙俄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①沙俄在侵占波兰之前并不是欧洲的一个大国。但是，自从1772年沙俄参与了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后，就逐步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入欧洲，成为维护欧洲反动势力、“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②可见，“波兰是实现俄国对世界霸权的食欲的最重要的工具”。^③如果沙俄牢牢地把波兰控制在自己手里，就可以左右欧洲政局，实现其称霸欧洲的野心；反之，“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④

恩格斯指出：“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⑤因

①②⑤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波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4、587页。

③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227页。

④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

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①沙皇要维持对波兰的殖民统治,首先必然要加强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②而“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③恩格斯还预言,在沙皇专制制度腐朽透顶,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俄国“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④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对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欧洲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首先推翻压迫他们的反动统治。但是,沙俄不仅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且它的军队更是“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⑤所以欧洲的贵族和反动的资产阶级都把沙俄“当做抵挡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浪潮的最后堡垒”。^⑥此外,从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看,瓜分波兰又“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连结起来的锁链”^⑦,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欧洲的反动势力。因此,在波兰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欧洲“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⑧只有恢复波兰的独立,才能拆散俄、普、奥的反动锁链,沉重打击欧洲的反动势力,“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⑨,无产阶级才能“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⑩

①②③④⑤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波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587、585页。

⑥⑧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

⑦⑨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2、632—633页。

⑩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对欧洲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些英明论断,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讲的,但是关于摧毁沙俄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光辉思想和支持波兰独立的原则立场,则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五、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国际纲领和路线的制定

恩格斯指出:“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①国际工人协会是在国际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迫切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的大好形势下,于1864年成立的。

英国工人为了抗议沙俄镇压波兰起义,声援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1863年7月22日在伦敦举行了群众大会。法国工人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1月10日,英国工人会议通过了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并建议召开有各国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

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联领袖为了欢迎响应《呼吁书》而来的法国工人代表团,讨论支持波兰斗争等共同性问题,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了盛大的国际性会议。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外,还有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和一些欧洲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马克思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指出:“虽然多年来我一直避免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等等,但是这一次我接受了建议,因为这是一桩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事业。”^②这表明,马克思正确地估计到,他和恩格斯长期以来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的国际无产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16页。

②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64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5页。

阶级的团结和建立一个包括欧美两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宿愿，现在已有可能实现了，所以他就积极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大会上，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分别宣读了《呼吁书》和《答复信》，一致表达了团结战斗的共同愿望，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维克多·勒·吕贝^①代表法国工人提出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计划：在伦敦成立一个有各国工人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国际活动的中心；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和大城市成立分会；并讨论各国工人共同关心的问题，等等。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法国工人的倡议，决定成立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并选出一个由英、法、德、意等国 21 名工人代表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来改称为总委员会）。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在中央委员会 1864 年 10 月 11 日的会议上，这个组织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简称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把它称为第一国际）。

马克思虽然只担任了总委员会委员，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 1864 年的成立宣言至 1871 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①恩格斯当时由于在曼彻斯特工作，所以没有直接参加第一国际初期的领导工作，但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都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并多次请他为总委员会起草报告或材料。恩格斯于 1870 年移居伦敦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被选入总委员会。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实际创建人和真正的领袖。正是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第一国际才得以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胜利前进。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国际的纲领和章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9 页。

程。为此,在10月5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九人起草委员会。由于当时工人运动发展水平所限,选入中央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成分极为复杂。参加起草委员会的除马克思、埃卡留斯外,还有奥哲尔¹⁰(英)、克里默¹¹(英)、韦斯顿¹²(英)、鲁·沃尔弗¹³(意)、勒·吕贝(法)等人,他们各自从其宗派观点出发,对国际的目的和任务存在着根本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着手起草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时,中央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内部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问题提得稍微明确一点,这个新协会就会立即分裂成为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①英国工联主义者力图使国际成为一个目的在于限制资本剥削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国际工联组织。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力图把国际建成为一个国际信贷或合作社之类的组织。意大利马志尼主义¹⁴者则力图使国际成为一个以马志尼为首的欧洲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只有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才真正想把国际建设成为一个团结、教育、组织和领导欧美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说:“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②;“把欧美整个斗争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③经过多次反复尖锐的斗争,几个草案争执不下,起草委员会决定交给马克思进行修改。这样,马克思就取得了最后修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权力。

马克思认为,在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中,必须坚持《共产党宣言》已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时各国工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11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9页。

②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③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16页。

人运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状况。制定这样的纲领和章程，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又困难的任务，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①所谓“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就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既要团结群众，又不能降低革命水平；在措词语句上既要温和灵活，又不能放弃原则，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马克思正是运用这一正确的革命策略，经过尖锐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写成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

在《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共产党”等明确的字眼，也没有直接驳斥各流派的错误观点，而是通过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两个成就（十小时工作日立法、合作社运动），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巧妙而又透彻地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贯穿进去。这些基本思想主要是：

（一）“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②这是创立国际时明确规定的战斗口号；

（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消灭任何阶级统治”。^③阶级统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②③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从于它的伟大目标”^①;

(三)“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②;

(四)“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

(五)“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④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⑤

上述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确定了第一国际的纲领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⑥

在《协会临时章程》中,马克思摒弃了蒲鲁东的所谓各个组织“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简要规定了第一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组织条例。《章程》规定:“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各支部或联合会选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听取上届总委员会的报告,讨论有关国际活动的重大原则问题,选举新的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在大会闭幕期间是国际的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负责对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指导各支部的活动。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起草委员会顺利通过后,11月1日又被总委员会一致通过。总委员会决定立即公布《成立宣言》,

①④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②③⑤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135页。

⑥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把《临时章程》提交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批准。这是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光辉胜利。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第一国际的成长，是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总结第一国际的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因此，“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②

第二节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一、蒲鲁东主义的产生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蒲鲁东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一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出身于法国柏桑松城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农民兼木桶匠。蒲鲁东在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②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

家庭破产后，从 12 岁起就参加了劳动，当过旅馆的佣工，也当过排字工人。他为了谋生曾到过法国许多城市，其间通过自学读了不少书，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很深的影响。

蒲鲁东怀着渴望成名充当社会“救世主”的个人野心，从 1837 年就开始写作，1840 年发表了《什么是财产？》一书，申述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点，第一次使用了“无政府状态”一词，引起社会的注意。1846 年 5 月，蒲鲁东在接到马克思、恩格斯邀请他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法国的通讯人的信件后，立即回信表示他在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上与马克思观点的根本对立。他说：“我认为并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决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作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种所谓的手段只不过是诉诸暴力和霸道，简单地说，是制造矛盾”；“依我看来，用一种缓慢的火烧毁财产，总比对财产所有者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好些。”^①1846 年 10 月，蒲鲁东抛出了自命不凡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一书，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他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公开鼓吹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欧洲 1848 年革命期间，蒲鲁东为了诱骗工人群众背离火热的革命斗争，走上和平经济改良的道路，在 1848 年 2 月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提出建立“人民银行”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吹嘘只要实现这一计划，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使世界走上真正的道路”。^②他还亲自动手筹建“人民银行”，发行 12,000 张股票（每张票面值 5 法郎），号召工人和小生产者购买这些股票。但是，这个银行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就在 1849 年 2 月被迫宣布关闭了。

1848 年革命失败后，蒲鲁东政治上日趋堕落，思想上更加反

① 见《蒲鲁东给马克思的信》（1846 年 5 月 17 日）。

② 见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

动。他在陆续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如《一个革命家的自白》(1849)、《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论革命和教会的公平》(1858)、《论联邦制和革命政党改组的必要性》(1863)、《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5)等,系统叙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继续推销“人民银行”、“无息信贷”这一套破烂货,并卑鄙地向路易·波拿巴献媚,疯狂地反对工人运动,极力攻击意大利、波兰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辩护。这些可耻的言行,更加充分暴露了蒲鲁东的反动面目和蒲鲁东主义的反动性。

蒲鲁东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有以下几点:

(1) 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英雄史观。蒲鲁东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看作是观念的历史。他说,他所考察的历史,“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①他不是把各种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唐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蒲鲁东认为,这些永恒的观念是少数英雄即“社会天才”创造的,或是上帝启示的结果,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永恒观念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他厚颜无耻地自命为“超人”的“社会天才”,狂妄地宣称以前的“社会天才”一直未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只有他蒲鲁东运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②才真正发现和解决了这一任务。因此,他对“以前的一切权威……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③他崇拜反动统治头目,无耻地向路易·波拿巴和沙皇献媚。他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群众和妇女的解放。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从他的反动哲学观点看来,“历史是

① 见蒲鲁东:《贫困的哲学》。

②③ 恩格斯:《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69、670页。

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①

(2) 竭力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张建立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从他的反动唯心哲学观点出发，把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独立”看成是“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把维护小生产私有制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违反平等原则；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没有私有财产就不能独立，所以是违反自由与独立性的。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和建立一个综合“平等”和“独立”的、超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就是蒲鲁东“恩赐”给人类的“伟大”救世良方，即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在这个“美妙”的“互助制”社会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既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这样，“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显然，这是妄图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②的反动、倒退的乌托邦。

(3) 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建立“人民银行”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蒲鲁东提出，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最好办法是由劳动人民入股组织“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信贷，协助工人建立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收购一切产品，发给劳动者一种证券，作为劳动货币。生产者可以凭这种证券进行产品交换，取得自己所需要的其它商品。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劳动人民贫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②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0页。

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在于交换条件，货币、借贷资本、利息的统治与剥削，正是这些交换关系破坏“永恒公平”，阻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所以他认为，通过“人民银行”进行有组织的、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就可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从而既保证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又可以逐步把国内的所有生产资料收买过来，以实现小生产者的理想世界。马克思指出：“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① 恩格斯也讥讽地指出，蒲鲁东的这个“互助制”计划，无异是“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②的灵丹妙方；在工人赤贫如洗的情况下，却妄想用他们的储金不仅“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的世界”^③，那更是虚构的“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④的戏法而已。

(4) 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蒲鲁东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出发，反对对资产阶级进行“粗暴”的阶级斗争，主张用合法手段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提高认识携手合作”。^⑤ 他竭力宣扬“和平革命”，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反对罢工，反对联合，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他不但认为工人阶级无权联合组织工会，“罢工是非法的”^⑥，而且丧心病狂地赞成反动政府用武力镇压罢工，屠杀工人。他诬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诉诸霸道，胡说革命应该是“和平的和流血的”，“为了胜利不应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⑦ 真是十足的“合法迷”！

①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②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页。

③④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页。

⑤⑥ 见蒲鲁东：《贫困的哲学》。

⑦ 见蒲鲁东1849年1月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5) 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鼓吹无政府主义。蒲鲁东认为国家是由家长制传统和宗教思想产生的，“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所以必须“打倒政党，打倒政权”。^①他说：“没有政权，没有政府，哪怕是最人民的政府，——这就是革命。”^②由此可见，蒲鲁东是极端仇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

总之，蒲鲁东主义的核心就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幻想用和平的改良办法，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倒退，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从而“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③这是极其反动的。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④恩格斯也尖锐地指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⑤

蒲鲁东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泛滥于 50—60 年代。它对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运动都有较大的影响。这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阶级斗争逐步尖锐化。这时，在法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发展后进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还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法国首都巴黎为例，该市到 1866 年共有 44 万 2 千多工人，其中在大企业做工的

①② 见蒲鲁东：《一个革命家的自白》。

③⑤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83、479—480 页。

④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 年 8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329 页。

还不到5万人。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陷于困境和破产。这些小生产者既饱尝了资本主义发展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和疾苦,更害怕落入无产者的行列,因此非常希望免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保持或恢复小私有制的经济地位,幻想有一个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和平盛世。而蒲鲁东炮制的一整套改良主义思想和计划,正适应这些小生产者的要求,代表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反映了他们的主观愿望。这就是蒲鲁东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此外,在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工人们一时信仰的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假社会主义的破产,使蒲鲁东“组织信贷”的改良计划和“社会清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了失望的工人群众的一线新的希望。这也为蒲鲁东主义的传播造成了条件和机会。

蒲鲁东主义的传播和影响,给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危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①因此,**“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②,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须断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蒲鲁东主义决裂。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蒲鲁东主义的荒谬性与反动性的揭露和批判。

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到了巴黎,在与盘踞在“正义者同盟”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的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之流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

② 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

宣扬的用工人储金来建立协作社、进而“购买整个法国”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恩格斯在论战中针锋相对地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维护无产者的利益；废除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能是暴力革命。恩格斯还揭露了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的原因，是“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①这就给予了力图维护私有制、大肆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蒲鲁东主义以迎头痛击。

1847年7月，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哲学的贫困》。在这部专门为批判蒲鲁东的那本坏书《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著作里，马克思从理论上对蒲鲁东主义的各种谬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改良主义经济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范畴，拟定了关于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地租等问题的科学原理。针对蒲鲁东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具有价值的谬论，马克思指出：“劳动（指劳动力，当时马克思尚未使用“劳动力”这一概念。——引者）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②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价值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学说所提出的初步原理。它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③，从而也击中了妄图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蒲鲁东主义的要害。

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观点，批判了蒲鲁东企图用对立的调和来代替对立的斗争的谬论。蒲鲁东所谓的“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两者招致的东西都是坏的”^④，解决

①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

②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4页。

④ 见蒲鲁东：《贫困的哲学》。

的办法就是保存其好的方面,消灭其坏的方面等谬论,其实质就是力图掩盖和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发展就是矛盾斗争的辩证运动,矛盾是不能调和的,调和矛盾就是取消辩证法,就是取消运动和发展。他说:“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①“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②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以会陷入这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诡辩论泥坑,是由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他想“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③

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反动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道路。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④;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必定会由自在的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⑤;“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⑦因此,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⑧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中,把蒲鲁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宣言》指出:蒲鲁东的消除社会弊病的改良主义“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务”^⑨,并“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以

①②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120、122、160、159页。

⑧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3页。

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①这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蒲鲁东主义的反动实质。

1859年发表的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也从根本上打击了当时在法国等地流行的蒲鲁东主义。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蒲鲁东主义的实质主要是反对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②

1865年1月，蒲鲁东死去。马克思当即写了《论蒲鲁东》一文，对蒲鲁东的一生作了评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③；他“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象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④针对蒲鲁东的自我吹嘘和招摇撞骗，恩格斯形象地讽刺说：“他那母鸡咕咕咕咕的叫声总是同他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例”。^⑤这是对蒲鲁东的盖棺论定。

蒲鲁东虽然死了，但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也并未因此结束，而是更深入激烈地继续进行着。以昂利·路易·托伦为首的蒲鲁东主义者继承了其祖师爷的衣钵，顽固地坚持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利用参加第一国际创建工作的有利条件以及所控制的国际巴黎支部，公然拒绝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兴风作浪，对抗马克思主义，妄图阻止和破坏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与第一国际的发展。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3、52页。

②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9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4页。

③④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

⑤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2页。

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①因此，蒲鲁东主义成为第一国际前期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主要危险；粉碎蒲鲁东主义，捍卫第一国际的革命纲领和路线，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发展，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的战斗任务。马克思在论及这一严肃任务时说：“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②“特别是必须防止可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③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到工人运动的政治策略方面。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关于所有制问题。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斗争主要是在国际的会议上公开进行的。1865年的伦敦代表会议和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被击败。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蒲鲁东主义者的猖狂反扑未能得逞。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斗争。第一国际关于波兰问题的正确立场

19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殖民压迫、争取民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

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1867年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6页。

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1页。

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波兰、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激起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强烈同情和积极声援。因此，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成为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坚持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规定：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①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真正中心是波兰问题”^②，即如何对待 1863 年爆发的波兰人民反对沙俄野蛮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恩格斯认为：当时“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③而蒲鲁东主义者却站在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的反动立场上，一贯反对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蒲鲁东本人在 1863 年所写的反对波兰的著作《1815 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公开反对修改 1815 年维也纳会议¹⁵关于瓜分波兰的决议，竟然为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责难欧洲民主力量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马克思痛斥了蒲鲁东的这一卑鄙行径，指出这是“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④

1865 年 9 月 25—29 日，第一国际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委员会委员和英、法、比、瑞士、德国、意大利、波兰的代表共 38 人。马克思以国际总委员会德国通讯书记的身份参加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5 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1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72 页。

③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70 页。

④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7 页。

了会议。会上就是否应把波兰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马克思主义者同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国际讨论波兰问题，他们认为波兰问题与无产阶级无关，无产阶级只需要关心“社会革命”，不需要注意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经过斗争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使会议讨论了“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把“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这一要求列入下年度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这充分表明，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第一国际在波兰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立场。

伦敦代表会议后，在国际总委员会里继续围绕着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展开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66年春写了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重要文章。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反复论证了波兰独立的恢复必将沉重地打击以沙俄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促进整个欧洲的革命民主运动，并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国际工人阶级必须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恩格斯痛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掩盖下，在波兰问题上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一方面“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另一方面却“称赞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①这种欺弱媚强的卑鄙行径，是“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驰”^②的。同时，恩格斯还针对蒲鲁东主义者诬蔑第一国际支持波兰解放的正确立场是什么遵循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的反动谬论，深刻地揭露了沙俄和法国反动政府利用所谓“民族原则”来达到其吞并弱小民族、扩张领土的险恶用心。恩格斯指出：“民族原

①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

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①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这种为侵略扩张打掩护的反动“民族原则”。

1866年夏，国际总委员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当时正在进行的普奥战争问题。当讨论归结到“民族特性”问题和国际对该问题的态度时，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又乘机宣扬其民族虚无主义、否定民族解放运动的谬论，公然胡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他们主张各个地方的居民都组成自治的小“团体”，然后由这些小“团体”结合为“自由联邦”。马克思尖锐地戳穿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反动空想：“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②马克思还揭露了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这一谬论的沙文主义反动本质，指出他们实际上是“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③这是为法国反动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的。

鉴于蒲鲁东主义者顽固地反对即将召开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波兰这个所谓“纠缠不清的民族问题”，马克思在会前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从反对沙俄霸权、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高度，论证了支持波兰恢复民族独立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上述指示，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击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和阻挠，通过了《关于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的决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7页。

^{②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

议，沉重地打击了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这充分体现了第一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

三、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的激烈斗争。第一国际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粉碎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

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道路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斗争的焦点，第一国际成立后，由于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高涨，更成为迫切的问题。当时，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斗争，是围绕着关于国际的性质、任务和领导权等问题展开的。

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已经制定了第一国际的纲领和基本路线，明确规定国际是领导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战斗组织，其任务是团结教育各国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道路。

但是，蒲鲁东主义者却极力反对国际的纲领和路线，喋喋不休地重弹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社会改良的陈词滥调。他们妄图以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路线代替马克思主义路线，篡改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把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的邪路。

1866 年 9 月 3—8 日，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就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展开激烈搏斗的一次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 22 个支部和 11 个其它工人团体的代表共 60 人，其中法国代表就有 17 人。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派出这样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是为了与国际总委员会对抗，企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图把蒲鲁东主义的观点强加给大会，从而实现其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的阴谋。为此，他们狂妄地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充满蒲鲁东主义教条的所谓《备忘录》。在这个共有 10 项原则的《备忘录》中，他们公开兜售蒲鲁东反对罢工、反对妇女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谬论，极力鼓吹建立合作社、确立平等交换原则，作为通过和平方式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手段这一蒲鲁东主义的“灵丹妙药”。他们恶意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胡说国际的任务是研究“经济问题”，建议把第一国际变为世界合作协会，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在本国和欧洲各国为会员寻找职业，协会将在世界各地设立联络局，联络局应尽可能开设商店，协会会员可以通过这些商店等价地交换商品”。显然，蒲鲁东主义者抛出的这个《备忘录》是反国际的纲领，是向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公开进攻。

马克思由于从事《资本论》第 1 卷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法分离开伦敦亲自参加日内瓦大会，但是他非常重视这次大会的召开，并为之作了重要的组织和思想的准备。马克思预见到大会将有激烈的斗争，所以在会前写好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大会主要议程的正确决议的基础。《指示》规定了各国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提出了争取 8 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确定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革命任务；主张吸收妇女和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坚持支援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反对掠夺性战争及其工具——常备军而斗争。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国际的具体行动纲领，是与机会主义路线针锋相对的。马克思在《指示》中着重批判了蒲鲁东派鼓吹合作制度是救世万能手段的空论主义，明确指出：合作制度“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合作劳动制度，“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

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①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②

马克思的《指示》同蒲鲁东主义者的《备忘录》是两个根本对立的纲领，反映了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拥护国际路线的代表以马克思的《指示》为武器，在所有的主要议程上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否决了他们《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各种错误主张，通过了各项正确决议。日内瓦大会的结果表明，由于马克思的正确领导和多数代表坚持斗争，粉碎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挫败了他们妄图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的罪恶阴谋，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后马克思写道：“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③

蒲鲁东主义者为了改变国际的性质和任务，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必然力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因此，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为捍卫国际的领导权，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国际成立起，蒲鲁东主义者便立即展开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他们所控制的国际巴黎支部，拒不服从总委员会的正确领导，拒不执行国际的革命路线，拒不缴纳会费，大搞独立王国。他们还于1865年秋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法国人支部，“事实上是反对派的支部”。^④这个支部的创始人勒·吕贝、韦济尼埃¹⁶同在布鲁塞尔

①②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218页。

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

④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2页。

的整个一伙蒲鲁东主义者相勾结，在比利时的报纸上发表长篇匿名文章，恶毒诽谤国际总委员会，并抛出了他们另行制定的原则宣言和章程草案。这个草案反映了蒲鲁东主义者的某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邦主义观点，妄图把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化为乌有，使总委员会变成只具有通报和统计这些纯粹技术性职能的简单的代表机关。他们企图以这个支部的名义，把这个草案提到代表大会上去，强使国际接受。但蒲鲁东主义者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总委员会很快就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篡权阴谋，并使这个“支部抛开了它的创始人”^①，转而宣布拥护国际总委员会。

蒲鲁东主义者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采取的另一阴险手段，是借口反对知识分子入会，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及其战友，妄图把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排除出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从而实现其罪恶阴谋。早在1865年春，由于国际巴黎支部的冲突¹⁷，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已经批判了只有工人才能成为工人组织中的负责人员这种错误的蒲鲁东主义观点。马克思指出：“工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而这毕竟是荒唐的”。^②总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 *ouvrier* [工人] 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③但是，蒲鲁东主义者在1865年的伦敦代表会议上仍然坚持提议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他们胡说什么国际应当是一个手工业性的、纯粹行会性的社团，它仅仅具有与脑力劳动者毫不相干的职业上的目的。这一反动提议除了反

①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866年1月13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95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85页。

③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1页。

映蒲鲁东主义者的狭隘的行会意识外，其罪恶用心主要在于妄图排斥马克思的领导。会议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的提议，挫败了他们的这一险恶阴谋。

1866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国际的共同章程时，法国代表、蒲鲁东主义者托伦¹⁸、弗里布尔¹⁹又一次提出被伦敦代表会议否决了的反动建议。他们声称，必须把国际的会员资格限定为体力劳动者，或者无论如何也只允许体力劳动者作代表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大会的多数代表坚决批判并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反复提出的这一别有用心反动建议。他们在发言中强调说，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他们特别称赞了马克思的功绩。日内瓦大会闭幕后不久，英国代表还要求任命马克思为总委员会的主席。但马克思婉言谢绝了。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揭穿了蒲鲁东主义者再三坚持上述反动主张的另一可耻用心。他说：“杜邦²⁰使我识破了托伦和弗里布尔的行为。他们从只有工人能够代表工人这一‘原则’出发，企图在1869年当立法团²¹的工人候选人。因此，由代表大会来宣布这个原则，对这些先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①

蒲鲁东主义者不甘心他们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的失败。经过长期的准备，网罗自己的信徒，动员他们的全部力量，在1867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占了多数。在出席大会的71名代表中，法国的18名代表全部是蒲鲁东主义者，瑞士的38名代表大部分也都倾向于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者依靠纠集的多数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反扑，企图强使大会重新讨论和修改日内瓦大会的决议。在他们的操纵下，虽然大会通过了反映蒲鲁东主义观点的关于信贷和人民银行等决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9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6页。

议；但是，由于马克思的拥护者坚持斗争，挫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翻案阴谋，并不顾他们的反对，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要的事情”。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求得彻底解放，必须首先参加政治斗争。决议还规定：“每年都要重申这种主张”。这是对一贯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的蒲鲁东主义的沉重打击。

洛桑大会关于政治斗争的决议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尖锐斗争。第一国际 1868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所有制问题，即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问题。它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第一国际的根本方向。因此，关于是否废除私有制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原则问题。

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主张消灭一切私有制，使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工人运动的伟大目标。《共产党宣言》深刻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①

蒲鲁东主义代表小私有者的利益，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给小生产者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又力图永远保存小生产者的私有制，顽固地反对科学共产主义关于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蒲鲁东主义的这种反动倒退谬论曾讥讽地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 38 页。

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①

第一国际前期,由于1866—1867年经济危机的严重侵袭,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深,农业衰退,投机盛行,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人群众急剧贫困化,这就促使觉悟的工人进一步意识到私有制的危害性。因此,在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上讨论第6项议程:“关于国家的作用;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问题时,第一次具体提出了所有制问题,即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当时通过的决议宣称:国家应该把一切交通运输工具都接收过来,以便消灭大公司的垄断。比利时代表德·巴普²²建议在这个决议后面加上一条关于把土地交给集体所有的要求。这正触痛了顽固地维护小私有制的蒲鲁东主义的要害。因而引起蒲鲁东主义者的疯狂反对。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头目托伦跳出来大肆宣扬个人所有制,狂妄地声称:“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德·巴普竭力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张,他说:“如果使土地本身成为少数人的财产,那就意味着使其他一切社会成员都成为这少数人的奴隶。地主们只需要在他们相互间达成协议,就可以使其他的人因挨饿而不得不屈服。”大会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德国、英国、美国 and 比利时的大多数代表都赞成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的绝大多数代表则顽固地拥护私人占有制,并拒绝让步。由于双方相持不下,大会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下次大会继续讨论。

洛桑代表大会虽然没有解决所有制问题,但是,这场斗争却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就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的公开交锋。马克思说:“我早就确信,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注^②。

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①洛桑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辩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日益胜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进步。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维护土地私有制的反动谬论时指出：“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田庄都应该分割成为细小农户，这种办法在现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验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向农民推荐蒲鲁东式的江湖医术”^②，是彻头彻尾的蠢事。洛桑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争论的意义，正在于它揭破了蒲鲁东主义的江湖骗术，使共产主义思想在国际会员和工人群众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1868年9月6—13日，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一次决战，是马克思主义战胜蒲鲁东主义的大会。

布鲁塞尔大会在讨论上次大会遗留下来的关于所有制问题时，德·巴普代表为准备土地所有制问题而选出的专门委员会作了报告，提出关于金属矿、煤矿、运河、铁路、电讯、森林和土地公有化的决议草案。蒲鲁东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反对土地公有化的建议，认为这是对私有制的空前未有的侵犯，并诬蔑它是“粗暴的共产主义”。托伦再次声嘶力竭地叫嚷：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最主要的前提”。赞成集体所有制的代表坚决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和反对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谬论。他们根据会前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保留小农所有制，因为它阻碍机器的采用和大生产的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7页。

②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7页。

发展,无法使劳动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实行土地公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是符合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会经过激烈的论战,使右派蒲鲁东主义者陷于少数孤立的地位,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关于实行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决议。这是蒲鲁东主义致命的失败。蒲鲁东主义者弗里布尔哀叹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形成了百名代表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任何东西——无论是私有制或者自由——能够抗拒他们”。^①

布鲁塞尔大会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决议,虽然还不是当时直接实践的问题,然而在理论上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打击了蒲鲁东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使蒲鲁东主义遭到沉重的失败,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粉碎了蒲鲁东主义者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永远保存小私有制的反动幻想,表明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远大目标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布鲁塞尔大会还根据德国代表列斯纳的提议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感谢马克思出版了他的巨著《资本论》,号召各国工人学习和掌握这本伟大著作中的理论。这一专门决议的通过,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传播,与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

* * *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斗争的历史表明,主张保守倒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蒲鲁东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经过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斗争,不但使蒲鲁东主义在有关工人运动的各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且使蒲鲁东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以瓦尔兰²³为首的左翼蒲鲁东主义者。他们

^① 见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第123—124页。

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和领导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因此,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后,蒲鲁东主义的影响逐渐下降,已不再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蒲鲁东主义虽然在国际内部被击败,但是对法国工人运动仍然保持相当的影响。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特别是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暴露了蒲鲁东改良主义路线的荒谬和反动,从而使蒲鲁东主义遭到彻底破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① 公社的措施“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② 所以,“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③ 此后,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就逐渐绝迹了,“只有在‘急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④

但是,要肃清蒲鲁东主义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流毒,还需要进行持久的斗争。1872 年,德国的蒲鲁东信徒米尔柏格²⁴ 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连续发表了 6 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鼓吹用使每个工人都成为自己住房的主人的办法,来解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住宅缺乏的问题。这是“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⑤ 为了及时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流毒,恩格斯在同年写了《论住宅问题》长篇著名论文,迎头痛斥米尔柏格之流妄图把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拉向后退,阻止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反动立场。恩格斯指出,米尔柏格要使现代无产者变为拥有小住宅、小土地的小私有者的反动主张,是建立在那个

①②⑤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27、470 页。

③④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 10 页。

使“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的“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上的”^①；这“只能是反动的哀歌”^②。“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③恩格斯在这一光辉著作中，还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保守倒退的反动实质，进一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和清算。至此，蒲鲁东主义就彻底破灭了。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斗争的历史还证明，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从1847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到1872年恩格斯发表《论住宅问题》，经过了25年长期反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才战胜了蒲鲁东主义。恩格斯在1887年回顾这一战斗历程时写道：多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④，现在，“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但是，恩格斯又谆谆地告诫无产阶级，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松懈自己的斗志，要坚持斗争。他寓意深长地指出，虽然蒲鲁东主义在理论上已被驳倒，在实践中已被排斥在一边，然而后来的机会主义者“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⑥恩格斯的这一英明指

①②③④⑤⑥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3、541、525、460—461、461—462、463页。

示告诉我们，机会主义者利用历史亡灵来为其反革命目的服务，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客观规律。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一规律。蒲鲁东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张倒退、复旧的祖师爷及其机会主义路线早已被埋葬了，可是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都大肆吹捧他，力图继承他的衣钵，妄想把历史拉向后退。叛徒刘少奇、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拉回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也祭起了从孔老二到蒲鲁东等中外反动派的历史亡灵，大肆鼓吹“克己复礼”，“三自一包”。这种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活动，注定要被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所淹没，被奔腾前进的革命巨轮所粉碎，遭到彻底的失败。

第三节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

一、19世纪50—6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联主义的出现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工联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工联主义是英国宪章运动衰落以后、19世纪50—60年代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机会主义派别。它是英国工会联合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所推行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政策的总称，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

工联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有以下几点：

(1) 鼓吹经济斗争，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工联主义认为，工人运动的唯一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同厂主进行经济斗

爭，爭取盡量減少工人的劳动時間，增加工人的工資。它的信條和口號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是在僱傭劳动制度下妄圖實現根本不存在的公平劳动和公平分配，以改善工人被奴役的條件的改良主義幻想。因為在資產者殘酷剝削無產者的資本主義社會里，“最公平的工資必然相當於對工人的產品的最不公平的分配”。^①

(2) 主張階級調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工聯主義認為，實現改善工人處境的根本手段是合法的和平談判，即工人代表同企業主和政府進行通情合理的談判，爭取簽訂勞資協議，頒布劳动立法，以達到勞資兩利。這就是以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工聯主義政治。它與以推翻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政治是根本對立的。因此工聯主義者拚命反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暴力革命，極力勸告工人要“公正和克制自己”，要避免“殘酷的階級斗爭”。

(3) 支持殖民主義政策，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工聯主義認為，要爭取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還必須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沙文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這是由於英國工人貴族力求安然地同資本家“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因而工聯主義者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和資產者對它的想法一樣”^②，他們賣力地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為資產階級效勞。

總之，工聯主義的反動實質在於：它把爭取稍微改善工人被奴役的條件作為工人運動的唯一目的，從而背棄了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它以階級調和、和平改良代替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

① 恩格斯：《僱傭劳动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7頁。

② 《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頁。

命，诱骗工人脱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实际上起着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恶劣作用。恩格斯指出：工联主义“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①，是极其反动的。正由于工联主义的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使英国工人运动“走了错误的道路”。^②

工联主义产生在英国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它是 19 世纪 50—60 年代英国政治、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产物。

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失败和英国宪章运动的衰落，曾一度使英国工人运动陷入停滞和低潮。但是，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侵略扩张，日益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工人运动逐步转趋高涨。1859 年爆发了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进入 60 年代，英国工人运动更加活跃，既有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又有声援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群众运动，同时还积极支持美国人民反对南方奴隶主叛乱的斗争和支持波兰人民反对沙俄奴役的民族起义。英国工人群众踊跃参加政治斗争的实践，大大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了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斗志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愿望。在英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急剧尖锐化的形势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和殖民利益，竭力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寻找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妄图以改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毒害工人群众的意识，阻止他们的觉醒，破坏并控制英国工人运动。工联主义正是适应英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97 页。

② 恩格斯：《工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85 页。

而出现的。

英国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最恶毒的一手，是在工人队伍里收买、培植工人贵族，使之为自己服务。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①这就使得英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利用从殖民地榨取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来收买本国熟练技术工人和工会官僚，培植一个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人贵族阶层。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已察觉了这一危险的事实。他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②这批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既摆脱了贫困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也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革命品质。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和生活，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于是模范地、忠实地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效劳。“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③这批工人贵族就是工联主义产生、传播的阶级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英国“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最贫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④据统计，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联所吸收的会员不多于英国全部产业工人的10%。可见，工联主义是英国资产阶级实行收买和培植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

正是在上述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从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工联运动继宪章运动后兴起。1851年创建的混合机器工会，是第

①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9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10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

③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1页。

④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4页。

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这个工联用收取高额会费来限制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它在组织上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全国领导机构,随后逐渐形成了一批领取高薪、终身任职的工会官僚。它的宗旨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通过与企业主的谈判,减少在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它的日常活动内容主要是组织工人间的互助。据统计,该会从1851年成立至1889年,用于补助疾病、丧葬、失业和年老者的费用共达293万多英镑,而用于支持罢工斗争的津贴只有8万多英镑。以后成立的其它行业的工会联合会大都效法了它的这一套。1860年5月,伦敦各行业工人为支援建筑工人罢工而成立的工联伦敦理事会,不久就成了全国性的工联领导机构。参加这个领导机构的各工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左右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政策,在工人运动中大力推行工联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工联主义的反动本质。然而,限于当时工人运动的水平,工联毕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是一支“真正的力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积极争取英国工联参加第一国际。他们希望一方面通过工联组织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团结教育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使之摆脱工联主义的影响,提高阶级觉悟;另一方面通过内部斗争,批判和粉碎工联主义,以便引导英国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从而推动和发展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同工联“调和,而是揭露它”,“把‘最低层群众’即真正的多数同旧工联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分开,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开,并且向这个没有沾染上‘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的真正多数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于此。”^①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关

①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97页。

于工人运动的道路和领导权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问题；关于如何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关于工人运动道路和领导权问题的尖锐斗争

第一国际时期，围绕工人运动的道路问题以及国际和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问题，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

第一国际建立后，英国工联主义者违反《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所规定的国际的革命纲领和路线，继续顽固地宣传和推行工联主义路线，妄图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改良主义道路前进。总委员会委员、英国工联领袖约翰·韦斯顿在提交给总委员会的关于工资的报告中，以及在1865年5月2日、23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公然宣扬工联主义思想，反对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他硬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使资本家抬高商品的价格，因而归根结底对工人没有任何好处，并由此得出工会“有害”的荒谬结论。

为了批驳韦斯顿的这一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反动观点，总委员会在1865年夏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工会的作用问题。这实质上是关于工人运动的道路问题。马克思在会上作了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通俗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正确道路，深刻地批判了工联主义的错误论调。

针对韦斯顿反对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的反动谬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因而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日益加剧；工人阶级决不应该容忍资本家的残酷掠夺，而必须为提高工资进行斗争，“如果

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①

在肯定为争取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马克思还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也不应当夸大这种日常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因为这“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②工联主义的错误正在于：“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③所以马克思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④

1866年8月底，马克思在为准备日内瓦代表大会而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总结了工会的作用，进一步批判了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指出：“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⑤；工会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⑥这就为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指明了应走的革命道路。

与工人运动道路问题的斗争紧密相联系，马克思主义者同工联主义者进行了争夺国际和英国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激烈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非常重视英国的工人运动，把它看作是推动、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杠杆。马克思当时曾明确指出：“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⑦，可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英国工人“所缺

①②③④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204、203—204页。

⑤⑥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19、221页。

⑦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8页。

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①因此，从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起，以马克思为首的总委员会就坚决主张并且实行对参加国际的英国各工联组织的直接领导，而没有另外成立国际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他们认为，这是抵制和清除工联主义在英国工人群众中的机会主义影响，促进英国工人运动革命化的重要关键；“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②

可是，工联主义者对于国际的目的与任务的看法同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同。他们参加国际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在发生罢工时能阻止欧洲大陆工人进入英国，以避免发生竞争，从而维护工联纯经济利益的工具。因此自国际诞生，工联领袖们就不仅竭力维护其对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反对总委员会直接领导参加国际的各工联组织，而且企图排除马克思对国际的正确领导，把总委员会的领导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为此，他们采取了各种卑劣的手段，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在第一国际前期，工联主义者主要在总委员会内部策划阴谋，玩弄两面派手法，反对马克思的领导，妄图实现其篡权的野心。

工联主义者力图垄断国际总委员会的重要职务，以阻挠和对抗马克思的领导。从第一国际成立后就担任总委员会主席的工联领袖奥哲尔，他不为国际做什么事情，却企图一直霸占主席职位。他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夕伙同另一名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策划了极其卑鄙的阴谋，公然违反总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的意愿，想方设法继续担任总委员会主席。为了挫败奥哲尔的阴谋，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在1867年9月24日的会议上通过

^{①②}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8页。

决议，废除了主席一职，从而削弱和打击了工联机会主义首领们在国际领导机构中的地位。

工联主义者为了达到反对马克思领导的卑鄙目的，还大耍两面派手法。在 1867 年国际洛桑代表大会前夕，总委员会总书记、工联领袖彼得·福克斯²⁵一方面在《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上签名，另一方面却暗中给在日内瓦的约翰·菲利浦·贝克尔²⁶写了一封亲启的密信，“要求贝克尔‘尽他的一切力量把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①当福克斯的这一两面派手法和反对马克思及总委员会对英国工人运动领导的阴谋被揭露后，他竟恼羞成怒，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疯狂攻击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并力图“在总委员会中形成一个‘反对派’，来反对象他所说的‘德国的独裁’”。^②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对福克斯进行了迎头痛击，把他的卑鄙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狼狈不堪。

工联主义者还在反对外国人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借口下，反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对英国工联的直接领导。他们曾多次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成立国际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提案，力图摆脱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领导。在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前，由于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坚持斗争，每次都否决了工联领袖们的提案，使他们篡夺国际对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阴谋没有能够得逞。

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的处境极端困难。工联主义者认为他们破坏国际的时机已到，于是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狼狈为奸，公开进行反对国际、分裂国际的猖狂活动。

以奥哲尔为代表的一部分工联领袖，配合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对国际的疯狂进攻，公开地诬蔑总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反对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宣言——《法兰西内战》，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走上了

^{①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 年 10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59 页。

彻底背叛革命的可耻道路。鉴于奥哲尔之流已经堕落成为“替梯也尔和法夫尔诸公辩护的人”^①，国际总委员会在1871年6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取消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²⁷在《法兰西内战》宣言上的签名，并在6月27日的会议上一致决议同他们公开决裂，实际上把这些叛徒开除出了国际的队伍。

以约翰·黑尔斯²⁸为代表的另一些工联领袖，则仍然留在第一国际中，但他们妄图伺机从内部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夺权和分裂国际的阴谋。1872年7月，在总委员会紧张筹备召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前夕，身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的黑尔斯不但千方百计地设置种种障碍阻挠大会的准备工作，而且以新成立的国际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为据点，制造各种借口，力图摆脱总委员会的领导。在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黑尔斯及其同伙就公开倒向巴枯宁分裂主义者一边，疯狂地展开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罪恶活动。当黑尔斯之流的背叛行径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迎头痛击和英国各地支部的强烈谴责后，他们便穷凶极恶地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擅自发表反对国际根本原则的“叛乱的公告”^②，号召不要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对总委员会、分裂国际的狰狞面目。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国际在英国的组织，坚决地反击了黑尔斯一伙的分裂活动，揭露了其罪恶“目的在于损害整个国际”。^③这就沉重地打击了黑尔斯之流的嚣张气焰，帮助广大英国工人群众进一步识破这些工贼的真面目，使几乎所有的支部都站到了忠于国

① 《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1页。

② 恩格斯：《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20页。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16页。

际和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合法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一边，从而使黑尔斯一小撮人陷于完全孤立，遭到彻底的惨败。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把黑尔斯开除出国际。6月1日至2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国际英国组织的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路线。至此，“国际在英国的阵地确定了”。^①

三、在无产阶级参加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在无产阶级参加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议会选举是资产阶级用来粉饰民主，愚弄群众，巩固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则是争取基本民主权利，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斗争手段。

英国地主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最惯于利用虚伪的民主选举制度，剥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权利，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因此，争取改革这种为反动派效劳的不合理的有限选举制度，历来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英国宪章派曾为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动、阶级矛盾的激化，英国又兴起了群众性的第二次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1865年1月，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发起的筹备保卫男子普选权大会临时委员会给总委员会送来了书面邀请，希望国际派代表参加他们的活动，以便在争取选举改革运动中进行合作。这样就在第一国际面前提出了英国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问题。

^① 恩格斯：《在国际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8页。

为了解决这一迫切问题，1865年1月31日，总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意见分歧很大，暴露了工联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目的、纲领和策略等问题上所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促进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目的出发，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这次选举改革运动，但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斗争纲领和策略。这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提出“给全体成年男子以普选权”的口号，作为自己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斗争纲领；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公开承认普选权要求的基础上，并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下，可以和他们建立同盟；但必须发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依靠群众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纲领口号，必须随时警惕和揭露资产阶级分子的妥协与叛变。马克思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激进派“在他们的纲领中直接地、正式地提出男子普选权”，总委员会“选派的代表加入常务委员会，从而可以监督这些家伙，在他们企图发动新的叛变(……)时揭发他们，那末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行动”。^①

工联主义者从崇拜资产阶级民主的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他们热衷于参加选举改革运动，其目的不是为了促进革命，而是企图利用这一运动，争得资产阶级的一些微小的经济让步和改善劳动立法，借以为自己捞取在议会中的肥缺，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也不赞成无产阶级提出普选权的要求，更不想发动群众，一心只想仰仗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为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争得选举权。

马克思主义者同工联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目的、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反映了在对待资产阶级民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页。

主制问题上的革命路线与机会主义路线的截然对立。经过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坚决斗争，总委员会否决了工联的机会主义路线，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正确决议，选派奥哲尔、克里默、埃卡留斯等八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了1865年2月23日召开的选举改革拥护者的筹备会议，建立了选举改革同盟。在同盟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12名委员中有6名是总委员会委员，并规定把“给全体成年男子以普选权”的口号作为同盟的纲领。这样，国际总委员会就掌握了选举改革运动的领导权。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改革同盟是我们一手建立的**”，“**我们已经打破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的一切折衷的企图。各省的运动这一次完全以伦敦的运动为转移**”。^①

在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领导下，改革同盟初期曾经坚持了正确的斗争纲领和策略，在英国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因而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地方都设立了分支机构，群众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这就震撼了英国统治阶级，吓坏了参加改革同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联机会主义领袖。他们与统治阶级策划的破坏、收买等勾当相配合，不久就逐步背离了总委员会规定的正确路线，开始了动摇与妥协的叛卖活动，力图把选举改革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议会斗争的狭小范围之内。在改革同盟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工联领袖们公然声称，作为最近的目标，只要赋予房客以选举权就行了。不久在改革同盟的理事会会议上，他们就正式表示支持格莱斯顿²⁹政府提出的略为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选举法改革法案，从而完全背弃了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纲领。为了掩饰他们的叛卖行为，工联机会主义领袖们竟然吹捧这一法案是什么“要以获得人民衷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3页。

心和认真支持的有利的改革步骤”，并无耻地把格莱斯顿美化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保护者”。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和英国先进工人立即展开了揭露格莱斯顿政府的欺骗和反对工联领袖们的背叛的斗争。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改革法案的不彻底性和欺骗性，指出：这个“可怜的改革法案”是“在这里所能搞得出来的最保守的东西”^①，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局部让步”^②。马克思愤怒地指出：“一切英国运动的可诅咒的传统性又在选举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了。”^③他痛斥工联领袖们“缺乏老宪章派的热情”，竟然把政府的局部让步“看成是体面的斗争成果”。^④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的坚决斗争，同时也由于上述改革法案被议会否决，导致了自由党内阁下台和更反动的保守党内阁上台，1866年下半年，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又继续高涨，并重新提出了要求普选权的口号。7月23日至25日，在伦敦连续举行的3天集会示威活动中，愤怒的群众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使运动具有了明显的革命性质。改革同盟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工联首领们极端害怕伦敦一触即发之势，酿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就迫不及待地与反动政府谈判妥协，无耻地答应协助政府劝说示威群众解散。接着，在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又匆忙通过“今后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的决议，妄图一举扼杀正在发展的革命群众运动。马克思尖锐地揭露并谴责了工联领袖们的这一卑鄙的投降行径，指出：“不论克里歇或是奥哲尔，他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13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04页。

③④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99页。

们两人都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那里违背我们的意志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①

慑于群众运动的汹涌澎湃，英国议会被迫于1867年8月15日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改革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城市中房东和居住一年以上、缴纳房租不下10英镑的房客具有选举权。这样，资产阶级争得了较前为多的政治权利，收入较多的工人上层分子也得到了选举权，而广大的工人基本群众依然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狡猾的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这种微不足道的局部让步，来收买工人贵族，分裂和破坏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而资产阶级化了的工联首领们却认为这个局部让步对自己最有利，所以欣然接受了政府的改革法案。至此，轰轰烈烈的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叛卖就半途而废了。这给英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造成的损失很大”。^②

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的斗争经验表明：英国资产阶级是非常老奸巨猾的，它不但惯于利用所谓议会民主、选举权利来愚弄、欺骗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善于利用“局部让步”的手段来收买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者，分裂、破坏工人运动，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工联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忠实代理人，他们利用自己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地位和影响，竭力把英国工人运动引向崇尚议会民主、合法斗争、点滴改良的机会主义歧途，从而保住资产阶级的“天堂”。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才能引导工人阶级正确对待和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循着争取彻底解放的革命道路胜利前进。

①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866年8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26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05页。

四、19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在爱尔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19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新高涨，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在如何估计和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又进行了激烈的尖锐的斗争。

爱尔兰自 12 世纪后半叶起不断遭受英国的入侵，被逐渐殖民化。根据强迫签订的《英爱合并条约》，1801 年爱尔兰正式并入英国³⁰，完全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侵略者对爱尔兰罪恶的殖民统治和残酷的掠夺，使爱尔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①，“使爱尔兰的发展丧失了一切可能性并使它倒退了几个世纪”。^②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爱尔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19 世纪 60 年代，由于爱尔兰爱国者组织的芬尼亚社³¹的积极活动，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1867 年，芬尼亚社在爱尔兰的一些城市发动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引起了英国各阶级的强烈反响。因此，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什么态度，就成了当时摆在英国工人阶级和第一国际面前必须正确处理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一贯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民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认为，爱尔兰的解放必须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 年 5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6 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 年 1 月 1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411 页。

通过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后来，马克思对英国工人运动和爱尔兰问题做了多年深入的研究后，根据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延缓和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一新形势，在 60 年代又得出了相反的新结论，即“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①；“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②这是由于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也是英、爱工人阶级对立不和的根源。“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③因此，“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④马克思关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结论，阐明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理，即在宗主国缺少革命形势，而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急剧高涨的条件下，殖民地的人民革命可能成为打击殖民主义并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正是由于当时爱尔兰的解放运动对于英国工人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认为：“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⑤；使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

①④⑤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 年 4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78、380、381 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 年 11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81 页。

④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 年 12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398 页。

会解放的首要条件”^①，必须无条件地全力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极力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英国工人群众，要他们懂得“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②这一真理，要他们把自己对爱尔兰的政策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马克思指出：英国工人政党“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③，并为其实现而奋斗。

但是，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追随资产阶级，采取了沙文主义的立场，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路线。他们竭力维护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实行独立。他们对英国统治阶级残酷镇压爱尔兰人的暴行不但一贯保持沉默，相反却特别起劲地责备芬尼亚社员没有采取“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手段。他们还为格莱斯顿政府对爱尔兰所实行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涂脂抹粉，胡说什么格莱斯顿“诚心诚意地”关心爱尔兰人民。这纯粹是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无耻言行。

为声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领导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揭露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反动政策和镇压芬尼亚社员起义的残暴罪行，并无情地批判了工联主义者的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同工联领袖们充当殖民主义辩护士的背叛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867年2—3月间，芬尼亚社领导的武装起义遭到镇压失败后，许多领导人被捕交付法庭审判，有的被判处死刑。英国政府的这一残暴行径在爱尔兰和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根据马克

①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1页。

②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2页。

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

思的倡议，国际总委员会组织和领导了这次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充满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情绪的工联领袖们不但不支持这一正义运动，而且奥哲尔等人竟伙同改革同盟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诬蔑芬尼亚社社员为“叛乱者”。鉴于工联领袖们的可耻行径，国际总委员会不顾他们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于1867年11月12日举行会议，讨论芬尼亚运动问题。马克思的拥护者列斯纳等人先后在会议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论证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和支持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谴责了改革同盟领导人对芬尼亚社社员的恶毒诬蔑。在11月2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准了由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英国内务大臣格桑-哈第的意见书》，抗议曼彻斯特法庭判处4名芬尼亚社社员死刑的残暴行径。后来，马克思愤怒地痛斥了“想参加下届议会的阴谋家”奥哲尔之流，指出他们所以反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只不过是把它作为“投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新借口”^①而已。

为了扩大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群众运动，抗议英国政府的暴行，马克思应邀于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³²上作了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马克思在报告中详细地揭露了英国统治阶级奴役爱尔兰的罪恶历史，论证了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正义性，并明确指出了爱尔兰问题的实质“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土地问题，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②因此，“英国人应该要求爱尔兰分离”。^③

1869年夏秋至1870年初，爱尔兰人民的反英斗争又出现高潮，在爱尔兰和英国各地进一步掀起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7页。

②③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39页。

社社员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马克思参加了1869年10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人数众多的群众示威大会，并猛烈地抨击了格莱斯顿政府。由于格莱斯顿蛮横地拒绝释放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要求，国际总委员会在11月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和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等问题。马克思在11月16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政府的反动政策的著名演说，并提出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马克思勇敢的这一击，在伦敦引起了轰动。它不但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反动政府，而且也击中了工联主义者的要害，“使那些向格莱斯顿献媚的人吃了一惊”^①，十分狼狈。因此，工联领袖奥哲尔和莫特斯赫德³³便跳出来公开反对马克思的决议草案，厚颜无耻地为格莱斯顿的殖民政策辩护，并丑态毕露地说什么：“如果我们想让人获得自由，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②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奥哲尔之流庇护资产阶级的无耻调言，尖锐地指出：“考虑爱尔兰人民比考虑格莱斯顿更为重要”。^③由于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坚决斗争，击败了工联领袖们的拼命反对，在11月3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草案。

为了打破英国报刊对爱尔兰问题和第一国际的原则立场的封锁与歪曲，动员社会舆论声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问题所作的有名决议送到各种进步报刊上发表。在1870年1月1日所写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87页。

② 转引自《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9页。

③ 《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69页。

委员会》的通告中系统地阐述了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意义。这就使格莱斯顿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工联领袖的机会主义立场原形毕露，遭到广泛的谴责。

鉴于曾被宣布为第一国际机关报的工联报纸《蜂房报》³⁴一贯站在工联机会主义立场，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已经堕落成为“一小撮资本家的机关报”^①，于是马克思就采取了断然的组织措施。总委员会在1870年4月26日会议上一致决定同《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给工联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者同工联主义者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斗争，反映了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工联领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了工人贵族的利益，是为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效劳的。它为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背叛提供了“表率”。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革命路线，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代表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奠定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策略。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②

* * *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工联主义阶级根源的揭露，指明了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是工人运动中出现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工联主义的反动实质的批判，揭露了工联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基本特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80页。

②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53页。

征，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反对殖民地被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工联领袖及其推行的工联机会主义路线，不但过去腐蚀、毒害了英国广大工人群众，败坏了英国工人运动，而且至今还被他们的徒子徒孙所继承，仍然在腐蚀、毒害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阻碍、延缓了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因此，学习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工联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工联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揭露工人贵族和现代工联主义者的叛徒嘴脸，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界限，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觉醒，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四节 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巴枯宁阴谋集团被粉碎

一、19世纪60年代末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

19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1866—186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激化了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1866年爆发了争夺德意志帝国领导权的普奥战争³⁵。普法之间争霸西欧的战争正在酝酿。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工人同反动军警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法国1867年2月的巴黎铜业工人大罢工，瑞士1868年春季的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比利时1868年3月沙勒罗瓦矿区工人反迫害的暴动和1869年4月赛兰、弗腊默里矿区工人争生存的大

罢工，都沉重地打击了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影响和促进了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第一国际勇敢地站在罢工斗争的最前列，号召并组织各国工人之间的相互声援。这就大大鼓舞了各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增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扩大了第一国际的组织和影响。

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国际组织的壮大和威望的不断提高，引起了各国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恐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血腥屠杀罢工工人的同时，采取了迫害和破坏第一国际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发动了对国际的大规模诽谤和迫害运动，诬蔑第一国际是无恶不作的“阴谋集团”，并有计划地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上对国际进行疯狂的迫害。比利时反动政府在1868年粗暴地袭击了国际布鲁塞尔委员会委员们的住宅，逮捕了一些委员。1868年3月和5月，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两次受到波拿巴政府的审讯，被判处监禁和罚款。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力图寻找代理人，设法打入国际，从内部破坏这个革命堡垒。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正是适应阶级敌人的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恩格斯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①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是继蒲鲁东之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头子，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分裂主义者。他于1814年5月8日出生在俄国提威尔省托留克县耶穆细罗村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是沙皇政府的外交官，其母

^①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8页。

是高级军官的女儿，家里拥有 700 个农奴。巴枯宁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很深影响，总想出人头地往上爬，14 岁进彼得堡炮兵学校，1833 年毕业后当了沙皇的军官。1840 年后，他辗转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留学，受到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深受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魏特林的依靠少数人进行密谋活动思想的影响。1843 年，巴枯宁在巴黎认识马克思。马克思曾耐心帮助、教育他。但巴枯宁丝毫没有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却对蒲鲁东推崇备至，吹捧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时，巴枯宁到处奔走推行冒险主义，大搞政治投机。他参加过 1848 年布拉格起义³⁶的领导机构，起义失败后逃到德国，又参加过 1849 年德累斯顿的起义³⁷，并于 5 月 10 日被捕，被萨克逊王国法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51 年引渡给沙皇政府，到 1857 年一直被囚禁在监狱中。在狱中，巴枯宁多次上书沙皇哀求赦免。1851 年 7、8 月间，他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长达 10 万言的《悔过书》，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吹捧沙皇是“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是“救命恩人沙皇”。1857 年 2 月，他又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书请求免刑，4 月被减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他为非作歹，并继续上书沙皇求饶。1861 年 4 月，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往日本，经美国到英国。

巴枯宁这个向沙皇屈膝下跪的无耻叛徒跑到西欧后，完全隐瞒了自己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恬不知耻地居然以 1848 年的“老革命”自居，发表了一篇《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吹嘘什么“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把我的全部余年贡献给争取俄国的自由、争取波兰的自由、争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①实际上，巴枯宁是在“自由”、“独立”的幌

① 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90 页。

子下,大肆鼓吹泛斯拉夫主义³⁸,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但是这些自我吹嘘、阿谀奉承的无耻行径,既没有获得沙皇的赏识,也没有为自己争得什么荣誉,而是到处碰壁。“于是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①,实现个人的野心。

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巴枯宁怀着别有用心之目的于1864年11月13日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当面虚伪地表示愿意“努力^②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随后他前往意大利。在那里的几年中,巴枯宁根本没有为国际做任何好事,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搜罗信徒,结党营私,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国际兄弟同盟”。他在为这个组织起草的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对权威”、“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1867年秋天,巴枯宁从意大利迁居瑞士,继续炮制他的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路线。1868年9月,他抛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领”^③,“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③

巴枯宁自称其理论是被他“扩大了、发展了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巴枯宁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有以下几点:

(1) 宣扬个人绝对自由,鼓吹“各阶级的平等”。巴枯宁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只有在个人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时候才能实现。所以他主张社会成员不分阶级、性别都绝对自由平等,把“一切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作为奋斗目标。他在1868年9月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不能想象在沒有自由的情况下还会有任何属于人类的东西”;“我希望

①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0、375页。

③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都得到平等”。^①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又要实现各阶级平等,这是自相矛盾的谬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②;“‘各个阶级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③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决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而是要消灭阶级。

(2) 反对一切国家, 否认任何权威。巴枯宁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人性论出发, 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本末倒置地硬说国家是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根源, “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 ……废除国家, 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④他抹煞不同国家的不同阶级实质, 胡说任何国家的统治都表现为剥削和奴役, 这“是对人性的否定”。他公开叫嚷: “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 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⑤ 这充分暴露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借口反对一切国家, 实际上是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巴枯宁既然认为“国家是主要祸害”, 所以他主张必须首先立即废除一切国家, 而代之以理想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在无政府社会里, 将没有任何权威, 人人都享有平等、自由和人性的权利。这些绝对自由的个人将组成小的自由公社, 然后自下而上地结合为

① 见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8 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②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 年 4 月 19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384 页。

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第 256 页。

④ 引见《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 年 1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400 页。

⑤ 见巴枯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 第 510 页。

自治的自由联邦。

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的这一反动谬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①；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逐步消亡的；但是国家的消亡是以“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②为前提的，否则，整个胜利成果就会前功尽弃，工人阶级就会人头落地。而无政府主义者却把事情颠倒过来了，正是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效劳。

(3) 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运动。巴枯宁认为，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而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他胡说：“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③，“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④他认为，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的途径，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依靠象他那样的天才人物的领导，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核心进行“暴动”的“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不需要任何准备，不需要聚积革命力量，只要少数有魔胆的骨干利用密谋策略，就可以在24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实行“摧毁一切”。巴枯宁把这种幻想的无政府主义破坏行动美其名曰“社会清算”，并说“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巴枯宁以天生的救世主自居，把社会革命看成是唯意志的行动，把群众看作是实现其

①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② 《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

③ 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1页。

④ 引见《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阴谋野心的工具，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政治斗争的陈词调调。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①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巴枯宁的所谓放弃任何政治，只不过是反对工人去搞无产阶级政治，而要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愚弄和统治。这完全是反革命两面派的骗术。他曾情不自禁地供认：“放弃政治——这是诈骗者为了愚弄白痴而想出来的蠢事。”^②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③，充当“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④

(4) 鼓吹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巴枯宁认为，不是私有制产生继承权和阶级的不平等，而相反，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主要条件；因此，社会革命应该从“废除继承权”开始。他胡说：“只要遗产还存在，就将存在世袭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即“人为的阶级的不平等”；只要废除继承权，就可以实现“各阶级平等”。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巴枯宁鼓吹的“废除继承权”这一谬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⑤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于它“**不把继承权看做法律后果，而把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

①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385页。

② 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67页注①。

③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

④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6页。

⑤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页。

的经济原因”。^①这完全是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它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在于“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②并且,宣布废除继承权,“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③所以,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说:“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④

(5) 主张在无政府社会里实行“集产制”。巴枯宁自供说:“我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⑤因此他反对生产资料国有化,主张在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后,通过自由联合自下而上地实行“集产制”。所谓“集产制”,就是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建立工业组合、农业组合,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这种“集产制”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根本不同的。它必然加剧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促使资本主义到处泛滥。可见这种“集产制”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

巴枯宁的这套无政府主义反动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剽窃来的。他所鼓吹的“废除国家”、“放弃政治运动”,就是从蒲鲁东主义抄袭来的。他所宣扬的“废除继承权”、“阶级平等”,则是贩卖圣西门派的旧废物。马克思指出: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⑥,“他的纲领是东一

①②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页。

③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④ 《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页。

⑤ 见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1868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⑥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①这些用革命词句装潢起来的杂拌，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②拿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指导工人运动，只能瓦解无产阶级的组织，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效劳。这就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

马克思指出：“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③巴枯宁“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④，进而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光有无政府主义的纲领还不行，还“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⑤他在意大利、瑞士鬼混的几年，为了实现这一罪恶计划，东奔西走，招降纳叛，网罗死党，于1868年10月在“国际兄弟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团体，实际上是分为三级的秘密阴谋组织。它的最高的、最秘密的核心组织是由巴枯宁直接控制的“国际兄弟会”。“国际兄弟会”由100名“身有魔胆的人”即巴枯宁的亲信组成，这是“独裁者巴枯宁的百名近卫军”，是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总参谋部”。第二级是分布在欧洲各国的“民族兄弟会”，它受“国际兄弟会”的严格控制。第

①③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5—396页。

②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④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

三级才是对外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总之，这是一个由巴枯宁直接操纵的派内有派、层层控制的反革命阴谋组织。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①这个匪帮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是“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们想控制国际，而当这一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图谋破坏国际”。^②可见，巴枯宁集团是一个由一小撮社会败类结成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巴枯宁主义的产生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除了前述的阶级斗争的背景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基础。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还没有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和经济危机的侵袭，以及连年战争的灾难，造成了小农和手工业者成批破产，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阶层。这些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因此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理、盲目破坏的情绪和复仇的思想。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清算”思想，正是这些破产的游民无产者的心理和情绪的反映。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③毛主席也明确指出：游民是“无政府思想的来源”。^④同时，由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因而在思想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的极端顽固的个人主义，在认识上表现为极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

①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1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7页。

③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④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9页。

顽固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极端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正是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反映。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①

60年代末，正当马克思主义刚刚战胜了蒲鲁东主义，第一国际的威望空前增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骗子手巴枯宁又跳了出来，妄图以巴枯宁主义篡改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巴枯宁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起劲地进行无政府主义的蛊惑性宣传，以其异常激进、极端革命的词句、口号煽动和蒙骗了不少无知的青年，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此，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就成为第一国际后期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在批判巴枯宁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着重同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和分裂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国际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反对巴枯宁集团阴谋篡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巴黎公社后至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第一国际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的斗争；海牙代表大会后，马克思、恩格斯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斗争。

二、第一国际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篡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为了扮演无产阶级解放者的角色，把国际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以实现其“贪求权

①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势的野心”^①，玩弄了“各种阴谋诡计”。^②恩格斯指出：“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③

1867年9月，巴枯宁怀着渴求成名得势的欲望从意大利迁居瑞士日内瓦，并立即钻进一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建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³⁹，捞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他原本企图把这个组织变成自己出头露面、左右工人运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工具，以便同第一国际相抗衡。但是他不久就认识到，当时第一国际已经发展成为使资产阶级谈虎色变的巨大力量，光靠“和平和自由同盟”这个无足轻重的团体是无法与之相抗衡并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的。于是他决定改变策略，设法打入第一国际，以达到篡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68年春夏之交代表“同盟”向国际提出两个团体之间建立改守同盟的建议，企图使“同盟”加入国际，阴谋作为他篡权的工具。当1868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绝了这个别有用心建议，使巴枯宁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后，诡计多端的巴枯宁乃在1868年9月“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④他提出了一系列鼓吹无政府主义谬论的决议案，企图以夸张的激进主义激起资产阶级蠢驴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提案遭到了大会的否决。巴枯宁便伙同其死党吵吵嚷嚷地退出“同盟”代表大会，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大

①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7页。

②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7页。

③ 《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9页。

④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

肆宣扬他们已同资产阶级决裂了，用以招摇撞骗，捞取政治资本，策划新的阴谋。

巴枯宁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后，公开申请加入了在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语区分部。马克思揭露说：“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①为此，“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②他暗中紧张活动，于1868年10月拼凑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反革命阴谋组织，“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③他随即于1868年11月29日通过约·菲·贝克尔向总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请“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但却狂妄地声称“同盟”仍然要保留自己的纲领和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觉察到巴枯宁集团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野心和阴谋。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巴枯宁的这一行动是企图“把工人运动置于俄国人的领导之下”。^④恩格斯回信说：必须坚决“反对这个俄国人的阴谋”，“否则，就会有两个总委员会，甚至两个代表大会；这是国中之国”。^⑤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决议，拒绝接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决议指出：如果接受“同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

①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②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376页。

④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8页。

⑤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21、220页。

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这“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①；只有在“同盟”废除其错误纲领和解散其组织后，其成员才可以加入国际。

巴枯宁为了掩护他的阴谋诡计，实现他的罪恶野心，在总委员会作出决议的同日即1868年12月22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光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马克思在接到这封极端伪善的信件后指出：“巴枯宁还陶醉于愉快的幻想中，以为我们将放心地让他自由行动。……于是后者便借这封信制造了一个温情的序幕！”^②这就揭穿了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卑鄙行径。

总委员会的决议给了野心家巴枯宁以沉重的打击。他看到既不能公开打入国际，但又急于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实现其篡夺领导权的目的，于是便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同意国际的条件，宣布“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解散；暗地里仍然保留“同盟”的组织，继续进行秘密阴谋活动。巴枯宁集团就是这样玩弄阴谋诡计混入了第一国际。从此以后，在巴枯宁集团的策划下，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篡夺国际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紧进行。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分裂与反分裂的两条路线大搏斗在国际内部激烈展开。

巴枯宁阴谋集团混入第一国际后，就积极策划利用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时机，来实现他们渴望已久的篡夺国际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3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28页。

领导权的罪恶野心。为此，“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①首先，巴枯宁建议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妄图把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强加给大会，从而改变国际的基本路线，使国际“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②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这是“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③，为了“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④，便接受了他的挑战，同意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其次，巴枯宁极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并制造借口妄图把总委员会的驻地由伦敦迁到日内瓦，以便把国际完全控制在巴枯宁集团手中。再次，巴枯宁企图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以实现其阴谋，便施展了各种卑鄙的手段，竭力动员其支持者多派人到巴塞尔去，他们人数不多，竟派出了 10 名代表，而巴枯宁也亲自出马。他们甚至还伪造代表资格证，把大批空白代表证带到大会上，妄图扩大自己的力量，但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1869 年 9 月 6—12 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参加大会的有 75 名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埃卡留斯等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围绕着继承权问题和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在讨论继承权问题时，巴枯宁分子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进攻，猖狂地要求代表大会宣布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妄图篡改国际的纲领和路线。早有准备的总委员会代表立即给予巴枯宁集团以迎头痛击。他们宣读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地批判了“废除继承权”谬论的反动性。大会进行表决时，巴枯宁的提案没有得过半数票，从

①②④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06 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6 页。

而挫败了他的罪恶企图。

巴枯宁集团在第一着失败后，又立即改变了反革命策略，把注意力集中在夺取总委员会上。当时马克思认为，为了有效地对付巴枯宁之流的宗派阴谋活动，有必要建议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因此，大会在讨论组织问题时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利和权限》的决议，规定总委员会有权接纳或拒绝新支部参加国际，也有权撤销或解散旧支部。巴枯宁分子也积极“赞成”这项决议。为什么一贯高唱反对“一切权威”、主张“绝对平等”的巴枯宁派竟然同意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呢？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巴枯宁分子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实用主义底细，指出：“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①然而代表大会再一次连选了前任的总委员会委员，巴枯宁未能钻入。总委员会的会址仍设在伦敦。这样，巴枯宁集团精心策划的在会上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诡计就完全破产了。

巴枯宁集团在巴塞尔大会上篡权活动的失败，使巴枯宁及其死党非常懊丧、愤恨。但是，老奸巨猾的巴枯宁认为与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公开摊牌进行斗争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在写给赫尔岑⁴⁰的一封信中吐露说：“如果我现在就公开进行战争来反对马克思，国际中四分之三的人都会反对我，我就会吃亏，会失去我想站稳脚跟的唯一基地”。于是巴枯宁便采取“拆散它”、“分割它”，“以便较容易地击溃它”的“分而治之”的策略。^②根据这一反革命策略，巴枯宁阴谋集团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积极地在各国的国际组织中策划分裂活动，扩大自己的宗派力量，篡夺领导权，不断地用无

① 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8页。

② 《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莫斯科1928年俄文版，第157页。

政府主义纲领“偷换国际的纲领”^①，妄图从基层逐步破坏第一国际。

巴枯宁集团为了制造分裂的反革命舆论，就利用他们控制的《平等报》^②和《进步报》^③于1869年11月至12月间多次发表文章，恶意制造借口，混淆是非，攻击总委员会。马克思当即于1870年1月写了《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回击了巴枯宁派的攻击，逐条驳斥了他们对总委员会的肆意诽谤。3月，马克思又写了《机密通知》，发给国际各支部，公开揭露了巴枯宁集团的种种阴谋诡计和分裂破坏活动，并提醒国际的各级组织要特别警惕巴枯宁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④

在这一时期，巴枯宁阴谋集团以瑞士的汝拉山区为基地，积极向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地区秘密发展“同盟”的组织，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密谋策划以夺取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领导权作为前哨战。1870年4月4日在瑞士拉绍德封召开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集团搞突然袭击，重施他们在巴塞尔大会上玩弄过的诡计，企图以两票的虚假多数迫使大会承认“同盟”的日内瓦支部为联合会的一部分，并且要把联合会会址迁到“同盟”的老巢汝拉地区，以便他们完全控制联合会。由于遭到许多代表的坚决反对，于是巴枯宁派便强行表决，结果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分裂为两部分，各自继续开会。巴枯宁派竟以全联合会的合法代表者自居，和原来的联合会委员会相对抗。这就导致了瑞士国际组织的公开分裂。马克思痛斥了巴枯宁集团罪恶的分裂活动，指出：“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害我

①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9页。

②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6页。

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①

总委员会坚决支持忠于国际事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在1870年6月28日举行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揭穿了巴枯宁派所拥有的多数“只是表面上的多数”。^②决议决定:设在日内瓦的联合会委员会应当保留自己的名称;设在拉绍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巴枯宁派)则应改用其它合适的名称。这一决定粉碎了巴枯宁派篡夺日内瓦支部领导权的阴谋,打击了他们分裂活动的气焰。他们对此大为恼火,攻击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总委员会被迫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总委员会原准备开展一次反击巴枯宁集团的大规模斗争,但是1870年7月普法战争的爆发,暂时延迟了这场斗争。

三、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派对国际的猖狂进攻。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斗争的胜利

普法战争引起了法国革命。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被卖国贼梯也尔勾结普鲁士侵略军武装颠覆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诽谤、诬蔑、围攻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反动狂潮。法国政府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参加国际就是“犯罪”。法国外长法夫尔照会欧洲各国政府,号召共同对国际进行征讨。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872年5月27日以图谋“叛国”的罪名,判

^①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7页。

^②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90页。

处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两年监禁。其他国家的国际支部和会员也都遭到同样的残酷迫害。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①

巴黎公社的失败，国际的困难处境，使混入国际各色投机分子、各种机会主义者原形毕露。他们有的动摇退缩，有的公开叛变投敌。而一贯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未能得逞的野心家巴枯宁及其阴谋集团，则认为他们分裂、破坏国际的时机已经到来，便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诽谤巴黎公社、反对第一国际的“大合唱”。一方面，他们同欧洲各国反动派一起恶毒地诽谤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事业和它的英雄们的英勇斗争。巴枯宁本人公开诬蔑公社“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是“犯罪行为，是蠢事”。这就彻底撕破了他的“社会革命”的假面具，暴露出狰狞的反革命嘴脸，充分证明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另一方面，巴枯宁阴谋集团积极配合各国反动派对第一国际的进攻，趁机加紧了分裂和破坏国际的猖狂活动。他们恶毒地攻击总委员会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正确立场，造谣说什么“总委员会没有支援巴黎运动”，“总委员会亲德意志的倾向是极其触目的”等等。他们把瑞士的汝拉支部作为反对国际的大本营，并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网罗门徒，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使国际由于内部的分裂处境更加困难。他们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际的非常代表大会，阴谋与资产阶级配合里外夹击颠覆国际。

面对这种内外艰险的形势，为了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回击巴枯宁集团的进攻，总委员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1页。

于1871年9月17—23日在伦敦召开了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到会代表共23人，其中大多数是马克思的拥护者，巴枯宁由于害怕当面被揭露而不敢出席。会议通过了《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谴责了巴枯宁派操纵的汝拉各支部的分裂活动，并警告他们如果再次发动公开攻击，总委员会今后将“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①会议彻底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关于放弃政治活动的谬论。恩格斯在发言中深刻地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人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我们“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②会议挫败了巴枯宁分子的阻挠，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和组织独立政党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③的根本条件。会议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⁴³阴谋完全无关，涅恰也夫是用欺骗方法僭取了国际的名义”^④的特别决议，尤其使巴枯宁集团惊慌失措。因为涅恰也夫是巴枯宁的死党，他是在巴枯宁的指使下，在俄国假冒国际的名义干了很多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所以涅恰也夫阴谋的被揭露，无异在全世界工人面前戳穿了阴谋家巴枯宁的假面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0页。

②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7页。

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①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对国际各级组织的名称作了统一的规定，取消各组织的宗派名称，严禁一切宗派活动，这也是对巴枯宁集团宗派分裂活动的沉重打击。

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遭到完全失败的巴枯宁集团，并不甘心罢休，他们把仇恨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身上。所以在伦敦代表会议以后，他们就以反对“权威主义”为名，公开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疯狂进行分裂活动，阴谋使国际瓦解。躲在阴暗角落里策划阴谋诡计的巴枯宁，指使其党徒于1871年11月12日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只有16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汝拉各支部代表大会。他们利用这次分裂会议的名义抛出了一个所谓《告国际工人协会各总支部书》，即臭名昭著的《桑维耳耶通告》，公开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恶毒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是什么“权威主义”、“独裁者”、“专政”等等，并要求召开代表大会，实行“支部自治”。这是巴枯宁阴谋集团公开分裂国际的信号和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指出：“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词句，一句话，他们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和独裁的统治。”^② 恩格斯还揭露说：巴枯宁集团“从此以后策略就改变了。命令下达了。在同盟有分支的地方，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班牙，巴塞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权威主义的决议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③

①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5、484—485页。

③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0页。

巴枯宁集团对总委员会的恶毒攻击和公开分裂国际的罪恶活动，完全迎合了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对欧洲警察当局来说，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②所以《桑维耳耶通告》一出笼，立即受到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客、警察和一切反动分子的热烈欢迎，到处广为推销。但是，巴枯宁派的倒行逆施却遭到各国觉悟的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和迎头痛击。各地的国际支部相继通过了拥护总委员会和谴责《桑维耳耶通告》的决议，甚至巴枯宁集团的支柱“同盟”西班牙支部的盟员们都起来反对他。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同巴枯宁集团的猖狂分裂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72年1月至3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和分裂破坏活动，逐条驳斥了《桑维耳耶通告》对总委员会的诬蔑和攻击，把他们的狰狞面目和罪恶目的公布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

总委员会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决定于1872年9月在荷兰的海牙召开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恩格斯说：“揭穿这个秘密的骗子手团体的存在，就是消灭它的力量。”^③因此，总委员会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派出代表去苏黎世调查巴枯宁集团的阴谋活动情况。巴枯宁对这次调查非常害怕，公然采取杀人灭口的卑鄙手段，竟指使其死党暗杀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吴亭⁴⁴。调查人虽受了重伤，然而还是完成了任务。

①③ 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3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00页。

马克思、恩格斯愤怒地揭露了巴枯宁集团采用撒谎诽谤、阴谋诡计和“有计划有步骤的暗杀”^①的卑劣策略。他们尖锐地指出：“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②；然而这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的耍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③

巴枯宁集团得知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消息后，也加紧策划，妄图作垂死挣扎。巴枯宁及其死党认为，即使重新使用在巴塞尔大会和拉绍德封大会使用过的手法，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也不能获得虚假的多数，更无力控制大会的领导权，达到其破坏国际的目的。于是“同盟就企图发动 coup d'état〔政变〕”。^④其办法是利用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于8月5日在里米尼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公开宣布分裂的决议，声明他们“不再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一致”，并建议一切反总委员会的支部于1872年9月2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瑞士的纽沙特尔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同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分庭抗礼。但是，这个孤注一掷的“政变”计划，遭到内外的强烈反对而彻底破产。巴枯宁阴谋集团不得不“纠正自己的失策”^⑤，又厚颜无耻地派出自己的14名代表在吉约姆⁴⁵率领下去参加海牙大会，妄图同国际最后决一死战。

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海牙举

①②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7、371、424页。

③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④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3页。

行。出席大会的共有 15 个国家的 67 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约有 40 名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巴枯宁派及其他反对派分子占 20 多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牙大会是关系到国际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所以亲自出席并领导了这次大会。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审查报告。巴枯宁仍然不敢出席大会，继续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玩弄阴谋诡计，策划新的分裂活动。

在海牙大会上，首先围绕加强还是取消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巴枯宁分子吉约姆等人发言要求取消总委员会的一切权力，主张把总委员会变成“通讯统计局”或者“信箱”。马克思在发言中根据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阐明了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极端重要性，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以“反权威主义”为名而行瓦解国际之实的反动阴谋。在马克思的拥护者的坚决斗争下，大会以 40 票赞成、4 票反对、11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授予总委员会更广泛权力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有权暂时开除国际的一个支部直至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独立的政党、从事政治斗争的决议，并决定把它载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审查了巴枯宁集团的分裂活动，通过决议把这个反革命阴谋组织的首恶分子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并公布有关“同盟”罪证的文件。

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最后判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这次大会是“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审判会”。^①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都逃不脱人民的审判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 年 6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11 页。

和历史的惩罚。海牙大会表明，第一国际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四、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集团的疯狂反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斗争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巴枯宁及其死党仍然负隅顽抗，进行疯狂的反扑。1872年9月15日，巴枯宁集团控制的西班牙、汝拉、意大利支部和自命是法国、美国的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瑞士的圣伊米耶召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公开宣称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不承认海牙大会选出的新总委员会，并成立了“反权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①巴枯宁还在1873年初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极力为他在国际内部的阴谋分裂活动诡辩翻案，恶毒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人身诽谤，恣意歪曲和粗暴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巴枯宁集团的疯狂反扑和垂死挣扎，只得到一小撮信徒和英国工联机会主义首领黑尔斯之流的附和，但却遭到国际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波兰、葡萄牙和北美的国际组织都坚决支持海牙大会的决议。就连在海牙大会上曾经支持过巴枯宁分子的荷兰联合会也转向总委员会一边。根据各地支部的要求，总委员会在1873年1月26日通过决议，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②同年5月30日，总委员会又重申了这个声明，并且决定将参加了巴枯宁派召开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32页。

②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37页。

的所谓“反权威主义”大会或承认它的各项决议的一切组织和个人统统开除出第一国际。这就从组织上彻底粉碎并清除了巴枯宁阴谋集团和巴枯宁分子。

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1872到1875年先后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和阴谋诡计，论证和发挥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巴枯宁集团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马克思说：“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①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②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说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绝不能废除国家，实行所谓无政府状态，而是

①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②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必须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否则，“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① 恩格斯还痛斥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和集中，鼓吹无条件自治的反动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和集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战斗的论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极其透彻地分析指出，工厂组织生产，火车正常奔驰，轮船安全航行，都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服从，即需要权威。而“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 因此，“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③ 那些诅咒权威和集中的人，若不是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而胡言乱语的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口头革命派，故意制造混乱，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④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穿了巴枯宁集团口头上高喊团结，实际上大搞分裂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论证了无产阶级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说：“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⑤ 而“团结”不离口的巴枯宁阴谋集团却是最大的宗派主义

① 《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439页。

②③④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553页。

⑤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者、最凶恶的分裂主义者、破坏革命团结的罪魁祸首。恩格斯指出：“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①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只有经过斗争，而不是调和，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革命团结。他说：“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②恩格斯在1874年撰文严厉批评了《前进》^{④6}杂志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纠纷的调和折衷主义。他写道：当巴枯宁集团大搞阴谋诡计，公开分裂国际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其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丧尽天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证明开除是正当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经验，明确地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却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

①②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411页。

③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9页。

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①马克思、恩格斯从伦敦代表会议起所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性的措施，都是为了彻底公开揭穿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给予它毁灭性的打击。《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出版和连续再版，也是为了彻底清算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②这就使巴枯宁集团在工人运动中声誉扫地，遗臭万年。

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根据巴枯宁分子在1873年2—9月爆发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⁴⁷中的丑恶表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策略的荒谬性和反动性。恩格斯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③他们的“极端革命的叫喊”，就会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④而他们“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⑤总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⑥1873年的西班牙革命最后宣告了巴枯宁主义在实践中的破产。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坚决斗争和毁灭性的打击下，陷于彻底孤立、走投无路的巴枯宁被迫于1873年9月在《日内瓦报》上登出一个所谓声明，虚伪地宣称自己年老多病，已经没有必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②③④⑤⑥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578、579页。

要的力量和信心来从事活动了，因此要“退出斗争舞台”，并哀求同时代的人把他“忘却”。这实际上是装死躺下，以退为进，为了更隐蔽地进行阴谋活动。巴枯宁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至死都在搞阴谋诡计。他公开发表“声明”后，仍然躲在幕后继续指挥其党徒策划反国际的阴谋。巴枯宁派的所谓“反权威主义”国际，在1873、1874、1875、1877年还开过4次大会，猖狂地进行反扑，进一步破坏工人运动。但是，这种疯狂反扑，只能表明他们心劳日拙，垂死挣扎。不久后，巴枯宁派发生内讧，党徒们纷作鸟兽散。1876年7月，巴枯宁病死于日内瓦，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虽然巴枯宁死了，巴枯宁阴谋集团也彻底覆灭了，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巴枯宁主义的余毒并没有也不可能短期内就完全肃清，作为巴枯宁主义思潮余波的无政府主义还伺机兴风作浪，不断危害其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一直持续地进行着。

*

*

*

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一次尖锐激烈的、惊心动魄的两条路线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坚决地粉碎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这次路线斗争的策略和经验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①这三项基本原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2年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则既是对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巴枯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大搞无政府主义，大搞分裂主义，大搞阴谋诡计的祖师爷。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地地道道的现代巴枯宁式人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巴枯宁的忠实门徒。他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党营私，大搞宗派分裂活动，不择任何手段，搞尽了阴谋诡计。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林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所以他们就不能象巴枯宁那样赤裸裸地反对革命，而必然要打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招牌来掩饰自己，欺骗党和群众；由于他们不仅代表了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力图篡权的愿望，因此比巴枯宁表现得更加阴险、狡猾、凶狠，特别贪婪、丑恶、疯狂。然而，不论巴枯宁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林彪，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都是违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所以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很虚弱的，终究都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

五、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国际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讨论了恩格斯提出的把总委员会的驻地迁往美国纽约的提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复杂的斗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一提议。大会根据总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在美国居住的原则，选出了新的总委员会，左尔格被选为总书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不再担任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海牙大会闭

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说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表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①

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后，由于远离欧洲，实际已不能起领导作用了。1874年，左尔格因同总委员会委员、拉萨尔派分子波尔特⁴⁸发生了严重分歧和尖锐斗争，辞去了总书记职务，退出了总委员会。从此，“**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②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的费列得尔菲亚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告第一国际解散。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组织形式必须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需要不相适应，则应该取消这个形式。第一国际就是在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使它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实际行动。当时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对国际进行疯狂的镇压，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国际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要求，如果要继续进行活动，就必然会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的牺牲。同时巴枯宁集团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又适应资产阶级镇压和破坏工人运动的需要，加紧分裂破坏国际的罪恶活动。为了杜绝这些叛徒们假冒国际名义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国际退出舞台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

①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②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2页。

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①

巴黎公社后,欧洲开始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整个西方进入相对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时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任务是: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充分利用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和斗争形式,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恩格斯指出:“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②,第一国际已不可能适应新的斗争任务的需要了,“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国际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毫不调和的坚决斗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胜利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到第一国际结束时,“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④

第一国际在斗争中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同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大大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正是在第一国际的革命路线影响下,诞生了伟大的巴黎公社。

第一国际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各国工人群众在罢工斗争中,特别是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第一国际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积累了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培养了一批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秀骨干。这就在组织上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奠定了基础。

列宁高度评价了第一国际的历史功绩,指出:“第一国际奠定

①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3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08页。

②③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④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①“它在工人解放的斗争史中是万古长存的”。^②

第二章 注 释

1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是俄国同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在巴尔干和中东的经济和政治的霸权而发生的非正义战争。1853年,俄国首先入侵土耳其。接着,英、法对俄宣战。最后,俄军被联军击败。1856年3月签订了《巴黎和约》。因为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克里米亚(原称克里木)半岛,所以称为克里米亚战争。——第108页。

2 意大利1848年革命失败后,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运动在50年代末重新高涨起来。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以马志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推翻意大利各邦的封建王朝,驱逐外国势力,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1810—1861)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贵族自由派主张通过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妥协,建立一个在萨伏依王朝领导下的意大利王国。1859年4月,撒丁联合法国发动了对奥战争,推动了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秋季统一了北部和中部。1860年11月统一了南部。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第109页。

3 德国的统一运动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或者通过革命,或者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就是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2页。)1848年革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统一德国的一次尝试。50年代末,争取统一的运动重新高涨。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反动,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力量领导革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就落入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手中,由他们的政治代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1815—1893)通过发动3次王朝战争于1871年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第109页。

4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北方资产阶级同南方奴隶主之间的内战。1861年2月初,南部保持奴隶制的各州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南部各

①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② 列宁:《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0页。

州同盟，并制定新宪法，选举总统，公开进行分裂叛乱活动。4月15日，联邦政府总统林肯（1809—1865）号召人民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北方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经过4年的内战，于1865年4月粉碎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恢复了国家的统一。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第109页。

5 1857—1859年，印度各阶层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举行了席卷印度北部、中部广大地区的武装起义。这次震撼全印度的人民起义遭到英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第109页。

6 1854—1856年的西班牙革命，是西班牙的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1854年6月，西班牙爆发了武装起义，要求实现有限君主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步派取得了胜利，组成了以埃斯帕特罗（1793—1879）为首的进步派内阁。但是，进步派在革命过程中被人民群众运动的发展吓破了胆，不断向反革命妥协让步，从而为反动势力的卷土重来铺平了道路。1856年7月，西班牙的反动派和教权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把进步派内阁赶下了台，组成了奥当奈尔将军的保守派内阁。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至此失败。——第121页。

7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第123页。

8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25—1910），裁缝工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在国际里为反对机会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进行了积极的斗争。——第123页。

9 维克多·勒·吕贝（约生于1834年），在伦敦的法国侨民，曾作为法国工人的代表参加第一国际的建立，任总委员会委员。1866年，由于他进行阴谋活动，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128页。

10 乔治·奥哲尔（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建立工作，任总委员会委员和主席（1864—1867）。后与资产阶级公开勾结，反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领导，诬蔑巴黎公社。——第129页。

11 威廉·朗达耳·克里默（1838—1908），英国工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创建工作，任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第129页。

12 约翰·韦斯顿是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欧文主义者，曾积极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工作，任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第129页。

13 鲁伊治·沃尔弗是意大利少校，马志尼主义者，曾参加第一国际的成立会议，任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1871年他的波拿巴特务面目被揭露。——第129页。

14 马志尼主义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泽培·马志尼(1805—1872)所鼓吹的一种反动主张。他信仰唯心史观，宣扬一种神意指引的历史进化观点，认为在即将到来的社会里，人类将根据新的宗教启示，按社团的原则重新组织起来；每个民族都将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所有的民族国家都由一种单一的“进步的道德规律”联系起来。他反对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和平”，提出以“劳资合作”、“产业协会”为基础来解决工人问题的空想计划，并企图使工人群众接受其错误理论和主张，成立所谓欧洲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里。——第129页。

15 维也纳会议(1814年10月1日开始，1815年6月9日结束)是反法联盟各国在战胜拿破仑后为重新瓜分欧洲领土和掠夺殖民地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在这次分赃会议上，俄、英、奥、普四强为争夺波兰领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815年6月，与会各国签署的《最后总决议案》，确认了四强关于瓜分波兰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波兰的大部分土地组成波兰王国，附属沙俄；普鲁士得到波兹南和但泽；奥地利占有加里西亚；克拉科夫及其附近约1000平方公里土地则组成独立的共和国，俄、普、奥三国派驻使节，实际上是共同统治这个地区。——第143页。

16 比埃耳·韦济尼埃(1826—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因进行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根据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被开除出国际。——第149页。

17 1864年底至1865年初，由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津组成的国际巴黎分部理事会同以勒弗尔和贝律兹为首的另一派，为争夺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总委员会为解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曾多次举行会议，1865年3月7日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第150页。

18 昂利·路易·托伦(1828—1897)，法国雕刻工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1871年2月，他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期间，他投靠凡尔赛匪帮，成为革命的叛徒。4月，国际总委员会把他开除出国际。——第151页。

19 弗里布尔原是法国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第151页。

20 欧仁·杜邦(1831左右—1881)，法国乐器工人，国际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法国通讯书记，拥护和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第151页。

21 立法团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名义上的立法机关，负责讨论和表决法案，但实际上是路易·波拿巴的御用工具。——第151页。

22 塞扎尔·德·巴普(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第153页。

23 路易·欧仁·瓦尔兰(1839—1871)，法国装订工人，工人运动的优秀活动家，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主要领导人。1870年9月4日革命后，瓦尔兰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革命期间任公社委员，1871年5月28日在保卫公社的最后战斗中英勇就义。——第155页。

24 阿尔都尔·米尔柏格(1847—1907)，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第156页。

25 彼得·福克斯(?)—1869)，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曾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和总书记(1866年9—11月)。——第166页。

26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参加者，60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与战友。——第166页。

27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国际。——第167页。

28 约翰·黑尔斯(1839—?)，英国工联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总书记(1871—1872)，后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委员会中的改良派，从事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的分裂活动。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167页。

29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资产阶级政客，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和内阁首相。——第170页。

30 1798年5—6月，在资产阶级爱国团体——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下，爱尔兰爆发了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英国政府在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后，强迫签订了《英爱合并条约》。条约从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废除了爱尔兰议会，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使爱尔兰完全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第173页。

31 芬尼亚社是19世纪50年代末先后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和爱尔兰本土成立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通称，因为它以爱尔兰历史上一个英勇的部落“芬尼亚”命名，所以称“芬尼亚社”。芬尼亚社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成员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虽然有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等错误，但它发动的反英武装起义却大大推动了60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恩格斯对芬尼亚运动的革命性质和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第173页。

32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等人于1840年2月建立的。1847年、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后，在列斯纳等人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被英国政府封闭。——第176页。

33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1825左右—1884)，英国织布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海牙代表大会后积极从事反对国际的活动。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177页。

34 《蜂房报》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1861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22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蜂房报》被确定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但是该报在刊登国际的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时经常篡改、歪曲或删节。马克思对此曾一再提出抗议。该报从1869年更换了所有者之后，实际上已蜕变为一小撮资本家的机关报。总委员会在1870年4月26日会议上的一致决定与《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第178页。

35 普奥战争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邦联领导权而发生的战争。战争于1866年6月17日爆发，7月3日普奥两军决战于捷克境内的萨多瓦，奥军惨败，普军大胜。8月23日签订和约，奥地利被迫退出德意志邦联，旧邦联宣告解散。1867年建立了有19个邦和3个自由市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成了德国各邦的盟主。——第179页。

36 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长期处于奥地利帝国奴役下的捷克也兴起了民族独立运动。1848年6月12日，为了回击奥地利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布拉格爆发了武装起义，巷战街垒布满了街道，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者并肩战斗。6月17日，布拉格起义苦战5天后终于失败。——第181页。

37 为了维护德国三月革命的成果，1849年5月4日，萨克森王国首府德累斯顿爆发了起义，起义人民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赶走了国王，组成临时政府。5月9日，王国军队在普鲁士军队的援助下把起义镇压下去。——第181页。

38 泛斯拉夫主义是俄国沙皇政府为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而制造的大民族主义的反动理论。它以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为幌子，鼓吹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恩格斯揭穿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本质，尖锐地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2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3页。〕——第182页。

39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古·福格特等人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它鼓吹通过建立“欧洲联邦”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第190页。

40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和作家。——第194页。

41 《平等报》是瑞士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周报）。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及其同伙佩龙、罗班等人曾把持该报作为攻击国际总委员会的工具。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于1870年1月改组了编辑部，撤销了巴枯宁分子的职务，此后该报又转而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第195页。

42 《进步报》是巴枯宁派的报纸，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在勒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编是吉约姆。该报公开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第195页。

43 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涅恰也夫（1847—1882）是巴枯宁阴谋集团在俄国的代理人、杀人犯。他假冒国际的名义在俄国从事破坏革命的勾当，利用欺诈、威胁等手段蒙骗一些革命青年，大搞暗杀恐怖活动，因而使这些无辜的青年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于1871年7—8月在彼得堡受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涅恰也夫案件。涅恰也夫于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第198页。

44 尼古拉·伊萨柯维奇·吴亭（1845—1883），俄国革命家，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曾参加过国际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第200页。

45 詹姆斯·吉约姆（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阴谋集团的主要骨干，因从事分裂和破坏第一国际的罪恶活动，在1872年海牙

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 201 页。

46 《前进》杂志是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于 1873 年至 1877 年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不定期俄文评论性杂志(总共出了 5 卷),它反映民粹派右翼的观点,但它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的活动给予很大的注意。——第 206 页。

47 1873 年初,西班牙爆发了争取共和制的资产阶级革命,2 月 11 日宣布成立共和国,亚马多国王退位,联邦共和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决定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革命继续发展,许多城市先后举行了反政府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巴枯宁分子不是努力使工人取得政权,相反地却帮助一个由骗子手和野心家组成的、自称为“不妥协派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集团取得了政权。由于各起义城市都实行了巴枯宁派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原则,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互相协作,结果政府只用了极少量部队到 9 月便把各起义城市一一征服了。——第 207 页。

48 弗里德里希·波尔特原是德国人、拉萨尔派分子,后侨居美国,参加美国工人运动,任国际北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1874 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 210 页。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

具有 1848 年革命光荣传统的法国无产阶级，从 60 年代起又积极投入战斗，于是工人运动重新广泛开展起来。

路易·波拿巴 18 年的反动统治，加剧了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1870 年的普法战争，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9 月 4 日革命，推翻了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巴黎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卖国投降活动与普鲁士侵略的斗争中，迅速地武装起来，举行了震惊世界的 3 月 18 日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在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中，表现了空前的历史主动性、革命的首创精神和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革命榜样。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短短的 72 天，但它的革命原则是永存的。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

巴黎公社革命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期——“**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①、工人运动向广阔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走向没落和衰亡的新时期。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39 页。

第一节 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的激化。3月18日巴黎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一、普法战争的爆发与9月4日革命。第一国际总委员 会关于普法战争的革命策略

法国在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时期，路易·波拿巴为了维护一小撮地主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他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推行了一整套反动的内外政策。对内，他一方面对工人农民进行欺骗；另一方面实行疯狂的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几乎毁灭了1848年革命的所有民主成果，禁止言论、出版的自由，取消秘密结社，摧毁一切民主组织。他派出大批特务、警察潜入工厂，监视和镇压革命工人，许多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审讯、监禁和流放。对外，波拿巴政权实行沙文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连年不断地进行侵略战争。1853年至1856年，法国伙同英国与俄国进行瓜分地中海东部势力范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法国占领了阿尔及利亚附近的卡比利亚；1859年，又以“援助”意大利统一为名，参加了反奥战争，并向意大利索取了萨伏依和尼斯；1861年至1867年，又派兵远征墨西哥；1867年派兵帮助意大利教皇镇压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等等。也正是在路易·波拿巴统治时期，曾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特别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军伙同英军一起入侵北京，大肆屠杀和掠夺中国人民，烧毁圆明园，抢劫大量财富，并强迫清政府两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64年法国侵略军还帮助清政府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同时，法国还加强了对印度支那的扩张，侵略越南，占领西贡，在柬埔寨建立了

殖民主义“保护权”。

波拿巴政权的政策直接符合大资产阶级的要求，为金融投机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工业总产量几乎增加3倍，对外贸易额也增加了2倍。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激化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法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人人数已由过去的100多万增加到300多万。工人的集中程度也有所加强。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巧取豪夺，以及1857年和1866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恶化。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提高10—40%，但是城市中的农产品价格却上涨了67%，房租则涨了70%，因此，工人实际工资却大幅度下降了。同时连年战争极大消耗了法国的人力物力，沉重的军费负担又全部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促使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进行政治斗争，反对帝国政府，要求民主权利。曾经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一度低落的工人运动，从60年代起又开始活跃起来。在法国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中，第一国际的影响很大。1865年初成立了国际巴黎分部理事会，仅仅一年时间国际会员就由200人发展到500人。1868年在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领袖瓦尔兰的领导下，国际巴黎支部贯彻执行国际的章程，积极建立工人组织，加强工人团结，赞助并领导罢工斗争，使国际在工人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869年，巴黎的40多个工人团体联合成立了“工会联合会”，与第一国际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1870年3至4月短短一个月內，国际巴黎支部就由13个增加到25个，并在瓦尔兰领导下建立了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在成立会上，瓦尔兰宣传第一国际的思想原则，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思想。这时的国际会员及其同情者

已达 24 万多人。以瓦尔兰为代表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的影响的加强,说明法国工人革命觉悟逐渐提高,他们日益摆脱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蒲鲁东主义的思想束缚,积极投入争取自身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工人运动不断高涨。1869 年爆发了矿工大罢工,这次罢工几乎席卷整个罗亚尔矿区;1870 年初,克勒佐兵工厂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罢工,3 月又再次发动了罢工斗争;4 月,巴黎发动了持续将近 4 个月的铸工大罢工;1870 年 1 月 20 日,巴黎人民为抗议路易·波拿巴的堂兄弟庇尔·波拿巴杀害共和派记者维克多·奈尔的暴行举行了 20 万人游行示威,并几乎演成起义。在这次斗争中,工人已经提出“打倒波拿巴!”“共和万岁!”的口号。1870 年 5 月,当波拿巴为了维持帝国统治而举行全民投票的时候,工人在国际巴黎支部的倡导下,展开了抵制运动,所有大城市的工人都一致起来,反对全民投票,揭穿了波拿巴玩弄假民主的欺骗性。法国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工人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表明他们已成为反对第二帝国的一支最坚决的力量,显示着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在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境遇也每况愈下。农民缺少土地的问题在第二帝国期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仅在 1862 年农民出卖土地的总值就达 20 亿法郎,而赋税负担却从 7 亿增加到 12 亿法郎。广大农民曾抱有的波拿巴能够带来土地的幻想象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的兼并、排挤之下,在沉重的捐税和物价上涨的重压之下,破产也日益增多,仅巴黎一地就有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破产的威胁。第二帝国在这个阶级中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以宫廷为中心的营私舞弊、盗窃公款以及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一方面加深了人民生活的贫困,激化了阶级矛盾,同时也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波拿巴统治日益不满。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的报纸经常发表抨击波拿巴政权的评论。政府反对派的首领，“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①的两面派梯也尔也在1867年大叫“种种错误，政府无一不犯”。共和主义者、青年律师甘必大¹发表反政府讲演，并提出广泛的民主纲领。知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则经常聚集在巴黎的咖啡馆中议论和抨击波拿巴政府的内外政策。

工人运动的发展，农民的不满情绪，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反政府运动的兴起，证明波拿巴政权已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波拿巴政权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在工人运动中具有很大影响的国际巴黎支部进行疯狂的迫害，继1868年两次对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进行逮捕审讯之后，1870年又策划了第三次审讯，妄图消除国际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破坏工人运动。与此同时，波拿巴准备发动对普鲁士的侵略战争，以便转移人民视线，扼杀国内革命运动。皇后欧贞尼曾经对她的儿子这样说：“如果没有战争，吾儿将不能做皇帝了！”发动对普鲁士的侵略战争，也是出于波拿巴称霸欧洲的野心，他早就想通过发动一场战争，阻挠德国的统一，夺取垂涎已久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以维持自己在欧洲的优势。

普鲁士俾斯麦政府也早想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削弱法国，进而夺取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既有丰富矿产，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这样，由于普法两个反动王朝利益的驱使，战争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870年7月19日，波拿巴借着法德两国统治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所发生的纠纷，首先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普法战争爆发前夕，法国工人阶级已经意识到波拿巴准备“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揭露和谴责波拿巴政府的战争阴谋，国际的巴黎会员在7月12日公布了《告全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下同），第40页。

世界各民族工人书》，指出：“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呼吁增强法德工人的团结，号召各国工人“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

德国工人积极地回答了法国工人的呼吁。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表示坚决反对王朝战争，“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利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国际柏林支部在回答巴黎宣言时说：“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共同事业。”

普法战争爆发后，欧洲无产阶级，特别是法、德两国工人阶级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这场战争呢？应采取的策略方针又是什么呢？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于7月23日发表，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宣言》中首先赞扬了法、德两国的先进工人，因为他们还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已举行集会，相互表达了加强国际主义团结，共同反对王朝战争的坚强意志。《宣言》接着分析了这次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指出战争双方都怀有掠夺和争霸的野心，是爆发这次战争的根本原因，“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①法、德两国统治阶级是这次战争的罪魁祸首，“战争不是法国人民，而是帝国发动的”；战争的另一方“俾斯麦实质上是和波拿巴一样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7页。

有罪的”。^①战争的起因说明,这场战争实质是普、法两国统治阶级蓄谋发动的一场王朝战争。《宣言》进而指明了法、德两国无产阶级对这场王朝战争所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战争是波拿巴首先发动的,法国是侵略者,德国处于防御地位。因此,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德国无产阶级则应该把战争严格局限于民族防御的范围,坚决防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②,必须警惕俾斯麦可能把防御战争变成侵略战争,并因此接受沙皇政府的援助,再度置德国于俄国的控制之下。这样,马克思在《宣言》中就为法、德工人阶级提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国际主义的策略方针。它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它要求法、德两国工人都必须善于区别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王朝的利益,紧密携起手来,利用战争形势,加速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解体,争取在比较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下实现德国的民族统一,从而促进法、德两国和欧洲大陆各国民主、民族任务的胜利实现,为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宣言》最后还指明了无产阶级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的根本原则。《宣言》指出:“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③但只要有剥削制度存在就必然存在战争的危险,只有在世界上彻底消灭战争的根源——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④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类才能获得持久和平。

马克思在《宣言》中已预见到第二帝国必然失败的命运。他指出:“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

①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1871年8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79页。

②③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7、18页。

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① 战争发展进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路易·波拿巴迫不及待地对普宣战，本想乘普鲁士尚未做好充分的军事部署和准备，突然袭击，克敌制胜。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从军事战略上加以分析，指出：“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他就能彻底打乱敌方的准备工作”，“并且能取得对德军退却纵队的相当大的优势”，“而这就会大大鼓舞法军的士气”。^② 但是波拿巴并没有抓住这有利战机进行决战。为什么呢？首先是战争的正义性掌握在德国人民手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现在路易-拿破仑面对着的不是普王威廉·‘亚涅山大’，而是德意志民族。”^③ 其次是战争暴露了第二帝国的腐朽。7月19日波拿巴的军队集中在边界线上，而出征所必须的各种物资在8月1日才开始分配，致使战争在最紧要的关头推迟了几乎一星期。因此可以说“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④ 第三是波拿巴对决战时机犹豫不决，甚至不能决定是采取进攻还是采取守势，结果在军事上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两军对阵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是否掌握战争主动权，“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⑤ 而法国既在道义上是失利的，军事上又由于指挥的犹豫不决造成被动，因此从战争一开始便丧失了主动权，以致在战争一打响波拿巴军队就不得不在普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进入了法国本土，波拿巴的主要兵团最后在色当和麦茨全部被普军包围，法皇被迫于9月2日在色当宣布投降。曾经骄横一时、阴险狡诈的骗子波拿巴，仅仅经过40多天的战斗就成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阶下囚。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6页。

②④ 恩格斯：《战争短评（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5—26页。

③ 恩格斯：《战争短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14页。

⑤ 毛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79页。

法国人民本来就坚决反对这场王朝战争。战争开始后帝国的腐朽大暴露,更激起了人民的不满。从8月7日起,巴黎、里昂、马赛等城市展开了群众性的反对帝制的游行示威运动。8月9日,巴黎10万工人走上街头,包围了立法团会议大厅,要求成立共和国。8月14日,巴黎爆发了一次起义,计划推翻第二帝国,建立共和国。这次起义虽然由于遭到血腥镇压而失败,却表明革命危机急剧加深。色当投降的消息传来,巴黎群情激昂,人民彻底认清了帝国的腐朽与无能。9月3日夜,愤怒的群众拥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保卫祖国。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工人、市民和国民自卫军战士包围了政府大厦,驱散了议会,推翻了第二帝国,市政厅插上了红旗,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成立了第三共和国。

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起,普法战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形势。始终密切关注着战争进程和巴黎形势变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立即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²去巴黎帮助组织国际巴黎支部的工作,以便加强巴黎与总委员会的联系,掌握局势的发展;同时马克思立即根据新形势起草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并于9月9日发表,为法、德工人阶级制定出新形势下的正确斗争策略。

马克思在《宣言》中首先指出了交战双方战争性质的转化及其政治和经济的根源。由于波拿巴的投降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普军侵入法境,俾斯麦公开扬言要吞并法国领土,因此,“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①,相反,现在法国所进行的战争则具有了正义的防御的性质。《宣言》进而指明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德工人阶级的正确策略方针。德国工人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20页。

阶级应当坚决反对普军侵占亚尔萨斯和洛林，要求德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与之订立光荣的和约。法国工人阶级则既要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又要注意不为法兰西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所迷惑。《宣言》特别指出法国工人阶级面临的双重任务：抵抗普鲁士侵略的民族任务和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阶级任务；他们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迫切的任务是“**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①马克思的这些宝贵指示目的在于使法国无产阶级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把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利用共和国提供的条件，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积蓄革命力量。《宣言》还告诫德、法两国无产阶级要警惕沙皇俄国乘机称霸欧洲的野心。沙皇亚历山大继承其前辈的衣钵，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随时准备寻机称霸整个欧洲。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更加紧了这种侵略准备，开始修筑通向西欧的战略铁路，并借大量的外债，准备作为未来战争的费用。

在普法战争爆发之际，沙俄已经建成了通往欧洲的铁路，并向西欧方向集结了军队，虎视眈眈，准备下手实现其称霸欧洲的野心。马克思在第一篇宣言中就指出在这场战争中已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②在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再一次提醒法、德两国工人阶级：沙俄准备在法、德双方两败俱伤的情况下进行侵略扩张。马克思指出：沙皇“**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命运的最高主宰**”。^③因此，法德工人阶级应该共同行动，努力实现“**光荣的和平**”，团结一致来反对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和霸权主义，保障各国的独立与

①②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27、18、24页。

和平。《宣言》也为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任务，号召他们执行国际主义义务，采取积极行动来迫使本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支持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反对普鲁士肢解法国；防止沙俄伸入侵略魔爪而使这场战争发展成为一场世界大战，使处于发展阶段的各国工人运动遭受损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贯彻《宣言》的策略方针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德国，他们通过以倍倍尔（1840—1913）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不顾政府的疯狂迫害，坚决揭露了俾斯麦的反动政策。他们通过写信给比利时、瑞士和美国的国际支部，要求他们为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斗争。在英国，他们亲自参加和组织伦敦工人迫使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活动。在法国，他们通过赛拉叶去贯彻总委员会的指示。可是由于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情绪的干扰和蒲鲁东主义者的阻挠，总委员会的第二篇宣言却被巴黎几乎所有的报纸认为过分“普鲁士化”而拒绝刊登，致使法国工人根本没能看到这个文件，因而也未能接受马克思的宝贵指示。

在普法战争期间马克思起草的两篇宣言，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正确地分析了战争、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透彻地揭示了普法战争的起因和性质；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结局和后果。它教育无产阶级要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坚决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把当前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它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今天的斗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9月4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投降活动的斗争

9月4日革命后，前立法院议员中的一小撮奥尔良保皇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窃取了共和国的政权，组成了临时政府，即所谓“国防政府”。奥尔良派的将军特罗胥当了政府首脑兼巴黎总督。军队、法庭等一些重要职位也都为奥尔良派分子所窃据。“这个政府不但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① 它只不过是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

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独立的力量不足，领袖被囚禁，而普鲁士人又已逼近巴黎，只得容忍“国防政府”的存在，“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②，否则就不予支持。同时，巴黎无产阶级迅速武装起来，准备把抗击普鲁士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

由于“国防政府”是“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③，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害怕法国工人甚于害怕德国侵略者，宁肯出卖民族利益，也不愿意看到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对付国内蓬勃高涨的革命运动，不得不乞求于外敌的援助，所以他们根本无意实现反抗侵略的民族任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④ 这些窃国大盗们从登台活动的第一天起，就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卖国路线。政府头目特罗胥一方面公开宣称：“巴黎总督永远不会投降”，但对他的同僚们却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外交部长法夫尔也公开表示：“决不会让

①②③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27、33、5页。

出我们的一寸领土”，但暗地里又说，“应该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蛊惑家’（革命者）”。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防政府”这种遮人耳目表演的实质，指出“让普鲁士人占领巴黎，是国防政府‘计划’的底蕴”。^①

“国防政府”无视巴黎无产阶级关于通过选举产生公社的要求，在它成立的第二天便任命资产阶级人士担任巴黎市长和20个区的区长。这些人物当中，有许多人是参与镇压1848年六月工人起义的刽子手。这是对巴黎无产阶级的挑衅，也是“国防政府”卖国的一个组织准备。接着，“国防政府”的后台，奥尔良派的头目梯也尔亲自出马，跑到英国、奥地利和俄国进行游说，以废除共和国、复辟帝制作为进见礼，厚颜无耻地恳求这几个国家出面帮助调停媾和。9月5日和9月8日，政府连续举行会议商讨媾和条件。

普军却并未因此而停止进攻。相反，在攻克色当之后，普军在“国防政府”不做丝毫防御和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于9月19日以20万之众包围了巴黎，准备以军事上的实力地位向法国提出更苛刻的要求，直至占领巴黎，灭亡法国。此时，巴黎处于危急之中，但还不是不可挽救。巴黎有大约10万正规军和广大的国民自卫军，人力上占着很大优势，并且还有一定的物资供应。在法国其它沦陷区和未沦陷的广大地区还有许多坚持抗战的游击队、自由射手和力量比较强大的卢瓦尔军团³等。对当时的这种军事形势，恩格斯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只要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都武装起来，进行必要的训练，建立起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采取积极的防御和有效的进攻措施，在外省的配合下完全有可能击败普军。至少可以击破普军对巴黎的包围，争取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但是，“特罗胥是奥尔良派，因此他极端害怕拉-维勒特、伯利维尔以及巴黎的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区。他害怕这些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90页。

市区甚于害怕普军”。^①就在巴黎被围的当天，法夫尔就偷偷地到了巴黎郊区俾斯麦的行营，乞求停战条件。10月28日梯也尔又同普军进行了乞和谈判。在此期间，“国防政府”出于投降卖国的罪恶目的，几次放过了击败普军围困的机会。

面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卖国活动，巴黎无产阶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首先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巴黎20个区中每区都成立了警备委员会，再由每区选派的代表组成20区中央委员会，对“国防政府”进行监督。巴黎无产阶级还冲破政府的重重障碍和阻挠，在3个星期内建立了194个营的国民自卫军，从而有了拥有30万人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普军的包围之下，巴黎人民忍受着重重困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抗敌热情。20区中央委员会代表和领导着巴黎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向政府提出要求：在普军还占领着法国领土时不得与之谈判；实行普遍征兵；取消警察局，建立民警机构；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供应；选举作为城市自治机关的公社；等等。布朗基还建议改组国民自卫军，并加强防御措施。几乎全体武装起来的巴黎工人在本来就很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己集资铸造大炮，修筑防御工事。他们是巴黎的真正保卫者。在斗争中涌现的群众性的政治俱乐部和妇女团体，经常讨论对敌斗争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提出了大量的革命建议和措施，充分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巴黎人民的英勇斗争有力地保卫着巴黎。同时，外省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支援巴黎。

面对着武装起来的巴黎人民，资产阶级“国防政府”更加害怕。它不仅不答应群众抗敌的要求，反而加紧了卖国投降的活动；它采取各种反动措施，加强对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镇压。因此，巴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了。

^① 恩格斯：《战争短评（三十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59页。

资产阶级极力扩大反动警察队伍，加强资产阶级区长的权力。他们完全无视巴黎人民成立公社的要求，故意拖延选举。他们不但对居民的生活困难熟视无睹，拒不发给巴黎人民口粮，而且还克扣国民自卫军本来就微薄的军饷，并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屯积居奇，破坏居民生活的供应工作。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恶毒地进行以破坏工人武装力量为中心的反革命活动。为了消灭工人武装，摧毁无产阶级的斗志，“国防政府”经过密谋策划，蓄意组织了两次叛卖性的出击，不惜使用借刀杀人的卑鄙伎俩，假普鲁士士兵之手来屠杀武装的巴黎工人阶级队伍。

10月19日，“国防政府”组织国民自卫军的部队进行一次出击。国民自卫军经过两天浴血奋战夺回了巴黎东北的一个村庄——布尔日，但是特罗胥却不派兵增援以巩固阵地。结果，国民自卫军在既无给养、又无援助的情况下，与普军激战了一天，阵亡达2千人，最后被迫撤离了这个村庄。

1871年1月19日到20日，特罗胥政府在比桑瓦尔又组织了一次事先没有准备的出击，把国民自卫军安排在形势最险恶的地方，在战斗中又不给以支援，使国民自卫军遭致失败并造成伤亡。“国防政府”企图以这两次必然失败的出击来证明：国民自卫军没有抵抗能力，任何解围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从而为它的投降卖国制造新的借口。

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系列罪恶阴谋激起了巴黎人民的强烈不满，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国防政府”的真面目。为了回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巴黎工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是10月31日的起义。10月27日，巴赞⁴元帅率兵17万3千人在麦茨向普军投降，梯也尔于10月28日对普鲁士的乞求谈判，这都使巴黎人民感到无比愤慨。他们举行集会要求特

罗胥辞职，要求拒绝签订和约，要求推翻政府和建立公社。根据20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10月31日早晨，开始群众示威，国民自卫军和劳动群众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高呼“打倒特罗胥！”、“公社万岁！”、“抗战到底！”的口号，随之占领了市政厅，拘捕了政府成员，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民众救亡委员会。“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同意在11月1日选举公社。但正当革命者忙于组织新政府的时候，特罗胥逃出了市政厅，他随即调集了一支反革命武装力量进行反扑，很快占领了市政厅，释放了被捕的部长。10月31日起义遂告失败。

10月31日起义虽然遭到了资产阶级镇压，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投降的斗争并未停止。1871年1月5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巴黎街头上贴出了著名的《红色公告》，揭露了“国防政府”的卖国罪行，指出：政府“拒绝发动群众抗战”，只是一味求和；它在经济上“制造了贫穷困苦”，使人们濒于绝境；在军事上拖拉迟缓、优柔寡断，“无目的的出击，无结果的流血战斗”，目的是“杀害我们”，他们同波拿巴分子一样把“共和派关进监狱”。《红色公告》宣告：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应当受到审判，唯一救亡图存的方法就是“把政府让位给人民，让位给公社”。《红色公告》是声讨“国防政府”卖国投降的战斗檄文，是革命的先声。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再一次发动起义，反对“国防政府”的卖国投降，准备推翻政府，建立公社。但是由于领导起义的布朗基主义者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国防政府”又早有准备，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起义者被打死打伤50多人。巴黎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卖国活动和争取建立公社的斗争中又一次付出了血的代价。

巴黎无产阶级两次起义表明：在民族危机严重关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了。“国防政府”为了借助俾斯麦来共同扼杀法国革命更加速了卖国活动，经过多次秘密谈判之后，

终于在 1871 年 1 月 28 日同普鲁士签订了临时停战协定，宣布卖国投降。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为了正式批准和约，在俾斯麦的指令下，资产阶级于 2 月 8 日通过所谓选举，在波尔多歌剧院拼凑了一个“地主议会”。资产阶级和天主教僧侣们狡黠地利用农民渴望和平的心理，又一次玩弄欺诈的骗术，使保皇派在国民议会中占有 2/3 的多数，并成立了新政府。奥尔良派的头目，暗中操纵“国防政府”的黑后台梯也尔亲自出马，充任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是一个老奸巨滑的阴谋家、卖国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① 梯也尔是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②，“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③ 要批准投降卖国的和约，也只有他是最合适的人了。梯也尔于 2 月 17 日粉墨登场，2 月 26 日就把同普鲁士的和谈结束了，而且强使国民议会不经辩论在 3 月 1 日批准了耻辱的卖国和约。于是，从 9 月 4 日由特罗胥开始的卖国投降“伟业”，最后由梯也尔完成了。

巴黎被围的 131 天，是资产阶级投降卖国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投降卖国激烈斗争的 131 天，是爱国主义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 131 天。两条路线形成两种不同的结果。法国资产阶级出于阶级的私利，千方百计地破坏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宁肯出卖民族利益，也不愿让人民的革命运动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的投降卖国行为，使法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巴黎 24 万正规军、海军和别动队向围城的 20 万普军投降了，交出了武器，当了俾

①②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40、36、37 页。

斯麦的俘虏，三分之一的国土被占领，赔款 50 亿法郎，首都巴黎的一角也交给了普鲁士。

巴黎无产阶级在外敌压境、国贼出卖、饥寒交迫、瘟疫流行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甘屈辱，敢于斗争，坚持抗敌。所以在资产阶级宣布卖国投降后，“**巴黎的真正保卫者——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巴黎人民——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无论是枪支或者是大炮**”。^①当 3 月 1 日普鲁士根据协定侵占巴黎的一个小角落时，整个巴黎屋顶上都挂着黑旗，街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关了门，广场上塑像被遮盖起来。巴黎人民紧握武器严密监视着入侵者，使普鲁士侵略军在这支武装的巴黎人民面前，紧紧龟缩在让给他们的那个狭窄的角落里呆了几天，而不敢擅越雷池一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②

三、3 月 18 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梯也尔政府同普鲁士签订投降协定之后，就向革命的巴黎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梯也尔不仅是一个阴谋家、卖国贼，同时又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复辟倒退的卫道士。“**他冥顽不化地死守着陈规旧例的传统**”^③，“**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理解**”^④；他反对任何改革和进步，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竟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他极力反对共和制，维护王朝制度。所以，

①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504—505 页。

②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 6 页。

③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173 页。

他极端仇视巴黎的工人武装,因为“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①为此他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来解除工人武装。

梯也尔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蓄谋已久。早在1870年10月28日向俾斯麦第二次求和时,梯也尔“便急切地哀求俾斯麦来解除巴黎的武装、占领巴黎、镇压‘它的暴徒’”。^②在投降协定签订以后,梯也尔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同俾斯麦勾结起来,准备“**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③来进攻巴黎,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装。于是,梯也尔政府便有计划地施展一系列阴谋手段,企图激怒巴黎,挑起内战。他们强令短期内偿清债务和房租,从而加剧了工人阶级的困苦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封闭了一切革命报刊,堵塞革命的宣传;起用保皇党将军,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领导权并恢复巴黎戒严;请求俾斯麦放回俘虏,重组反革命军队;阴谋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解除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断绝巴黎同外地的交通电讯联系,以此来孤立和困死巴黎;3月17日逮捕了工人运动领袖布朗基;并实际上取消了巴黎的首都地位。

梯也尔政府的猖狂进攻,迫使巴黎无产阶级把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早在2月19日,20区中央委员会就发表宣言,号召“取消资产阶级的特权,推翻这个统治阶层,使劳动人民获得政权”。宣言宣布只承认革命的公社政权是巴黎的政权。2月末,国民自卫军中除了大约20—25个资产阶级营忠于政府外,由215个营的代表组成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随即改选了国民自卫军军官,使整个国民自卫军置于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巴黎革命的政治领导者,“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

^{①②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44、90、42页。

革命”。^①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国民自卫军和巴黎工人立即投入了战斗准备工作，他们设法把原来由自己出钱铸造的、而被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迅速运集到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等工人集中的地区，并且夺取了政府军火库中的大量枪枝弹药，以加强防御。许多小资产者也纷纷加入了国民自卫军。

这时，由于赛拉叶等人的努力，国际巴黎支部的组织得到一些恢复和改组，并重新活跃起来，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不断加强。瓦尔兰坚决克服了许多领导人反对参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错误主张，提出国际会员应当参加中央委员会并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结果有 16 名国际会员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梯也尔决心挑起内战，扑灭革命的烈火。巴黎的局势愈来愈紧张了。3 月 15 日，梯也尔亲自到巴黎进行阴谋策划。17 日，在梯也尔主持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和武器，解散中央委员会，逮捕其成员。

3 月 18 日凌晨 3 时，梯也尔下令政府军队和警察突袭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其他工人住宅区，企图用强力夺取大炮，一举解除工人的全部武装。内战已由梯也尔一手挑起来了，巴黎无产阶级被迫面临两种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②在这种情况下，“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135 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 年 4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4 页。

所不顾”。^① 他们以高度的灵活性、无比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冲天的革命气概，开始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他们手执武器，高呼着“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的口号，在革命的道路上呼啸着、奔跑着，迅速地奔向停放大炮的地方，包围了政府军。在围城期间久经考验、锻炼得象钢铁一般的巴黎妇女，在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⁵ 的率领下，冲在革命的最前列。革命群众义正辞严地指责政府军的背叛行为，争取受蒙蔽的士兵。在群众的强大威力与正义的影响下，政府军士兵掉转了枪口，和人民站在一起。当反动将军列康特命令军队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时，士兵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反而把这个反动家伙打死了。在武装的巴黎面前，偷袭的阴谋失败了。梯也尔为了挽回败局，拉起了警报器，妄图召集反动军队进行反扑。国民自卫军迅速采取行动，积极投入战斗。上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②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带领巴黎人民以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奋起反击，一鼓作气地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市政厅等政府重要部门。不到半天，政府军就土崩瓦解了，梯也尔随同其残兵败将逃往凡尔赛⁶。巴黎人民以武装的革命粉碎了武装的反革命的进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被推翻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了革命的临时政府。革命的红旗在巴黎的上空高高飘扬，它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3月18日革命胜利了！

3月18日革命之所以胜利，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首先，巴黎无产阶级在战争中，在同资产阶级卖国投降的斗争中，紧紧掌握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45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2页。

了枪杆子。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不管战争怎样结束，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①其次，巴黎的无产阶级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逐步加强了自己的阶级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所以当梯也尔挑起内战，对巴黎进行反革命的武装进攻时，全巴黎能“象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②，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了胜利。第三，巴黎无产阶级面对梯也尔政府的突然袭击，敢于藐视貌似强大的敌人，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冲天革命精神，因而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人民的这种精神，他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③

马克思对巴黎无产阶级3月18日革命给予的高度赞扬，充分体现了伟大革命导师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早在巴黎被围之前，根据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无产阶级不要过早举行起义。现在，随着事变进程，当巴黎无产阶级被迫举行起义，为埋葬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时候，马克思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积极支持他们的斗争，高度赞扬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相信群众，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站在革命群众运动之中，和人民群众共同前进，给一切革命者树立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榜样。一切机会主义者从历史唯心主义出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②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6页。

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发,不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不许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他们是“叶公好龙”,当革命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总是站在它的对立面,结果他们总是为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所嘲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痛斥我们党内机会主义者时,曾经运用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革命这个历史经验,教育我们全党,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以马克思为榜样,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的英勇创举立即在法国其它已经武装起来的大城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3月22日,里昂宣布成立公社,解散市议会,把旧省长、市长撤职,选出新的市政委员会。3月26日,圣太田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成立公社的宣言,组成了临时委员会。同一天,克列索的国民自卫军攻进了市政厅,宣布成立公社。4月4日,里摩日的国民自卫军和工人们也占领了市政厅和警察局,宣布成立公社。与此同时,南部的马赛、纳尔榜和土鲁斯也于3月23日、3月24日、3月25日先后成立了公社。可是,所有这些外省公社都没有获得巩固,在几天之内均被镇压下去,没能给予巴黎公社以有效的援助。

第二节 巴黎无产阶级为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诞生及其革命措施

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了首都的政权。

巴黎革命“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

身而进行的革命”。^①因此，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巩固革命成果，发展革命，是摆在中央委员会面前的艰巨的任务。由于中央委员会内蒲鲁东派、布朗基派以及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没有统一的认识，由于巴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只能发扬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并且借助梯也尔这个反面教员“教育”，在斗争中摸索前进。

曾经掀起了3月18日革命的国民自卫军，现在成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正是这支工人的革命武装，迫使梯也尔反动派逃窜凡尔赛，并使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原有警察和宪兵溃散。这样，也就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

接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着手消灭资产阶级旧的国家管理机关，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管理机关。3月18日晚和3月19日晨，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对占领政府各部、建立新的政府机关作出了决议，并任命了各部人员，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与旧的国家管理机关根本不同，这里已经没有旧官僚，担任国家管理的各部工作人员，都是与“国际”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

新政权是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开展工作的。当时，普鲁士的军队仍然占据着巴黎东部和东北部郊区的战略要地；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反动派极端仇视巴黎工人政权，伺机进行反扑、复辟。他们极力搜罗和组织反革命武装，准备进攻巴黎；断绝巴黎和外地的联系，企图从物质和道义上孤立巴黎；利用潜伏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和捣乱；大造反革命舆论，对巴黎进行诬蔑和诽谤；向俾斯麦求援，图谋共同扼杀巴黎革命。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38页。

对于普鲁士军队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中央委员会有所警惕，在军事上作了准备。但是，在与反革命势力，特别是与凡尔赛政府进行斗争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部却意见分歧。绝大部分的成员由于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对反动阶级的凶残本性缺乏认识，受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偏见影响较深，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央委员会在革命进程中所应担负的历史任务。他们错误地认为，工人的权力只能建立在道义力量的基础上，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立即进行公社选举，以便把政权交给选举产生的公社；他们害怕别人非难他们非法夺取政权，对于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执行临时革命政府的权力深表“遗憾”。因此，他们反对进攻凡尔赛，反对从军事上彻底消灭敌人。只有杜瓦尔、⁷ 费烈⁸ 和沙尔东⁹ 等少数几个人坚决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然后再选举公社移交政权。波兰民主主义者、不久成为公社出色的将军的东布罗夫斯基，¹⁰ 在他被邀请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军事会议上，也极力主张乘胜进攻凡尔赛。他正确指出，不立即进攻凡尔赛，是政治上的近视，战斗迟早都要发生，但时机就会错过了，“如果你们现在进攻凡尔赛，你们就是形势的主人”。因为3月18日革命后，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匪帮，正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还没来得及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这种对革命有利的形势，连梯也尔的将领维努阿也不得不承认。可是，立即进攻凡尔赛的正确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和采纳。这样，正当中央委员会应当乘胜进攻凡尔赛，直捣反革命巢穴的时候，它却忙于公社选举，准备移交政权，错过了消灭反革命势力的极好时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铸成了致命的错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央委员会“……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

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①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②

在急于把政权“合法化”的思想指导下，中央委员会把公社的选举摆在工作的首位，匆忙定于3月22日举行公社选举。在准备选举过程中，中央委员会还错误地强调要和资产阶级区长们共同进行协商。但是，资产阶级的区长们并没有为中央委员会的“仁慈”所感化，他们在梯也尔的指使下，力图破坏和拖延公社的选举，争取时间，拼凑反革命力量，妄图重新建立反动统治。他们调集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队，在区公署所在地构筑街垒，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还策划了妄图反夺权的两次反革命示威。第一次反夺权是在3月22日，以第二帝国时期的议员埃克隆等为首的2千多人举行反革命示威。他们携带杀人凶器，公然向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挑衅，并狂叫“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公社”等反动口号，反革命分子还企图冲过警戒线，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给予了还击，挫败了资产阶级反夺权的阴谋。第二次反夺权是海军上将赛塞策划组织的。这个在3月18日革命后被梯也尔派进巴黎的反动家伙，妄图收集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队，建立反革命武装力量的中心，3月23日，资产阶级区长们把他封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当反夺权的阴谋正在策划时，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措施，解散了资产阶级区政府的武装和资产阶级的营队，并且占领了一部分区公署，赛塞狼狈逃窜凡尔赛。巴黎无产阶级经过斗争，粉碎了两次反夺权阴谋，才迫使资产阶级区长和议员们同意于3月26日进行公社的选举。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②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1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

中央委员会来不及制定新的选举法,但是,为了保证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代表能占优势,中央委员会打破了各区代表人数相等的旧传统,确定了代表人数同各区居民人数成正比的原则,规定每2万居民选举代表1名,其余数超过1万名的增选1名。全市共应选出90名代表组成公社委员会。过去,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巴黎20个区不论居民多少一律各选出3名代表,这样工人集中的、人数众多的区不能比人少而资本家集中的区拥有更多的代表。现在,由于按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工人集中的波宾库尔区(14万9千居民)和比尤特-蒙马特尔区(13万居民)能各选出7名代表,而贵族居住集中的帕西区(4万2千居民)就只有2名代表。在准备选举中,中央委员会发表文告,号召从人民中间选举公社委员:“只有从你们自己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艰苦共患难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请你们选举那些坚定不移的人,选举人民中间那些有毅力、有才干、坦率并以诚实称著的人”。^①

3月26日公社选举的这一天是巴黎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劳动人民破天荒第一次享有真正普遍的民主的选举权利,他们对选举表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无比的欢乐。巴黎的大街上红旗招展,咖啡馆里熙熙攘攘,报童叫卖着号召选举的《公社报》。在这里,选举既没有法律的限制和舆论的欺骗,也没有军警的监视和政客的收买。选举在工人区显得特别热闹。例如,圣安东区的工人成群结队而来(每队约7、8百人不等),队前举着红旗,帽上插着选票,意气风发,昂首阔步,走过巴士底狱广场,去行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正当巴黎劳动人民热气腾腾地进行选举的时候,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则抵制选举,而且暗地里咬牙切齿;准备卷土重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① 转引自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中文版,第307页。

的：在巴黎选举的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①

3月26日选举的结果，由于瓦尔兰、德勒克吕兹¹¹等候选人同时在若干选区当选，所以总共只选出公社委员86名（因布朗基尚在狱中，故实际只有85名）。其中有21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由于他们和公社走的不是一条路，所以在4月初宣布退出公社。在正式参加公社委员会的64名委员中，国际的会员约有30人，工人有28人。可见，公社委员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但是，他们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蒲鲁东派及其支持者20人，布朗基派及其支持者21人，新雅各宾派¹²12—14人，还有无党派人士10—12人。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一起被称为“多数派”，他们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建立少数革命者的专政。蒲鲁东派被称为“少数派”，他们把公社设想为地方自治机关，主张建立松散的地方自治制。无党派的委员大约有2/3附和“多数派”，1/3附和“少数派”。这样，在公社委员中，多数派占2/3，少数派占1/3。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错误理论，不能不在公社的活动中产生坏的影响。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和首创精神，加上在阶级斗争进程中得到的正反方面的教训，终于不顾错误的理论而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在公社选举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即发表声明，把权力移交公社，并号召人民接受公社的领导。

3月28日，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的阻挠和破坏，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巴黎公社，在“公社万岁”的欢呼声中庄严地宣告成立。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49页。

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和伟大的尝试！

公社委员会在接管政权以后，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继续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和巩固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资产阶级官僚特权和宗教特权，对社会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改造，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所绝对必需的。由3月18日革命开始的这个工作，现在由公社以法令和决定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指摧毁其五大支柱——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

巴黎的无产阶级在抵抗普鲁士的侵略和反对梯也尔发动的内战的斗争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常备军的反动性和人民武装的重要性。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法令规定：“一、停止招募新兵。二、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成立或调入任何武装部队。三、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①废除常备军，建立人民武装的意义在于：第一，“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债的这种根源”；第二，它使反动阶级“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难于实现；第三，“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②

公社废除了旧的警察和资产阶级旧法官，实行民选法官，建立了人民的治安委员会和人民的司法制度。早在3月18日以前，约有半数以上的区就把警察赶跑了，代之以国民自卫军。3月18日晚，工人占领了警察局，所有的警察和宪兵都逃往凡尔赛。公社成

①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2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40页。

立的第二天，在公社委员会的会议上，选举建立了人民的治安委员会。在3月18日革命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解散了军事法庭，打开了监狱，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公社成立后，选出了司法委员会，组织了新的民事法庭，颁布了新的上诉、陪审条例。

为了摧毁僧侣势力，取消宗教特权，4月2日，公社通过了教会同国家、学校分离的决定。实行“政教分离”、“免费教育”、“废除宗教预算”、“宣布被认为不能动用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国家财产”，并立即对这项财产进行调查统计，“交由国家支配”。^①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象、教义、祷告等从学校中革除出去。从前，反动的宗教势力与资产阶级政权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行双重压迫。公社这一措施的重大意义在于：继摧毁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主要支柱——常备军之后，又摧毁它统治人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公社在建立新政权机构中，发挥了革命的创造性。它建立了相当于政府各部的十个委员会——即执行、军事、公安、司法、财政、粮食、劳动和交换、对外联络、教育、社会服务等委员会，并选举了各委员会的委员。这些委员会在最高权力机构公社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一切大事由公社委员会讨论决定，交由各委员会坚决执行。公社委员会颁布法律，公社委员执行法律，并对委员会和人民负责。它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也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而是同时兼管行政、立法的无产阶级的机关。这就保证了政府机构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公社的一个伟大创举。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敢于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毅然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公社委员和政府其他工作人员，都由选举产生，

^①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0页。

对选民负责,受群众监督;经过一定时期进行改选。在他们任期内工作不称职时,选民有权随时撤换。第二,公社通过了关于国家机关职员薪金制的法令,取消了高薪制。法令指出,过去各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成为钻营的对象,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金。法令规定,任何公职人员的年工资最高不得超过 6,000 法郎(注:路易·波拿巴的年俸却高达 60 万法郎),公社委员的工资亦应如此,不得高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根据这项法令,公社采取措施,降低高薪,提高低薪,缩小差距。如电报局,递送员年工资 1,400—1,600 法郎(过去是 800—1,000 法郎),查对员 1,600—1,700 法郎(过去是 1,000—1,200 法郎),职员 1,800—2,400 法郎,稽核长 4,500 法郎(过去是 5,000—6,000 法郎),局长 5,000 法郎(过去是 15,000 法郎)。公社这两项措施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防止人们把职位变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保证国家干部不致于变成新的官僚高薪阶层,为防止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变质提供了宝贵经验。

公社还对建立全国政权进行了设想。4 月 20 日,公社公布了《告法国人民书》,制定了全国公社的组织纲领,号召在法国各地都建立公社,并把法国所有的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文件指出,3 月 18 日革命所争取的目标就是“承认并巩固共和国这个符合人民权利、符合社会的正常自由发展的唯一政体”。它所设想的全国政权的组成是:一切公社的自治权利是“同等”的,各公社以“条约”的“联合”保证“法国的统一”,“全体公社代表联合会议”就是“全国中央行政机构”。^① 文件最后号召说:“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猛烈进行的斗争,是不能由空幻的协议而结束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不

^①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311—312 页。

是公社思想的胜利,就是巴黎的毁灭”,“我们的责任是斗争并取得胜利。”^①文件中最大限度的地方分权和公社自治的思想,反映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

从公社的产生和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出,它是在巴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同以往一切旧的反动政权根本不同,“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它是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马克思高度评价说:“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③

巴黎工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这并不是目的本身。公社“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④因此,它利用自己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改造。然而,由于公社面临着梯也尔和俾斯麦相互勾结,时刻准备扑灭公社的危险,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武装斗争,在实现社会改造方面,只能做出一个开端,“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⑤

为了同凡尔赛政府划清界限,否定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公社宣布凡尔赛政府的命令和告示一概无效,凡听从凡尔赛政府命令的官吏,一律撤职。公社在镇压反革命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公社委员里果¹³、费烈、瓦扬¹⁴和德勒克吕兹等坚决主张实行革命的恐怖政策,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公安委员会代表、公社检察长里果说,对于反革命的活动,“我认为必须实行镇压,我们不应当有丝毫的动摇!”^⑥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情况下,他反对尊重出版自

①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1—312页。

②③④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8、142、152、63页。

⑥ 见《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第166页。

由的意见，主张对制造反革命舆论为梯也尔服务的报刊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由于里果等人的坚持，公社先后查封了 30 家反革命报纸。里果还揭发和清洗了混进公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的敌人、奸细和各式各样的败类。在与凡尔赛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公社通过了关于没收梯也尔、法夫尔等 6 个反动政府成员的财产并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法令。后来由于革命群众的纷纷要求，公社又颁布了没收“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成员、一切国民议会议员及波拿巴派等财产的法令。但是没收人民敌人财产的措施，执行得很不坚决，很不彻底。针对凡尔赛政府野蛮屠杀公社战俘的罪行，公社颁布了《人质法令》，规定与凡尔赛政府有勾结的人都要交给法庭审讯，并把这些罪犯作为人质关进监狱；凡尔赛每杀害一个被俘的公社社员，公社即以处决 3 倍的人质来回答。公安委员会根据《人质法令》逮捕了大约 260 个反革命分子。公社委员瓦扬正确指出，对于凡尔赛的残暴行为，公社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公社委员中不少人以“人道”、“正义”、“法律”的原则为借口，反对对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布朗基派的某些人甚至主张释放所有被捕的人以交换一个布朗基。由于这种种原因，只是到了最后，公社才处死了 64 个人质。在与反革命斗争中，公社未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公社对于盗窃、抢劫和赌博等犯罪和不良现象也立即采取了各种公安措施，打击了犯罪分子。

公社在经济措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工人、小资产者利益的政策。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代表弗兰克尔¹⁵正确指出，3 月 18 日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如果我们不能为这个阶级的利益做任何事情，我认为公社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主张“首先必须实现社会改革”。他还写信给马克思，征求对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意见。公社采取

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接管逃亡资本家的工厂，把它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3月18日革命后，许多工厂因资本家逃跑而停工，工人失业，工人们早就要求接管这些工厂。4月16日，公社下令接管逃亡资本家的工厂，把它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恢复生产。公社还批准了罗夫尔兵工厂关于工人参加管理的章程，即选举工厂的领导人员和工厂理事会，广泛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的管理工作。根据巴黎工人的迫切要求，公社发布命令，禁止厂主利用各种名义克扣工人工资和各种罚款；废除了使面包作坊工人长期不见天日、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的夜班制；取消了由警察把持的职业介绍所，设立了由公社管理的职业介绍所。这些措施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①

为了解决巴黎大多数人民主要是小资产者最迫切关心的经济问题，公社成立的第二天就下令停止当铺拍卖典当物品，以后又规定把20法郎以下的抵押物品（主要是劳动工具和衣服）无偿地归还原主。公社还决定免缴1870年最后一季度和1871年头两个季度欠缴的房租，并延长租约。在4月间，公社颁布了延期偿付债务的法令。这些重要的措施使得占巴黎人口3/4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所面临的破产境况有所改善。正是由于公社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这种利益，使得“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们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②小资产阶级团体“各省共和主义者联盟”，还曾坚决谴责凡尔赛，并公开支持公社。

如果说公社在争取巴黎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争取农民的工作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是由

①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7、148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48页。

于公社的领导人农民的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加之凡尔赛政府又严密地隔绝了巴黎和外省的联系。只是到4月间，公社才发表了《告农村劳动人民书》。这个文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与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公社保证使劳动农民的子女免费受到教育，保证免除第二帝国时代所加给农民的重税，战争的赔款和国家的税收应由那些有钱的人来负担。《告农村劳动人民书》最后说：“农业工人、劳苦的短工、高利贷折磨的小私有者、佃农和别墅的耕人、农场的农民，所有这些汗流满面地播种、收割和劳碌的人们，当你们的劳动果实最好的一部分给了那些什么工作也不做的人的时候，巴黎希望，归根到底，土地要给农民，劳动工具要给工人，工作要给一切人们。”^①可是这个文件由于巴黎受到隔绝，虽然用汽球散发出去，但很少落到农民手中，未能为农民所了解。所以巴黎工人始终未能和农民建立联系，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

公社在经济措施方面，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剥夺法兰西银行。这种错误之所以产生，主要责任在于蒲鲁东主义者。驻银行的代表贝累是一个工厂主出身并同凡尔赛有联系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他认为剥夺银行“是对于凡尔赛政府、公社、整个国家、法国信用事业和全体工商界的严重打击”，因此不愿也不敢去触动大银行资本的私有财产。恩格斯指出，在公社期间，“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覆灭的一部分原因”。^②

在文化艺术和教育方面，公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公社宣布实行免费教育，并创办业余教育，广泛开设图书馆和博物馆，使广大劳动群众第一次真正享受到学习和教育的权利。

① 参见《世界近代史文献》第2卷第1分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②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

学校还请 40 岁以上的老工人来作报告,对儿童进行阶级教育。为了使广大妇女能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公社还拟定了成立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计划。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及其艺术家的反抗,用劳动人民健康的艺术代替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艺术,公社于 5 月中旬决定把私人剧院交给公社的教育代表团掌管,撤销反动分子的职务,任命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人士来领导艺术机构。革命诗人欧仁·鲍狄埃¹⁶被选入艺术家联合委员会。在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中,剧院和音乐团体演出了不少以爱国主义精神和揭露剥削阶级腐朽本质为主题的作品,整个文艺界呈现一派新气象。巴黎公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劳动者真正享有艺术创造了前提,新型的革命文化极大地鼓舞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

公社是真正的工人政府,奉行国际主义政策。公社把旅居巴黎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战士和民主主义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吸收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参加公社领导机构的工作。公社关于拆毁旺多姆圆柱的决定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国际主义的性质。公社 4 月 12 日的决议指出:旺多姆广场上的皇帝纪念柱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是暴力和虚荣的象征,是对军国主义的赞扬和对国际法的否定,应该把它拆毁。这一行动是“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①的生动表现。

在制订和贯彻公社的决议和法令中,巴黎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的精神。公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根本相反,它“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②地做它的工作;……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②因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真诚拥护,密切了和他们的血肉联系,充分反映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63、141 页。

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同工人群众联系特别密切，委员会的许多命令都是经过工人群众广泛讨论后颁布的。当时在巴黎有工会 34 个，生产合作社 43 个，俱乐部达 40 个。这些群众组织团结和联系着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投入新生活的建设和斗争，对公社的工作进行监督并给予了强有力的帮助和推动。十分活跃的俱乐部，积极支持公社的决议和法令，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有时也对公社的决议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他们经常讨论革命的各种问题，提出“企业主、富人和牧师不绝迹，我们就不会幸福”，要求剥夺资产阶级，没收法兰西银行。有人十分生动形象地说：“公社是一棵小树，应当用贵族的血液来浇灌它！”他们要求对公社的敌人采取革命的恐怖手段。公社时期的报纸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力工具。它们同工人有密切的联系，并有自己的工人通讯员。报纸大量地反映工人读者、国民自卫军战士关于当时大家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的来信，对公社领导在对敌斗争中不够积极、不够坚决的态度提出批评，并且检举梯也尔代理人的反革命活动。

总之，由于公社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由于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积极投入了创立新生活的战斗，在巴黎出现了欢乐、紧张和充满信心的生动景象。城内秩序井然，偷窃和抢劫的事件几乎绝迹，街道打扫得十分整洁。马克思指出：“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①巴黎和凡尔赛是两个天地。同梯也尔的诽谤相反，“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②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公社所取得的光荣业绩，充分显示出了这个还不完备的无产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65、66 页。

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巨大威力，显示出了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它的伟大创造力。

二、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和国际对公社的支持。凡尔赛反革命集团勾结各国反动派猖狂进行复辟活动

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和公社的伟大成就，震动了全世界。它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舆论的赞扬与支持，也为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所切齿痛恨。

“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使它诞生”。^①这是因为巴黎公社革命虽然是普法战争和法国阶级斗争的局势造成的，但是第一国际事先的整个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对于公社的产生起了巨大作用。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它所采取的许多革命措施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法国虽然是蒲鲁东主义的老巢，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加强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逐渐接近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积极宣传第一国际的思想。瓦尔兰在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活动中，批判了“天意”和“善良的上帝”等唯心主义观点，宣传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的思想；他反对布朗基的少数人密谋暴动的策略，认为在号召人民起义以前，应当摸摸他们的脉搏，了解一下他们是否有热情；他主张更多地武装工人，扩充国民自卫军，并且提出国际会员应当争取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巴黎公社成立后，瓦尔兰、弗兰克尔和赛拉叶等人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曾经反对蒲鲁东的各项原则，实行由工人阶级革命本能所提示的决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社会要求。恩格斯指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出：“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①在这里，千百个国际的工人会员在现实环境的促使下所发挥的革命首创精神，起着重要的作用。公社社员在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方式的时候，是本能地沿着马克思在理论上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马克思在回击梯也尔诬蔑国际“自封为劳动的解放者而实际是劳动的暴君”的反动谬论时明确指出：“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象一些蠢才所想象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②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对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巨大的帮助。面对旧社会的豺狼们对公社的诬蔑和攻击，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联合一切同情公社的人大力声援公社，宣传公社事业的正义性。总委员会经常研究巴黎革命的局势，并派赛拉叶到巴黎，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负责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同国际总委员会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委员会向所属各个支部发出几百封信，介绍巴黎的斗争，号召各国会员积极地支援公社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以参加者的姿态，和巴黎无产阶级同命运，共呼吸，以强烈的革命激情密切注视着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尽

①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201页。

可能地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①3月18日革命以后，马克思设法与赛拉叶以及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建立通讯联系，经常来往于巴黎和伦敦的一位德国商人也成了他们与公社沟通信息的一条渠道。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总委员会召开了14次会议，研究巴黎革命的局势。马克思、恩格斯在会议上高度赞扬巴黎人的革命热情和英勇斗争，认真研究分析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并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无视公社的决定仍然留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徒行径，深恶痛绝，并建议总委员会批准国际巴黎联合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总委员会在1871年4月25日的决议中指出：“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的队伍中，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和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②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及时采取的措施是对公社革命的巨大支持。马克思还对公社的斗争策略、军事技术、社会经济措施等方面提出过许多宝贵指示和警告。例如，要求公社的领导人必须修筑和加强巴黎北部的防御工事，以防备凡尔赛分子的进攻；马克思还把他所得到的关于凡尔赛与普鲁士秘密勾结的重要情报告诉公社的领导人，促使他们加强戒备，并劝告他们不要轻信普鲁士统治者所谓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保持“中立”的诺言。为了揭露

①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89页。

② 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21页。

和打击敌人,马克思曾要求公社领导人“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来”,予以公布,“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①他还建议公社必须在巴黎以外,以至在其他国家赶快开展工作,以便解除巴黎斗争的孤立状况,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公社领导者的错误也进行了及时的切中要害的批评。马克思在给弗兰克尔等人的信中曾经指出:公社应当按照既定的革命目标前进,应当集中主要精力对敌斗争,可是“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②,以致分散了精力,错过了时机。后来,马克思深为惋惜地说:“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③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倡导下,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会员冲破本国统治者的阻挠,不顾镇压,对巴黎公社的事业,表现了国际主义的声援。正当普鲁士政府与凡尔赛勾结、共同反对公社的时候,国际会员,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锻工出身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都维护公社的事业,倍倍尔在国会发表演说,赞扬公社革命,表示共同斗争的决心。他说:“巴黎的斗争不过是前哨的小冲突而已,欧洲主要的事情还在今后,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将成为全欧无产阶级的战斗号召”。^④倍倍尔的演说,表达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心声,但他却因此遭到反动派的迫害,以“叛国”罪而被关进监狱。德国广大工人群众在柏林、汉堡、汉诺威、爱北斐特、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地举行集会,对巴黎无产阶级的

①③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赛·比斯利》(1871年6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9页。

②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和路易·欧仁·瓦尔兰》(1871年5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6页。

④ 见《世界近代史文献》第2卷第1分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斗争表现了国际主义的支持。在英国伦敦也组织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公社的大会。3月21日，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马克思的建议，组成代表团，参加英国的群众大会。4月15日，日内瓦的工人举行集会，在发给公社和它的英勇保卫者的贺词中热情地写道：“我们欢呼工人阶级在3月18日的公社革命中政治地位的提高；我们认为它是社会改组的时代的开端……巴黎的兄弟姊妹们，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的事业将永远不会磨灭，因为这是全世界工人解放的事业，……你们是国际社会革命的先锋队”。^①此外，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集会上和社会主义报刊上，都对巴黎公社表示祝贺。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准备按照马克思的指示，前往巴黎参加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工人阶级自己认识到1848年六月起义是它自己的先进战士的事业，曾经需要很长的岁月。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援。”^②

在公社革命期间，巴黎有国际支部32个。许多著名国际会员积极参加了3月18日革命和公社的斗争。与此同时，还有数百名外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亲身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斗争，表现了对公社事业的最直接的支持。如前所述，匈牙利人，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列奥·弗兰克尔，担任公社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委员；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¹⁷及其战友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都是公社出色的军事指挥人员；还有俄国女革命家伊丽沙白·德米特利耶娃¹⁸，等等。这些革命者在斗争中都起过巨大的作用。

各国无产阶级对巴黎公社革命热情支持和积极声援，是因为

① 参见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711页。

② 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2页。

他们从公社的事业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而各国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则被巴黎公社革命吓破了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①他们预感到自己末日的到来，因此以百倍的疯狂，千倍的仇恨，对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千方百计地要把公社革命镇压下去。逃到凡尔赛去的梯也尔反革命集团在各反动派的支持和帮助下，积极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力图一朝反扑过来，把巴黎淹没在血泊之中。俾斯麦是凡尔赛反革命集团的最大帮凶。3月18日革命以后，他竭力帮助梯也尔准备颠覆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他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表面伪装中立，实际上却给凡尔赛匪帮输血打气，指令普鲁士侵略军严密包围巴黎，切断公社与外省的联系，先后放回10万俘虏，协助梯也尔加强了凡尔赛的反革命军事力量。沙皇俄国和美国政府也积极参与了对巴黎公社的联合进攻。沙皇亚历山大露骨地声称：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叛乱”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叛乱”的蔓延，威胁着全欧洲的和平。所以沙俄极力支持凡尔赛政府，同时还鼓动俾斯麦迅速大力帮助梯也尔镇压公社。美国政府通过驻法大使华施贝恩，策划反对公社的阴谋活动。这个自称“最民主”的美国代表，发出了血腥的叫嚣：“巴黎人都是些暴徒”，“凡是公社社员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②他与普鲁士政府狼狈为奸，在巴黎与凡尔赛之间制造所谓“调解”骗局，麻痹公社的斗志，在最紧要的关头，使公社的防线瘫痪了两天，加速了公社的失败。所有这一切，如马克思所说：“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③国际资产阶级是各

①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0、80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12、413页。

国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

在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援助下，凡尔赛匪帮勾结内外反动派，积极进行罪恶的复辟活动。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当他们仓惶逃到凡尔赛，脚跟还没有站稳的时候，就想卷土重来，恢复失去的“天堂”。但是梯也尔非常懂得，要复辟，要镇压巴黎公社，就得有反革命的武装，而当时他手下只有2、3万人的残兵败将，根本无力与公社对抗。“公社社员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①于是梯也尔施展反革命两手策略，表面上“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②他虚伪地声称：“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③但在议和的烟幕下，他却把拼凑反革命武装作为其复辟活动的中心一环。他乞求俾斯麦放回俘虏，建立了宪兵队、骑兵队和炮兵队，并派人在他们中间进行反对公社的宣传和训练。在俾斯麦的允许下，凡尔赛的军队迅速增加到7万人，后来竟达到13万人。梯也尔还策动留在巴黎的爪牙和资产阶级分子从内部进行破坏，以达到里应外合，消灭巴黎革命的目的。梯也尔匪帮在巴黎周围修工事、筑炮台的同时，还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诬蔑公社，为镇压无产阶级作舆论准备。当梯也尔的反革命羽翼丰满之后，他立即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叫嚣：“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对公社决“不会留情”。从4月2日起，他就开始发动反革命的军事进攻。5月间，由于梯也尔同俾斯麦签订了卖国屈辱的和约，换得了普鲁士军队的直接援助，加强了凡尔赛的力量，这种进攻更加猖狂了。于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殊死斗争就展开了。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8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9页。

三、巴黎工人和革命群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复辟的英勇斗争

巴黎无产阶级同凡尔赛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①在这场斗争中，巴黎人民以气壮山河、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写下了悲壮动人的诗篇。

4月2日，凡尔赛匪军发起突然袭击，激怒了整个巴黎。第二天，公社组织了对凡尔赛的大规模反击，国民自卫军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牺牲精神，并且取得了几次胜利。在进攻凡尔赛失败之后，巴黎人民就积极修筑工事，挖掘壕沟，加固炮台和围墙，调运大炮和弹药，准备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在4月至5月的战斗中，公社社员为保卫每一个阵地和据点，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恩格斯在分析公社保卫战的形势时指出：“即使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要塞的围墙，在围墙后面还有街垒，在这些街垒中将出现前所未见的战斗。这些街垒将第一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来防卫。”^②

5月21日，凡尔赛匪军闯进了巴黎城区。普鲁士侵略者加紧了扼杀公社的罪恶活动。面对着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占优势的残暴的凡尔赛军队，巴黎保卫者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怯懦和动摇。公社向巴黎人民发出战斗的号召：“拿起武器来！公民们，拿起武器来！”“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刻到了！”“要用你们的革命力量叫敌人知道，他们可以出卖巴黎，但他们不能断送巴黎，也不能战胜它。”号召书还说：“公民们！你们的代表们和你们一起战斗，有必要的話，和你们一起牺牲。”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公社的战斗号召，他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77页。

② 《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5页。

们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也不论是工人还是售货员，都纷纷拿起武器，为工人阶级的事业、为全人类的事业，英勇地进行战斗。他们在腹背受敌的困难条件下，开始了为时一周震撼世界的浴血奋战！

广大公社社员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每一个街垒，每一所楼房，都是激战的阵地，敌人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公社战士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对旧制度的复辟者怀着满腔的仇恨，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一个战士倒下了，战友们接过他的枪继续战斗。敌人的炮弹可以消灭公社战士的身躯，但不能摧毁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

“长剑号”炮艇在5月战斗中，不幸被击中，但全体船员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炮艇是在全体船员高呼“公社万岁！”的震天响声中慢慢沉没的。

17岁的菲里克斯·杜南和14岁的弟弟爱尔尼斯德·杜南，是传颂一时的保卫公社的小英雄。他们十分英勇顽强，和敌人距离只有100米，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和部队一起进行白刃冲锋，占领了街垒，弟弟在把军旗插上街垒时不幸中弹倒下，哥哥冲上去保卫军旗，也不幸光荣牺牲。

公社军队统帅东布罗夫斯基在敌人进入巴黎后，亲自率兵英勇迎击。5月23日，他到蒙马特尔高地组织抵抗，在枪林弹雨中骑着战马奔驰前线，指挥杀敌，不幸腹部中弹受伤。临终前他嘱咐战友们：“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你们只是去想办法挽救共和国吧。”^①

国民自卫军老战士茹隆的三个儿子已经和他并肩杀敌，他还写信给军事代表，要求让他不满16岁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来参加战斗。他说：“我们发誓约定，假如敌人的子弹打死了我们之中的哪

^① 参见《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第304页。

一个，我们一定要替他报仇。”^①

巴黎的妇女也拿起枪，活跃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上。她们组织救护队和医疗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抢救自己的阶级兄弟。后来，一支专门的妇女营队在战火中诞生了，她们为公社的事业英勇战斗，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马克思满腔热情高度赞扬了巴黎人民团结战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他说：“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②

战斗进入到最后，就愈加激烈。巴黎的英雄儿女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卫着巴黎的每一寸土地。公社委员瓦尔兰指挥着战斗，他从一个区转到另一个区，从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最后一天，他被一个反动神甫认出被捕，在蒙马特尔慷慨就义。最后一场激战在贝尔一拉雪兹神甫墓地进行，不到200名公社战士同5千名匪徒进行激烈战斗，直到弹尽粮绝，还冒着炮火，用刺刀和敌人肉搏，最后在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中，全部在墓地的墙角壮烈牺牲！声震全球的巴黎巷战到此结束了！巴黎公社革命遭到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但是公社社员的英勇革命精神永远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敬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③为了纪念公社的英烈，人们把贝尔一拉雪兹公墓的那堵墙称为“公社社员墙”，它永远屹立在巴黎城东，成为

① 参见《1871年公社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2页。

②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73—74、80—81页。

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光辉象征。

梯也尔反革命集团实现复辟以后，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嗜血成性的豺狼们，疯狂一时，为所欲为，在巴黎实行白色恐怖。刽子手们杀死落入魔爪的公社社员，杀死街道上、教堂里无辜的群众，杀死无数妇女、儿童和公社医院的医生、病人和伤员，对穿红条裤子和穿军用皮鞋的工人（国民自卫军的标记）则更是抓着就杀！甚至连外国人也难幸免。整个巴黎到处充满着血腥的杀气！资产阶级的报复行为，使无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河。“工人们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①凡尔赛匪帮先后杀了3万多人，逮捕了约5万人，连同流亡者在内，巴黎牺牲了10万优秀子弟。很多街道住区空无一人，很多行业的工人多年绝迹。这场疯狂的大屠杀，彻底戳穿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骗局，暴露了“文明”、“正义”的狰狞面目。它说明：资产阶级的“秩序”就是要巴黎人民俯首帖耳，任其蹂躏；“文明”就是用多管炮成批成批地屠杀俘虏；“正义”就是肆无忌惮的残忍报复。这就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极端野蛮、残忍的豺狼本性。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②各国反动派看到梯也尔匪帮对巴黎工人的野蛮屠杀，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挽救他们共同灭亡的命运了，所以纷纷表示支持，连声叫好。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声称：“法国政府为了镇压巴黎暴动在不久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将得到我的同情，而且也将得到一切遵守秩序的人的同情”。^③各国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75、73页。

③ 《沙俄外交与巴黎公社》第167页。

反动统治者都声称要把已逃离魔爪来到一些国家避难的公社社员，引渡给法国政府。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致性。

但是，巴黎公社的英雄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监狱中，也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刑场上，都表现了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无产阶级骨气。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视死如归，坚信无产阶级的事业一定要胜利！公社检察长里果在被捕后解往监狱途中，凡尔赛反动军官强迫他叫喊“打倒公社”，他却高呼“公社万岁！”“打倒杀人犯！”使敌人闻之丧胆。公社委员费烈被捕后，严正驳斥了反革命法庭捏造的种种“证据”，充分揭露了凡尔赛政府对外可耻投降、对内发动内战，草菅人命，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把反革命资产阶级对公社委员的审判变成了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审判。他在法庭上正气凛然地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我的战胜者手中。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我的遗言是在将来要纪念我并为我报仇。”他在临刑前还写信对战友说：“不要为我们的失败而悲伤，而要更好地分析失败的后果，你我都要深信：社会主义事业从来都没有象今天那样令人感到必要！”^①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在法庭上回答反动派对她的控告时义正词严地说：“是的，我参加了巴黎的纵火！我想用火的障壁来抵御凡尔赛分子的进攻。……假如你们给我留着这条命，那末我决不会停止呼吁报仇，我将号召我的兄弟们向‘赦免委员会’的剑子手报仇。我已经说完了，假如你们不是胆小鬼，那就杀死我吧！”^②巴黎公社革命烈士们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真是气贯长虹，永垂青史！

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趾高气扬。梯也尔

①② 参见《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第149、150、259—260页。

曾得意忘形地嚎叫“社会主义从此休矣！”然而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凡尔赛匪帮对巴黎工人的血腥屠杀，并不“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①真正走向灭亡的决不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战士，而是资本主义及梯也尔之流。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并没有倒下，他们将永远活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心中，公社英烈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各国无产阶级去进行战斗。

在巴黎公社流血周的第二天，巴黎公社的坚强战士，无产阶级的杰出诗人欧仁·鲍狄埃以满腔的愤怒和沸腾的热血，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巴黎近郊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篇——《国际歌》词。这首歌词批判了“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号召奴隶们奋起斗争，“要做天下的主人”；控诉了资本主义“毒蛇猛兽”，要“把他们消灭干净”；歌颂了无产阶级团结战斗，坚信“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宣判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坚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它放射出马克思主义的灿烂光辉，是《共产党宣言》的艺术再现！歌词集中体现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经验，强烈反映了公社英雄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要为真理而斗争”的雄心壮志，“要创造人类的幸福”的崇高理想。17年以后，即1888年6月，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国际歌》谱上了庄严雄壮的曲子，从此，一首气势磅礴的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诞生了！正如列宁说的：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②至今，《国际歌》仍是我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它永远激励着我们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团结战斗！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79页。

② 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4、435页。

第三节 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一、巴黎公社革命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巴黎公社在旧社会的豺狼们的镇压下失败了。公社虽然只在短短的 72 天,但它的革命光辉永照千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伟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巴黎公社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阶段。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它给了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次沉重打击。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什么永恒正义、理想的王国,它的上升阶段结束了,开始走下坡路,向着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所以,巴黎公社以它自身的出现和存在,宣告了资本主义旧世界的灭亡和社会主义新世界兴起的开端。巴黎无产阶级以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批判了统治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宣扬的“救世主”和“神仙皇帝”,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开辟了一条革命的道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各国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唯一道路。公社的事业是劳动人民谋求政治经济的完全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巴黎公社以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说:“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①“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

^① 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1872年3月13日—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

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①列宁也指出：“巴黎的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②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获得迅速广泛的传播，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纷纷建立，并领导无产阶级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其次，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受到严格的检验，再次证明它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唯一科学真理，从而宣告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破产。在巴黎公社革命中，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影响较大，但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不顾错误的理论为自己开拓着道路”。^③由于整个巴黎无产阶级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群众的要求和促使下，公社的领导者不能不违背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理论，采取了一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措施。按照布朗基的理论，只由少数革命者去夺取政权，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可是公社的实践“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充分保证由大多数^人实行公开的、直接的、绝对的统治，而且只是根据这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④蒲鲁东的理想是建立小私有的社会，而公社则决定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把它转交工人生产协作社；蒲鲁东主义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而巴黎工人最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首创精神；蒲鲁东主义否认国家，而巴黎工人建立的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② 列宁：《纪念公社》，《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5页。

③ 列宁：《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列宁全集》第8卷，第180页。

④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24卷，第29页。

尝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①这些革命措施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全正确。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②正因为公社的伟大成就，使第一国际在欧洲的声望大为提高，各国反动派加紧对公社和国际进行诽谤、诬蔑和迫害；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围绕着对公社革命的肯定与否定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不仅如此，巴黎公社革命还以它辉煌的成果，特别是在开创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马克思、恩格斯从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中，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法兰西内战》的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基本经验的总结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在国际反动派的疯狂迫害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总委员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设法为逃亡到国外的公社社员解决生活问题和寻找工作，设法为仍隐蔽在国内的公社社员办理出国护照，以便逃脱敌人的魔掌。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回击阶级敌人和巴枯宁之流对公社和国际的污蔑与攻击，为了宣传巴黎公社事业的正义性和伟大的意义，为了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受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不顾身患重病，起草了《法兰西内战》宣言。5月30日，即公社失败后的第3天，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

①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9—10页。

②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0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28页。

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①这是由于马克思当时虽然不在巴黎，但实际上参加了巴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对待公社的事业，重视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和革命群众共同前进的结果。在公社革命斗争期间，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大量关于巴黎局势和公社活动的消息。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中，马克思除了直接引用中央委员会和公社的《公报》、凡尔赛的《通报》外，还从英、法、德许多报纸和巴黎的来信中摘录了大量的材料，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马克思特别重视研究分析公社的各项政策措施，总结革命群众的创造，他从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中，热情地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公社事业的伟大历史意义，深刻地揭露了阶级敌人散布的各种谣言和诡辩，驳斥了他们对公社的攻击和诽谤；并用公社的宝贵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891年，在迎接巴黎公社20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纪念版时，恩格斯为之写了《导言》，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导言》中，恩格斯重申了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经验做的理论总结，并对公社的经验教训作了重要的补充。

①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2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下同），第33页。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巴黎公社革命经验证明：无产阶级掌握武装，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

近代法国几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敢于提出自己独立要求的时候，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首先解除工人的武装，对工人实行残酷的镇压，以维持和巩固它的统治。所以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掌握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巴黎公社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于：9月4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在抗击普鲁士的侵略和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冲破了“国防政府”的种种限制，建立了194个营、3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到9月末，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已拥有280,737支枪，到10月份又增至313,000支枪，后来达到335,000多支枪。这是一支庞大的无产阶级武装力量。巴黎无产阶级没有上梯也尔反动派的当，不为威逼利诱所屈服，不为谎言欺骗所迷惑，始终牢牢地掌握住自己的武装。正是这支革命武装掀起了3月18日革命，使无产阶级在巴黎掌握了政权。马克思说：“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①巴黎公社的72天是武装起义、武装斗争、武装自卫的72天。马克思在总结公社革命这一宝贵经验时强调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②根据公社的经验，马克思还明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92、151页。

确指出：“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
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①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3月18日革命后，凡尔赛反革命集团积极密谋策划进行反革命武装复辟的事实，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还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彻底消灭反革命的武装，来保卫胜利的果实，并把革命进行到底。3月18日革命后，刚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匪帮只有2、3万人的军队，防御能力十分薄弱，国民自卫军本应抓住时机，乘胜追击，立刻进军凡尔赛，一举消灭敌人的武装，夺取完全胜利。但是，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对溃败逃往凡尔赛的反动派的凶残本性认识不足，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忙着进行公社的选举，没有进攻凡尔赛，给了敌人以喘息的时机，使梯也尔匪帮得以网罗反革命军队，向革命的巴黎猛扑过来，把它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恩格斯强调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②可见，掌握自己的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条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

①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二) 巴黎公社革命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时，曾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伟大的 3 月 18 日革命，作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实现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结论。马克思总结了公社革命这一新经验，进一步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①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经验十分重视，把它写入《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作为对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的重要补充。

巴黎无产阶级不仅作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尝试，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创造了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形式。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② 巴黎公社是破天荒第一次由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公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制度都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性。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根本不同，它实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公社的工作人员是由普选产生，受群众监督，随时可以撤换和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人民勤务员，而公社又是同时兼管行政、立法的无产阶级的工作机关，这就从根本上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特权，保证了国家的权力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里，保证了政府真正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138、151 页。

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机关。这种政权形式最便于密切联系群众，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因而也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这是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个伟大创举。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深刻分析了巴黎公社这一宝贵的经验。马克思指出，公社扫除了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和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①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这一光辉成就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变质的经验。他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②公社采取以武装人民的形式代替常备军的形式，以及准备采取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全国政权，都反映了公社政权形式的特点。后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采取武装人民和常备军相结合的形式，又丰富了公社的经验。

可见，公社只是否定了旧的国家，它本身则是一种崭新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公社存在的72天，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无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41、141—142页。

②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12页。

产阶级专政的宝贵经验。列宁后来指出：“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①

但是，公社由于缺乏经验，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又没能摆脱资产阶级“博爱观”的影响，因此未能充分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坚决、果敢、彻底地镇压反革命，对敌人过于宽大，讲“仁慈”，对敌人的间谍特务，警惕性不高，未能将他们从各条战线上完全清除出去，从而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②另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没有“剥夺剥夺者”，特别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在公社存在时期，这个仅在帐面上就有 30 亿法郎基金的银行，提供给公社的款额只有 1,600 万法郎，而提供给凡尔赛的款额却达 25,763 万法郎。凡尔赛反动分子因得到银行的支持而加强了力量。公社却因经费缺乏而削弱了自己。恩格斯指出：“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③可见，巴黎公社提供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三）巴黎公社的初步实践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原理。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 51 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 年 4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2—393 页。

③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 9 页。

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时,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过渡阶段”的思想。根据公社的初步实践经验,马克思在这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要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改造任务。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说,要“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①;要“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②;要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③要实现这些改造的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④，“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⑤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的伟大斗争,必然会遇到一切剥削阶级的拼死反抗和反复较量,革命改造有可能“被延缓、被阻挠”^⑥,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它们需要作长期的斗争;而且要“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⑦;至于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过来,那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

(四) 巴黎公社革命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广大的城乡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结成联盟,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 1848 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经验,早已阐明了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证明:巴黎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并维持政权达两个多月之久,正是因为及时地采取了延期偿还债务,停止当铺拍卖典当物品,废除欠交房租等措施,满足了巴黎小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争

①②③④⑤⑥⑦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 142、58、59、143 页。

取和团结了巴黎小资产阶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反之,公社之所以最后遭到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能争得巴黎以外全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支持,没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

巴黎无产阶级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如在公社公布的宣言和《告农村劳动人民书》的文件中宣布,战争赔款应该由发动战争的祸首承担,成立“廉价政府”,用由人民选举、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代替吞噬着农民血汗的官僚,废除征兵制,取缔高利贷,消灭乡警、宪兵,地方行政官的压迫,扫除僧侣的愚昧统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对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利,而且首先对农民有利。马克思对公社宣布的这些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① 这些政策如果能为全国农民所了解,并且得到认真的实现,农民就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②,并且会很快爆发农民的普遍起义来支持巴黎的无产阶级政权。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农民的激烈争夺,梯也尔匪帮严密封锁巴黎和外省的联系,对公社进行造谣、诽谤;而公社的领导者起初对农民的作用认识不足,后来又迫于敌人的包围和武装进攻,未能有效地向农民宣传和实现自己的农民纲领,因而各省农民未能行动起来,和无产阶级共同战斗。无产阶级的“独唱”,终于不免成为悲壮的哀歌。

(五) 巴黎公社革命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巴黎公社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1、146页。

政党的领导。占据公社领导地位的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许多重大革命措施，是群众运动的革命创造。正是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强力推动，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才做出一些和他们的错误理论相反的事情。恩格斯指出：“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①可是，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不能制定出一条符合阶级斗争规律和革命要求的方针路线，因此公社不能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从而遭致革命的失败。由于蒲鲁东派与布朗基派的政治主张不同，自然是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号，不可能形成革命的团结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把自己掌管的部门作为贯彻自己一派政治主张的工具，遇到要共同行动的重大问题，就必然闹分裂。布朗基派主张建立少数英雄人物的强有力的专政；蒲鲁东派则主张尽量的自治，反对集中和专政。5月1日，当公社决定成立由5个人组成的拥有最广泛权力的社会拯救委员会时，两派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有22个属于蒲鲁东派的委员借口反对“独裁”对此投了反对票；5月16日，他们竟进而登报声明退出公社。毫无疑问，在反对梯也尔反革命集团武装复辟的严重关头，蒲鲁东派所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可是布朗基派却趁机从许多重要岗位上撤免了蒲鲁东派的成员并换上自己一派的人；并且还踢开公社委员会，在自己一派的会议上擅自解决一切问题。当公社面临着梯也尔匪帮复辟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就更加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加速了公社的失败。马克思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

^①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10页。

经验这样教导我们。”^①恩格斯也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②

根据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才能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他们说：“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③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公社这一教训，于70—80年代积极为在欧美许多国家中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斗争。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巴黎无产阶级为建立、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成功的经验和血的教训，是永远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学习的。列宁指出：“公社兴亡的情景，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夺取并保持了世界上的一个首都的工人政府的面貌，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场面以及在失败后所受到的苦难，——这一切都鼓舞了千百万工人的意志，激起他们的希望，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同情。”^④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过72天，但是它体现的原则是永存的。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⑤；无产阶级必须掌握自己的武装，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⑥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②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1872年1月14—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9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

④ 列宁：《纪念公社》，《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5页。

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2页。

⑥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专政”。^①这是永远指引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光辉道路。所以马克思坚定地向全世界宣告：“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②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预言：“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③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表明，不管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如何枉费心地阻挡，公社英烈们用鲜血谱写的《国际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勇敢地战斗，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胜利地前进，马克思的伟大预言正在越来越成为光辉的现实。

苏修叛徒集团胡说什么巴黎公社“起初”“几乎是完全不流血的革命”。显然，这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对公社原则的无耻背叛，对公社英烈们的莫大污辱。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恶犬吠日，丝毫不损于巴黎公社的革命光辉。

第三章 注 释

1 莱昂·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律师，共和党左翼领袖，1870年9月4日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务部长。他残酷镇压了马赛、里昂、土鲁斯的工人武装起义。第三共和国头十年，他曾反对保皇派复辟阴谋，并先后担任众议院议长和政府总理；主张对德复仇，推行殖民政策。——第223页。

2 奥古斯特·赛拉叶(1840— ?)，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1872年任国际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是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的战友。——第227页。

①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1871年5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38页。

3 卢瓦尔军团,指驻防在法国西南部卢瓦尔河一带的法国正规军,1870年11月9日曾在奥尔良附近的库耳米耶会战中,击败了普鲁士巴伐利亚第一军。——第231页。

4 阿基·法朗斯瓦·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反动分子,1862—1867年为法国干涉墨西哥的首领,普法战争期间和普军司令部共谋推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复辟君主制,1870年10月27日率部17万3千人向普军投降,给普军开放了进攻巴黎的道路。——第233页。

5 克列门斯·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巴黎女教师,公社女战士,同凡尔赛分子英勇战斗,被捕后,在军事法庭上表现出革命英雄气概,坚贞不屈。——第239页。

6 凡尔赛,在巴黎西南18公里处,城内有原法国帝王的行宫,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梯也尔及巴黎的反动派都麇集在这里——第239页。

7 艾米尔·维克多·杜瓦尔(1841—1871),铸工,法国工人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秘书,铸工工会主席,9月4日革命后,任20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第13团团团长,积极参加1871年1月22日和3月18日起义,曾任公社委员、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坚决主张向凡尔赛进军,4月3日在保卫公社、出征凡尔赛的斗争中被俘,英勇就义。——第243页。

8 泰奥菲尔·费烈(1845—1871),法国新闻记者,布朗基主义者,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第二帝国时期曾多次被捕受审。1870年9月4日革命后,任蒙马特尔区警备委员会委员和20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成立后,先后担任治安委员会委员,公社副检察长,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和对敌人采取一些坚决措施。公社失败后被捕,在敌人法庭上拒绝受审讯,被判死刑,英勇就义。——第243页。

9 让·巴蒂斯特·沙尔东(1839—1900),法国锅炉工人,国际会员,9月4日革命后,任20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治安委员会委员。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第243页。

10 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1833—1871),波兰军官,1863年参加反对沙皇统治的起义,被捕后被判处15年强制劳役,1864年12月逃跑,1865年到巴黎侨居,积极参加巴黎工人运动,3月18日革命以后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总指挥,4月底率领公社第一军,在西线作战,5月23日在战斗中牺牲。——第243页。

11 路易·沙尔·德勒克吕兹(1809—1871),法国政论家,1848年革命

的参加者,1870年9月4日革命后,参加10月31日起义,1月22日被捕,2月被选入资产阶级国民议会,巴黎公社革命后,辞去议员职务,先后担任公社对外联络委员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公社军事代表,在“五月流血周”战斗中,光荣牺牲。——第246页。

12 新雅各宾派,是沿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名称而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宪政之友社”,会址设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故又名“雅各宾俱乐部”,通称雅各宾派。新雅各宾派重复雅各宾派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反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造,尤其反对剥夺剥夺者。他们在工人阶级中没有群众基础。——第246页。

13 拉乌尔·热尔日·阿道夫·里果(1846—1871),法国政论家,布朗基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曾因参加秘密团体被捕。1870年9月4日革命后,曾参加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起义。巴黎公社成立后,任公社委员、治安委员会委员、公社检察长等职,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措施。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5月24日英勇牺牲。——第250页。

14 爱德华·弗罗里蒙·玛丽·瓦扬(1840—1915),法国工程师兼医生,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曾参加第一国际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1870年9月4日革命后,任20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过10月31日和1月22日两次起义,巴黎公社期间,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委员会领导人。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905年成为改良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50页。

15 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宝石工人,匈牙利籍,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里昂支部的组织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书记,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委员,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和代表。和马克思保持通讯联系。1871年8月22日在伦敦被选入国际总委员会。匈牙利工人党的组织者。——第251页。

16 欧仁·鲍狄埃(1816—1887),印花布图案工人。长期从事革命诗歌创作,巴黎公社诗人,国际会员。曾积极参加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巴黎公社期间,当选为公社委员,同凡尔赛分子英勇战斗。“五月流血周”以后的第二天,写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国际歌》歌词。后来流亡英国和美国,1880年回法国,参加工人党,坚持革命斗争。——第254页。

17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836—1908),波兰革命家,曾参加1863年反对沙俄统治的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到巴黎,1866—1870年为“波兰侨民联合会”主席。巴黎公社期间被任命为将军,指挥第二军,是公社最有才干的将领之一。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1872年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85

年大赦后回法国,1908年8月5日逝世。——第260页。

18 伊丽沙白·德米特利耶娃 (1851—1898), 俄国人, 国际会员, 1868年到日内瓦, 参加了反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1871年3月底到了巴黎, 积极参加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的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 她率领妇女营对凡尔赛分子进行了英勇战斗。1871年10月回到俄国, 不久, 脱离了政治活动。——第260页。

第四章 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 和第二国际前期活动。马克思 主义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 义的斗争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开始。列宁说，19世纪的最后30几年（1872至1905）“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代”。^①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进入了未来革命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而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在资本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已占了统治地位。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摆在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②为此，首先必须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早在1871年9月召开的第一国际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在每个国家中成立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和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任务。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纲领，必须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战斗任务，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

①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页。

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右倾机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无产阶级在继续同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同时；还先后同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以及德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为帮助英、法、美等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开展了对改良主义、宗派主义的批判和斗争。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法国“可能派”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了第二国际。

90年代初，年迈的恩格斯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决同第二国际各国党开始滋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时也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从而保证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围绕着捍卫党的理论基础，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党，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围绕着革命还是改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

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各国革命派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著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原理，系统地、全面地、详尽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反修防修、批林批孔、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哥达纲领批判》的伟大意义

一、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及其危害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同时，也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拉萨尔主义是在 60 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极右的机会主义。拉萨尔是一个投机革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和工贼，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机会主义的祖师爷，也是早期国际共运史上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头目。

拉萨尔主义是在德国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的形势下出笼的。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德国依旧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统治下，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当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势力争夺权力的时候，在 1848 年革命中，无产阶级已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甚于害怕地主阶级，它甘愿屈服于容克¹地主阶级的政权下发展资本主义。德国无产阶级受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整个 50 年代，德国集会结社被禁止，革命人士被迫害，马克思主义著作被列为禁书。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在 50 年代，德国资本主义有相当大的发展，50—60 年代工业生产大约翻了两番，大机器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起来，“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①随着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91 页。

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也随之增长。1848年以前,产业工人不到60万,到60年代初,产业工人已增加到155万。

5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使无产阶级接受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了一些工人组织,如教育协会、互助会等。但是,随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60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又开始兴起。1861年,不少工人已经提出参加政治生活并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的要求。1862年,莱比锡、柏林等地的工人已经开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一贯热衷于政治投机的拉萨尔,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机会主义鼓动,全面抛出了他的机会主义纲领和路线。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他从少年时起就沾染了投机取巧等资产阶级恶习,并逐渐形成了他“伸手去取王冠”的政治野心。大学毕业后,拉萨尔竭力往上爬,想挤入贵族的行列,为此,他从1846年起便专心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件,并无耻地把这一贵族家庭的内部纠纷美化为处于“无产者”地位的伯爵夫人反抗权贵的斗争。拉萨尔曾抱着政治投机的目的参加了1848年德国革命,并千方百计地接近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失败后,拉萨尔悲观失望,便把全部精力用来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打官司,前后化了七、八年时间,并和伯爵夫人鬼混在一起。为了沽名钓誉、捞取政治资本,拉萨尔在50年代后期东翻西窃地写了一些著作,如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等。拉萨尔以此自我吹嘘,摆出一副“大学者”的面孔。这时期,拉萨尔的政治立场,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①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下同),第57页。

60年代初，当德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涨的时候，拉萨尔摇身一变，投向工人运动，于1862年春和1863年春先后抛出了他的机会主义代表作《工人纲领》、《公开复信》（致为在莱比锡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他以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自居，装出一付“老革命”、“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人民之友”的姿态，并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剽窃了一些词句装璜门面，向工人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极力兜售他的“救世仙方”，这样，拉萨尔主义就正式出笼了。

拉萨尔的主要谬论是什么呢？

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和政治路线就是鼓吹无产阶级通过议会道路建立“自由国家”，并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所谓“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假社会主义。

拉萨尔鼓吹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胡说：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他由此出发，认为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在于依靠普鲁士的“国家帮助”争取普选权。他胡说实施直接的普选权“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因为有了普选权，工人代表就能在议会中占多数，建立“自由国家”，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建立生产合作社，他胡说用一亿塔勒的货币“就足以使整个德国获得解放”，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最合法、最和平又最简单的方法”，这就可以实现他所谓“公平的分配”的社会主义。

为了争取普选权，拉萨尔鼓吹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机会主义政党，“这个党以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原则口号，作为党的旗帜”，“并为此开展一个合法的、和平的……宣传运动”，以便把象他这样的“英雄”、“工人领袖”选进议会里去。

为了从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拉萨尔从反动的马尔萨斯²人口论出发，臆造了一个

“铁的工资规律”。他认为“决定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限制停留在一国人民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永远不可能根本改善的。拉萨尔以此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举行罢工、组织工会，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拉萨尔为了推行他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竭力鼓吹无产阶级与容克地主结成同盟，而把无产阶级真正的同盟者农民、小资产阶级污蔑成“反动的一帮”，以此反对工农联盟，孤立无产阶级；在国际上，他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替德国地主资产阶级效劳。

拉萨尔在贩卖他的一整套机会主义谬论时，采取了表面上尖锐地攻击资产阶级的手法。他这样作可以一箭双雕：既可包庇容克地主，取得普鲁士王朝对他的好感；又能骗取工人群众的信任。1863年5月德国无产阶级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时，拉萨尔挂着“老革命”的招牌，利用他蛊惑宣传中的欺骗作用，骗取了工人群众的信任，趁机窃取了联合会主席的职务，并且把他的机会主义作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把联合会变成了他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①

为了加强对联合会的控制，拉萨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②例如拉萨尔死后的主要继承者施韦泽(1833—1875)，就是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

①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

②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哥达纲领批判》，第56页。

1862年因贪污公款和耍流氓而被判处过监禁的坏分子。他在走投无路之时投奔拉萨尔，拉萨尔竟不顾法兰克福工人组织的强烈反对，接受施韦泽参加联合会领导核心，并且无耻地把施韦泽的那些劣劣行为说成是生活小节，反诬工人们“胸襟狭窄”。又如哈茨费尔特这个伯爵夫人，她同普鲁士王朝有密切联系，也被拉萨尔放在联合会的领导核心中。拉萨尔在联合会中极力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凡入会者，都要宣誓效忠拉萨尔。为了培植对他的迷信，他收买一些御用文人为他写颂诗，其中有一首黑诗竟这样肉麻的吹捧他：“来吧，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吧，不要再作无谓的奔忙！有一个人愿为你们开辟幸福之路，你们只需为行动待命整装！……人民的儿子，斐迪南·拉萨尔！为民喉舌，言语明晰，朴素大方！”^①

拉萨尔为了实现其狂妄的政治野心，从1863年起便加紧了同俾斯麦的秘密勾结。他完全支持普鲁士王朝的内外政策，无耻地吹捧反动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为“明智的政治家”、“男子汉大丈夫”。1863年，拉萨尔同俾斯麦多次进行密谈，常常连续深谈数小时之久。有一次，俾斯麦竟因拉萨尔在座而拒绝接见巴伐利亚的公使。从1863年5月到1864年夏，拉萨尔直接拜访俾斯麦达十多次，写了不少密信，例如，1864年1月13日到16日四天之内他连写两封密信，急切地向俾斯麦呈献愚弄群众、加强统治的“仙方”。1928年从普鲁士内阁的旧档案中发现的确凿材料证明，拉萨尔在和俾斯麦密谈和通信中，不仅向俾斯麦宣誓他是普鲁士国家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和卫士，而且把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工人阶级的行动计划和今后的打算统统向俾斯麦作了汇报。他还劝说俾斯麦实施普选权，认为这符合普鲁士国家的利益，他希望普鲁士王室“转变成一个社会的、革命的人民的王室”。他保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47页。

证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兼并战争的道路统一德意志。上述事实说明,拉萨尔完全是一个内奸和工贼。

1864年8月底,拉萨尔为了争夺别人的未婚妻在决斗中死亡。但是,他的继承者施韦泽、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等人更加疯狂地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把联合会完全变成了一个效忠普鲁士王朝和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组织,对于德国工人运动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

二、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与成长

早在6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拉萨尔从1848年同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以来,一贯采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他在通信中和当着马克思的面总是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共产党宣言》的立场上的。在背后,他却竭力阻碍和破坏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他剽窃马克思的著作,却从不提马克思的名字,这一点,甚至他的忠实门徒施韦泽知道后都感到吃惊。恩格斯曾痛斥他是一个“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指出“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同拉萨尔合作过”。^①虽然如此,为了争取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从50年代以来,曾对他进行过多次的帮助和批评教育,但他屡教不改。他在50年代末写的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是利用戏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在这一著作中,他竭力美化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抹煞农民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严肃批判。但拉萨尔拒不接受,后来又进一步污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早在1861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根据他们对拉萨

^①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80年5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19页。

尔的长期观察,看出“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①

1862年,拉萨尔开始他的机会主义鼓动以后,马克思在同年7月和年底曾两次面对面地同拉萨尔进行了斗争。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计划和狂妄野心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使得他“狂叫、大怒并跳起来”。鉴于拉萨尔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马克思从1863年初就同他断绝了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决裂的原因时指出:“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②对于拉萨尔的蛊惑宣传,马克思十分蔑视,认为“从他迄今所写的一切东西看来,他只是个大言不惭地……中学预科学学生”。^③对拉萨尔与俾斯麦的秘密勾结,远在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早有察觉。恩格斯在1863年6月指出:“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④后来,恩格斯对拉萨尔这一时期的机会主义鼓动作了总结,指出“他在1862—1864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⑤

1864年拉萨尔死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利用给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机会宣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1年2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4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2页。

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8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4页。

④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6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页。

⑤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注,《共产党宣言》,第9页注①。

传科学共产主义，批判拉萨尔主义。1864年末，拉萨尔派头目施韦泽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为他主办的上述报纸写稿。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争取联合会的群众，并且看到办报纲领中没有包含拉萨尔主义的口号便答应了。马克思在向恩格斯谈到他为该报写的《论蒲鲁东》一文时说：“某些十分无情的打击看来是为蒲鲁东预备的，实际上都击中我们的‘阿基里斯’（指拉萨尔。——编者），并且是存心这样做的。”^①在马克思的要求下，该报还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该报不断发表吹捧拉萨尔和普鲁士王朝的文章，如鼓吹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可以依靠‘铁和血’的帮助”等，便立即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与该报断绝关系并进行了揭露。同时与该报断绝关系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约·菲·贝克尔等人。这是对拉萨尔派的沉重打击。

其次，通过写文章、信件、发表演说等各种形式，不断揭露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反动实质。恩格斯在为德国报纸写的文章中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②恩格斯还指出，在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连起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都没有的情况下，鼓吹“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③马克思1868年在信件中揭露了拉萨尔“国家帮助”的反动实质，指出这“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页。

②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5—256页。

③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3页。

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 1843 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①

第三,教育帮助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在“联合会”内外同拉萨尔派展开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影响,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曾期望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以便通过国际的活动来影响德国工人运动,使他们的斗争建立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原则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但是,拉萨尔的继承者施韦泽、哈茨费尔特等人,制造各种借口,阻挠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在此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便努力帮助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起来反对拉萨尔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写信给李卜克内西等人,既鼓励他们,又批评帮助他们,要他们在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不要着急”,要“做得机智”^②,同时还提醒他们注意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划清界限。当时在联合会内展开斗争的是以李卜克内西、白拉克⁴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倍倍尔当时领导了“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⁵与拉萨尔派作斗争。

当时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革命派与拉萨尔派斗争的焦点是德国统一的道路问题,这是德国工人运动 60 年代面临的迫切任务。

60 年代的德国仍处于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全德由 36 个大小不等的邦组成,最大的邦是普鲁士。这些邦的政权都操纵在地主阶级手中。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都要求国家统一。因此,国家的统一成了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最迫切的

①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 年 10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70 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 年 9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51 页。

问题。李卜克内西等革命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主张,认为德国的统一必须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加强民主力量的联合,反对普鲁士封建王朝的兼并战争,并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消灭一切封建势力,实行民主改革,最后达到全国统一。而拉萨尔派则主张向普鲁士王朝卑躬屈膝求得普选权,全力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从而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德国中的统治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在德国统一道路问题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德国的革命派在与拉萨尔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1865年到1869年6月这段时期内,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先后退出了联合会,他们与倍倍尔一道进行了筹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1869年8月7—8日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工党一成立就参照第一国际的纲领,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并宣布参加第一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德国工人运动就正式分成了两派: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

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后,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两派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时期斗争更为激烈。爱森纳赫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巴黎公社,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在议会讲坛上义正词严地谴责普法战争的双方政府都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在议会表决战时公债时先是以弃权表示反对,后则坚决投反对票。他们还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当他们遭到反动政府迫害时,还在自己报纸上号召同志们“要站稳脚跟,不要气馁”,并高呼“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万岁!”恩格斯在赞扬他们时指出:“德国工人在最近这次大危机的时期表现得很出色,比其他地方的工人都强。倍倍尔是他们的杰出

代表；他的关于公社的演说……给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与此相反，拉萨尔派则奉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反对巴黎公社。施韦泽胡说巴黎公社不仅是一个对德意志人民的战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因而提出每一个德国人，要为祖国而战的反动口号。他们无耻地给爱森纳赫派加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妄图搞垮爱森纳赫派。但是，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斗争中，爱森纳赫派的威信越来越高，拉萨尔派则众叛亲离，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和工人群众日益转向爱森纳赫派。1872年，拉萨尔派头子施韦泽与俾斯麦勾结领取秘密津贴的丑行被揭发出来，更引起该派广大群众的不满，该派头目们不得不玩弄“换马”计，把施韦泽开除出去，借以苟延残喘。

通过普法战争，俾斯麦虽然自上而下统一了德国，但是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正确的。列宁说：“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②

巴黎公社失败后，拉萨尔分子还与巴枯宁阴谋集团相勾结，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盘踞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中的拉萨尔分子，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同巴枯宁分子串通一气，疯狂攻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反对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并妄图使该协会退出第一国际。由于该协会中革命派的坚决反击，这伙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并被全部清洗出该协会。1872年，拉萨尔分子又一次和巴枯宁集团“结成了公开的联盟”^③，

①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71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9页。

②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3页。

③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7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8页。

反对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结果也遭惨败。一直到 70—80 年代，拉萨尔分子还在丹麦、比利时、美国等地继续从事破坏工人运动的罪恶活动。

三、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运动统一问题上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哥达纲领批判》的伟大历史意义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无产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英国的工人运动则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干扰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德国的工人运动却在 60 年代兴起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发展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开始“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①

70 年代以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从客观条件来看，是与德国统一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和容克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分不开的。

普法战争期间，德国自上而下地实现了统一，于 1871 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德国的统一，“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②

国家获得了统一，从普法战争中又获得了从法国掠夺到的亚尔萨斯-洛林地区丰富的工业资源和 50 亿法郎的赔款，以及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的成就等等原因，促使德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地发展。19 世纪 70—80 年代是德国产业革命完成的年代。在这一期间，德国的工业很快地赶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01 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3 页。

跃居世界第二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德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60年代初，德国的产业工人只有 150 万人，而到 1895 年就增加到 1,000 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 以上。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非常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德意志帝国的军事专制统治下，德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无权地位。在经济上，德国资产阶级为了在世界市场上和英、美等国竞争，千方百计地加紧对工人的剥削。与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相比，德国无产阶级的工资低得多，只相当于英、法工人工资的 1/4 到 4/5，而且劳动条件坏得多，劳动时间长得多。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加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发展，德国工人运动在这一基础上日益发展起来。

70 年代后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广泛发展，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已经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德国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

但由于拉萨尔派的破坏，德国的工人运动仍是不统一的，存在着两个党：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改良主义的拉萨尔派。与此相联系，工会等组织也不统一。这种分裂和对立的状况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德国统一后反动统治却进一步加强了，1873 年德、俄、奥三国皇帝结成了共同镇压各国革命的“神圣同盟”。1873 年的经济危机又给无产阶级带来苦难，德国无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克服分裂，统一自己的力量，对付共同的敌人，发展革命事业。为此，爱森纳赫派曾多次向拉萨尔派建议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但都遭到无理拒绝。后来，由于爱森纳赫派路线正确，在工人群众中影响越来越大，而拉萨尔派则由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越来越不得人心。这时，不仅德国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日益看清拉萨尔派头目为俾斯麦效劳的

反动面目，就是它所控制的联合会内部的广大群众也日益觉醒，对其头头推行机会主义路线表示不满。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爱森纳赫派当选6人，拉萨尔派只有3人。在1874—1875年初，拉萨尔派为了保持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摇摇欲坠的地位和适应俾斯麦从内部破坏工人运动的需要，一反常态，又主动要求和爱森纳赫派合并。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非常关心，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两派的合并，但特别提醒李卜克内西等人“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①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拉萨尔派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是因为他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②德国党是统一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基础上，还是倒退到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上，这是最关键的原则问题。革命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③1875年3月，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特别强调，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即理论方面，绝不能向拉萨尔派让步，“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④，因为“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⑤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纲领问题，认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⑥尤其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是7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主要任务，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

②④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哥达纲领批判》第31、32页。

③⑥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6页。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而德国党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处于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对德国新党纲的制定非常重视，认为如果新的纲领不能“**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①但是，李卜克内西等人急于追求形式上的团结，他们背着马克思、恩格斯，从1874年10月起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森克莱维尔、^②哈赛尔曼^③共同起草了一个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准备迅速地召开两派统一的代表大会，实现两派的统一。

当时被关在监狱中的倍倍尔曾对纲领草案表示反对，李卜克内西请求他别把这件事声张出去，以免妨碍合并。倍倍尔竟然放弃了原则，同意李卜克内西的要求。这样，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在合并问题和纲领草案问题上完全丧失了原则，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

1875年3月，当马克思、恩格斯从报上看到公布的纲领草案时极为愤慨，立即给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写信指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④“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⑤它的要害在于，接受了拉萨尔派的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和通过争取普选权建立“自由国家”的主张，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此，马克思在4、5月间，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纲领性文献，对《哥达纲领》草案（以下简称《纲领》）进行了逐条逐句甚至是逐字的批判。他为我们树立了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通篇揭露和批判了《纲领》的复辟倒退本质。指出《纲领》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5页。

③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哥达纲领批判》，第36页。

对《共产党宣言》和第一国际章程的无耻背叛，甚至同 1869 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相比，也是一个大倒退；在实践上，《纲领》是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否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纲领》“表现的断然的退步”，“感到特别愤慨”。^①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必须在革命的任务、对象和革命的最终目的；革命的动力和阶级路线；革命的道路等根本问题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纲领》恰恰在这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全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倒退到拉萨尔右倾机会主义泥潭中去。马克思对《纲领》的批判，是对拉萨尔主义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

（一）批判了拉萨尔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私有制、包庇地主阶级的反动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原理。

《哥达纲领》一开头就接受了拉萨尔用空谈“劳动”和“社会”的说教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谬论，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马克思在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②劳动只有和自然界，即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只有得到资本家的雇佣才能进行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纲领》避而不谈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胡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就是回避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就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今天，拉萨尔的徒孙们勃列日涅夫之流，为了诱使苏联人民为他们卖命，也高唱“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要求苏联人民“劳

^{①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3—4、7 页。

动、劳动、再劳动”，以便让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这是拉萨尔幽灵在克里姆林宫的再现。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劳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起来，揭示和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苦难的根源；揭示和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基于这种分析，必然得出的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①而《纲领》背叛了《宣言》的这个革命精神，空谈劳动和社会，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历史任务，其要害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纲领》在回避所有制问题的同时，追随拉萨尔，只提反对资产阶级，不提反对地主阶级，把地主阶级放在革命对象之外。

马克思揭露《纲领》篡改了第一国际章程的有关论述，国际章程的原意是“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②，这就是说，革命对象包括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纲领》却歪曲成“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实际上是把拉萨尔十多年前用仅仅攻击资本家的手法来包庇容克地主的那一套搬进无产阶级的纲领中来。恩格斯曾指出，在德国约有 $\frac{1}{3}$ 的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有 $\frac{2}{3}$ 的劳动者受封建地主的剥削。“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气愤话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③实际上拉萨尔攻击资产阶级也是假的，他空谈“劳动”与“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8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0页。

③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2页。

会”，鼓吹“铁的工资规律”等等，正是千方百计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二）批判了拉萨尔鼓吹“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假社会主义的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原理。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宣言》早已指出的。《纲领》却把拉萨尔的“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革命的最终目的。上述反动谬论是拉萨尔假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进行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的反动口号。

马克思在批判这些谬论时指出，消费品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的，或者说分配关系是由占有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某种抽象的平等观念一类道德原则决定的。离开历史条件，离开生产方式来空谈公平分配，完全是欺人之谈。

马克思还指出，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社会总产品中必须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后备基金、管理费、公益金等等，然后才能进行个人分配，根本不可能“不折不扣”，而只能是“有折有扣”。《纲领》把拉萨尔的这一“空洞的废话”搬来，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背叛。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庸俗的分配观点时，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展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光辉远景。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存在着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2页。

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存在着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劳动还没有从“谋生手段”变成大多数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没有达到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因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即每个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这里，劳动者已不再受剥削、受压迫，因而这种分配关系所反映的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或私有生产者的相互关系，而是反映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分配消费品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虽然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权利，但是“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它虽然消灭了剥削，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平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①由于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劳动力强些，有的弱些，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少些，因此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就会有多有少，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不平等。就这一点来说，按劳分配原则是旧社会痕迹的重要表现之一。如果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加限制，就会成为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所以，马克思在肯定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这是一种“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不断革命，限制和逐步缩小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①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3、14页。

资产阶级法权才会完全消失。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它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远景，引导着我们坚定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勇前进！

（三）批判了拉萨尔否认农民革命性和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谬论，阐明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制定一条革命的阶级路线。在国内，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上，必须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纲领》却接受了拉萨尔关于除了工人以外“其它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的观点。这个反动观点把中间阶层，即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等都列为反动阶级，不但没有向无产阶级指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且还以友为敌。马克思指出，笼统地把中间阶层列为反动阶级是不正确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应该和农民结成联盟，不断发挥农民的革命作用。拉萨尔所以把农民列入“反动的一帮”，“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②《纲领》接受拉萨尔的这一反动观点，必然反对工农

①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4、16页。

联盟,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①

《纲领》的另一错误是用资产阶级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反动口号来代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并且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②

马克思指出,这是要德国党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倒退到拉萨尔的最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

马克思在批判中分析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正确关系,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③,而就其内容来说,则是国际性的,是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国际上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相互声援、相互支持。

马克思指出,所谓“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在地主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际联合,俾斯麦正是实行了这种反革命国际联合的政策。《纲领》贩卖这一口号,说明它“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④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耻背叛。

(四)批判了拉萨尔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暴力革命道路。

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早就科学地阐明了这一规律。《纲领》却接受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以此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否定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是资产阶级

①②③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6、17页。

剝削剩余价值的结果，否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当剩余价值学说和工资理论“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这是“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①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制定一条革命的路线，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这是《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纲领》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拉萨尔“国家帮助”的黑货。实际上是适应了俾斯麦的需要。当时俾斯麦也倡导所谓国家帮助成立生产合作社，目的是要用社会改良来诱骗无产阶级放弃反对德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拉萨尔派竟把统治阶级的欺骗手段推崇为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是统治阶级忠实卫士的反动面目。因此，所谓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路线。按照这条路线，阶级斗争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了，社会主义哪能实现呢？马克思指出：“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③马克思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④也就是暴力革命中产生。

（五）批判了拉萨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

①③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9、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8页。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了这一光辉思想。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学说的极端重要性。《纲领》却背叛了这一学说,把建立所谓“自由国家”作为党的斗争目标,而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首要问题,这就完全滚到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立场上去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自由国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①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至于拉萨尔所推崇的德意志帝国,则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②然而《纲领》却企图要把这样的国家和平地变为“自由国家”。马克思指出,不但普鲁士专制国家不可能和平地变为所谓“自由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可能是什么超阶级的“自由国家”。马克思说:“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③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④

马克思根据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作用的分析,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①②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2、23、21页。

④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哥达纲领批判》,第35页。

斗争的实际材料,也就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历史任务,科学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这个著名的论断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以后,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它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它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建立共产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它是我们今天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思想武器。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拉萨尔“自由国家”的反动衣钵,炮制了“全民国家”的谬论,叫嚷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借以掩盖其法西斯专政。叛徒卖国贼林彪叫嚷要建立什么施“仁政”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过是拉萨尔“自由国家”的翻板,实际上是让地富反坏右和他们那一伙新资产阶级分子上台,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这说明他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坚持原则和敢于反潮流的光辉榜样。它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是我们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锐利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合并大会召开之前,就把《哥达纲领批判》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希望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同拉萨尔主义划清界限。但李卜克内西等人拒不接受马克思的批评。他们不在党内公开这个文献;同时对《纲领草案》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就在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2—23页。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匆忙通过。合并后的党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个合并大会上,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不但在纲领上向拉萨尔派投降,而且在组织上也让拉萨尔派占了多数和重要位置。合并后党的领导机构^①由5人组成,拉萨尔派3人,窃据第一主席、第二主席和一名书记职务;爱森纳赫派只有2人,一名书记,一名司库。恩格斯气愤地指出:“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②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原因之一是鉴于德国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是属于好同志犯错误,马克思的批评意见寄给他们主要是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公开表明他们对《哥达纲领》的原则立场,即“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③这样做,既能回答巴枯宁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的污蔑,表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又能对德国党的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但后来的事态发展,使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暂不发表公开声明,而是对《哥达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在说明原因时指出:《哥达纲领》发表后,“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④这就是说,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使马克思、恩格斯对《哥达纲领》没有在德国党内进行

①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哥达纲领批判》,第34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5页。

③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10月12日),《哥达纲领批判》,第43页。

公开批判。一直到 16 年之后，由于革命的需要，《哥达纲领批判》才由恩格斯坚持加以发表。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机会主义者总是惯于在理论上制造混乱。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里，总是把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的机会主义谬论混在一起，使人容易受骗上当，分辨不清。林彪一类骗子玩弄的也正是这一套伎俩。因此，一个革命者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要避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德国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之所以犯投降主义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因而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一历史教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识别能力，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节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同 杜林主义的斗争。德国《非常法令》 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反对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杜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马克思主义者 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

1875 年德国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后，由于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多年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抵制了党的领导人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个别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①再加上德国工

^① 恩格斯：《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516 页。

人运动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分裂的局面，在客观上符合共同对敌的需要和工人群众的愿望，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有所加强。

但是，两派无原则合并所带来的恶果毕竟是十分严重的。这是由于合并是在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下进行的，党内没有对拉萨尔主义开展批判，因而划不清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界限。马克思说：“合并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践方面都降低了党的水平。”^①他还指出：“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拉萨尔派做交易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确实向所有这帮动摇不定的人敞开了大门，并且违背己愿地造成了使党堕落的条件，这仅仅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才得以避免。”^②两派无原则合并是德国党内不断出现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875年以后杜林主义在党内的一时泛滥是与此分不开的。

欧根·杜林(1833—1921)出身在普鲁士一个官吏家庭，曾担任过普鲁士见习法官，后任柏林大学讲师。他原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门徒，从1865年10月开始为普鲁士帝国官方的《国家通报》撰稿，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从70年代起，他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1873年)和《哲学讲义》(1875年)等著作。杜林披着学者的外衣，打着所谓革新科学的幌子，在上述著作中，狂妄地声称他发明了新的“社会主义”体系。实际上杜林的“理论”体系，不过是某些已经过时了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杂拌。它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猖狂的、全面的进攻。但在两派合并以前，杜林这个党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并不大，它只不过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跳梁小丑。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7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4页。

②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的一些反动观点，早就有所揭露和批判。在1868年，当杜林写文章对《资本论》第一卷妄加评论时，马克思就讥讽他的评论是“废料”、“滑稽”可笑。恩格斯则指出他的整篇论文表现了“狼狈和恐惧”。1874年6—7月，马克思、恩格斯曾写信给李卜克内西等人，警告他们要提防杜林主义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影响的危险。1876年2月，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维护容克地主利益的面目。他指出，“杜林先生赞扬酿酒业……并郑重其事地宣称：‘酒精生产的意义如此巨大，与其说对他可能估计过高，不如说可能估计不足！’”^①而普鲁士容克地主所以能统治德国，从经济方面说，正应当“归功于酿酒业”。^②这完全暴露出杜林是容克地主的代言人。

1875年两派合并后，小资产阶级的杜林主义在德国党内和工人运动中象瘟疫一样的蔓延开来，这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杜林主义的出笼是适应德国和欧洲反动势力从思想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需要。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深刻影响，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在工人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使各国反动派吓破了胆。他们除了加强反动统治和镇压外，还从思想上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妄图阻挡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俾斯麦一再宣称他要实行“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宣扬什么对意外事故、疾病、年老等实施国家保险就是社会主义。他还收买一些御用文人在社会上大肆贩卖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例如70年代在德国颇为流行的“讲坛社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

①② 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53页。

局限于组织疾病和不幸事故的工人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杜林主义的出笼，正是适应德国和国际反动派从思想上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的需要，也是适应俾斯麦妄图分裂和瓦解刚刚统一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需要。

其次，杜林主义的蔓延是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大肆加以吹捧、贩卖造成的。党内的杜林分子以约翰·莫斯特(1846—1906)、伯恩施坦等为代表。伯恩施坦从1873年起，就成了杜林主义的狂热信徒，他自供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以杜林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学说原则了”，伯恩施坦上窜下跳，四处推销杜林的黑书，1874年倍倍尔在狱中看到的杜林的著作，就是他送去的。莫斯特等人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尤其是掌握了一部分报纸和刊物，大肆吹捧杜林，推销杜林主义。他们肉麻地吹捧杜林在科学领域内是“最热心、最果敢、最勤奋的首领”，是什么“思想家、导师、大智者”，他的三部著作是“划时代”的，疯狂叫嚷马克思派和杜林派“在党内有同等地位”，等等。莫斯特等人甚至在党内建立一个拥护杜林的宗派组织，妄图分裂党和另建新党。1875年和1876年，杜林分子莫斯特等人先后把他们吹捧杜林的文章送给李卜克内西，要求在党的中央报刊上发表。当遭到拒绝后，他们大肆攻击李卜克内西“专制”，妄图篡夺中央机关报的领导权，同时散发吹捧杜林的小册子。正如恩格斯所揭露的：“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①向党进攻。这是杜林主义得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蔓延的根本原因。

第三，杜林主义的蔓延也有它的社会基础。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党的影响和党的队伍的扩大，使一些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纷纷向党靠拢，不少人到党内来找出路，但他们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下同），第3页。

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恩格斯说：“德国小市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意义：这个党应当成为象小市民自己那样的小市民的党，决不要参加革命，而只是忍受革命。”^①这些人很容易接受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妄自大，都想独自创立一个什么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体系，这些所谓体系象“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②杜林主义不过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③尤其是两派无原则的合并，使一些拉萨尔分子、一些投机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得以混进党内，这就使党在思想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组织上不纯。杜林这个政治骗子和野心家，正好利用了党的这一弱点。他当时表面上声称赞同共产主义，并用激烈的言词攻击当时大学的制度和某些教授们，因此于1877年6月受到柏林大学当局的解聘，这样就骗取了党内外很多人的同情。杜林这个野心家也就乘机从党内纠集一伙人，建立宗派组织，妄图分裂党，另建新党。

④ 第四，某些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态度也是杜林主义得以蔓延的重要原因。例如倍倍尔就曾经认为：杜林的著作可以“为了党的利益而介绍出来并加以利用”。^④他甚至还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者》为题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推荐杜林的著作，把杜林作为一个所谓“新”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创造者而加以赞扬，错误地认为杜林的政治学著作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的“最佳著作”。后来，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看作学术上的争论，犯了调和主义的错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9页。

②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4页。

④ 《倍倍尔自传》，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200页。

误。这就不能不产生极不良的影响。马克思曾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①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后来，随着《反杜林论》的发表，倍倍尔才逐渐同杜林主义划清了界限。

上述种种原因，使杜林主义在 1875 年后一度成为德国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当时，李卜克内西虽然对杜林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不够，但他担心刚刚统一起来的党因杜林宗派集团的出现而再度发生分裂，因而从 1875 年以后，几次去信给恩格斯反映杜林分子的猖狂活动，并请求恩格斯对杜林的著作展开批判。当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获知杜林主义迅速蔓延的危险后，于 1876 年 5 月下旬及时研究了对杜林主义的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彻底批判”。^②由于杜林主义的泛滥，向德国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以杜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呢，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这是关系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前途、方向问题。对杜林主义的批判，首先关系到德国党的巩固和革命化。恩格斯说，要使德国党“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③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也有助于各国党的领

①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 年 10 月 19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17 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 年 5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5 页。

③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79 页。

导人和广大群众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界限,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恩格斯在谈到批判杜林主义的国际意义时指出:“德国的重大错误还在于,让大学生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学者’以党的科学代表的身分向全世界大量散布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是一种必然要经受的幼稚病,恰恰是为了缩短病程,我才以杜林为标本作了那样详细的分析。”^①由于马克思当时正在从事《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改;恩格斯虽然当时也在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但为了不致使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中断,便承担了反击杜林这一重大战斗任务,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②在马克思的密切合作下,恩格斯自1876年5月起开始写批判杜林的文章,从1877年1月起至1878年7月止,连续刊登在德国党中央的机关报《前进报》¹⁰上,恩格斯的这些批判文章,后来汇集成书,便是著名的《反杜林论》。恩格斯讥讽地把这本书题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反杜林论》在《前进报》上陆续发表是充满了斗争的,它突出表现在1877年党在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当时杜林分子莫斯特在会上叫嚷《反杜林论》在《前进报》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另一杜林的支持者尤·瓦尔泰希¹¹竟胡说:《反杜林论》的发表,“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叫嚷“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李卜克内西在会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驳斥了杜林分子的恶毒攻击。

①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78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93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页。

他指出:《反杜林论》的发表“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①李卜克内西的发言,打击了杜林分子的嚣张气焰。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党内革命派的坚决斗争,嚣张一时的杜林主义被驳得体无完肤,迅速丧失其影响。杜林宗派集团也随之土崩瓦解。

二、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根本分歧。《反杜林论》的伟大意义

由于杜林的“体系”涉及到广泛的理论领域,全面地攻击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恩格斯为了批驳杜林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并在批判中阐明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得不涉及到广泛的领域。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②为了给杜林及其同伙以毁灭性的打击,恩格斯在论战中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他说:“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③使杜林受到“应得的惩罚”。^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对杜林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98—499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6页。

③④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9页。

主义作了极其深刻、极其全面、极其细致的揭露和批判。

(一)批判了杜林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在哲学上，杜林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把机械唯物论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混在一起，但是，始终贯穿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根本原则却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杜林的折衷主义哲学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所以恩格斯首先抓住它进行批判。

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的反映论相反，杜林鼓吹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从头脑里臆造了一个“世界模式论”来作为世界的模型。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已经有一个所谓“存在形式的基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不过是这些“原则”的应用，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就是他所谓的自然哲学；应用于人类社会，就是他所谓的精神哲学。恩格斯在揭露和驳斥杜林这一反动谬论时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①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人的思想虽然是人脑的产物，但决不是人脑自生的、固有的，也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人的思维和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因此，“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②毛主席进一步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③

①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2页。

③ 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把他的先验主义“原则”应用于自然界时所散布的种种谬论。

杜林用折衷主义手法,提出了世界统一于存在这一谬论。恩格斯在批判时指出,“存在”这一概念的含意,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唯心主义者完全可以把存在说成精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因此,“世界统一于存在”是杜林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概念,来代替明确的、肯定的概念的一种诡辩手法,实质上是鼓吹世界统一于精神。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①,这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杜林还鼓吹物质世界可以离开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谬论。恩格斯在批判时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只有唯心主义者和有神论者才会设想时空以外的存在,因为他们要给上帝的存在留下一个避难所。

杜林还胡说运动可以和物质相分离,并把运动只归结为机械运动。恩格斯在批判时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运动的物质。”^②而物质运动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还指出,运动和静止是对立统一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③,“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④

杜林在把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原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时,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炮制了反动的真理观、道德观、平等观、自由观等等,恩格斯逐一加以深刻的批判。

①②③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41、56、57、59页。

恩格斯首先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杜林认为,人们的认识并不依赖于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所以在他看来,人们一旦获得了真理,它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具有“至上的意义”。那么,谁能发现这些真理呢?只有象他那样的天才人物才能发现。杜林无耻吹嘘自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只有他才能发现“世界模式论”,发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有的“原则”,因此,杜林把他的“体系”称作“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反动的真理观时,科学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观。他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①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是一个从有限向无限不断发展、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的过程。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要受到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受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能力又是无限的,因为人类生活的无限的延续,使认识能力越来越发展,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恩格斯的这些著名论点,就是后来为列宁和毛主席所进一步发展了的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相互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主要论点。根据这个论点,象杜林那样,声称他所达到的认识是最后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真理,就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可笑的。恩格斯指出,确实有一些真理是永恒的和最后的,那大多是一些简单的事实或普遍的真理,但就人类认识的整体来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绝对真理,永恒真理。人类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但不能说已经达到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恩格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84页。

斯指出，杜林把他的“体系”说成是什么终极真理，这只能证明他的无知和狂妄自大而已。

恩格斯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批判了杜林鼓吹的超阶级的道德观和平等观。杜林把道德、平等看成超阶级的、永恒的。恩格斯在批判时指出，道德观念、平等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①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的。所谓永恒的、适用于一切阶级的道德原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至于平等，也是这样，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各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的平等观。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时期鼓吹平等，主张消灭阶级特权，实质上是要用资产阶级特权代替封建贵族特权；它宣布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掩盖着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它鼓吹的自由、平等，只不过是雇工自由、买卖平等，这都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③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的自由观，阐明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杜林把“自由”看作纯主观的东西，和“必然”完全没有关系。恩格斯在批判时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④恩格斯简明地叙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指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自由的迈进。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

①②③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90、91、104、111页。

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是使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恩格斯在论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时告诉我们，唯物主义反映论决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是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列宁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著名论断，是“十九世纪哲学的真正的进步”。^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痛斥了杜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恶毒攻击。林杜咒骂辩证法是个“粗糙的木偶”，是“神秘主义”、“欺骗手段”等，他还别有用心地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为一谈，并且根本否认矛盾的存在。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谬论时，给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指出它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②它同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还深刻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提出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③这一著名论断。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反动哲学体系过程中，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成为我们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批判了杜林唯心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

杜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暴力论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从人的本性引伸出来的，以“平等”、“正义”原则为基础的、所谓“经济的一般的自然规律”。但只是由于国家暴力的干涉，破坏了“平等”和“正义”原则，破坏了所谓经济的自然规律，才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了不平等的分配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下同），第 185 页。

②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139、117 页。

制度，因此，暴力是绝对坏的东西。杜林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好的，应该保留，只是分配方式不好，应该消灭，只要取消了暴力，坐等“正义”、“平等”原则的实现，就会消灭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他那理想的社会主义就实现了。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谬论时指出，所谓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以平等、正义为基础的经济的自然规律，完全是主观臆造的，是杜林从 18 世纪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里抄来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散布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能够改变不合理分配方式的幻想，借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用暴力来解释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的反动谬论。他指出，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剩余产品之后才出现的。因此，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绝不是政治暴力干预的结果。正相反，政治暴力倒是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它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和剥削者利益而产生出来的。恩格斯说：“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①当然，可以通过政治暴力掠夺别人的财产，奴役或剥削别人，但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本身决不是政治暴力所能创造的；在发生用暴力掠夺他人财产和奴役他人的地方，必然早已产生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了。近代资产阶级主要是靠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法而发财致富的。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暴力看成绝对坏的东西这一谬论。杜林在巴黎公社革命后抛出这一反动谬论，其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恩格斯在书中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阶级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157 页。

的具体的分析，指出反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暴力起着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而革命阶级手中的“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区分不同性质的暴力，支持和运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用革命的暴力来消灭反革命的暴力。杜林给工人們的“救世福音”是放弃革命暴力，坐等“普遍公平原则”的到来，这是极大的欺骗，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江湖骗子”杜林那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②

杜林别有用心地颠倒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把私有制的出现说成暴力干预的结果；否认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胡说分配方式的好坏取决于暴力是否取消，其要害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针对杜林的这些谬论，恩格斯强调说明，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的正确关系，使工人阶级懂得，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取得自己的解放。

（三）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杜林一方面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大肆谩骂，而同时又模仿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杜林声称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的自然体系”。它的基层单位叫做“经济公社”，社会是无数“经济公社”的联邦。所谓经济公社，按照杜林的说法，是“一群人的共同结构，他们根据处理一定面积土地及处理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所以相互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共同分配收入”。在这个社会里生产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而分配则是按照所谓公平原

①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81页。

则进行,按杜林的说法即“以等量的劳动交换等量的劳动”,使生产者得到“自身劳动的全部产品”。

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纯粹是乌托邦,因为它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上的,而是杜林的头脑中作为“最后终极的真理”编造出来的,当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公社之间和公社内部的阶级分化不可避免地仍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因为按照杜林的设想,工人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每个人可以随意处理自己的收入,并且保留财产或遗产的继承权,社会上还允许有无限制的商品流通和货币,各个经济公社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其结果当然是“除了大财政资本家复活起来之外,再无其它的目的”。所以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变种,只能是“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在这里,恩格斯阐明了只要存在商品交换和货币,就可能复活资本主义的光辉思想。他指出,在杜林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这就“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这样“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①恩格斯还指出:只要商品交换存在,“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②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时,还全面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恩格斯追溯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精辟地阐明了空想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

^{①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99、300、306页。

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那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因而只能是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积累了经验,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这些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总结了近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了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恩格斯还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它没有许下可以实现那些美好愿望的诺言,而是分析现代社会及其矛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和途径。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在于生产力摆脱资本主义占有的性质,在事实上成为社会生产力。这就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②因此,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和镇压资产阶级,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对立和差别,便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共产主义的实现将使人类历史跨进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解放世界的宏伟事业。恩格斯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

^{①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56、277页。

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①因此，识别真假社会主义，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揭穿杜林一类假社会主义政治骗子的谎言与诡辩，对于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全面阐述使它成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成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②近百年来，《反杜林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重要著作，是反对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强大的理论武器。

三、《非常法令》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在理论战线上打退资产阶级的新进攻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对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进行批判斗争的基础上，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断地增长。1876年党拥有23种报刊，到1877年就增加到41种；在1876—1877年的议会竞选中，党所得到的票数由1874年的35万5千多张增加到49万3千多张，增加了36%，这反映拥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劳动群众的增加。正如恩格斯所说：“选举的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计算我们的力量的工具”。^③德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统治阶级感到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扑灭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消灭德国的工人政党，于是借口1878年5—6月间发生的两次谋刺德皇威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0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③ 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1877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7页。

第一的事件¹² 诬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10月由议会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非常法令》规定:任何团体、报刊以及印刷品和集会,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概禁止;对这种团体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宣布戒严、逮捕和放逐被它认为是危及治安的“危险”分子。这样,德国党就被置于非法的地位,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1,300多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被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汉堡选了一个工人当国会议员,政府马上就宣布那里戒严。第一批从汉堡被驱逐的革命者大约有100人,另外还有他们的家属300多人。从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一年内,单单在普鲁士,以“叛国罪”、“叛逆罪”、“污辱皇帝罪”等而被捕入狱的就不下1,108人,因政治诽谤罪、侮辱俾斯麦或诬蔑政府等罪而被捕入狱的不下10,094人。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领导人由于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思想麻痹,对于统治阶级加强镇压缺乏警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准备,因此在斗争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一时惊慌失措,不能及时辨明方向,确定新的斗争策略,反而采取了投降主义的立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会党团中的拉萨尔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声明自行解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也一度发生动摇,李卜克内西甚至在国会演说中声称服从《非常法令》,并表示反对暴力革命。

党的领导的这一错误决定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失去了中央的领导,各地党组织之间也断绝了联系,没有任何的策略和组织计划,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一些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特别是一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不住考验,纷纷宣布退党。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赫希伯格¹³、施拉姆¹⁴和伯恩斯坦等三人，在瑞士苏黎世办了一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组成了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在敌人的压力下，宣扬投降主义的路线。乞求统治阶级的饶恕，主张把党改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以莫斯特、哈赛尔曼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主张采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恐怖策略，妄图把党的斗争引向另一歧途。

正当党处于危急混乱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大力帮助德国党克服混乱，渡过难关。他们坚决反对德国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投降主义立场，并把希望首先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党员群众身上。恩格斯指出：“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①事实也正是这样，尽管党的领导表现出了动摇，然而受到马克思主义长期教育的德国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却表现出了坚定的态度。他们很快地恢复了联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继续开展斗争。他们的行动对于纠正党的领导的错误起了重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积极支持广大基层党员群众的斗争外，还帮助德国党的领导正确地分析形势，制订正确的路线和策略。他们在致倍倍尔等人的信中，对党在《非常法令》颁布后应采取的方针、路线和策略作了明确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俾斯麦反动政府实行高压政策，这并不表明反动派力量强大，而是反映了它的虚弱。党既然已经失去了合法地位，就应该采取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要紧密地保持和发展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要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创办党的秘密刊物，要通过各种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并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帮助党贯彻正确路线和策略，就必须

^①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0年4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18页。

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特别是同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

苏黎世三人团的成员原“是最坏的杜林派！”^①1879年，他们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刊物上，抛出了一个名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极右纲领，鼓吹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象拉萨尔所说的那样有“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全面的党；工人阶级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因而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必须“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由“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应当以暴力革命吓跑资产阶级，党应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党用不着谈论最终目的，只需“一站一站地”进行改良，应当用“全部力量、全部精力”，在帝国议会内乞求地主阶级的施舍“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他们还无耻宣称《非常法令》是无产阶级政党招来的，因而党应该向政府忏悔，乞求俾斯麦取消这个法令等等。这个纲领是后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公式：“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的最初版本。

鉴于在当时的形势下，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给德国党带来的严重危害，马克思、恩格斯于1879年9月联名写了给德国党的领导机关内部传阅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以及其他一些信件和著作，对三人团的极右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三人团的宣言，彻底抛弃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取消革命和革命的党，完全陷进了投降主义的泥坑。他们坚定地声明：“将近四十年来，

^①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77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64页。

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① 恩格斯还指出，苏黎世三人团的文章表明，这三个人全都是最平庸的资产者，和平的博爱主义者。他说：“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抛弃我们高举了将近四十年的无产阶级旗帜，更不用说去赞成我们与之斗争了也将近四十年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② 马克思、恩格斯向德国党的领导人严正指出，应该把这些“冒牌货”和假革命清除出党。他们声明，如果德国党采纳三人团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就将与党的领导人公开决裂。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坚持原则立场的态度，表现了伟大革命导师高度的原则性和反潮流的革命斗争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把主要力量集中打击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首的一小撮“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恩格斯说，莫斯特象一面风向旗，风向略有改变，就搖来摆去。莫斯特原是杜林的狂热信徒，哈赛尔曼原是拉萨尔派的一个头目，他们原来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时却改头换面，以“左”倾机会主义的面目出现，反对任何合法斗争，鼓吹采取个人恐怖策略和立即进行暴动。他们还在自己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摘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②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79年9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7页。

掌握的报刊上肆意攻击党的领导人，并把党内的争端有意暴露在敌人面前，以达到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目的。马克思指出：莫斯特等人“已经不是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①恩格斯也指出：“俾斯麦指望，无政府主义者和杜林派的阴谋能瓦解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能引起他最希望的事——进行暴乱的尝试，而那时他就可以开枪了。”^②果然，不久他们就走上公开反党的道路，莫斯特于1879年9月在报刊上公开宣布组织新党。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既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议会迷”，又斥责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利用议会讲坛的“革命空谈”。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就注意到资产阶级议会制给德国党带来的危险，指出党的某些领导人“已患了议会迷病症”。^③他们对三人团的批判，也是对党的领导人的一次深刻教育。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广大群众的促进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导人，较快地克服了在《非常法令》开始时的动摇，并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展开了斗争。正如列宁所说：“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他们的首领是倍倍尔）很快就认识到各种‘新’理论的全部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论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企图一刀两断。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下，学会了把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结合起来。”^④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相继恢复。党在瑞士创办了秘密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每

①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49页。

②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7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9页。

③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1页。

④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4页。

周有一万份秘密运往德国。这份报纸在《非常法令》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指导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鼓舞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有力工具。党还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如通过组织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和养金丝鸟协会等各种合法组织来掩护党的活动。党还继续利用俾斯麦为装饰门面而实施的普选权，把自己的候选人选进国会进行合法斗争。1880年在瑞士的维登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地下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动摇和混乱时期。大会对《哥达纲领》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删去了“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的错误观点，而决定改为党将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大会决定把半无政府主义集团的头子莫斯特和哈赛尔曼等人清洗出党。恩格斯在回顾这一场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时指出：“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驯服的、有教养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①

党的维登代表大会以后，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议会党团为据点，仍旧企图以改良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代替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把党变成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变成俾斯麦的御用工具。他们一有机会就宣扬对普鲁士国家的迷信，散布和平过渡的幻想，并摇尾乞怜地哀求俾斯麦废除非常法。党内一些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一直把党的报刊作为自己取得稿酬的来源，恩格斯形容这些人好比从“奶牛”身上取得“黄油”，由于非常法的实行，他们失去了稿酬，因而垂头丧气，也把希望寄托在俾斯麦发善心上面。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揭露了这伙人的丑恶嘴脸，号召一切革命者应该坚持斗争，“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2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27页。

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①

鉴于德国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人对国家的阶级本质认识不清,而资产阶级和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从拉萨尔到杜林,从苏黎士三人团到80年代德国议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等)又一直大肆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胡说国家是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等等。恩格斯于1884年3—5月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运用大量科学的历史资料,分析了国家的起源,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从理论上对形形色色的超阶级国家观和议会迷给予沉重的打击。针对机会主义者对议会制度散布的幻想,恩格斯深刻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②他还指出,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但是,“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③

在80年代中期,恩格斯还同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随着德国和欧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哲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德国地主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加强镇压的同时,还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发起新的进攻,妄图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打着宣扬所谓“新”哲学的旗号,把早已破产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各种废物加以改头换面搬了出来。当时

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3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

②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169页。

影响最大的是新康德主义¹⁵。新康德主义者在“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下,排除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拚命宣扬和发展康德哲学中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们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来攻击,并污蔑马克思主义哲学抄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企图混淆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

恰恰这一时期,在英国、瑞典和挪威等国,又有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大加宣扬,使它“好象有点要复活的样子”^①,以此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新康德主义作为他们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依据。他们宣扬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的辩证法,为其鼓吹改良主义、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反对暴力革命作辩护;他们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推行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辩护。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光辉著作,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联系和本质区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联系和本质区别;批判了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观点,批判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恩格斯在论述黑格尔的哲学时指出,辩证法是它的“合理内核”,但却被反动的唯心主义体系所束缚,马克思批判和抛弃了黑格尔反动的唯心主义体系,将他的辩证法思想加以革命的改造并与唯物主义世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

界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标准，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唯物主义者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者则与此相反。恩格斯在论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时，揭示了它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是以纯粹机械的原因去解释一切现象；它是以形而上学的即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观察客观世界；它没有也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恩格斯还着重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唯心史观，指出“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②恩格斯在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深刻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的原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原理；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既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对经济基础给予反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粉碎了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新进攻。

马克思、恩格斯在 80 年代所从事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大大武装了各国无产阶级。德国党在《非常法令》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等党的领导人领导无产阶级同反动统治阶级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胜利的斗争。列宁在悼念德国革命活动家保尔·辛格尔时指出：“在实行反社会党人特别法期间，辛格尔同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否认国会斗争的‘年轻的’半无政府

^{①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9、236 页。

主义者，又反对温和的‘顽固不化的合法主义者’。”^①正因为如此，德国党在《非常法令》时期不仅没有削弱、瓦解，反而进一步发展壮大。恩格斯十分形象地说，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两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恩格斯早在《非常法令》开始实行时，就预见到它将起反面教员作用，指出“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象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②俾斯麦采取种种白色恐怖手段，“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③事实证明恩格斯预见的正确。倍倍尔也曾指出：非常法实施的结果，“被击败了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俾斯麦”。^④

德国党在非常法时期所获得的成就，博得了欧美先进工人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普遍赞扬，使德国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继续处在前列地位。

① 列宁：《保尔·辛格尔》，《列宁全集》第17卷，第76页。

②③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

④ 《倍倍尔自传》，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页。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在欧美各国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为欧美各国党的革命化而斗争

一、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建立

19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的迅速发展和垄断趋势的不断加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日益深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在这一期间,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越出了西欧和美国的范围,扩大到了东欧和其它洲的一些国家:俄国、波兰、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和捷克以及塞尔维亚等国的工人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南非联邦在 1887 年出现了工人运动;亚洲的日本和印度也出现了早期的罢工斗争。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无论就规模和斗争激烈程度来说,比 50—60 年代有了进步和提高。既有分散的地方性罢工,又有全国性的总罢工;既进行经济斗争,又进行政治斗争,有时甚至发展到和资产阶级军警发生冲突的地步。

当时,德国工人运动走在最前列,法、英、美等国次之。俄国的工人运动虽然比德、法、英、美等国开始为晚,但从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在 70 年代,据不完整的统计,俄国共发生过 326 次罢工和骚动;到 80 年代增加到 446 次。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俄国的建立。

各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显著地提高了组织性和团结性。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工会组织。在 70—80 年代,工会组织在很多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先进工人

建立全国性工会的种种努力，从行业工会形式前进到产业工会形式，许多非熟练的工人，女工和农业工人参加工会组织等等，都显示了欧、美各国工会运动的进步。在工会运动和罢工斗争中，英、美、法等国无产阶级争得了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美、法两国的男工全部获得了选举权，英国的部分男工也获得了选举权。此外，经过多次罢工斗争，长达 14—16 小时的工作日有所缩短；童工和女工的恶劣待遇得到了一些改善；在英国还制定了许多有关工厂的立法，等等。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巩固了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在 80 年代里，《共产党宣言》在欧美已用 12 种文字出版，在许多国家重版过多次。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恩格斯于 1880 年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的三章改编成通俗读物《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出版。在短短 12 年中，该书就以 10 国文字畅销欧美各国，德国在《非常法令》时期也印了 4 版，约 2 万册。恩格斯说，在德国“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的畅销”；“由于帝国政府的照顾，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①

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的广泛传播，大大提高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水平，使从前那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宗派福音和万灵药方，都逐步被工人所抛弃。例如 70 年代初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在罗曼语系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到 80 年代，“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6 页。

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①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各国还出版了许多工人报刊。它们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启发无产阶级觉悟、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侵蚀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这些报刊了解和指导各国工人运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德、法、美、英、俄等国涌现出了一批革命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德国的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和保·辛格尔；法国的盖得¹⁶和拉法格(1842—1911)；美国的左尔格¹⁷；英国的艾威林、爱琳娜和奎尔奇；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革命活动非常关心，经常教导他们决不能把革命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要注意把宣传工作和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很多国家的先进分子在本国做了许多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工作。他们创办报刊，组织工人学习会，向工人群众作通俗的演讲，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出版他们自己的著作。其中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874年)，拉法格的《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懒惰的权利》，盖得的《共和国与罢工》(1878年)、《集体主义与革命》(1879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等等，在当时都对无产阶级起过良好的教育作用。

在工人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础上，欧美这一时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国家有：美国(1877)、西班牙(1879)、法国(1879)、意大利(1882)、英国(1884)、比利时(1885)、

^①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1—462页。

挪威(1887)、奥地利(1888)、瑞士(1889)、瑞典(1889)。俄国 1883 年也建立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

整个说来,8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恩格斯在 1885 年满怀豪情地指出,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壮大到如此地步,“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它现在已经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无论是法国激进派¹⁸、俾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胆战心惊的力量”。^①

二、法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主义同“可能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巴黎公社革命遭到血腥镇压之后,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到 70 年代后半期又发展起来。1876 年,当公社的保卫者还在继续遭到枪杀时,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就在巴黎召开了。到 80 年代,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产业工人的增加,工人罢工的次数和人数也不断增加。这时期最大的一次罢工是 1886 年在得卡斯威尔煤矿爆发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六个月,成为当时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议题之一。众议院为此曾经开展过激烈的争论,结果在众议院里第一次组成了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工人派。恩格斯认为,工人派的形成,是 1886 年可以与美国工人“五一”总罢工相并列的**第二个大事件**^②,因为他表明法国的工人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

在 70 年代末法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的基础上,1879 年建立了法国工人党,1880 年 4 月,马克思、恩格斯曾亲自帮助该党领导

① 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99 页。

②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 年 4 月 2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70 页。

人茹尔·盖得、保尔·拉法格拟订了党纲。盖得、拉法格等是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1880年5月指出：“法国的情况也很好。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在那里正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在宣传这种观点方面做得最好的，主要是不久前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些人，他们已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了”。^①1880年11月，法国党在哈佛尔大会上，通过了马克思帮助起草的党纲，马克思对此非常重视，把这件事看作“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开端。^②但是在党纲通过后不久，党内以马隆¹⁹、布鲁斯²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起来反对这个纲领，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他们要求取消党纲上规定的党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认为只要提出一些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到的要求就够了。他们认为，在纲领中积极的革命要求会妨碍党在选举中得到更多的选票。他们主张把工人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城市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机关方面。他们公开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要求党的每个地方组织拥有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随意修改党纲和“自治”的权力。总之，他们是要把法国工人党改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把无产阶级的活动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可能”的范围内。因此被称为“可能派”。马克思痛斥他们是一些“骗子手”。^③

马克思、恩格斯支持法国工人党中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同可能派进行的坚决斗争。在法国工人党188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可能派利用各种卑劣手段，在112个代表名额中，窃取了86个名额。在代表大会上，可能派利用其控制的多数推行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0年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22页。

②③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1页。

他们的改良主义路线。盖得派为了坚持原则，同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不得不退出大会，在卢昂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继续坚持党的革命纲领并保留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可能派则把自己的分裂组织叫做“社会主义工人同盟”，他们拟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法国工人党的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件好事。恩格斯在 1882 年 10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① 恩格斯还指出：“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② 法国工人党分裂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使恩格斯得出明确的结论：“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

^{①②}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 年 10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33—434、434 页。

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① 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内开展路线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壮大的规律性。

对于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的党，恩格斯认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他们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東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而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恩格斯还无情揭露了可能派的反革命手法，指出马隆和布鲁斯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共谋者（他是十七个创始人之一）。他们这时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保留了巴枯宁的阴谋手法，他们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使用了撒谎、诽谤、阴谋诡计等一整套反革命策略。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帮助下，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在 80 年代同可能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 80 年代末，可能派纠集英国的机会主义势力妄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恩格斯又领导各国革命派同可能派的这一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三、19 世纪 70—90 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社会劳工党宗派主义的批判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很快。1860 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 1894 年已跃居第一位。从 1859 到 1899 年的 40 年中，美国工人增加了 6 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1873 年的经济危机，

^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2 年 10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32 页。

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苦难。1874年末，美国宾夕法尼亚矿工举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罢工。1877年爆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是7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重大事件。这次罢工是由于资产阶级降低三条通往美国西部铁路干线的职工工资10%而引起的。这次罢工使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和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的主要路线全部瘫痪，几个城市一度被工人占领。资产阶级惊呼“这是一次叛乱，一次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十分高兴，指出美国“废除奴隶制总共不过十二年，而运动已经这样猛烈！”^①

8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本地土生土长的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也都参加了罢工斗争，斗争的主要内容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因为当时美国工人每天劳动长达14—18小时之久。加上1883年经济危机使劳动群众生活更加困难，资本家趁机解雇工人，降低工资，从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举行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40多万，使得火车停驶，主要工业部门瘫痪，给美国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尤其在芝加哥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激烈。5月3日，资产阶级打死6名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无比愤怒。工人决定5月4日举行抗议大会，参加者约3,000人，在大会进行中，反动军警又进行镇压，当场杀害杀伤工人200余人，数百人被捕。反动政府判处7个被捕工人领袖死刑，他们在法庭上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警告资产阶级说：“你们在这里踩灭一粒火星，但在那里，在你们前后，在各处，烈火正在燃烧着，这是来自地层的大火，你们无法把它扑灭。”他们的正义斗争得到国内外无产阶级的有力支援。

1886年5月1日的罢工运动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大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63页。

的意义。恩格斯在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①为了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通过一项决议：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以示威游行、集会等方式庆祝五一节。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检阅自己力量、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战斗节日。

对于美国的工人运动，恩格斯非常关心，他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社会劳工党身上。

三个派别中，当时力量最大的是劳动骑士团，该组织于1869年成立，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主要成员是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该组织领导权掌握在改良主义者手里，它以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为目的。1886年美国工人运动高涨时期，该组织大大发展，拥有会员70多万人。恩格斯指出，这一派对运动的现阶段来说是最典型的，同时无疑也是最有力的。这是一个以无数“集会”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巨大团体，它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②这些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群众参加运动的事实，是当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个运动起初摸索前进，没有明确的目的，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一切是会得到解决的。恩格斯把劳动骑士团比作“一块正在涌起正在发酵的由可塑性材料构成的实体”^③这样的组织，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以便引上正确的道路。

第二派是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当时主要是地方性的。亨利·乔治鼓吹改良主义，鼓吹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然后出

①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6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82页。

②③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9页。

租给单个的人,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实际上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派势力较小。

第三派是美国社会劳工党(又名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前身是1876年由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左尔格与拉萨尔分子阿道夫·斯特拉赛等人联合组织的美国劳动人民党,1887年改名为社会劳工党。这个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早在1871年,马克思就曾向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危害性。他说:“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① 8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社会劳工党的宗派主义错误,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严重障碍。恩格斯对该党寄予很大希望,对该党领导人所犯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这个党的长处是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因而使这个党负有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而该党存在的宗派主义恰恰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主要障碍。由于该党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的侨民,其中大多数都不懂美国通用的语言。该党领导人又拒绝在劳动骑士团和工会中进行工作,讥笑它们落后。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是当作教条。恩格斯尖锐指出,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要改变这种状况,“它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② 对劳动骑士团这样的组织,社

^①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②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90页。

会主义者“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① 恩格斯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 恩格斯要求美国社会党人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与工人群众性的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促使落后的组织革命化；不要犯急性病而埋怨群众落后，而应当相信，当运动真正发动起来以后，群众在斗争中就会迅速地提高觉悟。恩格斯说：“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③ 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告诫美国社会劳工党，要是德国人参加运动，对运动有所帮助，或是促使它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也许会大有用处，并在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要是袖手旁观，他们就会蜕化成为一个教条主义的派别，被别人看做不了解自己原则的人而撇在一边了。但是恩格斯所提出的建议和期望没有能够实现。美国社会劳工党由于受到党内拉萨尔主义者的控制和宗派主义者德里昂的统治，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它已经完全不能发挥一个美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作用了。

四、英国 80—90 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对英国社会党人的宗派主义和费边社改良主义的批判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工人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一个国家。但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影响，英国工人运动长期发展迟缓。

尽管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和 70 年代末英国工业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的开始丧失，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

^{①③}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8 页。

^②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 年 1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60 页。

压榨和剥削，70—9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仍是向前发展的。

70年代初，英国“农业工人的运动有所进展”。^①从1872年3月起，英国中部和东部一些郡的农业工人为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展开了斗争。1872年5月成立了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至1873年底会员大约有10万人。这场斗争持续到1874年，在许多郡斗争都以罢工者取得胜利而告终。

8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以及受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英国也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组织。1881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2)建立了民主联盟，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联盟。同年，该联盟分裂，另外组成了一个有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1855—1898)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1851—1898)等革命活动家参与领导的社会主义者同盟。

由海德门把持的社会民主联盟一开始就采取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政策。他们借口工会头头落后和反动而拒绝在工会中工作，拒绝争取黄色工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借口工人不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而拒不支持他们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拒不参加工人的罢工运动；他们并且打着所谓忠于“真正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旗号来掩盖其宗派主义错误，把他们控制的组织变成一个脱离工人群众的宗派团体。海德门本人则是一个剽窃马克思的著作并把它庸俗化和怀有个人野心的无耻之徒。恩格斯指出，海德门一伙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家，而是“把一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②，“是撒谎者和骗子手”。^③社会民主联盟的多数成员都是资产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4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1页。

②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6年4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2页。

③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5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4页。

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少数革命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工联主义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哈利·奎尔奇(1858—1913)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正如列宁所说:“在那些不屈不挠、满怀信心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的人们中间,奎尔奇走在最前列。”^①

1884年从社会民主联盟中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由于爱琳娜、艾威林等遵照恩格斯的指示,在工人群众中展开了一些革命活动,他们在伦敦东区工人中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参加工人的罢工运动,使该组织在工人中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不久就有无政府主义者混入,同盟的多数领导人对工人运动也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政策。恩格斯一再告诫他们要注意改正这方面的错误,注意外界的活生生的运动,否则就会把整个事情弄糟的。后来无政府主义者篡夺了同盟的领导,爱琳娜夫妇等就退出了同盟,该组织于1890年瓦解。

恩格斯在反对英国社会党人宗派主义的同时,还对费边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费边社是1884年由韦伯夫妇²¹和肖免伯纳²²等人建立,以纪元前三世纪古罗马一位主张等待时机、避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团体,它是在英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日益普遍的时期出现的。它企图把无产阶级引离革命,引离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者污蔑无产阶级是一群粗鲁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争求得解放;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应该等待资产阶级的降福和他们这批衣冠楚楚的律师、学者和多情善感的女士们的恩赐。费边主义者主张所谓“市政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当是通过地方自治的选民投票,民主选出地方自治的市政机关和

① 列宁:《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0页。

政府,并由市政机关逐步掌握自来水、电灯、电车等公用事业的所有权,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费边社的市政社会主义所抱的目的就是要说服百万富翁懂得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感化和说服资产阶级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费边社“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①“费边社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②费边社的改良主义理论的实质,就是鼓吹社会和平,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妄想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某些社会改革,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在地方自治等细小问题上兜圈子。费边社的根本要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是“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③列宁也指出:费边社是“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④

恩格斯既批判了英国社会党人的宗派主义,又批判了费边社的改良主义。鉴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者同盟都没有朝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方向前进,恩格斯就特别注意英国下层工人的活动,关心和帮助同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革命活动家。他写道:“艾威林正在伦敦东头进行出色的宣传活动。……他和杜西(即爱琳娜。——编者注)起劲地工作。这直接关系到建立一个具有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2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43页。

② 《弗·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33页。

③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页。

④ 列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7页。

独立阶级纲领的英国工人政党的问题。”^①

80年代末，由于1884—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欧美工人运动的影响，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经济危机使得造船工业部门每4个人中就有1人失业，码头工人一星期只有几小时工作。广大的非熟练工人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是这一时期英国工人运动的显著特点，他们纷纷组织新的工会组织，如煤气工人联合会、码头工人联合会等，因而这时期被称为新工会运动的时期。他们抛弃了老工联的“防卫而不挑战”的旧口号，积极展开罢工斗争，组织示威游行与集会等。1888年参加罢工的有11万9千人，1890年达到39万3千人。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6万余人举行大罢工，使整个泰晤士河畔的装卸全部陷于瘫痪，在50里长的码头上有1万6千工人巡回纠察，最后迫使资方让步，取得罢工的胜利。1890年5月4日，英国无产阶级在伦敦举行了庆祝五一节的大示威，参加的工人达20万，他们要求在所有工业部门中实行8小时工作日，示威结束时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70岁高龄的恩格斯同工人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和集会。爱琳娜、艾威林和法国的革命活动家拉法格都在集会的各个讲坛上分别发表了演说。与此同时，欧美大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也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恩格斯当天兴奋地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今天……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②

①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7年5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34页。

②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17—18页。

列宁在谈到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时指出：“1889年，英国开始了年轻的、新鲜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工人运动，参加运动的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工人等）。恩格斯对这件事感到特别高兴。”^①

*

*

*

从马克思、恩格斯为法、英、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化而进行的斗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既反对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针对英、美社会主义政党的状况，他们主要反对了宗派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中“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这就是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旺盛强大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②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英美等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为各国革命者指明了方向。

第四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前期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斗争

一、第二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第一国际于1876年解散后，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伟大思想仍

^{①②} 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9、346页。

然铭刻在各国工人的心坎中。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些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曾试图要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组织,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而没有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非常注意。他们认为新的“国际”应该比第一国际有更高的要求。恩格斯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①显然,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在这期间过早地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广大地区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迫切需要加强指导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由于长期过度的工作和劳累,身患重病,于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寓所与世长辞了。这个悲痛的消息传出后,整个欧洲和美洲,从俄国的西伯利亚矿井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千百万无产阶级无不对马克思表示尊敬、爱戴和追悼。

恩格斯在葬仪上发表了极其动人的墓前演说,对于马克思伟大的一生和他对国际无产阶级所作出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作出了极其恰当的评价。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②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有两大发现:“正象达尔文²³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②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①正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才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是永垂不朽的。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②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方面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以极大的努力从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3卷的整理和出版；另一方面他还肩负着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和准备建立新的“国际”的巨大工作。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德国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地开展了反对俾斯麦《非常法令》的斗争，并取得节节胜利。1886年美国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工人运动。同年法国工人的大罢工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英国大批非熟练工人日益觉醒，开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俄国、奥匈帝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工人运动也日益开展起来。

这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资本论》第一、二卷、《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以许多国家文字出版。马克思主义“已远远超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

^{①②}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575页。

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①

这时期，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已经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起来。“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②

这时期，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所有这些，说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1887年德国党的圣加伦代表大会通过了在最近期间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法国工人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他们的行动都非常迟缓。

当革命派着手筹建新的国际组织时，以马隆、布鲁斯等为首的法国“可能派”纠合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等组织于1888年在伦敦召开了所谓“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并决定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国际。“可能派”及其伙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窃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国际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轨道，走改良主义的邪路。

当时最有影响的德国党的领导人，对于“可能派”的阴谋认识不清。他们对“可能派”的倡议感兴趣，公然停止了自己原定的筹建工作去与“可能派”进行谈判；有人甚至还主张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在这重要时刻，恩格斯毫不迟疑地放下其他工作，全力投入反对“可能派”和领导建立新的“国际”的斗争。列宁在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恩格斯（他当时已经六十八岁了）象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当时不仅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抨击，而且李卜克内西和倍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反杜林论》，第7页。

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439页。

倍尔等等德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调和态度而受到了抨击。”^①对于“可能派”，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而他们的策略也是过去的那一套，“是以同样的造谣诽谤来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②，他们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因此，与“可能派”的斗争实质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的领导人终于积极行动起来。1889年2月在海牙召开了预备会议，决定在同年7月，即“可能派”开会的同时，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以便在两个大会对照之下，让工人群众识破“可能派”的机会主义本质。

1889年7月14日，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两个对立的大会同时在巴黎召开。改良派召开的大会，在550多名代表中，法国人竟占477名。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国际代表性的会议上，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新的国际组织。革命派召开的大会，有来自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其中很多人是各国工人运动的著名的活动家，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但是，在革命派的代表大会上，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等国的代表和一部分英国的代表（其中多是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迷信形式上的团结，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同“可能派”的大会合并。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的代表和一部分英国的代表反对无原则合并。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李卜克内西发言反对“不惜任何代价”实行合并的主张，但他提出的决议草案采取了含混不清

①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700页。

②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6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6页。

的折衷态度,其中说:只有“另一个大会的代表通过的决议能为我们大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两个大会才有合并的可能和希望。多数代表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但是“可能派”的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提出要审查对方代表资格作为合并条件。这样,合并没有实现。

恩格斯因为忙于《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工作,没有出席大会,但对大会非常关心。当他得知有人主张无条件合并时立即提出警告说:“在合理条件下的联合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人受这种热潮影响,却高喊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联合。”^①当调和主义的合并计划失败后,恩格斯高兴地写道:“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②

革命派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粉碎了“可能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宣告了第二国际的诞生。恩格斯指出:“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得更惨。”^③

“可能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在1891年8月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又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擅自发出邀请书,再次企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当时,恩格斯考虑到“可能派”影响已经削弱,考虑到在联合召开的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有把握占优势,同意和“可能派”一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恩格斯在1891年8月15日给李卜克内

①③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9年7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2、242—243页。

②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9年7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

西的信中说,因为有可能在合理的原则上联合召开大会,那时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在大会上发言,这样,“可能派”及其少数拥护者的错误观点将暴露无遗,以至连英国人(新工联)也不会理他们了。

在布鲁塞尔大会召开之前,两派在德国的哈雷举行了筹备协商会议,“可能派”被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大会议程。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可能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又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可能派”的头面人物都不敢出席大会,只派了一些次要的人来,因此他们在大会上实际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国际在同“可能派”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他们不断补充到工人队伍中去。无政府主义者依靠这个阶层扩大其影响,兴风作浪。无政府主义者不注意群众斗争的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当他们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他们反对利用合法手段积蓄革命力量,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党的作用。他们主张随时采取“直接行动”,以国际总罢工的办法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或不顾客观条件随时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时革命时机还不成熟,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利用一切手段积蓄力量,以准备未来的决战。因此,无政府主义思潮成为当时阻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障碍。当时无政府主义,以法国的工团主义²⁴、德国的“青年派”和荷兰的纽文曷斯分子等为代表。

从第二国际成立到1896年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这段时期中,第二国际各国党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讨论关于国际劳工法和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

爭时，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要求大会宣布放弃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他们在极“左”的词句掩盖下，反对工人争取 8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议会斗争。大会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论调，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国际劳工立法决议草案，决议正确指出必须运用一切手段回击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在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中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为夺取政权而奋斗。这是正确的。但在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决议避开了暴力革命，极错误地提出“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制度下夺取政权”。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会上有的人是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去反对无政府主义并支持大会的决议的。例如英国代表凯尔·哈第²⁵公开说，争取 8 小时工作制比一切革命更有价值。奥地利代表阿德勒²⁶宣扬“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让无产阶级放弃革命斗争。大会对这些机会主义谬论却没有进行批判。这说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一些领导人一开始就没有和右倾机会主义完全划清界限。

1891 年 8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态度问题，第二国际各国党同无政府主义者又展开了斗争。为什么这时期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问题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和当时国际形势密切相联的。欧洲自 1871 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时刻想“复仇”，恢复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而德国俾斯麦政府则企图进一步削弱法国，称霸欧洲，他们都疯狂扩军备战。当时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宪兵。它由于同英国争夺西亚、中东地区的矛盾加剧，不得不一度与德国结盟，对抗英国；但它又害怕德国势力的扩大，

竭力反对德国进一步打击和削弱法国的政策。80年代以后，沙皇俄国逐渐同法国接近，并于1891年缔结谘商协定，规定遇有战争危险时，双方共同协商对策。1892年，双方又缔结了军事协定，结成同盟。德国为了对抗法、俄接近，也利用奥国、意大利同俄国的矛盾，结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这样，从90年代开始，欧洲两个敌对的军国主义集团逐渐形成，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沙皇俄国是当时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危险，是国际工人运动最凶恶的敌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国际讨论了各国工人政党对待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态度问题。会上，荷兰无政府主义者纽文曷斯等主张，不论发生何种战争，社会主义者应该不顾条件地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国际性的总罢工。大会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提案，通过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草案。指出：军国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联系的，只有建立起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结束军国主义。大会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好战企图，努力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事业，以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次大会上，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仍未得到批判。如不少英、法代表散播了对罢工的恐惧，认为罢工是一种“两面有刃的武器”，它能伤害敌人，也会伤害自己。他们反对用罢工手段对付统治阶级。

1893年8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政治斗争的错误观点，并且在筹备会议上通过了不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决定。1896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则从组织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第二国际。但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合法迷”、“议会迷”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继续在大会发言和决议中反映出来，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

革命导师恩格斯一贯支持第二国际对无政府主义的坚决斗

争。恩格斯在谈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指出：“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是很好的：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①恩格斯还对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青年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所谓“青年派”，原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于1890年最后形成。它主要是由一些自称是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的学生和年青作家所组成。其主要头目是保·恩斯特²⁷等人。他们无视德国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讲坛，攻击党奉行着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路线。“青年派”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力图要党进行半无政府主义的冒险活动，并且胡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恩格斯严厉谴责了“青年派”的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②恩格斯指出，“青年派”的实践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③针对青年派分子无耻地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他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

① 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1页。

②③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却是跳蚤。’”^①为了挽救和教育“青年派”的某些成员，恩格斯诚恳地告诫他们：如果他们希望真正能有所作为的话，就不要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就不能认为自己目前所达到的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要注意吸取经验教训。针对“青年派”知识分子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等特点，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 and 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②经过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青年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改正了错误，而另一部分则继续顽固地坚持他们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对坚持错误的“青年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青年派”的头目拒绝服从党的决议并示威性地退出党代表大会，最终和党分裂，完全滚到了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了，从而“青年派”在党内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了。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支持第二国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时，敏锐地看到一股右倾机会主义逆流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滋长。因此，他既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把主要锋芒指向右倾机会主义。早在1890年3月，恩格斯在给威廉·李卜内克西的信中，就批评了他把任何主张革命暴力的人都

①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②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2页。

当作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他指出：“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不能接受的。”^①1891年上半年，恩格斯更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上面，这就是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废除后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

二、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废除后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

在德国统治阶级推行反动的《非常法令》的12年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执行了正确路线，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把非法的活动与合法的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影响越来越大。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1889年5月鲁尔区的10万矿工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震动了全国，其它地区的工人纷纷响应，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1888年登位的威廉二世，眼见俾斯麦残暴镇压工人运动的赤裸裸的手段已经失灵，《非常法令》实际已经破产，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1890年1月25日，德国议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再次延长《非常法令》的提案。3月20日，俾斯麦被迫“辞职”；9月30日《非常法令》期满，从10月1日起该法令被废除。

《非常法令》的被废除，俾斯麦的被迫下台，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多年来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党人粉碎了非常法，他们把俾斯麦赶下了台”。^②

①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0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62—363页。

② 恩格斯：《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55页。

《非常法令》废除后，德皇威廉二世宣布要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1891年德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星期日休息、关于禁止学令儿童做工、关于最大限度劳动日为11小时、关于产妇休假制度等方面的法令，企图以此蒙蔽工人的耳目，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平息”工人运动。

统治阶级在策略上的改变，使党内的机会主义猖狂起来：一方面是“左”倾无政府主义的所谓“青年派”在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在滋长。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的同时，对于日益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主要危险的、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1850—1922)出身于慕尼黑的一个官僚家庭，普法战争时投效德国军队，1875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79—1880年担任党在苏黎世出版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福尔马尔为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政策所迷惑，为党在议会斗争中的成绩冲昏了头脑，提出了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从而成为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福尔马尔美化统治阶级，宣扬阶级合作。他认为统治阶级废除《非常法令》，实行“自由主义”的改良政策，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认为统治阶级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因此，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就应当“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

福尔马尔鼓吹议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福尔马尔声称，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的，因而改良、妥协最为有利，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将是“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

福尔马尔鼓吹的这些机会主义观点，实际并不是什么新的货色，不过是拉萨尔主义的翻版而已，却得到德国党内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奥艾尔²⁸、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支持。甚至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也谈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股右倾机会主义逆流在新的形势下威胁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健康成长，而且势必要影响即将着手进行的德国党新党纲的制定。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它的纲领对第二国际各国党都具有很大影响，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击这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那末不仅德国党的新纲领不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并且将严重地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了迎头痛击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议会主义，年迈的恩格斯在1891年上半年以惊人的毅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先后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以高屋建瓴之势，向议会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恩格斯首先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坚持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鉴于哈雷代表大会已经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一战斗著作公诸于世，使广大党员群众了解马克思对拉萨尔和充满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的立场和观点，认清拉萨尔的真面目，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及其变种福尔马尔议会主义的界限。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一是德国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反对公开发表，因为“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①而倍倍尔则担心公开发表会给敌人提供武器，也不赞成公开。二是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包括一些老拉萨尔分

^①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1—2日），《哥达纲领批判》，第60页。

子)百般阻挠,他们公开声明反对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三是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²⁹ 主编考茨基最初也反对发表。恩格斯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定表示:“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①“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②恩格斯斩钉截铁地对考茨基说,如果《新时代》拒不发表,我就要在维也纳发表,“无论如何总是会刊印出来的。……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③经过恩格斯的坚决斗争,1891年1月,考茨基被迫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引起了党内极大的震动,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热烈拥护,他们感谢恩格斯“为党做了这件事”。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影响,维也纳《工人报》指出:恩格斯“正是在现在,正是在需要十分明确地、毫不妥协地确定我们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刻,把这一《批判》公诸于世”。

但是,《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后,也引起公开的和暗藏的机会主义者的狂怒。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格里林伯格竟在议会讲坛上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考茨基被迫发表后又进行猖狂反扑,在《新时代》上叫嚷:“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

为了进一步打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在1891年3月,利用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的时机,再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

①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1—2日),《哥达纲领批判》,第63页。

②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哥达纲领批判》,第57页。

③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月7日),《哥达纲领批判》,第45页。

战》一书，并写了一篇重要的《导言》。这是恩格斯为回击和批判议会主义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他精辟地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①恩格斯还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深刻地批判了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议会迷。恩格斯强调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②

1890年10月，在哈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后，李卜克内西等人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出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准备提交预定在1891年10月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讨论。恩格斯在同年6月中旬收到这份“草案”后，认为新的党纲草案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却仍然包含了议会主义、合法主义的观点。为了使党的纲领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恩格斯于6月底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文。这是恩格斯为批判议会主义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

恩格斯在该著作中批判了纲领草案作者由于害怕反动政府恢复《非常法令》而不敢在德国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他指出，在德国，皇帝和政府拥有无上的权力，而议会不过是专制制度的一块遮羞布。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应该是党的最迫切的政治要求，因为首先争取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进一步夺取政

①②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13页。

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痛斥了党内议会主义、合法主义的谬论，批判了那种鼓吹“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①的滥调。他指出：“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②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暴力革命的道路，“炸毁”旧的国家机器。

恩格斯还揭示了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和策略的特点及其危害。他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③

恩格斯在 1891 年上半年内所采取的上述重大措施，沉重打击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首先是德国党内的议会迷，又一次深刻教育了各国党的领导人和广大群众。德国党在 1891 年 10 月召开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正是由于恩格斯为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议会主义提供了锐利武器，指明了方向，所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等党的领导人在会上既反对了“青年派”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了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议会主义并使其陷于孤立。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巧妙地运用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纲领比《哥达纲领》和不久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 年 6 月 2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19—120 页。

②③ 恩格斯：《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4、273 页。

前拟定的纲领草案都前进了一大步：它删去了拉萨尔派的谬论，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党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原理；它明确地指出，为了对社会进行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但纲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仍然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等。爱尔福特纲领后来成为第二国际各国党制定党纲时的范本。

由于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胜利进行了反对议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曾高兴地说：“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指《哥达纲领批判》。——编者）发挥了充分的作用”。^①列宁在谈到德国党 90 年代初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时也指出：“这次党内危机所以历时很短，而且并不严重，应当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有莫大功劳的，因为他们给予了两方面的动摇以最坚决的反击。”^②

90 年代初德国党内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肃清。恩格斯在 1895 年逝世前，始终注意到和平发展时期右倾机会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害，并抓住一切机会，继续对议会主义、合法主义展开批判。1892 年 2 月，恩格斯痛斥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学者卓·博维奥对他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恶意歪曲，指出：“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③1892 年 6 月，考茨基在

①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 年 10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80 页。

②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95 页。

③ 恩格斯：《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27 页。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中，鼓吹“革命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散布和平过渡的谬论，同年7月，恩格斯利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版的机会，在德文第二版序言中狠批了右倾机会主义。他指出：“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①

1893年8月，恩格斯在唯一亲自参加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一方面豪情满怀地回顾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指出：“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



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图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苏黎世近郊合影，左起第二人是恩格斯，左起第三、四人是倍倍尔夫妇。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7页。

界发抖的强大政党”。^①另一方面，他又针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强调指出：“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②

1893年，法国工人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党的领导人便把注意力放在“攫取”选票的斗争上，并错误地与以米勒兰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别组成了统一的议会党团，结果领导权落入米勒兰一伙人手中。米勒兰之流鼓吹可以利用共和国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揭露了这种幻想，指出：“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方式不谈）。因此，把它看成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当它还为资产阶级所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③

1895年3月，恩格斯为再版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一篇《导言》。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发表时擅自删节篡改，把文章歪曲成带有主张议会道路的色彩。恩格斯获知后极为气愤。他在信中写道：“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④

①② 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9、480页。

③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8页。

④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4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

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视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着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主义观点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庸俗化和用庸人观点缩小工人运动的规模。”^①恩格斯反对议会主义所阐明的光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三、90年代法、德等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和美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贫困和破产，农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法、德、意、西等国，农民运动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

在法、德等国，农民是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1890年，德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3%；法国甚至在20世纪初仍有40%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民运动的兴起，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正确地制定党对农民问题的路线、方针，就成为法、德两党迫切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问题非常重视。他们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时，就阐明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而奠定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了对农民的具体政策。

但是，一向漠视农民的法、德两党某些领导人早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问题的光辉论述遗忘了。在90年代初农民运动高涨的推动下，他们开始讨论农民问题并着手制定土地纲领。法国工人

^① 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7页。

党为了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在议会选举中增加选票，在 1892 年 9 月召开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的土地纲领。随后，在 1894 年 9 月召开的南特代表大会上，又作了补充，进一步形成了法国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主要表现是：

把争取农民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目的只是为了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

不讲阶级和阶级路线，提出要联合农村中的“一切成分”，把富农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土地经营者都联合起来。

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必然破产的客观规律，公然背弃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原则，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农民私有制的错误主张。

在法国党南特代表大会后一个月左右，德国党于 1894 年 10 月 21—27 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代表大会，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窃据巴伐利亚党的领导职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福尔马尔在会上就土地问题作了补充报告。他要求在即将制定的土地纲领中，不仅要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还要反映富农以及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福尔马尔在说明他的主张时，引述了法国党的“南特纲领”，并且造谣说“南特纲领”得到恩格斯的赞同，等等。福尔马尔的观点还得到他在巴伐利亚的追随者及党内某些人的支持。

恩格斯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无耻造谣非常愤怒。他说：“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显然，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①“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末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福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②恩格斯认为福尔马尔提出的农民政策是“甚至比小资产者的政策还右”。

①② 恩格斯：《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93、294 页。

的农民政策”^①，并谴责福尔马尔是叛徒。倍倍尔为了捍卫党的原则立场，也在1894年11月14日柏林党的一次会议上，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同时批评了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李卜克内西虽不同意福尔马尔的观点，但他又替福尔马尔辩护，说他不是叛徒，并指责倍倍尔的批评过火，会造成党的分裂等。恩格斯在1894年11月24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肯定倍倍尔坚持原则立场无疑是正确的。恩格斯说：“如果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把党置之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末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作是党内的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这不过是他根据一般的正确观点来看局部问题，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他急于进行辩论，这不过是他履行自己的重大的职责，不过是注意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正确地解决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②恩格斯在信中还指出，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这样吧。我想他自己也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至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工和零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

鉴于德、法两党在农民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恩格斯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并对南特纲领和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1894年11月15—22日之间，恩格斯写就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

^{①②}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94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513页。

著名论文。

在《法德农民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中，恩格斯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究竟怎样建立工农联盟？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各个阶层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明确规定了党在建立工农联盟中应当遵循的阶级路线。他针对德国农村的状况指出，工人党首先当然应该依靠农村的无产者，其次，小农即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和租佃者是党建立工农联盟依靠的“重心”。

针对福尔马尔等机会主义者关于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是全体农民的政党的谬论，恩格斯指出：“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③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还严厉地批判了法国和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妄图以保护小农私有制来解救农民的谬论，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他指出：要拯救农民就只有把农业引导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道路。早在 70—8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农业合作化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密切联系。恩格斯在 1886 年 1 月 20—23 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就指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社生产作为中心环节。

①②③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 4 卷，第 295、296、305 页。

恩格斯在书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一场十分复杂的革命;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采用示范办法,而决不允许“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①;无产阶级的国家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大力帮助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所以恩格斯要求党和国家“慷慨地对待农民”。^②

恩格斯预见到生产合作社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指出必须“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③

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特别是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对于工农联盟的理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 *

恩格斯晚年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继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潮流袭来时,恩格斯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保证了第二国际基本上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前进。

1895年8月5日,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伦敦因病逝世,享年75岁。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又一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伟大的列

①②③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312页。

宁当时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列宁指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阐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对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 1883 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顾问，卓越地进行了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第二国际，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列宁指出：“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于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①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 50 年中，在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和关怀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19 世纪 40 年代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创立时，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到 90 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只是各种社会主义学派中的一个派别，“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② 60 年代第一国际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也还未占据统治地位，到 90 年代，马克思主义早已战胜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流派，并且广泛地传播开来。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 70 年代第一国际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6 页。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05 页。

后,恩格斯指导创立的第二国际也“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①90年代,恩格斯曾自豪的说:“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永远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我们当中,……而且比1871年要更加强20倍”。^②“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③

尽管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逐渐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大肆泛滥,但这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段暂时的插曲,它终究阻挡不了国际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凯歌前进。革命导师列宁更高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是不可阻挡的。

第四章 注 释

1 容克指德国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地主,是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支柱。——第288页。

2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反动的人口论的炮制

①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页。

② 恩格斯:《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2页。

③ 恩格斯:《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1页。

者。他胡说生活资料按照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却按照几何级数增加，劳动群众贫困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永恒的自发的“自然法则”。他主张用疾病和战争来调节人口的增长。——第 290 页。

3 菲利浦·约瑟夫·本杰明·毕舍 (1796—1865)，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天主教社会主义者。他鼓吹通过“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主张曾被工贼刊物《工场》广泛宣传。——第 295 页。

4 威廉·白拉克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反对拉萨尔派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但不够彻底。——第 296 页。

5 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成立于 1863 年 6 月，领导权最初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手里。1864 年倍倍尔当选为该组织领导成员后，联合会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控制，成为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1867 年倍倍尔当选为联合会主席。1868 年 9 月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1869 年 8 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合并入该党。——第 296 页。

6 威廉·哈森克莱维尔 (1837—1889)，拉萨尔派头目。1871—1875 年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德国两派合并时任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第一主席；1876—1878 年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编辑《前进报》；1874—1887 年为德国帝国国会议员。——第 302 页。

7 威廉·哈赛尔曼 (1844—?)，拉萨尔派头目，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成员，《哥达纲领》炮制者之一。1871—1875 年任拉萨尔派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顽固推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非常法令》颁布后，他又同莫斯特一起鼓吹无政府主义，妄图破坏德国党，于 1880 年被开除出党。后来迁居美国，脱离工人运动。——第 302 页。

8 自由贸易派，又叫曼彻斯特学派，指 19 世纪上半期在英国出现的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主张自由贸易的派别。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棉纺资本家理查·科布顿和约翰·布莱特。他们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要求排除民族间障碍，实行国际性贸易的完全自由。——第 308 页。

9 合并后德国党的领导机构，根据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决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哈森克莱维尔和哈特曼（均拉萨尔派）任主席，奥艾尔（爱森纳赫派）和德罗西（拉萨尔派）任书记，盖布（爱森纳赫派）任财务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是倍倍尔。——第 312 页。

10 《前进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 1876 年党的

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该报从1876年10月1日起在莱比锡出版，用以代替两派原来的机关报。《前进报》的负责人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第319页。

11 卡尔·尤利乌斯·瓦尔泰希(1839—1915)，原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3—1864年任该会第一书记。1864年2月与拉萨尔决裂，1869年加入爱森纳赫派。1874—1878年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1年流亡美国，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319页。

12 1878年5—6月发生的两次谋刺德皇威廉第一的事件，第一次是一个早被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党籍的坏分子——贺台尔在基督教宫廷传教士的指使下干的；第二次是一个叫做诺比林的资产阶级青年干的。尽管这两次谋杀事件根本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无关，但俾斯麦反动政府竟捏造事实，作为实行反动的《非常法令》的借口。——第331页。

13 卡尔·赫希伯格(1853—1885)，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儿子。1876年混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党内创办和资助许多传播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报刊，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332页。

14 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改良主义者。混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曾任赫希伯格主办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辑，80年代脱党。——第332页。

15 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之一。

康德(1724—1804)是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3页。)康德创立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即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的”，世界是不可知的。康德把他的哲学叫做“先验唯心主义”。

新康德主义把康德哲学中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拼凑成一个体系，流行于德、俄、意等国。其代表人物有柯亨、文德尔班等人。——第338页。

16 茹尔·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党创始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第一次大战期间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343页。

17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8—1906)，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曾参加1848年德国革命，1852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美国后任总书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343页。

18 法国激进派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左翼，1881年在克里蒙梭领导下正式组党。它利用人民对资产阶级右派的不满，提出一些改革诺言以骗

取选票,但上台后依旧推行反动政策。——第 344 页。

19 贝努瓦·马隆(1841—1893),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时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公社委员。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到意大利、瑞士等国,追随无政府主义者。80 年代后成为法国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能派”的首领。——第 345 页。

20 保尔·布鲁斯(1844—191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者。80 年代后成为法国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能派”的首领之一。——第 345 页。

21 韦伯夫妇,指英国悉尼·韦伯(1859—1947)和他的夫人比阿特里斯·韦伯(1858—1943),都是“费边社”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之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第一次大战时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悉尼·韦伯曾任工党政府贸易大臣、殖民地大臣等反动职务。——第 353 页。

22 乔治·肖伯纳(1856—1950),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和政论家,“费边社”创始人之一。他一生虽然写了不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作品,但他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十月革命时期,他支持苏维埃俄国,后来又反对法西斯主义。——第 353 页。

23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进化论学说的创造者,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其代表作有《物种起源》等。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达尔文的学说都曾给予高度评价。恩格斯说,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0 页)。——第 357 页。

24 工团主义是 19 世纪末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它主张工会(工团)是团结工人的唯一形式,认为只要通过经济总罢工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并由工会领导和组织生产,否认党的领导、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第 362 页。

25 凯尔·詹姆斯·哈第(1856—1915),改良主义者。英国 1888 年成立的苏格兰工党和 1893 年成立的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工人运动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第 363 页。

26 维克多·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改良主义首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他口头上赞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极力使党的政策适应于合法的议会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站在“中派”立场,宣扬“阶级和平”,反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战后初期当过短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外交部长。

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

一个右翼头目。——第 363 页。

27 保尔·恩斯特 (1866—1933), 80 年代末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曾是政论家、剧作家, 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的首领, 1891 年被清洗出党。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第 365 页。

28 伊格纳茨·奥艾尔 (1846—1907),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 两派合并时是执行委员会书记之一 (爱森纳赫派), 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是暗藏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第 369 页。

29 《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 1883—1890 年 10 月, 每月出版一次, 以后至 1923 年秋每周出版一次。考茨基从 1883 年至 1917 年 10 月一直担任该刊主编。恩格斯逝世后, 《新时代》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反动工具。——第 370 页。

第五章 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它产生以后的头半个世纪中，先后战胜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等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流派，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起来，并且在第二国际许多党内占据了支配地位。隐藏在马克思主义基地上、钻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导集团，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竭力歪曲时代的阶级内容，掩盖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全面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妄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机会主义的邪路，熄灭无产阶级革命。

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坚持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在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一系列问题上，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把马克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39 页。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①这一斗争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策略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一节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列宁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而斗争

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 1898—1914 年间最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垄断资本的统治。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有一个历史过程。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开始向垄断过渡。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大垄断组织，控制了本国各个经济部门。例如，20 世纪初美国各大托拉斯已经掌握了石油生产的 95%，化学工业的 81%，金属工业的 77%，钢铁工业的 66%，制糖工业和烟草工业的 80%。占企业总数 1% 的企业掌握全国企业总产值的 43.8%。在德国，1907 年占总数 0.9% 的大企业就占有工人总数约 2/5，汽力和电力总数 3/4 以上。英、法、日、意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也都类似。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9 页。

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主要表现在：垄断组织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力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形成了专靠“剪息票”为生的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少数国家变成了食利国，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垄断资产阶级从剥削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上层，培植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以便加强工人中的机会主义，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政治上从虚伪的民主走上全面的反动。

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表明“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腐朽的、没落的、溃烂的、反动的阶级”^①，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自己发展的垂死阶段，已经日暮途穷了。

帝国主义之所以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激化的结果。这首先表现在其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也有了巨大的进展。但由于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金融寡头手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仍然是无政府状态。自由竞争不仅没有消灭，反而更加尖锐和剧烈。经济危机不仅不能消除，反而愈益频繁和严重。“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一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②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根本不相容的。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时，“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

①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7页。

② 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1页。

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①这一基本矛盾的加剧，反映在阶级关系上，便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三大矛盾的激化。

毛主席指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②

第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在经济上采用种种手段加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物价飞涨，更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负担。政治上，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和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与国家政权日益紧密结合起来，日益强化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多地依靠反革命暴力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统治。“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③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了。20世纪初，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涨。例如，法国在1890—1899年的10年间，罢工人数92万4千人，而在1900—1905年的6年间，罢工人数即达110万7千人。德国在1895—1899年间，共发生罢工3,609次，而在1900—1904年间，则达7,235次。受工联主义影响最深的英国工人这时也动作起来。日本——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斗争，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质。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俄国等国的罢工斗争还会发展到与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也使

①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116,21页。

②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89页。

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有了广大可靠的同盟军。这一切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成熟了。“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①

第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化了。帝国主义为了榨取高额利润,疯狂对外扩张。19世纪末,英、法、德、俄、美、日等国家掀起了抢占殖民地的狂潮。到20世纪初,世界已被瓜分完毕。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通过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在殖民地开工厂,办矿山,修铁路,设银行,掠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倾销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造成这些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工业,造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破产农民,造成了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特别是造成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勾结和扶植当地反动统治阶级,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帝国主义野蛮的剥削和压迫,促进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例如,朝鲜的东学党起义(1893—1895)、菲律宾的反西班牙革命(1896—1898)和反美斗争(1898—1901)、印度提拉克¹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1895—1897)、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900—1901),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动力,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同盟军。

第三,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它们总是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16页。

极力要“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①帝国主义的霸权是以实力——经济、政治、军事等为根据的。而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实力的不断变化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1898年美国挑起的为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而进行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英国为夺取南非，对荷兰殖民者的后裔布尔人发动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沙皇俄国和日本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而发生的日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开端，也是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主要标志。帝国主义战争使它们互相削弱，同时又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从而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即由巴黎公社以后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进入到一个新的政治动荡和革命风暴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②为什么呢？斯大林指出：“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③

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

①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2、10页。

③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5页。

过战斗”。^①当历史的发展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在第二国际内部,一股修正主义逆流泛滥起来。它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并且在第二国际许多党内占据了支配地位。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是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祖师爷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曾在柏林当银行职员。他年轻时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872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来没有得到改造。在德国两派合并时,他鼓吹向拉萨尔派妥协,随后又成为杜林假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在俾斯麦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初期,他同机会主义者赫希伯格、施拉姆以“三颗星”为署名发表文章,极力鼓吹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个反党的“苏黎世三人团”,当即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因此,他的反党气焰暂时收敛起来。从1880年开始,伯恩施坦担任德国党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1888年该报从瑞士的苏黎世迁到伦敦后,他又接受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的影响,机会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他又同党内右派福尔马尔相呼应,鼓吹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联盟”,反对暴力革命。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1896—1898年间,他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他借口时代的变化,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公开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1899年,在考茨基等人的鼓动下,他抛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集当时修正主义“理论”之大成,搬出一套资产阶级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三个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组成部分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和“修正”。

在哲学方面，他否定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以康德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他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论证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诬蔑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事物的“陷阱”，胡说“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他企图以此为其反对暴力革命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制造根据。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根本原理。他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说“价值是纯粹思维的构想”；他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说这是“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他竭力用“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否认资本的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以及工人的日益贫困化；他美化垄断组织，大力吹嘘“现代经济的适应能力”，宣称可以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资本主义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这一切充分暴露了他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辩护士。

在政治学方面，他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专政，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狂热鼓吹阶级调和论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胡说“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诬蔑暴力革命是“无谓牺牲”，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倒退”，“属于较低的文化”，等等。

伯恩施坦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公开叫嚣要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的党”。他完全抛弃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公式：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

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列宁深刻地指出：“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①

伯恩施坦这部黑书的出版，标志着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和修正主义的正式出笼。在德国，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此书就重印多次，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译成法、英、俄、荷兰、瑞典、保加利亚、日本等国文字在各国大肆抛售。于是，这本书“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② 此书的出笼，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他们狂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驳倒”了；他们把伯恩施坦称为他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的“最前哨”，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此书的出笼，也得到隐藏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大声喝采。他们麇集在伯恩施坦周围，以他为“中心”和“靠山”。从此，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思潮，便被称为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出笼，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头子米勒兰² 就于 1899 年公然背叛无产阶级，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剑子手加利费一起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部部长，帮助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工人罢工，破坏工人运动，“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③ 米勒兰之流还无耻地把这种叛变行为说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伯恩施坦之流也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跃跃欲试，“希望尽可能快地达到这一步”。接着，入阁事件相继在英国、意大利发生。

这样，修正主义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各国泛滥起来。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³ 之流，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⁴ 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⁵、比索拉蒂⁶ 之流，奥地利的鲍威尔⁷、阿德勒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 页。

②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43 页。

③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26 页。

之流，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以及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等国家的修正主义者都步伯恩施坦的后尘，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攻击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各国修正主义派“都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

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②

自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时期。长期的和平环境，给第二国际各国党打上了合法主义的烙印。尤其是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斗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机会主义分子就更加醉心于合法斗争，把议会斗争当成唯一的斗争形式，把利用议会变成了盲目崇拜议会，宣扬阶级合作和和平过渡，否定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就是德国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法国的可能主义以及英国的工联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发展和继续。

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更尖锐化了，无产阶级革命也逼近了。资产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同时，还侧重于用微小的改良来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在社会上、在大学讲坛上、在很多小册子中、在许多学术著作里，大举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资产阶级策略的改变和思想影响的加强，使得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

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资产阶级普遍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4页注①。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

地用掠夺来的高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政党中的议会议员、工会官僚、熟练工人等，在工人队伍中培植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些人从世界观到生活都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同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所具有的革命情绪，毫不相干了。”^①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②，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批的小生产者破了产，而被抛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这一方面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但也不断把资产阶级世界观、小资产阶级传统习惯带到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中来。

总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产物，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直接产物。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激起了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斗争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剧烈展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刚出笼，就激起了广大工人党员和基层组织的不满和反对。他们纷纷要求《新时代》停止发表伯恩施坦的文章，要求党对伯恩施坦进行坚决回击和开除他的党籍。德国党在短短几年中连续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围绕着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在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大会上，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开始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考茨基虽然驳斥了伯恩施坦的若干修正主义观点，但却表现了严重的动摇，竟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③卢森堡和蔡特金⁸这两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9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8页。

③ 见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898年10月4日）。

位杰出的女革命战士站在反修斗争的前列，英勇地捍卫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卢森堡指出：“夺取政权始终是最终目的，而最终目的始终是斗争的灵魂。”^①她们的批判使得修正主义分子抬不起头来。会后，修正主义分子奥艾尔给伯恩施坦写信说：“你是一只蠢驴，——这些事情不要讲出来呀，这些事情我们做就是了。”斯图加特大会虽然给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定的打击，但是大会没有就伯恩施坦问题作出任何决议，采取任何措施。

会后不久，卢森堡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这部最早出版的批判伯恩施坦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反修著作，痛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谬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书中指出，与伯恩施坦斗争的根本问题，不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问题，而是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要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问题。但是卢森堡忽视了伯恩施坦的哲学观点，也没有在组织问题上批判修正主义。

在1899年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斗争更为激烈。倍倍尔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大卫用了3个小时为伯恩施坦辩护。考茨基在大会上又一次作了调和主义的发言。大会经过3天的争论，终于以216票赞成，21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逐条拒绝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决议指出：“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或改变自己的策略或名称，……党拒绝旨在掩饰或转移它对待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任何企图。”^②但是，这次大会仍然没有对修正主义者采取组织措施。

在1901年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公然叫嚣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大会在决议案中指名对伯恩施坦提出公开的

①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记录》1898年德文版，第118页。

②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记录》1899年德文版。

警告，要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否则就要他退党。迫于形势，伯恩施坦在会上虚伪地表示要“尊敬和重视”大会决议。

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占投票总数的31%，议席由1898年的56席增至81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这使得议会迷更嚣张起来。他们公然要求来一次米勒兰主义的尝试，妄图实现议会和平过渡。伯恩施坦之流公开提出要当议会副议长的要求。由于修正主义的猖狂，在1903年召开的德累斯顿大会上，就党的策略问题又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伯恩施坦在会上竟气焰嚣张地提出挑战，说：“我可以毫不迟疑地事先向你们声明，我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如果你们还嫌不够的话，我是一个伯恩施坦派！”^①大会以228票对11票通过了严厉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卢森堡在会上曾提议把投票支持伯恩施坦提案的人开除出党，然而党的领导人力图保持党的统一而没有支持她的正确主张。

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起来批判伯恩施坦主义。法国的拉法格写了很多反对修正主义论著，斥责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议会主义谬论及其用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在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译为保加利亚文出版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领导人布拉戈也夫⁹当即在1901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一文，指出伯恩施坦主义无非是集所有一切肤浅而无耻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大成。当伯恩施坦主义传到日本时，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家片山潜¹⁰在1899年1月东京社会政策学会举行的辩论会上就挺身而出，开始批判修正主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从1898年起写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等论文，从哲学上批判伯恩施坦主义。但他没有指出修正主义的社会阶级

^①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记录》，1903年德文版，第390页。

根源及其阶级实质，特别是回避了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

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第一次面对面交锋是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主要围绕着米勒兰事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左派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加以制裁。卢森堡尖锐而正确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性质决定，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可以成为执政的党。”^①而饶勒斯¹¹、伯恩施坦、王德威尔得¹²、安塞尔等右派则极力为米勒兰的背叛行为辩护，胡说什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社会党力量强大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起点。正当左派同右派两军对垒剧烈斗争的关键时刻，考茨基以中间派的虚伪面孔出现，用隐蔽的形式为米勒兰开脱罪责。他把米勒兰入阁说成是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而是各国社会党人的具体策略问题。大会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这个模棱两可的“橡皮性”决议。这是左派的一次严重失败。它表明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的泛滥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一决议使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卖活动合法化，为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泛滥开放了绿灯。

巴黎大会决定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作为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机构。执行局的主席是比利时社会党右派首领王德威尔得。从此，第二国际进入了由修正主义者把持并逐步蜕化变质的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日益分化为左派和右派，而且出现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暗藏的修正主义派——“中派”。

由于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被通过，巴黎大会之后，修正主义日甚嚣张，伯恩施坦之流继续明目张胆地鼓吹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1904年8月，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荷

^① 转引自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页。

兰阿姆斯特丹举行。大会再次就米勒兰事件讨论了社会党人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倍倍尔、卢森堡等在会上揭露了入阁派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叛卖策略。饶勒斯等右派再次极力为米勒兰主义辩护。安塞尔公然无耻地宣称：“即使他们只给我们一名阁员的职位，我们也要接受下来，并且说：‘非常感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得到一个职位呢？’”^①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通过法国代表盖德提出的反入阁主义的决议案，而王德威尔得的回避反修问题的提案仅以4票之差被否决。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谴责殖民主义的提案被否决，而万·柯尔¹³和海德门的改良主义提案却被通过。它虽然形式上也谴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但中心思想是要求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条件，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自由。

关于总罢工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也承认在某些部门举行普遍罢工是可能的，但把它当成是“最极端的手段”并回避了暴力革命问题。

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左派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修正主义势力已经相当猖獗了。

综上所述，在修正主义出现和泛滥之后，卢森堡、倍倍尔等左派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斗争，打击了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但由于他们在政治理论上不完全成熟，对帝国主义时代所面临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因而斗争还不坚决、不彻底，特别是害怕在组织上同顽固的修正主义分子决裂。在德国党内，甚至从1902年起还选派伯恩施坦担任议会议员，听任修正主义分子把持好些报刊和出版部门，占据理论宣传阵地，肆意放毒。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则极力维

^① 见安塞尔：《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发表的演说》。

护党内的“团结”、“统一”，借以掩护修正主义。这样，修正主义便猖狂地泛滥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列宁不但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三、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的斗争

沙皇俄国本来是一个政治、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但自 1861 年农奴制废除后，资本主义也获得迅速发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也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俄国帝国主义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除了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矛盾外，还有其独具的特点，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同经济、政治中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相结合；掌权的是同金融垄断寡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封建君主。因此，在俄国，无产阶级同垄断资本、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农民同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各民族人民同沙皇政府的矛盾，俄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俄国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特别尖锐和剧烈。正如斯大林指出的：“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所以，沙皇俄国成了“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①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67 页。

俄国不仅是当时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而且还拥有解决这些矛盾的革命力量。1905 年以前，俄国产业工人已达 300 万人，加上农业工人和其他雇佣工人，共约有 1,000 万人了。^①可是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却超过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工厂和矿山工业的产业工人中，有近半数集中在拥有 500 名工人以上的企业里。在那里，工人阶级受着垄断资本主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双重压迫，工时很长，工资极低，毫无政治权利，因而具有彻底革命精神。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工人运动开始走向高涨，并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工人提出了“民主”、“自由”和“打倒沙皇”的口号，个别地方还同沙皇军队发生流血冲突。在工人运动推动下，农民革命运动也开展起来，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广大农民作为自己革命的强大同盟军。

这一切预示着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列宁说：“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②与此同时，长期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前列地位的德国，由于修正主义的加强而日益丧失其先锋作用。因此，20 世纪初，世界革命的中心开始从德国转向俄国。

俄国先进的思想界，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痛苦和牺牲，“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③

19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1883 年，普列

① 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533 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5 页。

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82 页。

汉诺夫(1856—1918)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该社在翻译、出版和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并对当时流行的民粹主义开展了批判斗争。民粹主义是当时在俄国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障碍。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认为只依靠农民就能推翻沙皇制度；认为原始公社以后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群氓”，只能盲目跟着这种“英雄”走。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写了《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等著作，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给了民粹主义以严重的打击。但是，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又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的作用。这是他后来滑进机会主义泥潭的一个原因。

“劳动解放社”等马克思主义组织，“**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了基础，只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①，还没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1870年4月22日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西姆比尔斯克城（现称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位著名的教育活动家的家庭里。1887年，17岁的列宁在喀山大学因参加民主革命活动被捕，不久被流放于喀山省。这是列宁受到的第一次革命洗礼。

1888年，列宁在喀山省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次年，又移居萨马拉。在这个时期，列宁深入研究《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俄国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俄国的现实，特别是俄国的经济状况。他研究了有关农民经济的大量资料，还直接到农民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在青年

① 列宁：《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5页。



1920年5月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剧院广场向出发到前线去
反击白匪军的士兵讲话

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这样，在列宁周围便形成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3年，列宁来到了当时俄国政治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从事建党的巨大组织工作。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结合工人实际情况给他们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革命的道理，指出斗争的道路，同时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劳动条件、工资和罚款制度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列宁为工人们写了许多论文、小册子和宣传鼓动传单；并把一批先进的工人，如伊·瓦·巴布什金、鲍得罗夫兄弟、茹柯夫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此期间，列宁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了解，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的环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然胜利怀有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而成为彼得堡的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所拥护和爱戴的领导者。

列宁在萨马拉和彼得堡期间，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民粹主义在90年代在一部分青年中仍有影响，但这时的民粹派早已放弃了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主张同沙皇政府妥协，成了富农利益的代表。民粹派还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性的观点。

列宁在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名著中，批判了民粹派的反动理论和纲领、策略，阐明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规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和建立坚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列宁怀着对俄国革命的坚定信念写道，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建立起把现时分散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

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①

列宁这一著作给了民粹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1899年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最后完成了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对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斗争“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②

以司徒卢威¹⁴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主义斗争中的“同路人”。他们是一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经常在“合法”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得名。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参加反对民粹派的斗争，是企图扭转工人运动的方向，使其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反对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反民粹派的斗争中，列宁在与其成立暂时协定的同时，又非常激烈地揭露他们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本性，批判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指出他们抹杀阶级矛盾，抛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反动实质。

1895年秋，为了结束彼得堡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分散状态，给建党作好准备，列宁把彼得堡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俄国工人政党的萌芽。在列宁领导的“斗争协会”的影响下，其他很多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这就为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打下了基础。

1898年3月，俄国各地“斗争协会”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79页。

② 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751页。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部分同志合影,左起第三人为列宁。

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忽视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中央委员会也随即被破获,各地方组织仍处于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领导。因此,大会并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当时,列宁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没有参加“一大”。但是列宁始终密切地注视着俄国和国际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1899年8月,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所读到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后,极为愤慨。他在致亲属的信中,称伯恩斯坦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并且预言“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①

列宁敏锐地看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叫喊马克思主义“不完

^① 《列宁给玛·亚·乌里扬诺娃》(1899年9月1日),《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2页。

备”、“过时”了、需要进行“革新”的实质，无非是企图以一种倒退的理论来代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列宁强调指出“**必须直接展开论战**”来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坚决捍卫被修正主义者诬蔑为“旧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当前的迫切任务**”。①

列宁在驳斥伯恩施坦的“过时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叫嚷要“革新”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之流则“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②

当伯恩施坦的“过时论”到处流行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③

1900年，列宁从流放所出来后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清醒地看到德国党和第二国际各国党中的左派在反修斗争中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主张应该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修正主义彻底划清界限。

① 列宁：《给编辑部的信》，《列宁全集》第4卷，第184页。

②③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列宁反对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一条重要战线。

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列宁亲自缔造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内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青年人结成了宗派，趁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家被捕的机会，利用“一大”以后的党内分散的状况，通过报刊，大肆贩卖伯恩斯坦主义。他们鼓吹工人阶级只应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说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①，因而被称为“经济派”。他们反对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认为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工人运动应该走“阻力最小的路线”，“以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代替“夺取政权的意图”。^②他们迷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胡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对于执行“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意义”，“在实践方面还是有害的”。^③他们根本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党的必要性。他们吹捧伯恩斯坦主义，大量翻印伯恩斯坦的著作，声称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最合逻辑的进程”^④，并且效法伯恩斯坦，在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批评自由”的幌子下，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而伯恩斯坦也得意地宣布经济派的观点同他是一致的。所以，列宁称经济主义是“俄国的伯恩斯坦主义”。^⑤

当时，俄国革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加速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流放期间就

① 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3页。

②③④ 转引自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193、194、192页。

⑤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37页。

拟定了建党计划。列宁认为，首先必须从思想上建党。而经济派的行径，使党内思想混乱、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的局面更为严重，使俄国工人运动从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上倒退了一大步。因此，列宁主张，“应该立刻起来坚决反对这种倒退倾向！”^① 必须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和伯恩施坦主义、经济主义展开公开的论战，同它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思想上的统一，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为此，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900年底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这是列宁建党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列宁深信这份报刊“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② 《火星报》成为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为建党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了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深刻地阐明了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基本思想原则。这是一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著作。

（一）列宁揭穿了伯恩施坦主义和经济派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实质，是企图用修正主义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

列宁指出，伯恩施坦和米勒兰之流的修正主义言行，完全说明了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修正主义派的阶级实质。他们在理论上就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所以，“‘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

①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50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78页。

备，……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①他们在实践上就是用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以糟蹋科学社会主义、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来换取微小的改良。

由此可见：“‘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②

列宁还辛辣地讽刺说，经济派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但他们根本缺乏任何独立的判断，而是“奴隶式”地、“猴子式”地模仿伯恩斯坦主义，把它当成圣经。

（二）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论证了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原理。

崇拜自发性，这是经济派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基本错误。列宁指出，自发论只不过是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一公式的翻版。

列宁认为，在工人运动初期，自发性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能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③；科学社会主义则是由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人类优秀科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

①②③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226—227、247页。

列宁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并且时刻在侵蚀着无产阶级，因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反对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其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列宁写道：“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列宁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时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③

（三）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和伯恩施坦派鼓吹只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的改良主义谬论，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经济派和伯恩施坦主义者为了反对工人运动进行政治斗争，便歪曲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做出了经济斗争有首要意义的错误结论。列宁在批判这种改良主义谬论时指出，经济斗争虽然是团结和开展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但是，“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④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的有利条件，而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因此，就必须“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

①②③④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241、242、262页注①。

义的整个革命斗争”。^①

自然,经济派也不是绝对否认政治。他们说什么应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②这个政治不过是只图改善劳动条件而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工联主义政治。它“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③他们鼓吹合法斗争,宣扬走“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平取得政权的论调,这不过是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谬论的简单抄袭。列宁在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④

(四) 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谬论,阐明了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意义。

列宁根据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残酷迫害的具体情况指出,当时最迫切的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有了革命家组织为核心的党组织,才能使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的程度。“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⑤

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恐怖主义,并且指出:“经济主义者和现代恐怖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⑥前者崇拜自发的“纯粹工人运动”;后者崇拜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激愤。他们都轻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懂得把革命家的

①③⑤⑥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77、280、337、289页。

②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④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

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革命家的责任在于把工人群众激愤的水滴和细流汇成巨流,去冲击剥削阶级制度。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发表,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经济主义的任务。经过了3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使经济派这一称号在党内成为一种侮辱人的名字。

四、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反对经济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1903年7—8月,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后移至英国伦敦,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火星派和反火星派。在火星派中,有隐蔽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反火星派中,不仅有改头换面的经济派分子,还有坚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崩得¹⁵分子。因此,大会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斗争首先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

关于党纲问题,在代表大会以前,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草案的理论部分,依照西欧各国党的样子,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没有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由于列宁的坚持,才加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大会在讨论党纲时,机会主义分子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自由等民主权利当做工人运动的目标。经济派分子以不能“跟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大相同”为理由,反对党纲写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这表明他们是把第二国际类型的党奉为规范。经过斗争,火星派取得了胜利。大会通过的党纲中载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第二国际各

国党中,这是唯一列入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革命纲领,是列宁创建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党纲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且正是由于反对伯恩斯坦、反对机会主义才提出这个问题的。”^①

反火星派分子还反对党纲中关于工农联盟和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思想;崩得分子反对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们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

在讨论党章时,斗争也非常尖锐。争论的焦点是党章第一条,即党员的条件问题。列宁主张党员应当“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不让投机分子和空谈家混进党内。马尔托夫¹⁶则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组织,只要“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工作就行了,这是为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实际是要建立成分复杂、不定型、缺乏坚定的组织纪律性的第二国际类型的修正主义的党。由于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结果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

在选举党中央机构时,由于崩得分子和两个经济派分子已在中途退出了大会,结果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俄文音译,意即多数派。——编者),马尔托夫派退居少数,称为孟什维克(俄文音译,意即少数派。——编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重大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与第二国际类型的党有着原则区别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此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

^①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义理论上产生的。”^① 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俄国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② 这个定义正确地说明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内斗争更加尖锐了。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肆意破坏“二大”决议，猖狂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他们无理要求孟什维克在《火星报》编辑部中要占多数，在中央委员会里同布尔什维克人数相等。布尔什维克否决了这一要求。但是，在“二大”上曾经支持列宁的普列汉诺夫这时却被孟什维克实行分裂的要挟唬住了。他害怕同孟什维克决裂，坚持要同其“和解”，对其让步。列宁坚决反对这样做，于是在1903年11月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接着，普列汉诺夫帮助孟什维克篡夺了编辑部的领导权。从此，《火星报》成了机会主义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普列汉诺夫不久就从调和主义的立场滚进了孟什维克的泥坑。孟什维克进而企图夺取另一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他们的分裂活动，给全党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孟什维克还拼命地鼓吹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他们反对建立严格的集中制，拥护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诬蔑党的纪律是“农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页。

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奴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把人变成“机轮和螺丝钉”，宣称可以听任每个同情党的人自行列名入党，等等。本来，经过“二大”，党已经克服了小组习气和涣散状态，前进了一步，而孟什维克却要开倒车，要使党倒退两步。

为了粉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观点和反党活动，列宁在 1904 年上半年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痛斥了孟什维克的倒退行径，揭露和批判了孟什维克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提出了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列宁指出，党应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的分子组成，“**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① 孟什维克宣布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是企图削弱党的先进性，实际是要把党化为乌有。

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列宁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是一个整体**”^②，才能领导整个阶级去夺取胜利。马尔托夫之流反对党员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就取消党组织的作用，使党丧失战斗力。

党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为此，就需要有统一的党章、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机构；就需要有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列宁强调指出：“**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③ 孟什维克攻击党的集中制，实际上是要维护地方组织和个人有反对中央、不

①②③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457、455、482 页。

执行党的决议的权利。这种无政府主义只能使党陷于瓦解。

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任务就在于领导无产阶级及其他一切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决不能把党与一般工人组织混为一谈，或使之并列起来。否则就抹杀了党的领导作用。

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与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联系的体现。列宁说：“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①党如果脱离群众，就不能巩固，不能生存。

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反映了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中不愿接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只想挂个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列宁指出，机会主义派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是“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②

列宁最后强调了党的组织的重要意义，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③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这部著作的传播，使得大多数的地方组织都团结到了列宁的周围。

但是，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也更猖狂了。1904年夏，孟什维克夺取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因而不得不

①②③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460、497、510页。

成立自己独立的中央领导机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自此，俄国党内形成了两个组织上各自独立的政治派别。

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同样是一种国际现象。当时，德、法、意等国党内到处都存在着反对集中制，拥护自治制，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因此，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激烈斗争的时候，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便为孟什维克撑腰。德国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刊物都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声称俄国的任务是同“集中制的极端作斗争”。甚至左派卢森堡也错误地反对列宁的正确立场。考茨基则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公开宣称，假如“我必须在马尔托夫和列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将赞成马尔托夫”。

列宁对第二国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及其对俄国党内事务的干涉不断地揭露、批判和抵制。1904年8月，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经过斗争，第一次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了国际会议。会上，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由列宁参加编写的《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资料》，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向各国党说明了俄国党内斗争和分裂的真实情况。1905年初，第二国际执行局以“调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执为借口，成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要两派停止争论，“统一”起来。实际是要停止和取消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坚决拒绝了干涉俄国党内事务的“仲裁”，并提出两派的争论只应由俄国党的代表大会解决。

由于列宁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抵制了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保持了布尔什维克的独立自主，从而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

第二节 俄国 1905 年革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高潮和低潮时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斗争

一、俄国 1905 年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

20 世纪初，俄国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1900—1903 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促使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1904 年 2 月，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朝鲜和我国东北，在我国辽东半岛上爆发了战争。这是一场争霸远东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破坏了俄国经济，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战争的结果俄国遭到完全的失败。“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①沙皇政府本想通过对外战争来熄灭革命，结果适得其反，战争加速了革命。

1905 年 1 月 16 日，彼得堡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为抗议厂方无理开除 4 名工人而举行罢工。罢工迅速发展为全城总罢工。沙皇政府策划了屠杀工人的阴谋。它通过警察局的奸细加邦¹⁷ 牧师，诱使工人向沙皇和平请愿，以便集中枪杀工人。布尔什维克向工人们指明，自由不能靠请愿获得，而要拿起武器去夺取。由于很多工人对沙皇还抱有幻想，布尔什维克的劝阻未能奏效。

1 月 22 日（俄历 9 日，星期日），彼得堡工人扶老携幼共 14 万多人，抬着沙皇的像，举着教堂旗幡，唱着颂歌，带着请愿书前往冬宫。但是沙皇并没有对人民讲慈悲。正当工人们等候沙皇接见时，

^① 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34 页。

早已安排好的沙皇军队，向请愿队伍扫射砍杀，结果有1千多人被打死，2千多人受伤，血染彼得堡。这一天被称为“流血星期日”。

沙皇的血腥屠杀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使他们认清了沙皇的凶残本性。工人们愤怒地说：“沙皇痛打了我们，我们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顿！”当天傍晚，工人们便开始构筑街垒，投入战斗。列宁说：“1905年1月22日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有了政治觉悟并且奋起进行革命斗争。”^①“流血星期日”成了1905年革命的起点。

沙皇的暴行激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各地工人掀起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罢工浪潮，仅1月份罢工人数就有44万，超过了过去10年罢工的总人数。罢工很快地从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有的地方发展到同军警武装搏斗。农民运动也跟着高涨起来。农民们烧毁地主的庄园，夺取地主的粮食和土地。从5—8月，农民运动席卷了俄国欧洲部分总县数的1/5。沙皇制度的支柱——军队也动摇了，6月，黑海舰队中的“波将金”铁甲舰爆发了起义，沙皇军队第一次转到革命方面来。整个俄国沸腾起来了！

革命使各个阶级都纷纷动作起来，制定本阶级的策略方针和行动路线。

沙皇政府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政策：继续采用残酷的镇压手段，并利用自己的奸细唆使各族人民互相残杀；答应召集缙绅会议或国家杜马（俄文译音，即议会。——编者）粉饰民主，愚弄群众。它企图以此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和扑灭革命。

自由资产阶级一方面极力与沙皇妥协，以图同沙皇分掌政权，扼杀革命；另一方面又拿革命来吓唬沙皇，要求实行一些小小的改良来“安慰”人民，分裂革命势力。

^① 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3页。

在这种形势下，“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是仅仅勉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①因此，布尔什维克建议从速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制定党的策略路线。这一建议遭到了孟什维克的拒绝。但是，全党的大多数组织毅然排除了孟什维克的阻挠，派出代表于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列宁的领导下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现工农民主专政；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革命推向前进的革命路线。

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制定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俄国革命和过去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因而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应该跟着资产阶级跑，而不应与农民接近，以免吓跑资产阶级，缩小革命规模；不应举行武装起义，而应该通过议会道路，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即使民主革命胜利了，也不应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临时革命政府，而应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保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要也不可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害怕革命，害怕胜利，企图把运动拉向后退的路线。

孟什维克的这条策略路线，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翻版。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策略路线的分歧，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三大”以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又积极支持孟什维克，掀起了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运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13页。

动。考茨基公开发表文章，用道听途说的材料诽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反对在德国出版和宣传这些决议。他们竭力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说什么“在这种时候争吵是犯罪”等等。他们又以“调解”为名，想用国际仲裁法庭迫使布尔什维克屈从孟什维克。

列宁坚持原则立场，坚决地顶住了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俄国党内事务的干预，揭露第二国际考茨基对孟什维克的庇护，抗议他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揭穿他的“不偏不倚”的虚伪性，维护了党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列宁在1905年7月写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该书以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为靶子，在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关于武装起义和工农民主专政、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学说。

（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关于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谬论指出，俄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处在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①它害怕革命的继续发展，害怕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的武器来反对它；它总想与沙皇妥协，窃取政权。这就决定资产阶级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着。

而无产阶级身受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它力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②所以，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

列宁认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革命

^{①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2—543、541页。

是以工农大众的伟大胜利而结束呢，还是以资产阶级与沙皇妥协分赃而告终？“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①

列宁进而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为：第一，“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②；第二，无产阶级已有了“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③

俄国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孤立资产阶级，把它赶出领导舞台。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对农民领导的问题。列宁指出，当时农民所关心的是夺取地主的土地，而只有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成为彻底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在驳斥孟什维克关于发动农民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规模的谬论时指出，谁真正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④

列宁的上述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权的一般原则发展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策略路线。

（二）人民武装起义和工农民主专政是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

①②③④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13、563注①、576、590页。

保证。

孟什维克根本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他们或重复第二国际议会主义的说教，把沙皇政府同意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称为革命的彻底胜利，或鼓吹“起义是自发的”，组织起义是“空想”。

列宁驳斥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暴力革命的原理。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①列宁还指出：“各国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②俄国沙皇政府一贯就是这样干的。因此，暴力革命是战胜沙皇制度的唯一道路。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成为党的第一位任务。

为了组织武装起义，列宁号召革命群众马上成立战斗组织，用各种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同时提出了能够发扬群众革命积极性、瓦解沙皇统治的革命口号，如举行群众政治罢工，立即实行8小时工作制，用革命手段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直到没收地主土地等。这些口号的精神就是根本藐视沙皇政府及其法律，让革命群众无所顾忌地采取革命手段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在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列宁反复教育群众要抛弃孟什维克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幻想，指出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立宪会议的一切决定，都是无聊而可怜的空话。

随着人民武装起义的胜利，就要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临时革命政府来代替沙皇政府。列宁强调说：“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

^{①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620页。

号唯一地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迫切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沙皇方面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②

列宁关于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个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政权，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它是依靠人民武装力量建立起来的专政机关；它的任务是巩固民主革命成果，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即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列宁认为，为了同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社会民主党不仅应该参加、而且必须领导这个政权。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却反对这样做。他们狡辩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就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他们把无产阶级参加工农革命政权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混为一谈，正好暴露了他们要把工农夺取的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的企图。列宁反复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

（三）坚持不断革命，不停顿地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从第二国际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就是说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时期，即资产阶级专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极力反对“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③ 无产阶级只有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

①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23、547页。

③ 转引自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31页。

同时,托洛茨基则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思想,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主张直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提出了“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的口号。这个臭名昭著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实际上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同孟什维克的“万里长城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相反,列宁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

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两步。他指出,俄国民主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当时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使无产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列宁批判企图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谬论时说,对于民主革命的任何忽视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①

但是,革命不应该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民主革命胜利后,应当尽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充分估计到民主革命后,资产阶级一定会拼命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成果,所以,无产阶级“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新的斗争”。^②列宁痛斥了孟什维克的右倾保守主义,号召无产阶级“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击溃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③,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的成果,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实现革命的转变,关键在于党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性、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充分运用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机关。列

①②③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77、520、531—532页。

宁后来在论证革命的转变时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①

列宁作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整理论，为布尔什维克党确定了新的方针。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两种策略上的分歧，实质是敢不敢胜利的问题。列宁指出：“‘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这一分歧。”^②

两种策略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列宁在书中十分注意揭露孟什维克的思想根源和特征。孟什维克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走卒，心目中只有资产阶级，而没有无产阶级，更没有农民。他们的思想远远落后于广大工农的革命斗争实践。这就决定他们害怕斗争，害怕胜利。他们的路线就必然是守旧、倒退的。他们“不号召前进而是节节倒退”^③，他们反反复复地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列宁指出，这就是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一切重要决议的“基本的和不变的主题”。^④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则充分相信群众的革命毅力和历史首创精神。列宁坚信：“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②④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97、595页。

③ 列宁：《倒退的第三步》，《列宁全集》第8卷，第519页。

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①

列宁这部光辉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第一次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动力、道路和前途，为俄国无产阶级制定了一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了俄国无产阶级 1917 年推翻沙皇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策略的基础，对于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也有普遍的意义。

布尔什维克为了贯彻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策略路线，深入到工人、农民和士兵中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当时，斯大林同志在南高加索进行了巨大的革命工作。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朱加施维里)，1879 年 12 月 21 日生于俄国南高加索梯弗里斯州哥里城一个皮鞋匠家庭。斯大林在中学学习时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1898 年正式加入梯弗里斯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反对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斯大林坚定地站在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一边。他所写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等著作，批判了孟什维克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在 1905 年革命中，斯大林坚定地拥护党的“三大”决议，揭穿和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领导和组织工人展开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战斗。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工作，革命迅速走向高潮。1905 年 6、7 月间，在梯弗里斯、巴统、巴库等地连续爆发了总罢工。沙皇被革命的风暴吓坏了。为了赢得喘息时间，8 月 19 日，沙皇政府宣布召开咨询性的国家杜马。孟什维克主张参加竞选，布尔什维克则坚决抵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01 页。

制杜马。斯大林当时尖锐地指出：“以枪弹对付无产阶级，以虚伪的诺言欺骗农民，以‘权利’笼络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反动势力用以武装自己的手段。”^①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的斗争发展成为全俄的政治总罢工。

十月全俄政治总罢工首先从莫斯科开始，接着全国铁路工人总罢工。罢工浪潮迅猛地扩展到所有的工业中心城市，直至边远地区，形成了总政治罢工，全国到处是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罢工的有200万人，连下级职员、学生、知识分子也起来响应。这个史无前例的总政治罢工使工厂停工、城市停电、车船停运、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全部社会生活陷于瘫痪状态。

在十月总政治罢工中，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普遍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不顾沙皇政府的法律和禁令，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制，公开出版报纸，收集武器武装群众。这个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政治组织，逐步由领导罢工的机关发展成准备起义的机关。

革命步步高涨，沙皇又大耍反革命两手。10月30日，沙皇发表“诏书”，答应召开由全体公民选举的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并允许公民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地主、资产阶级及其走卒孟什维克都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列宁戳穿了沙皇的骗局，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和孟什维克的无耻背叛。列宁指出，“诏书”的颁布是无产阶级经过英勇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但是，专制制度并没有崩溃，“诏书”只是沙皇政府的“假让步”和“丑恶的滑稽剧”^②，“当沙皇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它的一切让步，甚至直到‘立宪’会议，都只是一种幻象、泡影、障眼法罢了”。^③

① 斯大林：《反动加紧起来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56—157页。

② 列宁：《最新的消息》，《列宁全集》第9卷，第423页。

③ 列宁：《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列宁全集》第9卷，第436页。

事实证明列宁论断的正确。“诏书”墨迹未干，沙皇就出动军警并利用黑帮组织的反革命匪徒在全国大肆搜捕、屠杀工人和革命者。沙皇政府的暴行撕破了议会立宪的骗局。工农群众以更坚决的革命斗争回答沙皇政府。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时机到来了。

为了使总政治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布尔什维克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5年11月，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参加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20日，莫斯科苏维埃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建议，按计划举行总罢工并准备转变为武装起义。沙皇政府调集军队进行镇压，工人们构筑大批街垒进行回击，于是武装起义很快就开始了。近8千名起义的战斗队员和武装工人，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了9天的英勇战斗。他们运用三、五成群的游击战法，给敌人严重的打击。后来，沙皇政府调来了大批援军，炮毁街垒。但是武装工人宁死不屈，浴血奋战。起义的中心——红色的勃列斯尼亚区战斗司令部在最后一道命令中说：敌人“憎恨我们，包围我们，向我们放火，想摧毁我们……流血、暴力和死亡将接踵而至。但是这算不了什么。未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人们以热血和生命为革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战歌。由于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和各区起义领导机关被破获，起义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指挥，起义工人又缺乏武装，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失败了。俄国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也先后遭到镇压。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最高峰。这次起义失败后，革命逐渐转入低潮。1907年2月沙皇政府召开第二届杜马。由于革命已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届杜马。6月16日（俄历6月3日）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强行解散第二届杜马，逮捕并流放了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全体成员65名，擅自颁布了更为反动的选举法。这就是“六三政变”。从此俄国历史进入

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造成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和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很大一部分农民对沙皇及其工具——杜马还存幻想，行动散漫，缺乏组织和决心；工人发动不够普遍，还没有统一的指挥，动作不够协调；特别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相当多的工人思想混乱，分裂了工人的队伍，破坏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西欧帝国主义帮助了沙皇政府镇压革命——法国银行家贷给沙皇巨款，德国陈兵边境，随时准备武装干涉。1905年9月日俄和约的缔结也巩固了沙皇的地位。

二、俄国 1905 年革命的历史意义。对 1905 年革命两种根本不同的估计

1905 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为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

这次革命揭示了社会各阶级的真实本性，它证明了：沙皇专制制度是人民的死敌；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民主革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农民完全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这次革命使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受到一次战斗的锻炼，提高了觉悟性和组织性，获得了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本领和武器，积累和丰富了革命斗争经验。这次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特别是十月全俄总政治罢工和十二月武装起义证明了：政治罢工是无

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强大武器，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手段，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一种很好的政权形式。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高度赞扬群众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和历史主动性。他指出：“使武装起义同无产阶级特有的武器——群众性的罢工结合起来，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明显，这个经验对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意义的。”^①“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争的榜样应当成为我们在教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②列宁还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创造的苏维埃，指出它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革命政府的萌芽”。^③

总之，这次革命使俄国人民取得了在“和平”时期几十年所不能得到的丰富的斗争经验，给俄国以后的历史发展以深远的影响。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④

俄国1905年革命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结束了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社会的“和平”发展时期，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新时期。在这次革命的影响下，全世界的工人“也准备投身于伟大的决战中”^⑤，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这次革命还“唤起了整个亚洲的运动”^⑥，在1905—1911年间，伊朗、土耳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等地相继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①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6页。

② 列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15卷，第43页。

③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3页。

④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4页。

⑤ 列宁：《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列宁全集》第9卷，第421页。

⑥ 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8页。

但是,怎样评价 1905 年革命,怎样对待这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完全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他们把反动政权视为圣物,而把俄国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苏维埃,则仅仅看作是罢工委员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竭力贬低苏维埃的伟大意义。从 1903 年起就滑进机会主义泥坑的普列汉诺夫,这时更进一步暴露了他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嘴脸。十二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以后,普列汉诺夫便出来指手划脚,说政治罢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引起了起义;说什么起义的失败是“不难预料”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等等。列宁严厉地批判普列汉诺夫这种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贵族老爷式态度,痛斥他是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勇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①普列汉诺夫竟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 1870 年也曾阻止巴黎工人的起义。列宁指出,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经警告法国工人,不要举行不成熟的起义;但是,**“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②列宁说,马克思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而普列汉诺夫在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前,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起义失败以后,又瞎说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怎样评价 1905 年革命,怎样对待这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国际上也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和态度。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

① 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66 页。

②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90 页。

派，极端仇视俄国革命，诽谤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胡说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是“半野蛮”国家里的“野蛮的”斗争方式，不适用于西方“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当俄国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伯恩斯坦在德国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狂热地鼓吹议会道路、改良主义。他咒骂总罢工“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贫困”，“它只会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发动一次总罢工很可能引起一次流血的革命，很可能造成一种必然导致暴力冲突的局面。但工人阶级毫无理由拿他们切身的利益进行赌博”^①等等。

同一小撮修正主义者相反，俄国革命爆发以后，全世界的工人和劳苦大众都带着激动和欢乐的心情庆祝俄国工人的胜利。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罗马尼亚、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工人们，在“学习俄国同志的榜样”的口号下，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募捐，抗议沙皇政府的暴行，介绍俄国工人的革命事迹和斗争经验，支援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法国塞纳省工会在致俄国工人书中热烈地表示：“革命城市巴黎的工人们，把整个的心献给你们。你们不必顾虑，我们一定支援你们。打倒沙皇！……社会革命万岁！”各国无产阶级还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沙皇政府的反革命企图。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号召工人抗议政府派遣军舰到俄国去；法国无产阶级要求政府解除同沙皇专制政府的联盟；罗马尼亚劳动者为了帮助因起义失败流亡，国外的“波将金”铁甲舰的水兵，成立了“支援俄国水兵协会”。在亚洲的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和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也出现了声援俄国革命的运动。

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如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¹⁸，波兰的马尔赫列夫斯基¹⁹，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等，都热烈地欢迎和支持俄国革命，坚决主张学习和采用

^① 见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和经验。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无产阶级“站在俄国革命的旗帜下行动起来！”卢森堡以沸腾的革命热情，不畏艰险，不怕坐牢，到处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坚决主张采用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和经验，积极参加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左派对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和伯恩斯坦之流的批判斗争，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她热情洋溢地写道：“伟大的俄国革命将成为以后几十年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师表。”^①

三、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国内革命战争“这个学校是很艰苦的，它的全部课程必然包括反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镇压等等”。^②在革命的转变时期，尤其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有没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坚韧精神，能不能正确地估计形势，会不会根据新的形势采用新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把革命坚持下去，这对每一个政党和革命队伍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六三政变”以后，沙皇政府对工农革命群众和社会民主工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政治上，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了绞架，几千名革命者惨遭绞杀，几万名革命者被监禁流放，宪兵、特务横行无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沙皇政府还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大量增加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经济上，资本家把工人积极分子列入“黑名单”，开除出厂，同时又用降低工资、延长工时等手段，对广大工人加重奴役和盘剥。沙皇政府还通

①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演说论文选》第2卷，1955年德文版，第257页。

②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7页。

过1906年11月颁布的《斯托雷平土地法》²⁰，力图培植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作为自己在农村的支柱。这就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

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多数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干部被枪杀、逮捕，混在党里的革命“同路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退党、脱党，有的当了叛徒和內奸。

以唐恩²¹、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大部分孟什维克，被沙皇政府的反革命暴力吓倒了。他们悲观失望，不相信革命会重新高涨起来。他们认为“六三政变”后，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政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了”；今后的中心任务不再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而是期待“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他们还叫嚷党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害的”，恢复党的秘密组织的努力是“反动的空想”，因而提出了建立“公开的工人党”的投降主义口号。他们甚至不惜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革命传统来换取合法地位。他们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和群众集会上公开反对党，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他们变成了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

另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以波格丹诺夫²²、卢那察尔斯基²³为代表的坚定分子，则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号，否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否认改变斗争策略的必要性，反对党利用合法机会进行工作，特别是坚持要把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从第三届杜马中召回来，故被称为“召回派”。

面临着社会上反动势力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联合进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进入了政治动摇、组织瓦解和思想涣散的严重危机时期，处境极为困难。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仍然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党的纲领，为发展新的革命运动，保卫党的秘密组织，同反动势力和取消派、召回派进行了顽

强的斗争。

同取消派和召回派对形势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估计完全相反，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仍然满怀信心，既确认革命已处于低潮，又坚信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早在1906年3月，列宁就指出：“革命被葬送了。蛆虫正在蛀蚀革命。然而，革命具有一个特点，它能在良好的土壤中很快地复活并且蓬勃地发展起来”。^①这是因为，俄国原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并没有解决，工农大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有一位织布工在一封信中写道：“工厂主夺去了我们的果实，副工长仍旧象过去一样嘲讽我们，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列宁兴奋地指出，这就是工人们想法。因此，列宁确信“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奋起进行这种斗争，一定会重新来领导革命”。^②

根据革命处于低潮这一新的形势，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改变策略，采取迂回的、防守的斗争手段，以便重新团结、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就是说，党必须实行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方针。这个策略方针要求：保存和巩固党的组织，使党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斗争；同时又要善于利用一切合法、半合法的组织和机会，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公开据点，巩固和加强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掩护党的秘密斗争。这是一个和取消派的合法主义以及召回派的冒险主义根本对立的方针。

列宁彻底地批判取消派的投降主义方针，揭露了它们的阶级实质。列宁指出，取消主义是“走到了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③它们的“公开的工人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

①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189页。

②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2卷，第391页。

③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59页。

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①它们“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②因此,列宁把取消派称为“斯托雷平党”。^③

列宁在批判时明确指出,秘密斗争是主要和基本斗争;保存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基本任务。因为,只有党的秘密组织,“才能指导合法组织中的一切工作,才能使这些工作具有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④

列宁还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在对待合法活动问题上的界限,指出,布尔什维克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是为了宣传教育群众,揭露沙皇反动专制制度;取消派则希望在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范围内。

列宁同时彻底地批判了“左”倾空谈家——召回派的机会主义实质。列宁指出,召回派拒绝利用合法机会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在秘密组织中闭关自守,使秘密组织失去掩护。他们事实上是拒绝党去领导广大非党群众,同取消派一样,放弃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因此,列宁把召回派称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⑤,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⑥

列宁在驳斥召回派对布尔什维克利用杜马进行革命活动的攻击时,还指出了这一活动同议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布尔什维克反对“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和独立存在的活动。尤其是必须尽力使党团确实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职能之一,并且使党团同党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是同党隔

①②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70、464页。

③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13页。

④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7—258页。

⑤⑥ 列宁:《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列宁全集》第15卷,第330页。

离,而是贯彻党的观点,贯彻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机关的指示”;在议会活动中,“无产阶级政党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想替农奴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①

列宁在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揭示了它的社会阶级根源,同时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取消派和召回派都是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他们在革命时期卷入了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他们最不能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缺乏坚持斗争的精神,最容易倾向于机会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同小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阶层接触,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外人,使他们服从自己,而不是服从他们”^②;要对那些“缺乏一种不仅在革命顺利时期而且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精神的人,进行不断的教育和改造”。^③在某种情况下,必须同他们公开划清界限,否则,就可能成为他们的俘虏。

列宁在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反复阐明了同顽固的机会主义者公开决裂的必要性。1909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直接谴责了取消派。同年6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召开了《无产者报》²⁴扩大编辑部会议,严厉批判了召回派,并把拒绝党的批评的波格丹诺夫等召回派分子清除出布尔什维克。1910年1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又一次斥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揭露了他们的阶级根源,并号召全党同取消派决裂。与此同时,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

① 列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第409页。

②③ 列宁:《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4、425页。

说服和教育那些受取消派和召回派影响和蒙蔽的同志，使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为了保护党，列宁还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了暂时的护党联盟，共同反对取消派，“不过这不是要消除原则性的分歧，而是为了使真正统一的工人政党团结起来，使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致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和共同的斗争”。^①

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完全采取了取消主义的立场，但却用“反对派别主义”的动听言词掩盖起来，鼓吹同机会主义“和平相处”的谬论，并且污蔑列宁“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就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②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组织了“八月联盟”，把取消派、召回派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纠集在一起，进行反党和反对列宁的罪恶活动。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一贯随风转舵、左右摇摆的丑恶历史，指出他自命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实是“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③，是一个“最最恶毒的分裂派”。^④列宁还把他比作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称他为“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⑤

在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坚持列宁的革命路线，建立了巩固的党的秘密组织，同时依靠秘密党组织的领导，巧妙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组织和机会，如国家杜马、职工会、《真理报》、合作社、俱乐部、疾病保险社、戒酒会等，成功地进行革命斗争。

① 列宁：《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4页。

② 转引自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504页。

③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卷，第506页。

④ 列宁：《“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4页。

⑤ 列宁：《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

国家杜马是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低潮时期进行合法斗争的全国性据点。特别是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遵循列宁的革命原则，以杜马为讲坛，抨击沙皇政府的罪行，揭穿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本性，同时利用党团成员的合法身份，经常深入工厂进行宣传鼓动，召开秘密会议，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职工会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进行合法斗争的重要据点，联系广大工人群众的纽带。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工会工作，恢复了大批被瓦解的工会组织，发展了新的工会组织，并把取消派分子从许多工会组织中清除出去。

1912年5月，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彼得堡创办了《真理报》。它是布尔什维克进行合法斗争的另一全国性据点。布尔什维克通过《真理报》巧妙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沙皇制度的凶恶本性，打击取消派的分裂叛卖活动，鼓舞、教育和团结了广大工农群众，密切了合法组织和秘密党的联系，培养和锻炼了一代工人和党的干部，为俄国革命的胜利作了重要的准备。

由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坚韧的斗争，到1914年它就把俄国4/5的觉悟工人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据统计，1914年捐款援助布尔什维克刊物的有5,600个工人团体，而捐款援助孟什维克取消派刊物的却只有1,400个工人团体。在工人选民团选出的杜马代表中，布尔什维克所占的比例由第二届杜马的47%上升到第四届杜马的67%。布尔什维克在路线斗争中的胜利迎来了1912年以后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四、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伟大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它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

也加强了进攻。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是帝国主义腐朽性在哲学上的反映，是垄断资产阶级用以麻痹广大人民革命意志的精神武器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工具。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因对工人运动毒害最深的反动哲学思潮，有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

新康德主义在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者——资产阶级教授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实际上他们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回到”康德的唯心主义那里去，把康德哲学中的恶劣的、反动的、僵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重新拼凑成一个体系。

马赫主义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也出现于德国。其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1838—1916)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阿芬那留斯(1843—1896)。他们声称要批判地了解经验，因此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经验批判主义。他们所说的“经验”，是感觉的总和，是主观臆想的东西，而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他们所说的“批判”，就是清洗掉对经验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坚持唯心主义的理解。所以，马赫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我论。列宁称之为“休谟主义²⁵和贝克莱主义²⁶的混合物”。^①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他们在哲学方面，都“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②伯恩施坦之流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德、奥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如弗·阿德勒、奥·鲍威尔等人则拣起马赫主义作为武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宣称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用平静的“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宣布宗教对于无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 204—205 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 页。

产阶级政党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总结和“消化”丰富的革命经验教训的时期。因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使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高潮过去了，人们“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①不同的世界观对革命的经验教训有不同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产生不同的政治路线。因此，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结革命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②

就在这个时期，俄国反动势力在政治、经济战线上猖狂进攻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向革命反扑过来。有一批时髦作家跳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辱骂和讥笑革命，赞美叛变行为，贩卖资产阶级哲学，鼓吹宗教，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在这种形势下，革命的同路人特别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腐化和颓废情绪的浸染十分严重。这些同路人是在革命高潮中从资产阶级方面跑进革命队伍的。他们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缺乏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革命一失败，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便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在政治上表现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在哲学上表现为推崇马赫主义。他们的著名代表是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²⁷，孟什维克的尤什凯维奇²⁸、瓦连廷诺夫²⁹和社会革命党的头目切尔诺夫³⁰等人。这些人在哲学上形成了统一战线，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1908年，他们连续出版了《关于

①②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401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等四本书，企图用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叫嚷唯物主义“过时了”，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公然宣称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宗教”和“神”。

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同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相关的。列宁指出：哲学问题上的斗争“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别’有‘真正的现实的联系’”。^①俄国修正主义者以马赫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武器，是为了推行其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马赫主义是否认现实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客观存在，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正好成为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主观主义的形势分析和阶级估量、推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特别是召回派推行冒险主义的极“左”路线的理论根据。

“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②取消派和召回派都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实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都企图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革命失败后被打入了地下，因此，“领导权消逝了”。“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是决不存在的”，列宁说，这就是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的理论前提。^③

取消派否认革命失败以后旧的矛盾依然存在，他们颠倒客观历史事实，为取消党、投降资产阶级寻找理论根据。“因为直截了当地干脆地承认不容置疑地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给取消派的**“全部取消主义哲学一记耳光”**。^④

召回派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线的中心就是反对党在革命低潮时期进行议会斗争。这个派别的头子波格丹诺夫认为，在反动的年代里，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列宁尖锐地指出，这“十足地表现

①④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58、49页。

②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③ 参见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63页。

了召回派在政治上信口开河的本性”^①；这说明了他们根本不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根本不去“稍微考虑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②他们只会空喊、机械地重复在革命高潮时的口号，“而不是自觉地深思熟虑地使之适应于已经改变的客观情况”。^③

马赫主义这种唯心主义，也是召回派宗教造神说的理论基础。因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④而俄国马赫主义者站在唯心主义的阵地上宣扬造神说，正是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在革命低潮时期，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更需要复活宗教、编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因此，“对造神说的宣扬就具有了社会性和政治性”^⑤，“马赫主义这个变相的唯心主义客观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⑥

马赫主义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打着“无党性”的旗号，标榜“驾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二是披着科学的伪装，声称自己是反映了“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俄国马赫主义者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⑦他们“跪着造反”的本性正需要这种伪装得更精巧的哲学为其辩护。他们事实上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革命，口头上却又百般抵赖，不敢公开明确地反对被他们抛弃了的观点，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可耻行为，还无耻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打着哲学“无党性”的幌子，把马赫主义这个“最新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实则采取折衷主义的形式贩卖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以代替“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

①②⑤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列宁全集》第16卷，第18、21、33页。

③⑥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54、60页。

④⑦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76、6页。

种手法,较易迷惑人。

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和以此为出发点的不可知论,也是俄国修正主义所需要的,因为它可以证明任何诡辩、任何无原则的立场都是正确的,可以为背叛革命、动摇变节的可耻行径作辩护。

由于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配合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反动势力在哲学上的猖狂进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便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①列宁说:“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方面的曲解,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②

为此,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在1908年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对马赫主义及其他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思潮给予了毁灭性的批判和打击,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列宁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可知论,精辟地阐明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理。

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精神同物质的关系问题上开始的。恩格斯认为,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感觉是物的反映或映象。马赫主义却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列宁指出,这就是“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③列宁在剥去了马赫主义的种种伪装和诡辩之后,揭露了它的反动实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世界是我们的感觉,是主

①②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402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8页。

观唯心主义的。它的荒谬就在于导致唯我论。

客观世界能不能认识？精神和物质有没有同一性？马赫主义者是不可知论者。他们攻击唯物主义承认客观实在及其可知性是超出经验或感觉的范围和界限，是“形而上学”。列宁针对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提出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①；人们的认识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认识到比较确切的认识过程。列宁给物质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② 这些结论划清了唯物论与唯心论、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原则界限。

接着，列宁又批判了马赫主义在真理问题上的谬论。马赫主义者公开宣称他们是相对主义者，只承认相对真理，否认绝对真理，因而也否认了客观真理。波格丹诺夫说：“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③ 列宁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主观真理观，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④ 列宁在批判中阐发了恩格斯关于认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他说：“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⑤ 人的认识，正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推移的过程。在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基础问题上，马赫主义者还把认识和实践分割开来，看成是两回事。列宁在批判

①③④⑤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92、120—121、128、127页。

⑥ 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13—114页。

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时强调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这个重要结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马赫主义者还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认为这种规律性不是物质世界固有的，而是从意识、理性和逻辑中得出来的。“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就是他们的公式。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论，人们为了“方便”，似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规律，任意地改变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是十分荒唐的。列宁在驳斥这种谬论时指出：“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②

（二）列宁揭露了马赫主义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罪恶目的，捍卫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先后发现了电子和放射性现象。这就使古典物理学的适用范围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打破了机械自然观，证明旧物理学关于质量不变、原子不可分性等形而上学的观念是错误的。“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待辩证唯物主义去‘处理’。”^③但是一些科学家由于不懂辩证法，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从相对主义陷入了唯心主义。马赫主义者抓住这一点，叫嚷物理学发生了“危机”，说什么“物质消失了”，存在着“没有物质的运动”，科学原理不过是一些“符号”和“记号”等等。他们以此证明唯物主义“过时”了，不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应当进行“修正”。

针对这些谬论，列宁明确地指出，物理学的新发现，只是证明

①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4、162—163页。

③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59页。

机械自然观的破产,但物理学并没有“破产”,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没有被推翻,而且获得更充分的科学论证,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列宁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是由于物理学家不懂得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使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

接着,列宁揭露了马赫主义者鼓吹“物质消失了”的唯心主义实质,说明“消失”的不是物质,而是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我们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物理学的新发现证明:物质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任何关于物质结构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只具有相对的性质。这“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①,而整个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和整个经验批判主义都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废物”。

列宁还指出摆脱自然科学的真正危机的出路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代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列宁这些论述,彻底地揭穿了马赫主义者自我标榜的“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的伪装。

(三) 列宁揭示了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批判了马赫主义者反动的唯心史观;全面地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揭露了马赫主义哲学的“无党性”的实质。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认为马赫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企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马赫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首先揭露了马赫主义的发源地德国的马赫主义者 布莱³¹和彼得楚尔特³²的历史观的反动本质。布莱以马赫主义的观点为论据,污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胡说马克思关于资本、劳动等概念是“超验的范畴”。这是明目张胆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62页。

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否认其所研究的规律的客观性。彼得楚尔特则否认世界物质的统一性，而认为追求稳定性倾向是一切有机生物也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制度正在逐步走向符合人类的稳定性倾向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他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是从马赫主义引伸出来的一个唯心史观的标本。列宁对他们的反动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们“无论在认识论上或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的同样反动的内容”。^①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和马赫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同样是根本对立的。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企图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论来“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说：“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等同的。”^②列宁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它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③，是为反动派效劳的。列宁通过对马赫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分析批判，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理，指出：“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它们是一整块不可分割的钢铁，“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④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之后，集中地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揭露了马赫主义“无党性”的虚伪性。

列宁总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各种唯心主义、机会主义和

①③④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22、325、326—327页。

② 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23页。

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和哲学史上的斗争，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说：“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①

列宁认为对宗教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很能说明一种哲学思想的党性，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就是马赫主义反动政治作用的一种表现。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理性的产物，是一种信仰，一种“新的宗教”。这种造神说或“新的宗教”正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反动年代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最好的思想棍棒、精神棍棒。由此可见马赫主义“无党性”是十分虚伪的。

列宁作出结论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②

哲学的党性就是阶级性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一定的哲学总是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经验批判主义则完全是为僧侣主义即造神说、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粉碎了马赫派修正主义的进攻，给企图以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给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思潮及其思想渊源——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列宁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武装了布尔什维克的

①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36、360页。

干部,奠定了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这部著作,从理论上总结了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概括了恩格斯逝世以来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宝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中,不断地扩大马列主义的影响,使俄国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布尔什维克必须同孟什维克彻底决裂,以便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统一策略、统一组织的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布拉格召开了有20多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亲自领导的这次代表会议,指出了俄国革命运动重新高涨的大好形势,确认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低潮时期的策略原则,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了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的决议,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此,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形式上统一在一个党内的局面,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这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形成,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同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反对经济派和孟什维克,反对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直至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全部斗争史,就是为建立这样一个新型革命政党而斗争的历史。列宁的《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光辉著作,为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盘踞在德国社会

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机构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站在俄国党内机会主义者一边，打击布尔什维克。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再让托洛茨基和取消派利用其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诽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还资助取消派，企图帮助他们另立新党。对于这种干涉行为，布尔什维克多次抗议。布拉格会议以后，第二国际执行局通过了安排俄国各派“交换意见”的计划。列宁表示交换意见可以，同时又指出考茨基所谓俄国党“已经消失”的错误。1914年7月，第二国际主持俄国各派的会议。会议在考茨基把持下，通过了一个恢复“统一”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根据列宁指示拒绝参加这一决议案的表决。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使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干涉活动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斗争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再次证明了“**无产阶级的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①，“**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②这一真理。

第三节 战争危机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 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的 破产

一、20世纪初期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和亚洲的觉醒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帝国主义在争夺霸权和分割殖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页。

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60页。

民地的斗争中，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帝国主义集团。1907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笼罩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矛盾愈趋尖锐。它们疯狂地扩军备战。战争危机四伏，局部战争不断发生。1908—1909年，俄国与德、奥之间因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³³差点儿打了起来；1911年，为了争夺摩洛哥，发生了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危机；同年，爆发了意大利夺取土耳其在非洲的属地的黎波里³⁴的战争；1912年又爆发了巴尔干各国反对土耳其统治者的战争；1913年保加利亚又与希腊、土耳其、塞尔维亚³⁵等国进行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些战争背后站着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这就意味着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军备竞赛的加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同1872年比较，1912年英、法、俄、德、奥分别增加了180%、133%、214%、335%、155%。这就加重了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榨，促使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

在德国，1906年1月17日，汉堡10万工人举行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性政治罢工，并与军警发生了流血的武装冲突。1905—1906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德国就有80多万人参加了罢工斗争，这几乎是过去15年参加罢工人数的总和。1910年，德国工人掀起了要求实行普选权的运动。3月6日柏林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遭到警察的屠杀。于是这一天称为“德国的流血星期日”。反动派的镇压，使革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4—6月间，柏林、汉堡等地爆发了建筑工人大罢工。秋天又发生了汉堡造船工人大罢工。1912年3月，鲁尔爆发了25万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列宁十分重视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认为它是革命的前奏。

在英国，尽管1906年上台的自由党采取了欺骗政策，也不可

能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特别是1910年以后，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罢工规模越来越大。1910年罢工者达51万5千人，1911年增至96万人，1912年则高达140万人。1911—1912年间爆发了著名的码头、铁路、煤矿工人总罢工，其中1912年百万煤矿工人全国性的总罢工，坚持了35天，列宁称它为“划时代”的罢工运动。

1905年以后，法国工农运动也高涨起来。从1906到1914年，就有200多万工人参加罢工，其中1906年罢工达1,300余次，1911年达1,470多次。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是1908年发生在巴黎附近的特罗维尔城，这次罢工发展成为工人反对军警的街垒战。1907年夏，生活极端贫困的法国南部种植葡萄的农民还举行了武装暴动。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奥匈帝国，工人运动也日益发展。1905年底，各民族工人为了争取普选权展开示威游行，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示威群众还与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一斗争迫使政府不得不同意实行普选。1908年，布拉格发生暴动。1912年，奥地利发生工人抗议物价高涨的运动。同年，在匈牙利爆发了要求实行普选权的政治总罢工。

意大利的工人运动更为高涨。1901年共发生了1,671次罢工。1914年6月，反对军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变成了工人和军警的街垒战。东北部许多城市爆发了武装起义，有好多地方工人们一度推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成立了共和国。这些起义虽然在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却显示了工人的战斗精神。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美国、日本，也广泛开展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工人运动已经开始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从议会合法斗争走向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道路。它说明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条件正在逐渐成熟。

但是,帝国主义疯狂地扩军备战,不仅加重了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榨,同时通过加强与亚洲各国封建势力的勾结,也加紧了对这些国家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压迫愈重,反抗愈烈。20世纪初,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蹂躏的亚洲人民,掀起了席卷整个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风暴,沉睡的亚洲觉醒了!

1905年俄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这个“亚洲宪兵”^①、“东方民族的恶魔”^②,促进了亚洲革命风暴的到来。列宁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③

在这个革命风暴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

20世纪初,伊朗主要为英、俄所控制。破产和饥饿逼迫人民走上革命道路。1905年俄国革命深刻地、直接地促进了伊朗革命。1905年12月,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爆发了反对专制王权的罢工、罢市和示威游行,要求国王实行民主改革。革命形势迫使国王于1906年8月下令召开立宪国会,颁布了伊朗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形式上给了人民一些民主权利。1906年以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农民抗租抗税,夺地夺粮,拒服劳役;工人、商人、手工业者不断起来斗争,不少地方建立了革命政权“恩楚明”和革命武装“费达伊”。1907年8月,受革命直接打击的英、俄帝国主义,签订了瓜分伊朗的协定,决定联合干涉伊朗革命。1907年12月和1908年6月,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国王两次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镇压革命人民,废除宪法,解散国会。政变后,革命中心转移到南阿塞拜疆首府大不

① 列宁:《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1页。

② 斯大林:《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0页。

③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里士和附近的吉兰省。革命人民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继续进行斗争。1909年7月，革命军队和南部一个反国王的部落军队一起攻克了德黑兰，推翻了国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反动统治。以后，由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反动势力勾结了英、俄、美等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镇压，伊朗革命在1911年12月就被扼杀了。

1905—1911年的伊朗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动摇了封建制度，打击了英、俄帝国主义，开辟了伊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土耳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国王哈米德二世，在国内实行极端暴虐的统治。1905—1907年土耳其统治下的马其顿³⁶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和阿拉伯等被压迫民族纷纷起义。这使当时已濒于瓦解的土耳其资产阶级政党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振作起来。青年土耳其党的纲领是恢复1876年宪法，反对国王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了人民起义，国王被迫恢复宪法，召开国会。青年土耳其党人于是宣告革命结束。他们继续保留哈米德二世的王位，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利益；他们害怕、压抑、阻挠甚至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1909年4月，国王亲信的军队勾结反动派，又策动了反革命政变，解散了议会和内阁，把青年土耳其党人逐出首都。青年土耳其党利用人民反对复辟的革命情绪，重组革命军队。两个星期后，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再克首都伊斯坦布尔，恢复议会，废黜了国王哈米德二世。青年土耳其党人重组内阁，掌握了政权。

但是，这次土耳其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人虽然提出过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但却没有付诸实施。他们掌权以后，勾结内外反动势力，拒绝广大工农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成了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自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起彼伏,频繁发生,规模逐年扩大。1905 年 8 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同盟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号召中国人民“闻风而起,效法俄国人民起来革命”。此后,全国许多省掀起了反对日、俄、美、英、德等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各阶层人民发动了抗租、抗捐、罢工、罢市、罢课的革命斗争。这个时期,同盟会先后组织了 10 次武装起义。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这个起义震动了全国,各省积极响应,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就是有名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这次革命虽然由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而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辛亥革命在这次亚洲革命风暴中,是一次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比较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当时亚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中国革命,并给予很高的评价。1912 年,布拉格代表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①

^①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457 页。

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外,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也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

1905—1911年,越南人民展开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早在1893年就开始了的黄花探领导的大规模的抗法游击战争,继续深入发展,一直坚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04年潘佩珠等人创立维新会,开展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扩展到农村,在殖民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南、广义等省农民,从1908年2月以后,掀起了反拉伕、反纳税运动。在辛亥革命影响下,1912年,越南革命者成立光复会,提出了“驱逐法国殖民者,争取越南独立,成立越南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并且组织了光复军,发动了抗法武装暴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斗争归于失败。但它标志着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朝鲜在日俄战争以后,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高潮,义兵运动高涨起来。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基本群众的义兵是朝鲜人民自愿组织起来的武装。1907—1911年,义兵在全国240多个郡开展反日游击战争。据日本官方缩小的统计数字,这期间,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达14万多人,作战达2,900余次。义兵运动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它给予日本侵略者和卖国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以后,朝鲜人民继续坚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

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从1905至1908年持续了3年。1908年7月,孟买10余万工人,举行了6天的政治总罢工。它标志着印度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①

^①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8页。

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在 1905 年以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人成立了工会,要求民族独立的政治组织如“印度党”、“伊斯兰教联盟”等纷纷建立,民族运动发展到比较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阶段。

20 世纪初的亚洲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助手参加革命的。所以,革命领导权由资产阶级掌握着。然而,由于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一直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但是,这次亚洲的革命运动同 19 世纪相比,不仅规模有所扩展,而且水平也有所提高。19 世纪亚洲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斗争,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自发分散的暴动,斗争方式比较原始,多半以宗教外衣为掩护,缺乏鲜明的政治意识和明确的斗争目标,而且与欧美工人阶级的革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20 世纪初的亚洲革命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参加运动的有还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更带有自觉性和组织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斗争的旗帜;与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有了初步的联系和配合。这就充分地表明,亚洲各国人民已经有了新的觉醒。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们已经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强大同盟军。

亚洲的觉醒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震撼了整个世界。但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不仅根本漠视殖民地问题,而且猖狂反对和咒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则坚决支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列宁在这个时期写了一系列文章,高度评价亚洲觉醒的意义,

热烈地赞扬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刻地阐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道路。

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它们在亚洲革命中所扮演的宪兵角色，特别是沙皇俄国“在亚洲重演1849年俄国在欧洲所干的勾当”。^①列宁教导亚洲各国人民要警惕和识破帝国主义的两面手法，从而要把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同推翻帝国主义结合起来，给被压迫民族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列宁英明地指出，亚洲是世界革命风暴的新泉源，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已经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强大同盟军。列宁写道：“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拚命赞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②列宁高兴地看到欧洲工人阶级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亚洲亿万劳动者有欧美各国无产者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因此列宁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③

列宁还指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指出亚洲革命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破产。他在总结亚洲革命经验时深刻而生动地写道：“亚洲各国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卑鄙无耻、民主群众独立活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间的明显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

① 列宁：《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0页。

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③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450页。

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①列宁深信：“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②

二、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列宁团结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巴塞尔大会的反战宣言

在帝国主义战争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日益成熟的形势下，从1907—1912年，第二国际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民族殖民地、党的策略原则等迫切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当时修正主义势力日益猖獗，左派力量还较小，而且他们对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还缺乏认识，所以，斗争是十分艰苦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发扬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团结、发展左派，争取、教育中间派，孤立、打击右派，会上会下相结合，进行了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连连挫败修正主义，使这几次大会通过了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决议。

1907年8月，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召开了来自五大洲25个国家的884名代表参加的、空前盛大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第一次亲自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出席国际大会，同修正主义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这次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的机会主义立场，起了恶劣的作用。他们为了操纵这次大会，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反民主的措施。他们利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由德国党的代表担任全体会议的主席，并派出自己的重要成员担

①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40页。

任大会最主要的几个委员会的领导，如由休特古姆担任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的主席，由考茨基担任党同工会关系问题委员会的书记。他们还使大会规定了不平等的表决权，大国党是 20 票，小国党只有两票，而德国党实际上攫取到 50 票的表决权。

德国党一方面让党内极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大卫、列金³⁷、谢德曼³⁸、福尔马尔等人参加代表团出席大会；另一方面又用尽一切办法阻挠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卢森堡参加大会。卢森堡经过斗争冲破他们的阻挠，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右派和“中派”占了多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卢森堡、马尔赫莱夫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以蔡特金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处于少数。

大会的中心问题，亦即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问题。会上提出 4 个草案：法国极“左”派爱尔威³⁹的草案，打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旗号，主张“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饶勒斯和瓦扬代表法国社会党多数派提出的草案，充满了沙文主义精神，叫嚷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盖得代表法国社会党少数派提出的草案，虽然认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但是主张大会不必确定国际在战时的态度；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决议草案，正确地指出了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战争才不会发生，但是，这个草案错误地以“防御”或“进攻”作为区分战争性质的标准，并且由于害怕党的合法地位受到威胁，不敢明确提出反对军国主义的具体任务和行动。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分析批判了这几个草案中的错误。

列宁指出，爱尔威的草案“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

争”^①；他不懂得是不是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战争，“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②；他“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③列宁说，反对战争的目的“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④

同列宁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反，福尔马尔等人借批判爱尔威的错误，宣扬机会主义观点，说什么反对战争的斗争形式是议会斗争，应当用加强对执政当局和社会舆论的影响来制止军事冲突，而不应当用罢工来反对战争。针对这种谬论，列宁指出，对爱尔威的批判，“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比较和平与安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⑤

列宁也批判了倍倍尔草案中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他指出，这个草案“使别人有可能戴着机会主义眼镜来阅读倍倍尔的正统原理。福尔马尔立刻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⑥然而鉴于倍倍尔是第二国际享有众望的领袖，他的草案又包含有正确的部分，并且是代表整个德国代表团提出的，容易为大会所接受，于是，列宁乃决定以倍倍尔的草案为基础，加以修改。

列宁召集了有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参加的会议，并和卢森堡一起对倍倍尔的草案进行了修正。这些修正是：“(1) 说明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2) 指出在青年中间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3) 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仅要反对发动战争和尽速结束

①④⑥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3、64页。

②③⑤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48、749页。

已经发生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①列宁为了使倍倍尔接受自己的观点，同他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协商，终于使他同意了修正案。

经过修改，原来的倍倍尔的决议草案面目为之一新。列宁说：“这个决议真正有了丰富的思想，并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个决议既具有正统的，也就是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用福尔马尔的眼光阅读不了这个决议，而幼稚的爱尔威思想的狭窄框子也容不下这个决议。”^②经过列宁修正的这个决议案，在大会上一致通过。列宁的这一修正案为无产阶级指明了用社会主义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动路线。它成为以后指导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策略路线。

殖民地问题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又一个问题。

荷兰修正主义者万-科尔提出的决议案，根本不谈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争，不去唤醒殖民地被迫群众起来反抗殖民主义，而只是列举资本主义制度下殖民地可能做到的“改革”。这个决议案甚至公然宣称：“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③这一提案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得到了多数机会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受到了左派的坚决反对。在大会讨论时，伯恩斯坦等人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公开叫嚷“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统治的，一种是被统治的。有些民族还是小孩子，他们自己不能发育”。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腔调，居然在大会上得到不少人的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为帝国主义殖民

①②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64—65页。

③ 转引自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44页。

政策辩护的反动观点。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①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②

经过尖锐的斗争，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团结了没有实行殖民政策和深受殖民政策之害的中小国家代表，在表决时以 128 票对 108 票通过了一个谴责殖民政策的决议。但是，由于大多数左派还不了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问题。

大会还讨论了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机会主义者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关系，彼此不相从属。普列汉诺夫也竭力为“工会中立论”辩护。

列宁彻底批判了“工会中立论”，指出工会中立实际上是对党实行中立，这只能加强资产阶级的影响，使工人阶级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宣传工会中立，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为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张目。**”^③他希望一切国家要引以为戒。大会经过斗争，通过了原则上否定“工会中立论”的决议。

由于列宁和各国革命左派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斯图加特大会本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可是大会也暴露了修正主义的病毒已经深入第二国际的肺腑，特别是一向在第二国际中居于前列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日益滑向修正主义。列宁痛心地看着这一严重现象。会后，他根据这一情况，论述了对德国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应该采取的态度。列宁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④，不应当

①②④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745、744、743 页。

③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63 页。

掩饰这些错误”，而“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①，从他们所犯的错误的教训中学会避免这些错误，更严格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斯图加特大会以后，列宁继续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908年4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列宁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著名论文，全面揭露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反动实质，科学地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深刻地阐明了反修正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意义。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②

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1910年8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了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第二次亲自出席大会，并且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由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合作社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因此，社会民主党如何看待工人合作社的问题，成为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大会开幕以前公布了三个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草案，继承了从蒲鲁东到伯恩施坦老机会主义流派的衣钵，把合作社捧上了天，鼓吹合作社可以协助工人“准备生产和分配的民主化和社会化”，鼓吹合作社的中立性。比利时代表的提案则与此不同，它反对把合作社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和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认为合作社只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希望各国社会党同合作社建立密切的联系。法国社会党少数派的草案强调合作社的意义是有局限性的，要求防止对合作社的幻想，并主张无产阶级的真正任务是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

① 列宁：《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0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

收归公有。列宁分析了这三个草案，指出这里反映了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路线，承认合作社对这个斗争的意义，认为它是进行这个斗争的工具，是进行这种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并且确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这种作用而不会成为纯粹的商业企业。另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它模糊了合作社在无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脱离这个斗争来谈合作社的意义（即把无产阶级和小业主对合作社的看法混为一谈），用笼统的词句规定合作社的目的、这些笼统的词句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即进步业主和小业主的思想家都是可以接受的。”^①

列宁支持比利时和法国社会党少数派的草案，坚决反对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草案，但为了争取大会作出最正确的决议，他代表俄国党另提出了一个真正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草案。这个草案，一方面肯定了合作社在无阶级群众性的经济、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只能取得“极不显著的改善”。^②草案主张：在合作社中应向工人传播阶级斗争的思想；合作社应同党建立并加强有机的联系。由于大会上“中派”和右派占优势，列宁的决议草案没有被通过。

为了避免局部性问题的争论，列宁在大会上赞同了以比利时代表的草案为基础的小组委员会的草案。由于列宁和左派的坚持，草案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合作运动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但是它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即夺取政权和经济上的权利并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化。”这是与修正主义针锋相对的。这个草案成为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

这次大会又一次讨论了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修正主义

^{①②} 列宁：《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列宁全集》第16卷，第275、277页。

分子再度跳出来鼓吹修正主义谬论，妄图翻斯图加特大会的案。列宁联合各国左派痛斥了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行，使大会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在修正主义的喧嚣中，仍然通过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决议，这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胜利。会议期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同波兰、德国、保加利亚、荷兰等国的左派，开了联席会议，协调步调，坚持斗争，从而才在一系列问题上打击了修正主义。但这次大会的全部进程表明，第二国际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这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决裂不可避免。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日益逼近。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战争威胁，激起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强大的革命运动和反战运动。这种局势，促使第二国际执行局决定提前于1912年11月，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以制定各国党的统一行动路线。这是第二国际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2个国家555名代表。大会开了两天，集中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危险问题。大会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揭露了英、俄、德、奥等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指明正在酝酿的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重申了第二国际“七大”、“八大”制定的反战原则，呼吁世界人民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警告资产阶级政府不要忘记“普法战争引起巴黎公社的革命爆发，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历史先例，并表明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欧洲无产阶级就要“采取极端行动”，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修正主义者尽管在会上还喋喋不休地重弹老调，但是迫于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反战斗争的压力，他们在大会上采取两面派手法，表面上也举手赞同这个《宣言》。

巴塞尔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面战斗旗帜。列宁很重视这个《宣言》，认为它“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①

巴塞尔大会以后，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继续发展，英、法、德等国社会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得不通过反对战争威胁的决议或表示反对军备竞赛。但是言行不一的修正主义者只把巴塞尔宣言当作应付局势的官样文章，实际上继续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并随时准备抛弃巴塞尔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13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威信、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领袖倍倍尔逝世。党的领导权落入了右派谢德曼等人手中。此后，修正主义分子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击左派，并暗中与政府勾结，保证一旦战争爆发就支持政府。这个党的机关报甚至把德皇说成是人类和平的忠诚倡导者。在德国党的带头和影响下，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也日益沿着蜕化的斜坡滑下去。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背叛和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教训

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②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长期酝酿的世界大战，终于在1914年8月爆发了。

战争的导火线是奥国皇太子被塞尔维亚人刺杀的事件。7月28日，奥国以此为借口对塞宣战。俄国宣布支持塞尔维亚。法国支持俄国。紧接着，德国对俄、法宣战，英国对德、奥宣战，日本为了争夺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的霸权，也向德国宣战。后来卷入战争的还有意大利、美国等。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把一系列殖民地半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15页。

② 列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页。

殖民地也拖进这次大战，战火从欧洲一直烧到亚洲、非洲，造成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先后参加这次战争的共有 33 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反映。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奴役“异族”，争夺国际市场和世界霸权。后起的德国想夺取英国在近东、法国在北非等处的大量殖民地和比利时的刚果，还想从俄国手中夺取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英国则力图击败自己的竞争者德国，还蓄意要夺取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想收回早先被德国占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夺取德国富产煤铁的萨尔区。俄国则力图击败德国，独霸巴尔干和土耳其，还想攫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列宁指出：“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大厮杀。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

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国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对待这场战争采取什么态度，成了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一响，各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就完全背叛了巴塞尔宣言，公然投向资产阶级怀抱，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高喊“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强迫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益互相残杀。结果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史无前例的修正主义大叛卖。战争戳破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脓疮，使隐藏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叛徒

^①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68 页。

彻底暴露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第二国际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负玷污社会主义的责任”。^①在战争一开始，它就倒向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无恶不作的榜样”。^②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增加军事预算，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声明“在危险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党的右派首领谢德曼叫喊：“我们有责任保卫社会民主主义最发达的这个国家，使它免遭俄国的奴役。”全德工会总委员会急忙宣布“国内和平”，要求工人在战争中支持政府，“实行劳资合作”，禁止工人罢工，煽动工会会员开赴前线，参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第二国际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党即法国社会党，也于8月4日，在议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8月26日，党的领袖茹尔·盖德和马赛尔·桑巴⁴⁰还参加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充当部长。他们为了欺骗群众，进行狡辩说：“如果只是通常的那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么，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但是现在问题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法国的生存”。他们还无耻地表示要对法国政府“保证其绝对忠诚”。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采取了背叛的立场。在奥国皇太子被刺事件发生以后战云密布的日子里，社会民主党就发表声明全力支持政府，号召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反对沙皇俄国和半野蛮的塞尔维亚”。

英国社会党右翼、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俄国孟什维克都各自支持本国政府对德作战。英国工党主席韩德逊⁴¹和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王德威尔得都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政府。

①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2卷，第570页。

② 《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1914年10月21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0页。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到处鼓吹“保卫祖国”的正当性，积极鼓动杜马中的孟什维克议员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他竟然宣称：“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将是对人民的背叛”。

意大利的比索拉蒂、瑞典的布兰亭⁴²、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⁴³、丹麦的斯陶宁格⁴⁴和美国的伯尔格⁴⁵等，也都纷纷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

有些社会党人不仅在国内散布社会沙文主义，而且在国外到处游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列金等受反动政府委托，到瑞士、瑞典、丹麦等中立国家，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和社会舆论赞助德国。英、法的社会党人则跑到俄国，鼓动俄国工人为保卫沙皇制度和它的盟国而战。

在这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革命左派，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顶妖风，反潮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党籍，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了坚决而艰苦的斗争。

8)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一开始，就采取了坚定而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布尔什维克的彼得罗夫斯基、巴达也夫、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沙果夫等五位工人代表，在杜马中坚决反对沙皇政府的战争拨款案，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他们因此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逮捕和流放。

1914年10月，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了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宣言》彻底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无情地谴责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们的背叛行径，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①的行动口号，向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号召各国左派坚决地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

^①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2卷，第574页。

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①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叛变行为，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柏林的女工们举行示威游行，当着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面发表声明，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耻行径。工人阶级的斗争，使得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有靠警察和反动分子的保护才能过日子。德国反动军事当局为了维持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和平”，采取了禁止书报出版、取消集会自由的措施，以平息工人们的革命斗争。

德国的国际主义者是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为代表的革命左派。他们从战争开始时起，就英勇地进行反战宣传。1914年12月2日，德国议会第二次表决战争拨款时，李卜克内西毅然决然投反对票，并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不顾一切地重新联合起来”的呼声。李卜克内西的声明，给了各国工人很大的鼓舞，各国革命派给他寄来了103封贺信。列宁热情地赞扬李卜克内西的英勇行动，他写道，李卜克内西虽然处于极少数的地位，但他“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〇八个人（指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编者）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②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左派——“紧密派”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发表声明，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在议会投票反对军事预算。

在英、意、法、奥、美、荷兰、瑞典、瑞士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内都有一些拥护国际主义的左派分子，他们对社会沙文主义提出了强

①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选集》第2卷，第572页。

② 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页。

烈的抗议。他们是革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真正代表。

虽然,当时各国党内有一定数量的革命左派,还有少数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在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控制下,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怀抱,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可耻地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彻底破产。列宁指出:“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①当然,“国际的破产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②

第二国际的破产不是偶然的。它是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长期腐蚀的结果,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和平演变的总暴露,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长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第二国际的破产给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举起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用假马克思主义的谎言和诡辩欺骗群众,改变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所以我们必须维护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揭穿他们的谎言和诡辩,认清其反动的阶级实质,在斗争中使全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分清什么是

① 列宁:《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第2页。

② 列宁:《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6—7页。

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

第二，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渝地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绝大多数的党，由于修正主义的腐蚀和资产阶级的收买，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立党，而变成了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工人党”。它不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而是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合在一起的成分复杂的党；它不是密切联系群众，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革命的道路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党，而是脱离群众的议会党团的附属品，是十足的合法主义的党；它不是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维护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纯洁的党，而是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睦相处，最后变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党。这个党，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而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员可以不过组织生活、地方可以实行自治的党。这个党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党的核心被一些动摇者、变节者和野心家所占据。这样的党，只能断送革命。它的教训证明了：“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

第三，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决不能对修正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② 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一些左派不仅没有一贯到底地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尤其更不愿意把那

① 毛主席：《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页。

② 毛主席：《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

些完全资产阶级化了的修正主义头子清除出党。特别严重的是，第二国际一些领袖对修正主义采取了调和、纵容、庇护的态度，使修正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内步步得势，日甚嚣张，最终把整个第二国际葬送了，使工人运动蒙受极大的损失。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思潮，一个派别，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有组织的工具。因此，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①

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对他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必须同他们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同那些顽固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实行彻底决裂，把他们从工人运动和党内清除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他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才能争取那些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才能孤立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肃清其影响；才能维护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革命团结；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不断引向胜利。

第二国际最后被修正主义断送了；然而，第二国际自1889年成立以来，前期在恩格斯的领导和影响下，以后又在国际内部的革命派的坚决斗争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列宁在清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叛卖罪行的同时，对第二国际进行了历史评价。列宁写道：“第二国际在25—45年内（从1870年或1889年算起）已经完成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预先地初

①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96页。

步地极简单地组织社会主义力量这件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①
“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②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表

一、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及其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露骨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堕落成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在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已经十分孤立。这时，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考茨基主义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害最大**”、“**最危险**”^③的敌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生于布拉格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年轻时就醉心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说和机会主义思想；热衷于追求名利地位。1875年，他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沉重包袱在奥地利加入社会民主党。从1883年起，考茨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

① 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79—80页。

②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③ 《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1914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6页。

《新时代》的主编。在恩格斯的指导下，他曾经写了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了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和理论“权威”，并常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较高声望。

但是，考茨基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头号伪君子 and 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①在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总是公开或隐蔽地站在机会主义一边。他结交了伯恩施坦之后，立即同他“情投意合”，把他当作自己“强有力的引路人”。当伯恩施坦跳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时，他自认“深有同感”，因此，总是对伯恩施坦采取庇护和姑息的态度。他也曾同伯恩施坦进行“论战”，但他自供说，这是“被迫的”；而且在“批判”伯恩施坦主义时，他总是竭力回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声称对此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正如列宁尖锐指出的：“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②随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尖锐化，考茨基日益陷进机会主义的泥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更阴险的敌人。

考茨基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的虚伪性，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它搞折衷主义，行“中庸之道”，极力维护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左派同右派的“统一”、“团结”，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替已经陷于孤立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护，力图维持机会主义对群众的影响，用诡辩来证明已经成熟的革命不合时宜。所以，这种隐蔽的机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列宁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95页。

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①又说：“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②

考茨基主义不是一国的现象，而是一时嚣张的国际思潮。它在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哈阿兹⁴⁶、奥地利的阿德勒、意大利的屠拉梯、法国的龙格⁴⁷、英国的麦克唐纳、俄国的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这样一些国际上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同考茨基主义斗争就关系到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

因此，列宁认为，工人阶级若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考茨基主义，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扬了反潮流的革命气概，同这个“庞然大物”考茨基及其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时代与帝国主义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考茨基主义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国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急剧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如何分析时代的主要特征和世界的基本矛盾，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才能制定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和路线。分析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不说明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③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20页。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4页。

但是,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派别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小资产阶级庸人、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批评”帝国主义的幌子下,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歪曲时代的阶级内容,散布社会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谬论,企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考茨基,为了给修正主义观点披上科学的外衣,在大战前夕和大战中,精心编造了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它掩盖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修正主义思潮的理论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谬论,特别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分析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修正主义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否则,千百万劳动群众就不能从思想上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①

伟大的导师列宁,从战争一开始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对帝国主义进行了集中的、全面的、周密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列宁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本质、阶级矛盾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清算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种种反动谬论,揭露了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阐明了反帝必须反修的著名原理。

(一)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0页。

义是他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

列宁首先详细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巨大变化，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第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第三、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成了帝国主义对外剥削和压迫的基础；第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第五、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帝国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垄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① 垄断是由自由竞争发展起来的，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它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生产走到最全面的社会化，但生产资料却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更加尖锐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就进一步激化了。

在帝国主义阶段，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形成金融资本，产生了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经济上的垄断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反动，产生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现象——垄断资本家对绝大多数居民的暴力统治。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金融寡头便竭力向外扩张，掠夺别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民。这就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矛盾的尖锐化，引起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激烈斗争。

列宁在分析、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阶级矛盾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②，是垄断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①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0、81页。

但是,考茨基却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考茨基给帝国主义捏造了一个定义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

列宁严厉地批驳了考茨基的定义,指出它的错误在于:把帝国主义仅仅归结为力图兼并,并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而没有说明“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②;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

帝国主义掠夺扩张的本性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考茨基的定义之所以背离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他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好象在垄断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可以采取另一种政策,即和平的、民主的政策;好象经济上的垄断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政策相容了,金融资本对世界领土的分割也可以不采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了。这完全是散布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的谬论,是企图掩饰与缓和帝国主义固有的深刻矛盾,为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套观点的基础”。^③

(二)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斗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

① 见考茨基:《帝国主义》。

②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2、83页。

考茨基从他的荒谬的定义出发,胡说资本主义会经历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各国金融资本间的相互斗争”将为“国际上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来代替”。^①这样,帝国主义的矛盾、冲突和战争就消除了,裁减军备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就到来了。

列宁彻底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指明了帝国主义之间争霸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必然要在世界上争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就成了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②

帝国主义霸权是以其实力做后盾的;但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其实力总是在变化的,这就造成了实力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③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④

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结盟、订立协定是相对的、暂时的,其争夺则是绝对的、长期的。列宁指出,同考茨基的市侩幻想完全相反,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⑤

考茨基编造“超帝国主义论”的罪恶目的,就是要转移群众的

①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学的书》,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周刊。

②③④⑤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2、89、6、109页。

视线,使人们不去注意帝国主义时代存在的尖锐矛盾,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能实现的永久和平的幻想,来对群众进行安慰和欺骗。

(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理论。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垄断的统治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全面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①基本矛盾的激化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列宁根据他对帝国主义的全部分析,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即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③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则根本否认列宁这一科学的革命结论,而胡说资本主义“比以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还“为时过早”,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帝国主义结成全世界的“国家联盟”以后,才能“夺得权力”。考茨基的这种理论“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④,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理论。

为了帮助人们鉴别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各种观点的阶级实质,列宁提出了一个根本标准,即坚持革命,坚持前进,还是主张改良,坚持倒退。他写道:“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

①③③④⑤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16、10、7、8、100页。

论正是一个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前进,主张倒退的反动理论。

(四)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工人贵族和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贯串着维护机会主义的反动意图。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还贯串了一种维护同机会主义统一的反动意图。考茨基虽然在口头上也表示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但却对资产阶级分裂工人运动的反动措施保持缄默,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兼并问题上,他只反对别国的兼并,而不反对本国的对外兼并,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德帝国主义和公开的机会主义者的欢迎。所以,列宁指出,考茨基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都贯串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统一的意图”。^①

列宁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必然联系,阐明了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只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维持其反动统治,因此更需要在工人队伍中寻找代理人。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广大殖民地而获有高额垄断利润,所以,在经济上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造成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从生活到世界观都资产阶级化了。它们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支柱,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 and 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传播者。

列宁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12页。

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①

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彻底批判了考茨基之流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机会主义谬论,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

列宁的这部光辉著作,是列宁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论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卓越贡献。

列宁全面地阐明了20世纪初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正确认识时代,就要判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②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作了深入的分析,向我们指明了无产阶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些光辉思想,一直指引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胜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伟大理论及其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仍然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矛盾,认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认识国际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和现代战争的根源,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的修正主义理论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15页。

②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苏修叛徒集团疯狂篡改列宁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原则，叫嚷今天的时代是“和平共处”和“谈判的时代”，是“电子时代”和“核时代”，大肆散布“缓和”的烟幕弹。这完全是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一脉相承的，其罪恶目的在于掩盖他们对外扩张、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借口形势的变化，胡说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和列宁所处的时代不同的“新时代”，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并且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绝则错”等等，其罪恶企图是对内要搞“克己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阴谋把中国重新拉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

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凡是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①

列宁在全面深刻地分析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新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 19 世纪的具体条件，曾经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异常显著，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等）在经济政治实力的发展上很快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要求夺取更多的资本输出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然而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因此新老帝国主义国家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 696 页。

之间就只有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战争势必使帝国主义的力量互相削弱，从而在帝国主义链条上造成薄弱环节。这样，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首先在这里冲破帝国主义阵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列宁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辩证法，分析了新时代的这种新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光辉论断。早在1915年8月，列宁就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过了一年，列宁又进一步强调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②

列宁这一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根本对立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从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胜利，极力否认一些经济上不太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可能性。他们企图以此谬论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窒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阻挡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而列宁的新理论则是激发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鼓舞他们勇往直前，夺取胜利。这一新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辉前景。

①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斯大林在评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概括地指出：“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做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的必遭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

二、列宁和各国左派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交战国经济面临破产，给人民造成空前的浩劫，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时，无产阶级革命在实践上是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命运。

战争爆发后，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跟着资产阶级叫喊“保卫祖国”的正义性：同盟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把它说成是抵制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入侵，解放被压迫民族；协约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把它说成是反对德国军国主义，挽救欧洲的文明。为了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都以“进攻”或“防御”作为确定战争性质的标准，扬言本国被迫处于“防御”的地位。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则无耻地歪曲国际主义，说什么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承认“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义务”来“保卫祖国”。

判定战争的性质是确定对战争的态度根据。列宁揭穿了公开的和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抹杀战争阶级性质的谎言。列宁指

^①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6—87页。

出，任何战争都是和一定的阶级政策相联系的。列宁多次引述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指出只有分析“战争是由于什么打起来的，是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①，才能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为此，就必须研究交战国战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英、法、俄、德、奥等国的统治阶级，在战前几十年中实行了掠夺殖民地，侵占别国领土，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帝国主义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政策的继续。因此，不管谁先进攻，谁的领土被侵犯，都不能抹杀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修正主义者鼓吹“保卫祖国”，正表明他们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② 列宁还痛斥了考茨基歪曲国际主义的行径，指出它无非是为了保卫祖国而让各国工人互相残杀。这表明考茨基已经堕落到比叛徒还可耻的地步。

公开和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是对巴塞尔宣言的无耻背叛。巴塞尔宣言充分地揭露了公开的机会主义和考茨基派的真面目，所以，战争爆发后，他们都不敢否认这个宣言，也不敢拿这个宣言提出的要求同他们的行为相对照。因此，列宁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斗争中，还以社会沙文主义者曾经举手赞成的这个宣言为武器，揭露他们的叛徒嘴脸。

列宁在批判社会沙文主义时还指出，对于“保卫祖国”问题，应作具体的分析，在一定条件下，“保卫祖国”或“防御”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他说，如果殖民地、半殖民地向帝国主义宗主国宣战，“那末不管谁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99页。

的国家，希望它们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① 同样，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在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战争中，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也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

列宁在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中，还对社会沙文主义的历史根源、政治思想内容和经济基础作了透彻的剖析。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它们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内容，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它们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就是维护工人贵族、官僚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维护他们从垄断资产阶级的高额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总之，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政策的直接继续和完成，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②

列宁坚决彻底地批判社会沙文主义，同时也坚决彻底地批判社会和平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方面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高喊“保卫祖国”，挑动各国工人互相残杀，同时又不断地施放和平烟幕。特别是从1916年下半年起，世界政治形势中开始出现由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转变的迹象。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已经疲惫不堪，资源耗尽；人民苦难重重，怨声载道，革命的情绪日益增长。于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帝国主义政府弹奏起和平主义的乐章，考茨基和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便使劲地哼着和平主义的调子，鼓吹通过签订“民主的”和约，裁减军备以至废除武装等等来实现永久和平。此外，荷兰、瑞士等地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在群众普遍厌战的气

①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69页。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0页。

氛中，提出了“废除武装”的口号，反对任何军事化和任何战争。这样，社会和平主义便大肆流行起来。

列宁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说教。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①帝国主义所能实现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帝国主义和约也只是战前和战争中那一政策的继续。它只反映了战争中所造成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一些变化。它“对于人民则是一个充满了甜蜜语句、小改良、小让步等等的大骗局”。^②

当帝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大念和平经的时候，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只有在我们推翻、最终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③因此，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同反对帝国主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宣传革命，就是愚弄群众的空话或谎言。列宁着重指出，我们的理想就是结束战争，实现国际和平，停止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暴行，“但是只有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用这种理想来迷惑群众，把它同立即直接鼓吹革命行动割裂开来”。^④

列宁还揭露了社会和平主义者的阶级实质，称它们同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帝国主义需要的“两种色彩的奴才”。帝国主义“既需要普列汉诺夫之流用‘打倒侵略者’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继续进行屠杀，也需要考茨基之流用歌颂和平的靡靡之音来安慰怨气冲天的

① 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15页。

② 列宁：《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69—270页。

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④ 列宁：《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1页。

群众”。^①

列宁还彻底批判了所谓“裁减军备”、“废除武装”的和平主义幻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②这里因为除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外，还必然会有革命的战争：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自卫战争。社会主义者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这种革命的战争。

列宁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是沒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③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④社会和平主义者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而且还主张写进党纲中去，这就等于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使无产阶级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

当社会和平主义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列宁坚定地宣布：“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⑤

综上所述，列宁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最主要之点就是把它同革命联系起来。列宁在批判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时

① 列宁：《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3页。

②③④⑤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1、875、874页。

候,反复论证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他还提出了革命形势具有的三个主要特征:(1)统治阶级遇到危机,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异乎寻常的加剧,已经不愿照旧生活下去;(3)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并且表现为革命行动。当时,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革命形势。但是,客观条件必须加上主观变化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①

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在战争条件下的行动路线,列宁早在战争初期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②、“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③的口号,号召各交战国工人、农民、士兵,掉转枪口,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第一步是实现民主革命)。

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之所以成为叛徒,要害就在于他们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他们闭眼不看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扬言无产阶级革命已成幻想。考茨基说:“政府从来没有象战争开始时那样强大,政党从来没有象战争开始时那样软弱”。^④因此,他认为在战时法令限制下,不可能开展革命活动,甚至把街头的群众示威游行都斥为“冒险”。

革命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彻底革命的路线;而考茨基之流则成为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而遗臭万年。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1页。

②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页。

③ 列宁:《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4页。

④ 参见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77页。

三、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了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榨取。如英国每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的商品超过战前的10倍，法、英分别从殖民地征集140万、450万军队，帝国主义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抓了几百万劳工。大批劳动力被赶上战场，这就使这些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濒于破产，人民陷于苦难的深渊，饥饿、贫困和疾病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

“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①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工人罢工，农民反对征兵、抗租抗税，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彼伏此起，接连不断。亚洲的越南、印度、伊朗，非洲的喀麦隆、尼日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西欧的爱尔兰，等等国家在大战中先后爆发了反帝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加深了欧洲的革命危机，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反帝的重要同盟军。

怎样对待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问题成了大战期间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他们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否认民族自决权，公然赞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兼并政策可以促进落后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之流则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伪称“要全面地和无条件地

^①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103页。

重视和坚持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胡说殖民地对于帝国主义的作用“非常微小”，工业资本推行殖民政策是失大于得，他们“对殖民政策并无好感”。考茨基还认为每个民族要求“国家独立”是“太过分了”，只要实行“民族自治”就够了，等等。

除了右派和“中派”之外，一些左派，如德国的卢森堡、波兰的拉狄克⁴⁸、荷兰的果特⁴⁹等，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错误的立场。他们于1915—1916年间，分别发表了民族问题提纲，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自决权是“不能实现”的，是“形而上学的空谈”，是妨碍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团结等等。

左派的错误为右派和“中派”所利用。于是，民族殖民地问题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地提出来。

列宁在大战期间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等文章，狠批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反动观点，同时批评了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全面地论述了党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

列宁首先批判了右派和“中派”考茨基之流抹杀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对抗性矛盾的谬论，列宁指出：同考茨基之流关于在帝国主义时代可以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①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理论，它揭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产生的根源，表明了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列宁指出，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分是非常紧要的。但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却用“一般民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20页。

族”等概念来掩盖这种区分,有的则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因此,列宁强调说:“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①

列宁高度地评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从帝国主义后方打击帝国主义、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基础的伟大力量。“弱小民族是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②这个革命斗争,对于被压迫民族来说,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同那种认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观点相反,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③总之,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必须结成反帝统一战线,打倒共同的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

列宁从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认为“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④,也就是承认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实现政治分离、独立的权利。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同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才能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真正独立。这一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兼并、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列宁同时指出,坚持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8页。

②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2页。

③④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724页。

成立小国家的要求”^①，也不妨碍各民族工人的大团结；相反，“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②

列宁还从革命辩证法观点出发，认为由于所处的实际地位不同，在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进行教育工作的重心和具体任务都应有所不同。

列宁经常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③这一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教育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列宁说，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④不这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阶级团结也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口头上拥护自决，实际闭口不谈“他们本”民族压迫和兼并其他民族——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得到解放。列宁还多次指出，拥有殖民地的民族（俄、英、美、德、法、意、日等）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捍卫民族自决权，那就是沙文主义者，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

列宁进而指出，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但要无条件承认民族自决权，还应当支持和帮助被压迫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⑤“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⑥

“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

①②④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720页。

③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

⑤⑥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7页。

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①,才能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列宁教导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使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服从自己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族的要求并把它提到第一位;要警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他们经常是这样干的: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某一帝国主义强国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

列宁还英明地预见到:“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②但是,即使这样,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也不能拒绝民族自决权。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批判某些左派的错误中提出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对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加强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处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根本指导原则。

列宁在大战期间,在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关于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与和平以及民族殖民地等问题的光辉思想和路线,为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

①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4页。

②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21页。

四、列宁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反对考茨基主义而斗争。

国际社会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

列宁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不仅必须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同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而且必须把各国左派组织起来,积蓄革命力量。因为,只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才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将来,……才是群众的领袖”。^①然而,当时各国革命左派还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大战期间,列宁在思想理论上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利用各种国际会议,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反对考茨基主义而斗争。

列宁为教育、团结和提高各国左派进行了大量的艰巨工作。他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政治论文。他用通信、会谈等方式同各国左派建立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列宁还深入工人群众,向他们说明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分歧的实质,用阶级斗争的实践教育群众认清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把革命群众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下。列宁还利用战时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作为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讲台,作为联结各国革命左派的纽带。

1915年2月,协约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伦敦召开了代表会议。列宁委托布尔什维克的李维诺夫⁵⁰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声明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叛卖行为,要求社会党人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并同本国帝国主义决裂。

布尔什维克还派代表参加了1915年3—4月先后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者青年代

^①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7页。

表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并且宣传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提高了广大妇女和青年的国际主义觉悟。

战争期间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是 1915 年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 1916 年的昆塔尔会议。

1915 年 9 月，在瑞士首都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考茨基派占了多数。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组织左派，同考茨基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代表左派向大会提出《告全世界工人宣言》草案，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进一步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同时，批判了社会和平主义，号召群众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推翻资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战争。

左派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由于占多数的考茨基分子的反对，而被否决。然而，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坚持斗争，使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中，宣布了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了“保卫祖国”的口号，指明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联系起来。但是，《宣言》没有说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背叛和第二国际的破产，没有向工人阶级说明革命斗争的手段，没有包括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重要论点。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考虑到《宣言》在同机会主义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所以在宣言上签了字；但同时发表了一项声明，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列宁认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大的成就。”^①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以后，列宁团结各国左派，成立了自己的常务局——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常务局，和会上选出的由考茨基多数

^① 列宁：《国际社会主义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368 页。

派所把持的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相对立。左派常务局出版了自己的杂志《先驱》。

1916年4月，在瑞士的伯尔尼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力量虽有发展，但仍占少数。

昆塔尔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之后，考茨基派大力鼓吹社会和平主义。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合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由于考茨基分子在会议上占多数，左派的决议草案没有被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仍然没有被采纳。但是，由于广大群众日益向左转和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坚持斗争，会议通过了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决议谴责了国际社会主义党执行局的社会和平主义立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持久和平”，“争取和平的斗争只能包括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之内”。^①昆塔尔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会议上相互斗争的两派妥协的结果。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在投票支持宣言和决议的同时，又采取了保留态度。后来列宁在回顾这段斗争的历史时曾指出，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等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或削弱同他们的斗争。^②

战时召开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国际会议，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都促进了各国左派力量的增长。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蔡特金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于1916年1月召

① 《国际社会主义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关于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的决议》。

②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27页。

开了“斯巴达克”同盟全德代表会议，并正式形成了独立组织。“斯巴达克”同盟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坚定组织者和领导者。“斯巴达克”的传单在德国秘密地出版和传播，它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的阴谋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列宁指出：“德国斯巴达克派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系统的革命宣传工作，真正地拯救了德国社会主义和德国无产阶级的荣誉。”^①从1915年至1917年，法国、瑞士、瑞典、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左派也开始在组织上形成独立的派别。

左派力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使齐美尔瓦尔得内部多数派和左派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起来。1916年末，齐美尔瓦尔得的多数派向右转，堕落成社会和平主义者。这样左派暂时处于“孤立”地位。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毫不畏惧，他深信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他并且以历史上革命阶级的代表由少数变为多数的例子来鼓舞各国左派和无产阶级，使他们坚信革命必将胜利。他问道：“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要根据他们的多少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②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③为了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清界限，列宁坚决主张不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得第三次代表会议，并且坚决地和齐美尔瓦尔得国际断绝关系。

由于列宁在这个时期的坚决斗争和艰苦工作，齐美尔瓦尔得国际虽然被考茨基派破坏而陷于瓦解，但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左派毕竟成长起来了。在战争和革命年代，正是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成为各国群众的真正领袖，成为冲击资产阶级统治的先

① 《列宁给斯巴达克派成员》，《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7页。

② 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③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60页。

锋,成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骨干和核心。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团结各国左派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且为建立第三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做了良好的准备。

第五章 注 释

1 贝尔·冈加达亚·提拉克(1856—1920),印度民族主义的创始人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也是印度有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第391页。

2 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原属资产阶级激进派,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899年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任工商部长,帮助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破坏工人运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主义叛徒。他的这一叛变行为被称为“米勒兰主义”,列宁斥之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1904年米勒兰被社会党开除,以后历任部长、总理和总统,执行反共反民主政策。十月革命后,他积极策划和组织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第395页。

3 阿里斯得·白里安(1862—1932),法国社会党机会主义头目之一,反动政治家。1906年因参加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任部长,被开除出社会党。此后,他十几次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总理,对内对外执行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第395页。

4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工党创始人,该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他竭力推行极端的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上,后来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24年后担任第一、二届工党政府首相,实行分裂工人运动、镇压英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政策。——第395页。

5 菲利浦·屠拉梯(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和右派头目,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敌视十月革命。他主张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合作,广泛参加资产阶级内阁。1922年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后,他是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的首领。列宁说:“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列宁全集》第8卷,第360页)——第395页。

6 列奥尼德·比索拉蒂(1857—1920),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和右翼首领之一,国会议员。他积极推行改良主义路线。1912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他建立“改良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不管部部

长，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395 页。

7 奥托·鲍威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目之一，修正主义理论家，鼓吹“和平过渡”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后初期曾任奥地利资产阶级共和国外交部长，多次参加镇压奥地利工人运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指出：“这位出色的社会主义叛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有学问的混蛋罢了。”(《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327 页)——第 395 页。

8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女活动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坚强战士。——第 397 页。

9 布拉戈也夫(1855—1924)，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最早传播者。他领导的党内左派“紧密派”同第二国际和保加利亚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列宁称赞“紧密派”是“保加利亚的左的国际主义政党”。(《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20 页)“紧密派”在 1919 年改组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布拉戈也夫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过一些错误。——第 399 页。

10 片山潜(1859—1933)，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日本社会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后来又创立日本共产党，并为该党领导人，曾当选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399 页。

11 让·莱昂·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该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编，国会议员，当过社会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坚持改良主义立场，积极支持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上反对军国主义，于 1914 年 7 月被沙文主义者暗杀。——第 400 页。

12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之一，1900 年起担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他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 年 8 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国务大臣，以后还担任过司法、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竭力支持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1933 年支持德国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统治。——第 400 页。

13 万·柯尔(1852—1925)，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右翼头目，第二国际执行局委员。——第 401 页。

14 彼得·别隆加尔道维奇·司徒卢威(1870—1944)，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一度混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 年是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中央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

坚持社会沙文主义；十月革命后，参加了白匪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伪政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第407页。

15 崩得，俄文“бунд”的译音，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工人总同盟即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成立于1897年，成员大半是俄国西部地区犹太手工业者，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1898年）上加入党内，在“二大”（1903年）退出党，“四大”（1906年）后又加入党。1912年第六次全俄党代表会议把崩得开除出党。——第415页。

16 马尔托夫是乌利·奥斯洛维奇·别杰尔巴乌姆（1873—1923）的笔名，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曾担任过《火星报》编辑，1905年革命时期是妥协分子，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的头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采取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竭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第416页。

17 格·阿·加邦（1870—1906），彼得堡一个工人区的牧师，沙皇警察局的奸细，1905年1月俄国“流血星期日”事件的阴谋策划者。他的罪恶阴谋后来被彻底揭露，工人群众把他绞死。——第421页。

18 弗朗茨·梅林（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莱比锡人民报》主编。他积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也犯过一些错误。——第436页。

19 马尔赫列夫斯基（1866—1925），波兰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积极参加俄、德工人运动，并经常为巩固波、俄、德工人运动的联系而斗争，1909年起，主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工作，是该党左派领导人之一。1918年他到俄国，同年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职到逝世。——第436页。

20 《斯托雷平土地法》是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于1906年11月颁布的土地法令。该法令规定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分地归农民私有，并可以出卖。富农在反动政府支持下，得到了最好的地块，并从政府那里取得贷款，贱价向贫农收买分地，大肆进行掠夺，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该法令颁布后几年内，有100万以上贫农完全失去土地而破产，成为无产者，富农则成立了大田庄，成为农村资产阶级，成为沙皇政府在农村的支柱。——第438页。

21 费·伊·唐恩（1871—1947），真名费多尔·伊里奇·古尔维奇，孟什维克取消派头目。——第438页。

22 波格丹诺夫（1873—1928），真名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马

林诺夫斯基，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5年归附于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在理论上用马赫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上反对列宁的策略原则，是召回派的组织者，1912年脱党。他反对十月革命。——第438页。

23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90年代初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后归附于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与波格丹诺夫一起企图以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又是“造神派”头目之一，在政治上是“召回派”头目之一，反对列宁的策略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站在反社会沙文主义一边，1917—1929年为人民教育委员。——第438页。

24 《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创办的秘密报纸；1906年9月3日至1909年12月11日由列宁编辑出版。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1907年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第441页。

25 休谟主义是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的反动哲学观点。他继承了贝克莱的唯心论先验论。他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又是不可知论者。休谟及其信徒的哲学理论被称为休谟主义。——第444页。

26 贝克莱主义是18世纪英国主教，反动哲学家乔治·贝克莱(1684—1753)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存在就是被知觉”是他的主观唯心论的基本公式。他用主观唯心论向唯物论和无神论猖狂进攻，竭力用宗教、神学为反动势力服务。其哲学观点被称为贝克莱主义。——第444页。

27 巴札罗夫(1874—1939)，鲁德涅夫的笔名，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马赫主义者，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他反对十月革命；1930年因参加孟什维克和武装干涉者的反革命组织的活动被判罪。——第445页。

28 巴维尔·索洛莫诺维奇·尤什凯维奇(1873—194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孟什维克，在哲学上是马赫主义者。——第445页。

29 瓦连廷诺夫(1879—？)，沃尔斯基的笔名，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1917年退出孟什维克，以后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工商报》工作。——第445页。

30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1876—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首领，1917年2月革命后，一度担任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后逃居国外。在哲学上，他是马赫主义者。——第

445 页。

31 弗兰茨·布莱(1871—1942),德国人,阿芬那留斯的学生,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第 451 页。

32 约瑟夫·彼得楚尔特(1862—1929),德国资产阶级教授,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生,经验批判主义的鼓吹者,公开主张回到贝克莱那里去,政治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第 451 页。

33 波斯尼亚,现在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成员国。——第 456 页。

34 的黎波里,今利比亚之一部。——第 456 页。

35 塞尔维亚,现在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成员国。——第 456 页。

36 马其顿,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部,曾是一度强盛的古国。现分属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三国。属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叫皮林马其顿,属希腊的一部分称爱琴马其顿,属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为南斯拉夫六个联邦共和国之一。——第 459 页。

37 卡尔·列金(1861—1920),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领,担任过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主席、国际工会书记处书记、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驱使工人为帝国主义战争卖命,极力破坏革命运动,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说,列金是“工人出身的普鲁士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77 页)——第 465 页。

38 菲利浦·谢德曼(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1903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1 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成员、国会党团主席团委员和国会副议长,1913 年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他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战后他曾任资产阶级政府,即所谓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部长和总理,是绞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刽子手。——第 465 页。

39 古斯塔夫·爱尔威(1871—1944),法国社会党党员。在党内站在“极左派”立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宣扬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纲领,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 年被开除出党。他反对苏维埃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第 465 页。

40 马赛尔·桑巴(1862—1922),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劳动部长,支持侵略战争政策,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474 页。

41 阿瑟·韩德逊(1863—1935),英国工党首领之一,1908—1917年期间,曾两度担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先后担任教育、邮政、不管部大臣;1924年以后,又当过工党政府的内政和外交大臣。——第474页。

42 卡尔·亚马尔·布兰亭(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之一,长期任议会议员和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担任瑞典王国财政部长,后又几度任王国政府首相。他公开敌视十月革命,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第475页。

43 彼得·叶勒斯·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人之一,20世纪初滚向极端的机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75页。

44 托尔瓦德·斯陶宁格(1873—1942),丹麦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改良主义者,1910年起为该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任不管部大臣,后来当过首相。——第475页。

45 伯格(1860—1929),出生于奥匈帝国,随家移居美国后,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的创建工作,主编社会党的报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一生几度任议员。——第475页。

46 胡果·哈阿兹(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中派”代表人物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4月,他与考茨基组织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为该党头目。1918年德国革命时,他与反革命势力勾结,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第482页。

47 让·罗朗·弗雷德里克·龙格(1876—1938),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法国“中派”的头目,但一直赞成军事拨款,实际上拥护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他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中派”的“第二半国际”;后来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破产的“第二国际”,并疯狂攻击第三国际。——第482页。

48 卡尔·拉狄克(1885—1939),生于波兰,后到德国,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工作,曾制造分裂,组织小集团反对列宁。1917年10月他来到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与布哈林一起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1924年参加了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39年以叛国罪被捕，受到审判。——第499页。

49 格尔曼·果特(1864—1927)，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了荷兰共产党。1920年他成为左翼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首领，从此逐渐离开共产主义运动。——第499页。

50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1921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联共(布)第17次党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第503页。

第六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 1917 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由于机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等的叛卖，革命后的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政权实际上落在资产阶级手中。在新形势下，列宁和党于 4 月制定了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7 月又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路线。为了粉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俄国和欧洲革命，列宁在 8—9 月间写了不朽著作《国家与革命》。

在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通过从城市到农村的武装起义的道路，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彻底打碎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从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就激烈地进行着。1918 年春，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列宁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妄图借德帝国主义之手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阴谋。1918—1920 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策动的十四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这场国内战争是十月暴力革命的继续。

布尔什维克党在战胜国内外敌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破坏

的同时，还粉碎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从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猖狂进攻，列宁写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人民取得解放的共同道路。苏修叛徒集团和我国的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林彪都是十月革命的可耻叛徒。

第一节 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辉煌胜利。

《国家与革命》的伟大意义

一、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到1917年已经三年。战争夺去了俄国数百万人的生命，资产阶级和地主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工人和农民却受着日甚一日的艰难困苦。战争破坏了俄国全部国民经济。约有1,400万劳动人民被拉去当兵，大片土地荒芜，粮食奇缺。莫斯科面包房门口经常挂着“今日整天无面包”的牌子。1917年1月，首都彼得格勒¹仅存有10天的面包，3天的食油，肉类则完全没有。由于交通运输瘫痪，燃料和原材料缺乏，许多工厂相继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俄国的劳动人民和前线士兵忍饥挨饿，赤脚露体。凡此一切都使工人、农民、兵士和知识分子从反面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对沙皇政府深恶痛绝，再也不能继续忍受下去了，革命因素在不断增长。

布尔什维克党从第一次大战开始，就根据列宁制定的革命路线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深刻地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且积极利用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在广大群众中坚韧不拔地进行

反战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活动的。党的领袖列宁匿居瑞士。党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如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²等，都被沙皇政府逮捕下狱或流放。党的各种报刊都被封闭。各地方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任何猖狂迫害都无法制止党的活动。列宁在国外通过种种方式同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给予指示。党派了一些优秀干部到许多地方着手恢复并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战争期间，各地党组织散发了400多种传单，广泛宣传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路线。仅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在战时就散发了90多种传单，共30多万份。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不仅投票反对军事预算，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³的叛变行为，而且利用杜马代表身份在全国各地，举行工人集会，进行反战鼓动，宣传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党还不屈不挠地在工会、工人合作社、伤病互助会以及某些文教团体中进行革命工作。甚至沙皇的法庭，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揭露敌人、教育群众的讲坛。特别是在军队中建立了许多秘密支部，发展了数千名党员，如在波罗的海舰队的每一艘大军舰上都建立有党的小组；并且冲破军法恐怖统治的重重障碍，散发各种传单、报刊和小册子，向广大士兵揭露战争的根源和性质，鼓动他们掉转枪口起来革命。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俄国人民反战革命斗争的浪潮急剧高涨。无产阶级首先行动起来，1915年秋后，群众性的罢工已波及全国。1916年共发生罢工事件1,500起，参加人数超过100万，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1916年10月政治罢工达到高峰，工人们在示威游行中喊出了“打倒战争”、“打倒专制政府”等口号。

由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和党在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士兵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前线，交战双方士兵的联欢活动日益增多；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不愿为沙皇卖命而开小差，仅1916年，逃兵就达150万人；有的水兵还举行了反沙皇的起义。

农民运动也接踵而起，他们反对政府征兵，并且开始夺取地主的粮财，烧毁地主的庄园。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也群起斗争，1916年在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因反对征兵而爆发了民族起义，参加者有数百万人。前线士兵的发动也更加频繁了。这些情况表明，俄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

1917年1月9日（这是俄历，比公历晚13天，本章十月革命前按习惯均用俄历），为纪念1905年的“一·九事件”，在许多城市爆发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尤其是彼得格勒，革命浪潮汹涌澎湃。2月18日，普梯洛夫工厂3万工人首先发动罢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号召全市工人用政治罢工来纪念国际妇女节，2月23日，有50个企业的9万男女工人举行了政治罢工。第二天，罢工人数激增到20万人。2月25日，全市工人爆发总政治罢工，罢工工人达25万人以上。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局号召武装起义，次日清晨，武装起义开始。工人群众解除宪警武装，夺取武器库，占领维堡区（工人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并且深入兵营与士兵联欢，进行革命鼓动，号召士兵转向革命。2月27日（公历3月12日），彼得格勒驻军开始参加起义，早上还只有1万人，到晚间已增至6万人。工人和士兵的联合行动，迅速摧毁了反动军警的挣扎。起义者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打开了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大会宣告开幕。首都起义胜利的消息飞传全国，各地人民都一致奋起摧毁沙皇地方政权，并且纷纷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至此，统治俄国人民将近4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⁴，长期以来作为欧洲反动堡垒

的沙皇专制制度，终于被工农的铁拳打碎了！二月革命表明：战争引起革命是一个普遍规律。任何貌似强大的反动势力都是可以被打倒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光辉思想时，曾列举了俄国人民推翻沙皇的事例。他说：“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①又说：“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那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②

列宁在分析沙皇被推翻的原因时指出：“二月革命获得最初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1905年所没有达到的目的。”^③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中能够起到领导作用，这是由于党在战前就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了孟什维克修正主义者，在战时又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沙文主义、护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广大工农和士兵群众，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在彼得格勒起义中，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局按照列宁的指示，具体领导了这次革命。

在二月革命过程中，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苏维埃，既是武装起义的机关，又是工农专政的机关。但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首都彼得格勒、

① 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25页。

② 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1091页。

③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52页。

莫斯科以及很多重要地方的苏维埃组织一开始就被妥协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据了多数席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首先，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当时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还有不小的欺骗作用，他们以花言巧语答应推翻沙皇后，帮助人民解决和平、土地、面包问题，从而暂时蒙蔽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群众。其次，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还不够。当时，俄国城市中无产阶级的成分在战争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厂中大批产业老工人被送到前线，很多破产了的小私有者补充到工厂中来，他们一时还认不清妥协党的假革命面目。第三，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党的领袖和许多优秀干部当时不是被迫侨居国外就是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由于上述原因，当布尔什维克党在各地领导群众直接斗争的时候，妥协党加紧在新建立的苏维埃组织中活动，用欺骗手段窃取了多数。

妥协党在窃取了苏维埃组织的领导权以后，他们从俄国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应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修正主义观点出发，拱手把政权送给了资产阶级，认为苏维埃只要在一旁“监督”就可以了。于是，他们背着布尔什维克和工农兵群众，与资产阶级暗中勾搭，在1917年3月2日，成立了以大地主李沃夫侯爵为总理、有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⁵参加、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妥协党宣布支持临时政府，他们只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成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对临时政府进行所谓“监督”。这样，正如列宁所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一个“最主要的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

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属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绝大多数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①

两个政权的并存，反映俄国革命正处在一个过渡的、不稳定的阶段。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根除苏维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单一政权。在这种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加米涅夫⁶、李可夫⁷等少数机会主义者附和妥协党的主张，认为可以有条件地赞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拥护护国派政策；斯大林等多数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主张不信任临时政府，反对护国主义，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可是，革命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党迫切需要制定出明确的革命方针，迫切需要伟大领袖列宁回国掌舵。

列宁得知二月革命的消息以后，立即进行回国的准备，以便直接领导已经开始了的俄国革命。在沒有动身的时候，他连续写了很多信，并为《真理报》复刊写了五封《远方来信》，在信中对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示布尔什维克一定要把革命推向前进，一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一定要按照革命方式进行全部工作。他指示对临时政府要“进行系统的彻底的 *Entlarvung*（揭露。——编者），以便准备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现在要消灭反动派，丝毫不信任不支持新政府，……武装起来等待时机，武装起来为更高阶段准备更广泛的基础”。^②

1917年4月3日，列宁终于排除了种种阻挠，回到俄国。当

①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38—39页。

② 《列宁给亚·米·柯伦泰》（1917年3月17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91页。

天夜间在群众的欢迎大会上，列宁发表了演说，号召群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最后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第二天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工作人员会议上，列宁又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回答了俄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给党和无产阶级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路线。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根据二月革命后的时局特点，进一步论证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必然性，并提出了过渡的具体措施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战斗口号。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转变是革命转变的根本标志。列宁在《提纲》中指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①

《提纲》还指出，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解决和平、土地、面包问题仍然是当时群众最根本的要求。要摆脱战争，要解决和平、土地、面包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

孟什维克疯狂地反对列宁提出的革命路线，普列汉诺夫咒骂列宁是讲“梦话”，他叫嚷：“现在，我国某些人……号召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而不知道，只有在进行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时，夺取政权才是有意义的。目前，这许多条件还不存在……”^②党内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之流也跟着他们来反对列宁的路线，他胡说：“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内民主革命还没有完

① 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14页。

② 转引自列宁：《根本问题之一》，《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5页。

成的环境之下，在乡村中甚至还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并不适宜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①他们直到十月革命前夕都没有收起上述滥调，而且还以无产阶级“不能开动”国家机器，“环境非常复杂”，“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②等相威胁。这些谬论无非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唯生产力论”在俄国的翻版，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工业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才能进行，看不到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与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战线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之流的陈词滥调，给予了系统的驳斥。他说，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末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尽管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可以用组织全体居民参加苏维埃的方法来粉碎。至于无产阶级能否开动国家机器问题，列宁指出，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才有条件去学习管理国家的本领，他们也一定会通过实践学会管理国家。列宁在驳斥“环境非常复杂”的谬论时指出：“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的痛苦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诞生”。“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末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③

列宁与机会主义者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即四月会议）上取得了胜利。出席会

① 参见《列宁文集》第5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1页。

② 转引自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第301、302页。

③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第323、323—324页。

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拥护列宁的观点，反对加米涅夫等人的机会主义谬论，从而在全党确立了列宁制订的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路线。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根据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特点，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它要求布尔什维克党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引导革命的工农群众去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并在斗争中逐步摆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相信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最好形式，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逐步从苏维埃中排挤出去，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改变苏维埃的路线和政策。这是预计革命可能和平发展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基于二月革命后出现了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例外情况而提出的。列宁当时说：“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① 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②

列宁很早就说过，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③ 因此，列宁在预计革命和平发展的时候，并没有放弃用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群众，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实际准备。他正确地估计到形成和平发展的罕见的例外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反复强调要组织和武装群众。列宁在为布尔什维克党四月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中写道：“无产阶级的党应

① 列宁：《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演说》，《列宁选集》第3卷，第101页。

② 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第107页。

③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

当用全副精力向人民说明：必须组织和武装无产阶级，使它同革命军队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必须抛弃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以防止类似 1848 年 6 月巴黎的大规模枪杀无产阶级的惨剧。”^①

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会议）后，党大力开展了争取、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此，群众觉悟不断提高，革命群众运动不断高涨，临时政府和妥协党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向有利于无产阶级方面转化。从 4 月到 7 月的阶级斗争实践证明，当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时，他们总是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

4 月 18 日，临时政府发表声明，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并保证完全遵守协约国承担的义务，因而大大触怒了首都的革命群众。4 月 20 日，彼得格勒爆发了 10 万群众的抗议示威，造成临时政府的危机。为了转移群众的不满，资产阶级在妥协党的帮助下改组了政府，社会革命党的头子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头子策烈铁里⁸等 6 人入阁，妄图掩盖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巩固其统治。列宁对妥协党的入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同政府的妥协更加使自己陷入泥坑，并且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②，“‘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③ 列宁把改组后的联合政府痛斥为“由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叛徒组成共同的内阁”。^④

改组后的政府所执行政策与以前并无不同。担任劳工部长的妥协党人斯柯别列夫⁹ 反对工人罢工。担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头子切尔诺夫禁止农民“擅自”夺取地主土地。当喀琅施塔得

①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45 页。

②③④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22、123、122 页。

水兵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政委时，孟什维克的部长策烈铁里被派去进行“安抚”。克伦斯基由司法部长改任军事部长后，大肆鼓吹二月革命后俄国进行的战争已变成进步性的，“劝告”士兵不要在前线联欢，并着手准备前线的军事进攻。列宁当时揭露说：“凡是资产阶级的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社会主义的’部长斯柯别列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现了（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拚命替内阁辩护，替资本家掩饰，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①

妥协党头目的这些丑恶表演，充当了很好的反面教员。由于正反两方面的教育，首都原来不太觉悟的群众逐渐脱离妥协党而拥护布尔什维克。1917年5至6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代表中已争得了一半席位，在士兵代表中争得了3/4的席位。5月中旬召开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也占3/4。6月18日，约有50万工人士兵及其他群众拥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等等。这就充分表明妥协党的政策已经不得人心，而布尔什维克却得到首都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拥护。列宁在《六月十八日》一文中称这一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转变的日子”，“第一次有行动的政治示威”。^②六月事件是临时政府政治危机的开端，虽然这次危机被临时政府在前线发动的进攻所打断，可是这次进攻很快就失败了。这一消息激起了彼得格勒工兵群众的无比愤怒，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于7月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50万示威群众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要求打倒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早已准备着反革

①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3卷，第124页。

② 列宁：《六月十八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95、96页。

命大屠杀，他们从4月以来，就不断纠集、组织反革命武装，如组织军官部队、士官生营、“佐治亚奖章军人”突击营、妇女营等，还把哥萨克¹⁰的部队调到首都。当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时，资产阶级与妥协党就秘密勾结起来，调动士官生¹¹、哥萨克以及前线的军队来镇压，结果示威群众死伤400多人，街道上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这就是“七月事变”。接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向布尔什维克和人民进攻，解除了首都工人的武装，封闭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大肆逮捕、监禁布尔什维克党人。7月7日还下令通缉列宁，恶毒污蔑列宁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扬言要以“叛国”和组织武装起义的罪名交付法庭审判。7月14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联合政府。妥协党所把持的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甚至通过决议，吹捧临时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自愿将全部政权交给它。于是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由于党在列宁革命路线指引下，对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因而党及时转入了地下，未遭到重大损失。“七月事变”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

“七月事变”充分说明，反动统治阶级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暴力革命。正如列宁在“七月事变”后所说：“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和平发展。”^①“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②“客观情况是：或者是军人专政最终取得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③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推行“和平过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肆意篡改二月革命后的历史，无耻地歪曲列宁的思想，胡说列宁

① 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7页。

② 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第108—109页。

③ 列宁：《政治形势》，《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7页。

“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把列宁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条件下的一种设想，歪曲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这充分暴露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叛徒嘴脸。

二、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武装起义路线。《国家与革命》一书的伟大意义

“七月事变”后，列宁根据俄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指出，七月事变后全部政权已操在临时政府手中，实际上开始了军人专政，工人武装已经被解除，妥协党把持的全国苏维埃已经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武装起义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列宁的关怀和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于7月26日至8月3日秘密地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未能出席，大会由他的亲密战友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同志主持。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与《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总结了四月代表会议以来党的主要活动，肯定了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方针。斯大林着重指出，由于七月事变以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终结了，因而“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到来”。^①现在，剩下的道路只有一条：用强力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

可是，机会主义者却在大会上继续攻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实际上，他们根本反对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仁斯基¹²叫嚷说，只有西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哈林则说，现在资产阶级已经与农民结

^①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5页。

成了联盟，农民不会跟着无产阶级走。对上述谬论，斯大林进行了坚决驳斥，并阐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他指出：目前俄国比西欧其他国家具备更多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① 斯大林还批判了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缺乏阶级分析的错误论调，指出虽然富裕农民与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但贫苦农民永远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规定了实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大会还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了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口号。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为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

大会闭幕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大会所确定的路线，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的准备工作。当时，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仍在残酷地进行着，从而促使欧洲的革命形势，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在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发展。1917年德国许多城市爆发了大罢工，仅柏林就有3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8月，德国爆发了水兵起义，起义者力图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奥匈帝国的工人也不断举行罢工并与反动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法国工人提出“把工厂主送到前线去”、“把士兵接回家来”等反战口号，6月2日在巴黎还发生了工人和警察的武装搏斗。在意大利，8月间都灵市有4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并转为武装起义，街头巷战持续了5天。当俄国孟什维克的代表到都灵市企图鼓动工人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时，工

^①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页。

人们报以“列宁万岁”的响彻云霄的呼声以示抗议。西班牙无产阶级在8月爆发了总罢工，工人们要求推翻君主政体，在一些城市，革命人民与反动军队还进行了流血斗争。总之，提出鲜明的政治要求，甚至发展为武装斗争，这是当时欧洲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则比欧洲各国更加迅速。七月事变后，资产阶级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8月25日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¹³率领反动军队向彼得格勒进军，目的是镇压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面对这一局势，布尔什维克党一面揭露临时政府与妥协党，一面又利用彼得格勒苏维埃等组织动员群众，重新武装群众，组织工人赤卫队，有6万名武装战士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前线的士兵也拒绝科尔尼洛夫的调遣命令，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斗争，终于将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粉碎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从反面又一次教育了群众，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加之当时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加剧，国民经济陷于全面瓦解，因此各地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如狂澜巨涛，发展异常迅速。工人们不仅发动经济与政治罢工，而且常常在工人赤卫队的协助下把资本家驱逐出工厂，夺取企业的管理权。贫农群众采取暴力手段烧毁田庄，驱逐地主，夺取土地和农具，骚动已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以前一直动摇的中农这时也和贫农一起投入革命运动。前线士兵则自动起来赶走反动军官，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日益加强，开始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8月31日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掌握了首都苏维埃的领导权。9月5日，莫斯科苏维埃也转向布尔什维克。当时157个主要城市中，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的有118个城市，占77%，这说明妥协

党在工农兵群众中已十分孤立。

临时政府这时已处于经常性的危机中，内阁人员更替频繁，无法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妥协党内部也开始分裂。孟什维克中分裂出了一个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派”，社会革命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国际主义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这些党内右派领袖的公开叛卖政策，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开始同布尔什维克接近。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在俄国，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临近了。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武装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

在俄国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革命胜利后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正如列宁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①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当时在俄国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条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是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俄国的孟什维克等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疯狂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此破坏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学说，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并且强调要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为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航向。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3页。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大肆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千方百计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掩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疯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站在公开的或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鼓吹“保卫祖国”，宣扬“国内和平”，瓦解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欺骗性最大的是叛徒考茨基，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先是采取“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①的态度，后来则公开鼓吹议会道路，并污蔑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理为无政府主义。

在俄国，叛徒普列汉诺夫公开反对列宁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路线，反对暴力革命，胡说“俄国的失败会大大阻碍它的经济发展，亦即阻碍俄国工人运动的增长，从而会大大地推迟俄国政治解放时刻的到来”。谁“如果去妨碍俄国的‘自卫行动’，那就会象童话里的傻瓜一样，竟然砍断他坐着的那个树枝。”他甚至露骨地叫嚷，“我们大家都应当齐心协力地团结在我国临时政府的周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反动头目策烈铁里、克伦斯基之流，不但利用其操纵的苏维埃把政权送给资产阶级，而且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生危机时，直接参加到临时政府中去，借以欺骗群众，并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七月事变”后，当临时政府进一步面临崩溃的形势下，妥协党又策划了一个立宪改良的骗局。9月14日，妥协党召开了所谓“民主会议”¹⁴，并在这个会议上产生了“预备议会”。他们把立宪会议吹得神乎其神，似乎只要立宪会议一召开广大工农兵需要的东西就会立即得到。他们妄图用立宪幻想把群众引向改良主义道路。

隐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也散布种种谬论，反对党的武装起义的路线。他们公然支持妥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99页。

协党的立宪改良骗局，并鼓吹通过争取议会多数来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思想基础。第二国际和俄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都在理论上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在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大肆泛滥的情况下，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① 为了从理论上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篡改，并以此武装全党和俄国人民，武装国际无产阶级，列宁在1917年8、9月间，在革命斗争极端紧张的情况下，在匿居地拉兹里夫¹⁵从事巨大的理论工作，写了《国家与革命》这一不朽的著作。而列宁为写这一著作的准备工作，则早在1916年下半年在国外期间即已开始。当时，列宁为了指导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即着手系统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几乎全部有关国家问题的著作，翻阅了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作品，并作了摘录，写了批语和评注。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总结了1848至1917年70年来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的发展过程，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歪曲、阉割和埋没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集中批判了考茨基及其在俄国的门徒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谬论，并根据新的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国家与革命》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3—4页。

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性文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与革命》内容极其丰富，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解放。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国家的产生、特征及其作用等方面，论述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指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俄国门徒所鼓吹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界限。

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①这就是说，国家问题是同阶级密切联系着的。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产生，它随着阶级冲突的日益加剧而强化，只有当全世界完全消灭阶级以后，国家才会随之自行消亡。在原始社会，由于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就没有国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分裂为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利益根本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它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奴役，镇压奴隶的反抗，便建立了一种强力组织，这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国家。随着社会发展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便相应地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是地主阶级压迫农奴的机关。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机关。由此，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②

国家为什么能够成为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呢？为什么占人口

①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7、8页。

极少数的剥削阶级能够运用国家政权来进行统治呢？列宁发挥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的光辉思想，进一步指出：国家“这种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①这是国家能成为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的根本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家就是统治阶级手里所掌握的一种暴力，所以只有自己掌握枪杆子、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解放。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却竭力掩盖、抹杀国家是暴力统治的机关，否认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的阶级性。他们胡说军队、警察的存在是由于“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的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不应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应该保存它。这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列宁说：“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②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 1848 年革命，特别是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革命的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往的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的革命，所以，它不需要打碎，而只要把旧的国家机器稍加改变一下，就可以适应新的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需要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革命。因此，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奴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工具绝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但

①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 9—10、103 页。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却把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讲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这一光辉思想歪曲成马克思“强调缓慢发展”、“不主张夺取政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来说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等等。列宁在痛斥他们的这一别有用心地歪曲时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②；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四十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④考茨基之流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⑤

（二）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列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集中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之流所鼓吹的“议会道路”。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把革命暴力看成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催生婆**”，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⑥，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光辉思想，指出，国家既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工具，既然军队、警察等暴力是国家的主要成份，那末，“**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⑦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

①②③④⑤⑦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33、34、26、95、106、20页。

⑥ 转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9页

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①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同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时，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疯狂的镇压。资产阶级用以镇压无产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主要工具就是国家。资产阶级和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血腥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能消灭反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考茨基及其俄国的门徒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和加米涅夫之流，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他们从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把资产阶级的议会看成是国家的主要成份，是“纯粹民主”的机关，鼓吹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伯恩施坦胡说“普遍的平等民主选举权”是“工人解放的必要先决条件”。考茨基则叫嚷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应当“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们肆意歪曲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思想，似乎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资产阶级的国家就会缓慢地、平静地、逐渐地“自行消亡”。

列宁痛斥了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指出议会是专门为了愚弄人民而从事空谈的资产阶级“清谈馆”，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和“屏风”。真正的国家工作的决策不是在议会内，而是在后台决定，由政府 and 司令部来执行。议会只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②列宁还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

^{①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20、41页。

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①因此,无产阶级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议会和平过渡上,革命就永远不会取得胜利。至于国家消亡问题,列宁明确地指出,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原理是同暴力革命的理论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严密整体。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和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它决不会“自行消亡”,只能由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暴力来打碎,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阶级斗争,最终消灭阶级,国家才能“自行消亡”。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故意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区别,来反对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②

(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

列宁详尽地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体系更加严密和完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因此,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能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

①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3—14、16页。

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①

十月革命后的 1918 年，列宁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事实，针对考茨基否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反动谬论，在补充写的第二章第三节中进一步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②

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学说。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③

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然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一般都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集体所有制里资产阶级法权并没有完全取消。同时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

①②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 78、32、84 页。

题,即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这就是说,所有制问题,不能只看到它的形式,还要看到它的实际内容;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十分危险的。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法权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分配方面“**仍然占着统治地位**”^①,“还起‘**调节者**’的作用,是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②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不能达到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说,社会主义还“**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③从政治思想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广大劳动人民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但是,由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和侵蚀,特别是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和旧社会的传统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不可能很快地消除。因此,人们还不能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还不能普遍地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分配方面还“**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⑤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虽然不可避免,还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应该正确对待;但是它的弊病是会产生“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

①②③④⑤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83、88、84页。

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①所以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修正主义、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权对之加以限制。对资产阶级法权，是加以限制还是助长其扩大，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问题。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培植修正主义社会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刘少奇、林彪也妄图利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逐步限制和消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列宁还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任务、政治形式、阶级基础和党的领导作用。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②列宁根据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认为俄国人民在革命中创造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当的政治形式，它是巴黎公社这个“**‘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③的继续和发展。但列宁同时也指出，由于各国具体条件不同，今后各国革命中“**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④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核心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建立和

①②③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86、24、51、32页。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① 列宁还论述了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他说：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所以能够而且必须结成联盟；如果“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②

考茨基之流把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污蔑为无政府主义，别有用心地混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因此，列宁严格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界限，批判了布哈林等所鼓吹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从而粉碎了考茨基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无政府主义的可耻企图。列宁指出：“（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③

历史上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把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当作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他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①②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24、36、101页。

……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①

《国家与革命》是一部伟大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回答了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它也是我们当前反帝反修，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革命向全国发展

列宁在1917年9月写完《国家与革命》第六章后，曾打算写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并已经拟定了大纲。但俄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很猛，广大工人、农民、革命士兵的革命情绪达到了最高潮，他们再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当时，“**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②在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形势下，列宁放下了第七章的写作，全力以赴地投入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列宁于9月12至14日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明确提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党必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思想，制定了起义的计划，指出武装起义和布朗基主义的阴谋暴动根本不同，起义要依靠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正确掌握革命的决战时机。列宁的这些指示武装了全党，指引着布尔什维克党满怀信心地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为武装夺取政权而斗争。但是党内机会主义者却猛烈反对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31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277页。

列宁的指示，加米涅夫攻击列宁脱离了实际生活，并把列宁论武装起义的信污蔑为“疯人呓语”。9月15日党中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加米涅夫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极力鼓吹参加妥协党策划的预备议会，叫嚷现在“绝对不容许有任何街道上的行动”。^①对此，列宁驳斥说，妥协党所炮制出的“预备议会”不过是一个骗局，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欺骗群众，愚弄工人和农民”。^②列宁尖锐地指出，谁要是在决战的时刻拒绝武装起义，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谁“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③；必须制止“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④斯大林完全支持列宁，他把预备议会称为“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⑤经过斗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于10月5日通过了抵制预备议会的决定。

为了便于领导武装起义，列宁于1917年10月7日从芬兰秘密地回到了彼得格勒。第二天，他写了《局外人的意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规定了武装起义的主要原则：“（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⑥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武装

① 参见《苏联国内战争史》，第2卷，中文版第28页。

② 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6卷，第39页。

③④ 列宁：《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64、65页。

⑤ 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6页。

⑥ 列宁：《局外人的意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43页。

起义问题。在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实行武装起义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成熟，应该立即发动起义，并加紧在技术上准备。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公开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仍然鼓吹通过争取立宪会议的多数来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修正主义谬论。托洛茨基虽然没有在会上公开反对列宁的主张，但他提出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举行起义，这实际上是要拖延起义，错过时机。全会否决了他们的主张，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决议，决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负责起义的政治领导。10月16日，党中央又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全会的决议，决定了武装起义的日期，成立了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同志领导的军事革命总部。这个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

根据中央决定，布尔什维克党加强了武装起义的具体组织与技术方面的准备。党中央派出了许多领导干部到各地领导起义，一些最先进的工人编进了赤卫队，至10月中旬，各地赤卫队合计拥有20万名优秀工人。为了争取驻军转到革命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出许多政治委员到各个部队中，建立革命的士兵核心组织，准备按照党的指示发动起义。鉴于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苏维埃中已占多数，于是党又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目的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变本加厉地反对武装起义，竟然干出了骇人听闻的叛卖勾当。10月18日，他们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还诽谤说，“把一切放在日内一次进攻上作孤注，乃是冒险绝望的行动”。^①两个叛徒的声明，实际上把党关于武装起义的

^① 转引自《列宁文集》第5册，第366页。

秘密暴露给了敌人，使敌人有可能及时扑灭革命。列宁愤怒地斥责了他们的叛卖行径，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科¹⁶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①，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在10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又公开鼓吹他已提出过的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不要发动起义的谬论，胡说什么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需要不需要武装发动，这将取决于意图破坏全俄代表大会的那些人们”。^②这是向敌人泄露起义的日期，并企图使党错过武装起义的时机，让敌人赢得时间来扑灭革命。

临时政府接到叛徒的告密后，便企图先发制人。它急忙从前线调军队来防守彼得格勒，并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力量，封闭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它还制订了一个计划，打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占领斯莫尔尼宫，击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心。有鉴于此，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提前于10月24日发动起义，以便乘临时政府尚未完全准备就绪时给以突然打击。列宁在10月24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等等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③列宁批判了托洛茨基之流关于把武装起义推迟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的荒谬主张，指出“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④当天夜间列宁从秘密住所来到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正在进行的起义。约20万赤

① 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第26卷，第205—206页。

② 转引自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③④ 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350页。

卫队、革命士兵的队伍，向斯莫尔尼宫集中。按照列宁的战略部署，首先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重要据点，同时将首都起义的消息电告全国以争取支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上午，起义的工人与士兵群众攻占了车站、发电站、主要桥梁、邮电局、国家银行等据点，解散了预备议会。临时政府的头子克伦斯基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只身逃出彼得格勒去请求援军。下午6时，革命军队包围了冬宫。当时临时政府已处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但他们仍寄望于前线大本营调反动军队来支援，拒绝军事革命委员会限令其投降的最后通牒。晚9时，革命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开始炮击冬宫，经过6小时激战，直到在冬宫内短兵相接的搏斗，在深夜两点钟全部占领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

10月25日晚，当胜利的武装起义已达高潮时，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了。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告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着的掠夺性战争；表明苏维埃政权将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斗争。《和平法令》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①大会还通过了《土地法令》，规定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无偿地收归国有并交给劳动农民使用。最后，大会还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革命继

^①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3卷，第356页。

续向全国范围扩展,各地工人、农民、革命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与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各地政权。莫斯科的武装起义从10月26日开始。由于反革命势力较强,他们拚命顽抗,也由于莫斯科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错误(如让孟什维克分子参加领导;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与莫斯科反动当局进行谈判并将起义队伍从已占领的克里姆林宫、邮电局、电报局撤退等),起义遭到了一些挫折;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纠正和莫斯科广大工兵革命群众的英勇奋战,并在彼得格勒赤卫队、波罗的海水兵队伍以及莫斯科附近城市赤卫队的直接支援下,起义才于11月2日(俄历)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的特点是革命首先在城市取得胜利,然后再伸展到全国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革命向全国发展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当时以卡列金¹⁷为首的顿河哥萨克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拚命的反抗。俄国的反革命头子,如米留可夫¹⁸、科尔尼洛夫等都跑到他那里去了。卡列金还同库班、捷列克、阿斯特拉罕等地的反革命哥萨克,同奥伦堡地区的反革命匪首都托夫¹⁹以及乌克兰反动势力建立了反革命联盟。卡列金还得到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例如美国国民银行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指示在1917年12月给了卡列金50万美元。法国政府也给了卡列金1亿卢布贷款等。为了消灭卡列金匪帮,苏维埃政权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和顿巴斯等地派出了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他们在顿河地区哥萨克的革命人民的有力配合下,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于1918年2月终于粉碎了卡列金的反抗,3月成立了顿河苏维埃共和国。

在民族地区,革命的胜利经历了更尖锐复杂的斗争。乌克兰人民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于10月29日晚开始武装起义,10月31日,基辅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但这时,由乌克兰反动的资产阶级组成的中央拉达(“拉达”即人民大会、群众

大会之意)却把反动军队从前线召到基辅来,颠覆了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他们并同南俄的反革命势力、同顿河的匪首卡列金等建立了反革命联盟,还同罗马尼亚战线司令,叛乱将军谢尔巴切夫相勾结,向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乌克兰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2月1日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同时开始建立“赤色哥萨克人”的队伍,他们同彼得格勒、莫斯科、斯摩棱斯克以及其他城市赤卫队一起展开了反对拉达的武装斗争,逐步解放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1918年1月15日,在基辅又一次发动了武装起义。1月26日,基辅解放了。1月30日,乌克兰苏维埃政权从哈尔科夫迁到基辅。至此,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全境基本上建立起来。

这样,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英明领导下,从首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到革命向全国的发展,大致经过了4、5个月的时间,到1918年2月,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辉煌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了。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措施。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遭到国内外敌人的疯狂反对和破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军事反抗便开始了。公历11月9日(从这起,以后都用公历),克伦斯基纠集

了部分哥萨克向彼得格勒进攻；11月11日，彼得格勒反革命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策动了士官生叛乱；前线大本营俄军总司令杜鹤宁也企图策动士兵叛乱，他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责成其与德军和谈的命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依靠革命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镇压了反革命叛乱，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这时，妥协党所把持的全俄铁路总执委会也从政治上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他们要求苏维埃政权停止镇压克伦斯基等人的反革命叛乱，成立包括孟什维克与右派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狂妄叫嚣撤销列宁的政府首脑职务。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党当时派他同全俄铁路总执委会谈判）、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与国内阶级敌人紧密配合，竟然也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让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让布尔什维克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决议，否决了主张同这些反革命政党妥协的提议，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叫作破坏革命事业的工贼。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米留亭四人反对党中央决议，声明退出党中央委员会。接着，李可夫等三人还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党内机会主义者这种分裂活动得到敌人大声喝采。国内外反革命都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然而列宁指出：“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钟也不会，丝毫也不会动摇拥护我们党的群众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党。”^①他还指出：“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决不当有别的政府。”^②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仍然主张与一切赞同苏维埃政权的党派和政治力量建立联盟。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使左派社会革命党掌握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

①②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371、369页。

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某些领导人参加了人民委员会。

十月武装起义以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措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与健全了苏维埃国家机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各部院、地方专员、旧法院及警察机关统统被废除，相继建立了各人民委员部、苏维埃人民法院与人民警察机关。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12月20日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²⁰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尤其重要的是，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情况，决定建立无产阶级的常备军。他指出：“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实行劳动者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解除有产阶级的全部武装。”^①在工人赤卫队和起义的革命士兵的基础上，1918年1月28日和2月14日，苏维埃政府发布了成立红军和红海军的法令。与此同时，1月19日解散了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这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沉重打击。

在苏维埃国家建设方面，列宁指出必须严格遵循巴黎公社的原则。为此，苏维埃政府吸收了成千上万优秀工人、士兵参加国家机关工作，发动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与监督；规定人民不仅有选举权，而且有可以随时罢免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1917年11月23日颁布了国家工作人员（直至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工资标准为每月500卢布（相当于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法令。

在经济上，苏维埃政权立即着手剥夺剥夺者，没收了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实现了工业、银行、铁路、对外贸易等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为了打垮和消灭资产阶级经

^① 列宁：《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405页。

济势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经济机关——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来管理全国工业。苏维埃政权还宣布废除了沙皇和临时政府所借的 160 亿卢布(至 1917 年年底)的外债,打击了国际资本主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独立。

布尔什维克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附带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根据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在全国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贫农、中农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 1 亿 5 千多万俄亩土地。土地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此外,苏维埃政权还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宣布废除人的等级区分,实行男女平权以及教会与国家、教会与学校分离等等。

为了实施列宁制定的民族政策,巩固苏维埃政权,1917 年 11 月 15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境内各民族权利完全平等,废除沙皇的民族压迫制度,受到俄国各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

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摧毁了资产阶级、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势力,初步整顿、巩固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对外政策方面,列宁认为,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列宁的这种观点,是 1920 年他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18 年 3 月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规定,“首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

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①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后来列宁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②苏修叛徒集团妄图把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歪曲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只能暴露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叛徒嘴脸。

对于沙皇俄国强加给东方各国的不平等条约，列宁一贯主张废除。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列宁的原则，苏维埃政府反复强调了对被压迫民族的基本政策。1917年12月3日，苏维埃政权发布了《告俄国和东方一切劳动的穆斯林书》，声明沙皇政府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现名伊斯坦布尔）和瓜分土耳其的条约无效。1918年1月29日，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反对伊朗独立的一切协定，废除瓜分伊朗的条约，并从伊朗撤出俄国军队。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8月发布了《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20年9月，又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宣言》，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宣言的原则。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远地归还中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苏修叛徒集团根本背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他们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这说明他们是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比老沙皇更凶残更无耻的敌人。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

①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页。

② 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76页。

平,是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条件。当时,俄国经过了3年多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广大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和平,而国际帝国主义却要拖住俄国继续战争,以便乘机拖垮苏维埃政权。它们还积极策划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在当时条件下继续战争,就无异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命拿来孤注一掷。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苏维埃政府便多次向各交战国提议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各协约国拒绝这一建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便决定单独与德国举行和平谈判。列宁认为,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在当时最危险的强盗德帝国主义面前实行退却,与其签订和约,那怕是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只有这样做,苏维埃政权才能取得暂息时机,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建立新的军队,巩固苏维埃政权,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反之,“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①

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到白卫分子,都疯狂地反对签订对德和约。他们的目的是挑起德军的进攻,力图引进德军来帮助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围绕着和约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和以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²¹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勾结在一起,疯狂反对列宁的革命策略。当时,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在“左”的词句掩盖下从事革命空谈,硬说德国帝国主义者不可能发动进攻,德国革命马上就会成功,鼓吹什么“没有军队也要进行战争”,如果与德国媾和就是支持德国帝国主义而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等等。托洛茨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配合下,鼓吹“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口号,主张结束战争,不签订和约,让士兵复员回家,并故意掩盖苏维埃国家面临的危险局势,散布什么

^① 列宁:《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我们并没有死亡的威胁等等。他利用负责外交工作并率领代表团参加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与德国谈判的机会，推行危害苏维埃政权的叛卖路线，拒绝执行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和约的指示。他在1918年2月10日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时声明说，苏维埃政府拒绝在德方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同时却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谈判因此中断。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叛卖行为！列宁愤怒地斥责说，这是以战争当儿戏，把革命断送给德国人。托洛茨基所采取的这种反革命立场，为德国帝国主义进攻提供了借口。于是德军在2月18日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很快占领了俄国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着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中。

在苏维埃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列宁和党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战斗口号，动员群众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工人阶级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年轻的红军，英勇地阻止住了德国强盗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回击德帝国主义军队的那一天（2月23日），被定为红军节。另一方面，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责他们是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列宁说：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要促进德国革命的发展，而“**实际上是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①同时列宁反复向党内同志说明，为了革命根本利益，暂时牺牲一些次要利益的必要性。虽然签订和约会使俄国失去一些领土，但却能以空间换取时间，赢得为巩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喘息时机。这是一种革命的妥协。

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尖锐、激烈的。列宁关于签订对德和约的建议，在2月18日以前一直被否决，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只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支持列宁。列宁一度处于少数

^① 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选集》第3卷，第447页。

地位,但是列宁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斗争中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注意团结大多数,教育和帮助那些一时认识模糊和具有轻敌情绪的人。这样,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志终于理解并接受了列宁的正确主张,站到革命路线上来,击败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党中央通过了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决定。这时德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却比第一次更为苛刻了。1918年3月3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在党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签订和约的决议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结束,反而更激烈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更疯狂地反对列宁,反对党,他们更进一步进行分裂活动,企图拉拢一部分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对抗。当时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控制的莫斯科省委会竟然通过了分裂主义的决议,以分裂来威胁列宁所领导的党中央,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这些反党分子居然发展到采取反苏维埃的叛卖立场,他们在决议中声称:“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①列宁斥责这个决议是“奇谈与怪论”,说他们不懂得,“现在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②同时列宁还写了许多文章批判了他们的各种谬论。

为了最终解决签订和约问题并粉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于1918年3月6—8日召开了党的

① 转引自列宁:《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第3卷,第439页。

② 列宁:《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5页。

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确认列宁在解决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批准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的和约。大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反动立场，痛斥了他们分裂党的阴谋，因而他们的阴谋被击败了。1918年3月14日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

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交锋，是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

列宁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人伙分赃。”^①苏维埃俄国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必要妥协属于前一种，这是为了更好地战胜帝国主义，为了“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我们要遵照列宁的教导，严格分清两种性质不同的妥协，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本领，揭露和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的叛卖勾当。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革命策略的范例。运用这种革命策略就能分化和阻止他们互相勾结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便争取时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1920年回忆这一问题时指出：“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终于占了便宜。”^②他教导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4页。

②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0页。

我们：“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敌视。这个原则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已经掌握了，而且在实际上已经运用过了。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①列宁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苏维埃政权在缔结和约后，就赢得时间来巩固苏维埃政权，调整全国经济，建立红军，保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以及利用帝国主义相互冲突瓦解敌人。

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富农的强烈反抗。当时俄国约有 200 万户富农，他们是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他们趁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特别是国内粮食极端困难的时机，大肆进行粮食投机，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想用制造饥荒的办法来颠覆苏维埃政权。他们还疯狂迫害贫农与苏维埃干部，篡夺基层政权的领导权。为此，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于 1918 年 5—6 月间，组织了反对富农的斗争，颁布了《粮食专卖法令》，派遣大批工人下乡帮助贫农，组织了贫农委员会。各地都整顿改选了农村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富农的余粮，镇压了富农的反抗。工人下乡工作和贫农委员会的成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阵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列宁指出：“对农村来说，城市的十月革命只是到 1918 年夏天和秋天才成为真正的十月革命。”^②

富农的反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他们恶毒攻击“贫农委员会里是些二流子，说工人抢劫劳动农民的粮食”。^③列宁在痛

①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399 页。

② 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24 页。

③ 转引自列宁：《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55 页。

斥他们的反动谬论时指出：“富农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叫喊‘二流子’，自己却抢粮食、藏粮食，进行投机，希望靠工人的饥饿和痛苦来发财。”^①

富农的反抗失败后，一部分反映富农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便公开进行反苏维埃活动。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们要求停止反富农的斗争，要求放弃派遣工人收粮队去农村，他们甚至在美、英、法等国政府的支持下，在莫斯科等地发动武装叛乱，但很快被粉碎了。布尔什维克党经过这一时期的艰苦斗争，使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就为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叛乱的3年革命战争（1918—1920年）奠定了基础。

二、苏维埃政权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伟大胜利

1918—1920年，苏维埃政权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进行了3年艰苦的革命战争。这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继续，是暴力革命的继续。

从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一天起，国内外敌人便千方百计妄图消灭它。苏维埃政权由于实行一系列革命措施和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日趋巩固的事实，使帝国主义、首先是协约国帝国主义深感不安。英、美、法等协约国政府惟恐苏俄退出战争以后，德国的军事力量会因此加强，同时他们特别害怕俄国革命的烈火会在其本国燃烧起来。因此，各协约国帝国主义便决定要对俄国实行武装干涉，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俄国国内的一切阶级敌人，从十月革命胜利起，便异口同声地叫喊，说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没有根基，连几天都维持不了等等，但他们所策划的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

^① 列宁：《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6页。

反革命阴谋活动都纷纷破产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为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从1918年上半年起,便加紧了和帝国主义者们的勾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中”,在俄国实行反革命复辟,并绞杀日益高涨的各国革命运动。因此,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仅关系着俄国人民的命运,而且也关系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

俄国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联合的武装进攻,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斗争,经历了两个时期。从1918年夏到年底是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强盗采取不宣而战的手段,径直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俄国国土,并在俄国的许多边疆地区(如俄国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牟尔曼斯克,东部的海参威以及北高加索等)颠覆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统治。德帝国主义则在顿河一带暗地支持白卫将军克拉斯诺夫发动的叛乱。英、法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制造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²²的叛乱。然而国内外敌人的这一系列武装进攻,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打击下——被打退了。从1919年春至1920年,国内战争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一方面,由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失败,遂使英、美、法等国武装干涉俄国的势力得以加强,给苏维埃政权造成许多新的困难。另一方面,德国的失败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立即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取消赔款,收回被强占的大片领土。更重要的是1918年11月爆发的德国革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所开始了的革命运动,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中,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支持俄国反动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猖狂的进攻。

第一次进攻是在1919年春,它是由国内反革命和武装干涉者

联合进行的。从东面进攻的高尔察克²³是这次进攻的主要力量，协约国帮助它建立了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从南面进攻的是邓尼金²⁴。在北面有英、美和法国干涉者的混合部队以及白卫将军米列尔的军队。由于红军和俄国人民的英勇奋战，高尔察克从东部的进攻于1919年夏便遭到惨败，不久就全线崩溃。正当红军大举反攻的时候，窃据红军总司令要职的托洛茨基提出了停止追击高尔察克、将红军主力调往南线作战的诡计。这样做，会使高尔察克得到重整旗鼓的机会。列宁和党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计划，命令红军继续进攻，到1919年末，高尔察克匪帮被彻底消灭了。

第二次进攻从1919年夏开始，这次进攻是由白匪头子邓尼金、白匪将军尤登尼奇²⁵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在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这次反革命进攻的主力是南方邓尼金的军队。英、美、法干涉者以大量武器和装备供给他的军队，在1919年8月1日以前，仅仅美国运给俄国南部白卫军的武器、被服等就足够装备一支10万人的军队。英帝国主义者派了2千名左右军官到邓尼金军队中充当顾问、飞行员等。这次进攻到1919年冬和1920年春终于被红军彻底粉碎了。

第三次进攻从1920年4月开始，这次进攻是由波兰地主军队和白卫将军弗兰格尔²⁶从西线进行的。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波兰地主军队大量军事装备，在1920年春仅法国就供给了波兰1,500门大炮、30万枝步枪、约3,000挺机关枪、350架飞机、800辆载重汽车以及其他许多装备。法国军官担任了波兰军队的教官。美国政府在1920年上半年运给了波兰200多辆坦克、300架飞机、2万挺机关枪、3百万套服装、4百万双皮鞋以及药品等。这次进攻在1920年冬被红军彻底粉碎了。

至此，帝国主义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武装干涉都遭到破产，俄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这并不是帝

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完全停止，日本在远东方面的武装干涉一直继续到 1922 年。

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时期，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四分之三的国土被敌人占领，各个富产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地区都一度落入敌人手中，工厂被迫停工或几乎停工，旧俄遗留下来的落后经济受到进一步破坏，更加濒于破产了。广大人民忍饥挨饿，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在极端困难时期每两天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甚至还有完全不能发给面包的日子。但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英雄的俄国人民，并没有被强大的敌人和严重的经济困难所吓倒，而是紧密团结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为战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赢得了国内战争的最后胜利。

苏维埃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是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革命措施。

首先，党自始至终发动全国人民来进行卫国战争。党宣布全国为军营，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提出“一切为前线”、“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等战斗口号，动员全俄人民实行抗战。在后方，广泛地开展了被列宁称为“伟大的创举”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活动，工人忘我英勇劳动保证了前线一切必需品的供应。列宁对这一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①，“它表明这里正在产生、正在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违反资本主义旧有的一切惯例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东西，即广泛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②在沦陷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6 页。

②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43—144 页。

其次，列宁十分重视红军的建设。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工农义务兵役制，迅速扩充红军，1919年1月达到100万人。1919年10月已经有300万人。到1920年春已拥有近500万人了。在军队中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批判和纠正了托洛茨基在红军建设上的错误路线，同时也反对了“军事反对派”从“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当时，托洛茨基利用其窃取的掌管军事工作的职权，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他崇拜旧时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藐视和仇恨红军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干部，企图枪毙前线许多负责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中央的干涉和红军中广大干部的反反对，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军事反对派”（许多人是先前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打着反对托洛茨基的旗号，从“左”的方面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



弗·伊·列宁 1918 年 10 月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利用军事专家，反对任何一个革命军队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反对了这两种从右的方面和极“左”方面对红军建设的破坏，从而加强了红军的建设。同时，在革命战争的一些关键时刻，党中央都委派斯大林亲赴前线（例如到东方战线、南方战线等）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军事指挥和错误作战计划，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第三，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苏维埃政府把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转入战时轨道，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埃政权继对大工业实行监督之后，对中小工业也实行监督，以便积蓄大量日用消费品去供军队和农村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实行了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了私人粮食贸易，并规定了余粮收集制，以保证军队和城市的需要。同时实行了劳动义务制，迫使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的基础和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联盟。正如列宁所说：“农民从工人阶级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得到了免遭地主和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在大工业恢复以前，则从农民那里借取粮食。”^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对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党十分重视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在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把中立中农的政策改为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国内战争开始后的经验证明，中农的向背对革命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白卫分子、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918年夏在伏尔加河一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也就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大一部分中农的援助。富农在俄国中部组织叛乱时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从1918年秋天起，中农群众已转向于同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4卷，第547页。

情苏维埃政权了。他们看到：白军获得胜利就会恢复地主政权，夺去农民手中的土地，使农民遭受抢劫、拷打和残杀。贫农委员会粉碎富农的活动，也促进了中农的觉悟。因此，列宁在1918年11月就提出：“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指示决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与中农保持坚固联盟，并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富农与中农严格加以区别，要关心中农利益，绝对不要用强迫手段而是要用说服方法去克服中农的落后性。无产阶级在巩固与中农联盟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自己的领导作用。党对中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对于巩固工农联盟、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第五，针对反革命的白色恐怖，苏维埃政权实行了“红色恐怖”，坚决镇压了反革命。在国内战争时期，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政党公开站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将军一边，进行颠覆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谋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负责干部，谋刺列宁就是他们这伙匪徒干的。在十月革命以前，这些政党在工人阶级中有过某些影响，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却在人民面前完全暴露了其反革命的面目。苏维埃政权对这些政党的反革命活动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也清除了党内的不可靠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保证了党的纯洁和统一。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和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俄国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英明领导下终于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保卫住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粉碎了14国（英、法、美、日、意以及芬兰、

^① 列宁：《皮梯列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选集》第3卷，第612页。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阿尔明尼亚)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事实,充分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表明了正义战争、人民战争的强大生命力。帝国主义和俄国国内反动派表面上张牙舞爪,貌似强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起来的人民。伟大的列宁1919年11月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演说中总结了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胜利。列宁指出:两年以前,“当时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情形就可以看到,连我们的敌人也愈来愈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看到:象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使我们能够击退外来的侵略,取得彻底的胜利”。^①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虚弱本质,对于武装革命人民树立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思想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发表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欧洲许多国家中爆发了总罢工。在奥地利,1918年10月底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柏林工人和士兵于1918年11月9日举行起义,德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皇被迫退位。在英、法、意等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摆在日程上了”。^①

害怕和仇视欧洲各国人民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1918年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干涉的同时，还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大浪潮。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积极参加了反苏反共的大合唱，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向布尔什维克猖狂进攻。已经破了的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充当了疯狂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急先锋。他在1918年8月间，抛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反动的小册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攻击布尔什维主义是“拿破仑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是“毁灭民主”，“没有自由”；攻击苏维埃政权是“没有生命力的孩子”；极力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过渡”。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列宁在痛斥叛徒考茨基时指出：“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做《附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②

为了粉碎考茨基的猖狂进攻，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动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列宁在1918年10—11月被刺养伤中，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光辉著作。在这本书写完之前，列宁还以同一名称发表了一篇短文，以便尽快表明意见，在各国无产阶级面前揭穿考茨基的叛徒嘴脸。

①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16、679页。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针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疯狂反对十月革命的道路等反动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个叛徒的可鄙的、丑恶的面貌。列宁指出:考茨基“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斯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①考茨基“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浸透了奴才精神”^②,“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③“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没有丝毫差别,连一点差别的影子也没有。”^④只不过他“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⑤

列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着重批判了徒叛考茨基如下的几个反动谬论。

(一) 彻底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歪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进一步论述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考茨基无耻地散布谎言和诡辩,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 1875 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尔用过的一个“词儿”。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这种荒谬绝伦的歪曲。他引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⑥列宁指出,这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无产阶级专政

①②③④⑤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628—629、623、627、701、706 页。

⑥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22—23 页。

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捏造成马克思用过的一个“词儿”，“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①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暴力革命化为乌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

考茨基在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的时候，拼命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他采用骗术，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解释为“统治的状态”。所谓“统治的状态”，照考茨基看来，就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方法获得多数”所产生的状态。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这种诡辩，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精辟的定义，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②，而不是什么“统治的状态”。考茨基之所以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③所以考茨基的罪恶目的，就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还无耻地捏造说巴黎公社是由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他还把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认为英、美有可能例外地和平发展的设想，搬到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大谈其“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的过渡。考茨基伪造巴黎公社历史的做法是十分笨拙可笑的。列宁指出，当时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用反革命暴力来反对公社的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难道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全民投票”和“纯粹民主”吗？至于考茨基歪曲马克思的观点来为他的和平过渡谬论辩护，这是徒劳的。

①②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0、623、624页。

马克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确实曾经说过：象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马克思同时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①就英国来说，马克思当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要准备进行暴力革命，他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②

列宁在写本书前，在同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短文中，批判叛徒考茨基时指出：“借口马克思在 70 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③列宁在本书中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制度”。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④

列宁针对考茨基“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进一步阐明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制

① 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79 页。

②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686 页。

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91 页。

④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626 页。

度和官僚制度”^①，“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②列宁在书中还进一步阐明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指出：旧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的最坚固的柱石”。“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③无产阶级“不在艰苦的内战中逐渐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和巩固这种统治地位”。^④

坚持还是反对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反复斗争的焦点。苏修叛徒集团大肆鼓吹“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他们甚至篡改十月革命的历史，胡说“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等等。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耻背叛。

（二）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所谓“纯粹民主”的谬论，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考茨基在其反动小册子中，喋喋不休地大谈所谓“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如何如何地“优越”，攻击苏维埃国家“毫无理由”地“损害民主”、“消灭民主”。列宁痛斥了考茨基荒唐透顶的谬论。列宁指出：“‘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⑤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纯粹民主”、“全民的民主”。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

①②③④⑤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5、624、669、629页。

有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的“纯粹民主”、“全民的民主”都是无稽之谈。

列宁针对考茨基美化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动谬论，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① 列宁还针对考茨基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疯狂攻击，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② 因为“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正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③ 考茨基攻击苏维埃国家“毁灭了民主”，正好表明他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一丘之貉，唱的是同一个调子。

考茨基攻击苏维埃国家“毁灭民主”，还拿出了一个所谓论据，即苏维埃国家没有保证被剥削者与剥削者“平等”。他认为剥削者是极少数，劳动者是多数，而多数就应该“保护少数”，多数应该同少数“平等”。他说，民主的意思，就是一切人“都平等地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列宁痛斥了考茨基这种鼓吹被剥削者应该同剥削者平等的谬论。在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只有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的关系。考茨基离开具体的、阶级的内容来谈“多数”同“少数”的关系，并由此而推论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应该“平等”，这完全是一种诡辩的伎俩。列宁强调说，考茨基根本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如下一个事实：剥削者虽然只占全国人口中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实际力量比

①②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634—635、633页。

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还保持有很大的优势。资产阶级还有金钱，有动产，有组织管理的技能，有较高的教育程度，有军事技能，同时“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①此外，还有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援与联系等等。所以被推翻的剥削者绝不会甘心失败，他们“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而“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②列宁深刻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③所以，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不能讲“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专政。列宁说，“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反动派恐惧”，“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④，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还别有用心地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他把资产阶级民主美化为“全民民主”，而把苏维埃制度丑化为排斥民主的“一般专政”、“独裁”、“专横”等等。列宁回答说，资产阶级在几十年几百年当中用种种残酷的手段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被剥削者实行惨无人道的专政，考茨基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而当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立了自

①②③④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638页。

己的苏维埃政权，所有资产阶级恶棍们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跑出来狂吠什么“专横”。“‘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①列宁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总是和专政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就谈不上专政，没有专政也就无所谓民主。奴隶主、封建主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奴隶主、封建主实行民主，对广大的奴隶和农奴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也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第一次把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如实地揭示出来，而不加任何掩盖。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结合。考茨基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丑化、攻击无产阶级民主，这就彻底暴露了他充当资产阶级奴才的叛徒面目。

考茨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还攻击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认为应该用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作为国家的组织形式。列宁指出，考茨基这一谬论的实质就是：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进一步论证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②而这一形式正是巴黎公社形式的继续和发展。

（三）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反动谬论。

考茨基在其反动小册子中，恶毒地攻击布尔什维克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恶毒地攻击苏维埃政权“没有生命力”，胡说布尔什维克“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革命这一张牌上”^③，胡说农

①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60、643页。

③ 转引自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73页。

民要“转向同城市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阵营里去”，叫嚣布尔什维克正处在被农民推翻的前夕，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

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种种谬论，分析了当时欧洲的大好革命形势，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 and 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及其革命策略。列宁指出，苏维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以苏维埃政权为基地来发展世界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把支援各国革命运动视为自己应尽的、最崇高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①也正因为这样，苏维埃俄国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信任和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以各种方式援助了苏维埃国家。而考茨基完全背叛了国际主义，他“害怕世界革命”，“‘不相信’世界革命”，既反对苏维埃政权支援世界革命，也反对各国无产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社会主义能够在俄国胜利的国际条件。

列宁也驳斥了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同俄国人民对立起来，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反动谬论。考茨基认为俄国经济落后，小农占优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可以指望得到农民的支持，当革命一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他们之间便会发生敌对的冲突。考茨基同拉萨尔一样，把农民看成“反动的一帮”。列宁在批判时指出：“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②，而其余都是劳动农民。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工农联盟的客观基础。劳动农民不仅能够参加民主革命，而且能够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劳动农民是无

①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77、680—681页。

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①苏维埃国家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国首先胜利、并巩固这一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

围绕着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工农联盟等问题，列宁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场深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列宁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列宁在其光辉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给予考茨基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捍卫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不仅对当时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我国的批林批孔运动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叛徒考茨基在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残暴”“独裁”时，还无耻吹捧中国反动派的“圣人”孔老二。他胡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还称不上“亚洲式的社会主义”，“因为亚洲诞生了孔子”，所以用“亚洲式的社会主义”来形容苏维埃政权“残暴”、“独裁”“并不公道”，而只能“称之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即最残暴的社会主义。^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林彪和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一样，狂热地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宣扬其“德”、“仁义”、“忠恕”、“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等谬论，把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叫嚣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独裁”、“绞肉机”等等。这就充分证明林彪和考茨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87页。

② 参看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节 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最伟大的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论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毛主席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又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②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所制订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过世界无产阶级 70 年来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无比正确，同时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彻底破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各种类型的革命，但任何革命都不能和十月革命相比拟。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完成了巴黎公社的未竟事业。

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以巨大的、深刻的影响。正如列宁所

①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278 页。

②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628 页。

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①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毛主席说：“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②

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开辟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俄国无产阶级首先举起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大旗，在一个地域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使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上升到统治的地位。这就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榜样，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斗争勇气和信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中通过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的革命经验，为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指明了方向；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个公开的革命基地。列宁称苏维埃共和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真正的实在的策源地”。^③正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推动下，芬兰、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都掀起了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德国、匈牙利爆发了革命，给帝国主义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十月革命不仅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而且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的统治，开辟了

①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

②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31页。

③ 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130页。

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它使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这是因为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使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营垒与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营垒。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毛主席所说：“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①

其次，十月革命为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指出了一条争取彻底解放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道路。毛主席在谈到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时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③同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对内，把沙皇制度下的“民族牢狱”变成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多民族国家；对外，从苏维埃国家建立最初之日起，就向中国、伊朗、土耳其和其他东方国家伸出了兄弟和友谊之手，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等所订立的一切不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32页。

②③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1359页。

平等条约，取消沙皇政府的特权，宣布和东方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结成联盟。这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促进了他们的觉醒。

第三，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①从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冲击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日益觉醒，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70 来年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战胜各种机会主义而获得胜利的历史；是从一个游荡于欧洲的“幽灵”变成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的伟大理想的历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虽然列宁的故乡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苏联历史上发生了大倒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了逆流；但这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插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战胜现代修正主义，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定会推翻新沙皇的法西斯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②

①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149 页。

② 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 1061 页。

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共同道路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以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世界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他还指出：在俄国所发生过的事件“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①毛主席在总结十月革命经验时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②

十月革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什么呢？

（一）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关键，是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十月革命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要完成它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象列宁缔造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建设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坚强的革命的党。列宁指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③

这个党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才取得的。没有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78页。

② 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11月7日。

③ 列宁：《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列宁全集》第8卷，第135页。

衡的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学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及时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略方针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加以实现；在二月革命胜利后，及时制定了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坚决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坚持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充分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自始至终同党内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才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巩固了这一胜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国家出现过革命形势。但是，由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党，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而根本谈不上引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俄国，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成功。

（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他们根据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但革命导师的这一英明思想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阉割了。他们诽谤和反对暴力革命，并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企图以此麻痹无产阶级斗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十月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正确性，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议会道路”的彻底破产。

全部十月革命史就是一部光辉的暴力革命史。沙皇的反动统

治是俄国各族人民用铁扫帚扫掉的。“七三事变”说明：当革命群众运动危及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时，标榜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立刻就露出凶残的吃人本性，用反革命屠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堵塞革命和平发展的任何可能。科尔尼洛夫妄图恢复独裁统治而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也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武装起来加以粉碎的。从首都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到莫斯科的流血奋战；从粉碎临时政府头子克伦斯基和反革命士官生的复辟活动到消灭妄图发动叛乱的前线俄军总司令杜鹤宁²⁷；从顿河等地区经过激烈的战争消灭卡列金匪帮到乌克兰及全俄国的解放，都是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结果。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更是经过了3年半的艰苦的革命战争才达到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路线战胜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及其俄国门徒的“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所以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① 斯大林曾经指出：“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②

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革命的历史也表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正如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页。

②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无产阶级革命》，第39页。

枪杆子才可能改造。”^①

反之，无产阶级政党由于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不搞革命武装或者放弃革命武装而使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是不少的。近百年来，许多共产党参加选举，参加议会，不但没有一个党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资产阶级恰恰通过议会选举收买共产党，使它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赫鲁晓夫这个叛徒一开始鼓吹“和平过渡”的时候，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② 这说明对待暴力革命的态度，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分水岭。

（三）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道路。

列宁指出：“十月革命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③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迫切需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打退德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14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叛乱，布尔什维克党才在斗争中逐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正是为了镇压国内外暗藏敌人的种种暗杀、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保安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坚决镇压反革命，强迫资产阶级劳动改造；正是为了镇压富农的激烈反抗，发展农村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派遣了大批优秀工人到农村去，帮助贫农开展阶级斗争，巩固农村的

① 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2页。

② 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转引自《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③ 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第407页。

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囤积粮食、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等破坏活动，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经济机关——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果断地实行了余粮收集制这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等等。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的原理，以及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实践，英明地预见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但剥削阶级不可能一下子消失，而且还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因而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它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有鉴于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必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这些英明预见和光辉思想，都为十月革命以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特别是为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所证明。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教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而更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四）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道路，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基本力量。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证明，农民的向背是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等失败的原因之一都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工农联盟。对于农民作用的估计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①第二国际和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否认农

^① 列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3页。

民的革命作用，因而都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否定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反对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愤怒地指出：“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①在十月革命准备与实施过程中，为了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革命的土地纲领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并积极领导农民争取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妥协党对农民的欺骗，因而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争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起草的并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对于巩固工农联盟，使城市武装起义比较迅速地为广大农村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在坚持依靠贫苦农民的同时，又强调贯彻团结中农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的政策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的胜利。

（五）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与互相支持，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准则。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84—685页。

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①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及其俄国门徒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可耻叛徒，他们在第一次大战中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伟大的列宁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了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种种谬论，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路线，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对国际无产阶级最有力的支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推进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主张坚决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坚决废除沙皇俄国强迫被压迫民族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坚持国际主义的光辉榜样。

同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也是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德国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仅在1917年11月参加声援俄国革命示威的就有100多万人。在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日子里，英、法、意、美等国无产阶级在“不干涉俄国”的口号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与罢工直到武装起义。法、意海员扣留了本国政府为俄国白卫军运送武器的船只。所有这些，都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不敢直接派更多军队到俄国去进行武装干涉。而德国、匈牙利革命的爆发以及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都牵制了帝国主义的手脚，削弱了14国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力量，从而支援了俄国革命。

不仅如此，许多国家侨居俄国的无产阶级还直接参加了十月革命与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们组织了“国际纵队”、“国际营”等等。当时侨居俄国的中国工人参加十月革命与苏联红军的先后有5万人左右。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传奇英雄包其三的英雄事迹至今还流传在苏联人民之中。苏修叛徒集团妄图一笔抹煞中苏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页。

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历史事实，是绝对办不到的，只能暴露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可耻嘴脸。

上述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极力抹煞、否认和篡改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并否认其国际意义。伯恩斯坦无耻诽谤“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特殊的俄国现象”，没有“模仿的价值”。^①考茨基也竭力否认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叫嚷“希望这样的事重演一次，那是无益的。产生这种情形的事态发展是特殊地反常的”。^②他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反动小册子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俄国落后的产物加以百般歪曲与污蔑。显然，不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就不能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此，列宁、斯大林曾同这群无耻叛徒作了殊死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保卫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破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继承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竭力歪曲与篡改十月革命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这只能说明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十月革命的可耻叛徒，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死敌。

第六章 注 释

1 彼得格勒在第一次大战前叫彼得堡，战争爆发后，改名为彼得格勒。因为“堡”这个词根是来自德文，沙皇政府为了宣传反德的沙文主义思想，故改用俄文词根“格勒”。“堡”与“格勒”均为城市之意。十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第515页。

① 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② 见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2 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苏维埃政权最初的组织者之一,列宁、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他十五岁开始在工人中从事地下工作,1902—1912年多次被沙皇逮捕流放,十月革命胜利后当选为全俄苏维埃第一任主席,由于长期流放身体受损,于1919年病逝。——第516页。

3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它早期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混合物。1905—1907年革命时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十月革命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一度参加苏维埃政府。1918年7月,该党因组织反革命叛乱,很快被消灭。——第516页。

4 罗曼诺夫王朝为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个朝代。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的米海依尔·弗多罗维奇(1596—1645)由全俄缙绅会议推选为沙皇,是为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始。1917年二月革命把它推翻。罗曼诺夫是沙皇的姓。——第518页。

5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头目,曾当过律师。1912年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8月任第二届联合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1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兼总司令,十月革命后逃往巴黎后到美国进行反苏活动。——第519页。

6 列甫·波利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混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夕伙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路线。1926年参加托—季反党联盟。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第520页。

7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81—1938),布哈林反党集团头目之一,1899年混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前曾是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先后窃据内政人民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要职。1928年伙同布哈林组织反党集团,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阴谋被粉碎。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第520页。

8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也维奇·策烈铁里(1882—1959),俄国孟什维克反动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伪政权的头目之一,积极进行反苏活动,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死

敌。——第 524 页。

9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柯别列夫(1885—1939),十月革命前是孟什维克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劳工部长。十月革命后脱离孟什维克,1922 年参加俄国共产党(布),从事外贸工作。——第 524 页。

10 哥萨克是 16 世纪为躲避农奴制压迫而逃往南俄大草原的农奴。当地鞑靼人称这些异乡人为“哥萨克”,意即酷爱自由的人。十月革命前沙皇利用哥萨克人优异的骑术和武术镇压革命,十月革命后,哥萨克中的劳动人民在历次战争中为保卫苏维埃祖国作出很大贡献。——第 526 页。

11 士官生是沙皇时代军事学校的学生部队,他们都是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政治上十分反动,克伦斯基用他们来守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第 526 页。

12 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普列奥布拉斯基(1866—1937),托洛茨基分子,1905 年混入布尔什维克,当过《真理报》编辑,在一系列问题上他支持托派立场,1923—1927 年成为托派重要成员,在俄共(布)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被开除出党。——第 527 页。

13 拉甫尔·格奥尔基也维奇·科尔尼洛夫(1870—1918),沙俄反动将军,1917 年二月革命后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七月事变后被委任为总司令,1917 年 8 月企图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但没有得逞。十月革命后,他是白匪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之一,1918 年 4 月被红军击毙。——第 529 页。

14 民主会议即“全俄民主会议”,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妄图阻止俄国革命爆发,于 1917 年 9 月 14—22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民主会议”上产生了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十月革命时被解散。——第 531 页。

15 拉兹里夫是列宁格勒郊外不远的一个小湖,当春暖雪融时湖水向周围草地漫出,因此叫拉兹里夫(即涨水的意思)。1917 年“七月事变”后,反动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列宁化装为割草人匿居在此湖旁的草棚里。列宁在这里写了不朽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一书。——第 532 页。

16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将科(1859—1924),大地主,沙皇时期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主席。二月革命后为临时议会主席,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第 545 页。

17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1861—1918),沙皇反动将军,1917 年是顿河地区反动的哥萨克军团的首领。十月革命后,他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支持下,在顿河地区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

叛乱被击败后于1918年2月自杀。——第547页。

18 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反动首领。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是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之一,后逃往巴黎。——第547页。

19 亚历山大·依里奇·都托夫(1864—1921),沙俄参谋本部上校,奥连堡哥萨克白卫军的首领,1918—1919年在英、美帝国主义指使和支持下,在乌拉尔一带进行反革命叛乱活动。——第547页。

20 费里克斯·艾德门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出生于立陶宛。17岁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岁成为职业革命家。从1906至1917年过了11年的监狱、苦役、流放生活。十月革命后曾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26年7月20日逝世。——第550页。

21 格奥尔基·列奥尼多维奇·皮达可夫(1890—1937),从1919年至1929年他始终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反对列宁主义。1927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此后,他成为托派匪帮总头目之一,从事破坏革命、策划叛国、组织暗杀、刺探情报等反革命活动。1937年被判处死刑。——第553页。

22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战俘组成,1918年5月在苏维埃政权允许下回国,行至途中发动反革命叛乱,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559页。

23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高尔察克(1873—1920),沙皇的海军上将,白匪头子。十月革命后,他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区组织反革命叛乱,1920年被红军歼灭,他被判处死刑。——第560页。

24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1872—1947),沙皇时代反动将军,白匪军头子。十月革命后,他在南俄和乌克兰地区组织反革命叛乱,并向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进攻,被红军击败,1920年逃往国外。——第560页。

25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尤登尼奇(1862—1933),沙俄时代反动将军。十月革命后,他在俄国西北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反革命“西北政府”军队的首领。1919年进攻彼得格勒时被红军击败,后逃亡英国。——第560页。

26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878—1928),沙皇反动将领,协约国帝国主义傀儡,国内战争时期南俄反革命首领之一。1920年11月他任白匪“志愿军”总司令,进行反革命叛乱活动,在北塔夫利和克里米亚地区被红军击溃,后逃往国外。——第560页。

27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1876—1917),沙皇反动将领,克

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最高总司令部参谋总长。十月革命在首都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周，他自己宣布为最高总司令，准备反革命叛变。由于他拒绝执行苏维埃政权关于停止前线军事行动以便开始和平谈判的命令，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号召革命士兵起来逮捕他，1917年12月3日，他被革命士兵击毙。

——第 582 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大事年表

(1848—1920 年)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 1818 年 5 月 5 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恩格斯 1820 年 11 月 28 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的巴门市。他们在“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1848 年 2 月 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1848 年 2 月 法国二月革命胜利，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48 年 3 月 13 日 奥地利维也纳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1848 年 3 月 德国爆发三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

1848 年 6 月 1 日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出版。

1848 年 6 月 12 日 捷克布拉格爆发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

1848 年 6 月 23 日 法国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

1850—1852 年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发表了《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一系列重要著作。

1851—1864 年 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1852 年 3 月 5 日 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明确地谈了他的新贡献，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简明地概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

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 普鲁士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科伦审判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马克思著文揭露普鲁士政府的无耻捏造。

1852年11月17日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解散。

1857—1859年 印度人民反英武装起义。

1859—1861年3月 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

1861—1865年 美国人民反对南方奴隶主叛乱的国内战争。

1863年1月 波兰人民反对沙俄统治的民族起义。

1863年5月 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窃取了领导权。

1864年9月28日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被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担任德国通讯书记。

1864年11月1日 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

1865—1867年 英国掀起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马克思领导国际总委员会同工联主义者就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纲领和策略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1865年9月25—29日 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

1866年9月3—8日 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围绕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867—1870年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在爱尔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1867年9月2—8日 第一国际在瑞士洛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

1867年9月14日 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出版。

1867年9月24日 为了削弱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在国际领导机构中的地位,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决议废除总委员会主席一职。

1868年9月6—13日 第一国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决议。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1868年10月 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反革命阴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分裂和破坏第一国际。

1869年8月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爱森纳赫城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1869年9月6—12日 第一国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挫败了巴枯宁集团阴谋篡夺国际领导权的企图。

1870年4月22日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诞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

1870年7月19日 普法战争爆发。

- 1870年7月26日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发表。
- 1870年9月4日 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 1870年9月9日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发表。
- 1871年1月18日 普鲁士通过普法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
- 1871年3月18日 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 1871年3月28日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 1871年4月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一）国家机关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并可随时撤换的人担任；（二）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最高薪金每年为6,000法郎。
- 1871年5月28日 巴黎公社被梯也尔卖国政府勾结外国反动派武装颠覆了。巴黎公社虽然仅仅存在72天，但公社的光辉榜样和革命原则是永存的。
- 1871年5月30日 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法兰西内战》宣言。宣言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做为新社会的先锋受人敬仰。”
- 1871年9月17—23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集团的分裂阴谋。会议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
- 1872年9月2—7日 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把其首要分子巴枯宁、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大会决定把总委员会迁至美国纽约。
- 1872年10月 恩格斯写《论权威》，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论述了革命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1873年5月30日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巴枯宁派一切组织和人都开除出国际。
- 1875年5月 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无原则合并，通过了

充满拉萨尔主义观点的《哥达纲领》，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和一系列通信中，系统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1876年7月15日 国际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美国费城召开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告第一国际解散。

1876—1889年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欧美许多国家先后建立。

1876年9月—1878年6月 为反对杜林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密切合作下写了《反杜林论》这一光辉著作。

1879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为反对在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后出现的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投降主义，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

1879年12月21日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出生于俄国南高加索梯弗里斯州哥里城。

1880年11月 法国工人在加夫尔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马克思亲自帮助拟订的党纲。

1882年9月 法国工人在圣亚田代表会议上分裂为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和以马隆、布鲁斯为头子的机会主义“可能派”。

1883年3月14日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1885年2月 恩格斯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

1886年5月1日 美国40多万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举行全国总罢工，芝加哥等城市的无产阶级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反动警察的血腥镇压。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1889年7月14日 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关怀下，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宣告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通过了每年5月1日组织工人示威游行反对资本剥削的决议。

1890年10月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在哈雷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年1—6月 恩格斯为了回击在德国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废除后滋长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月发表了被德国党领袖们隐瞒达16年之久的《哥达纲领批判》；3月为《法兰西内战》写了重要的《导言》；6月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1891年8月16—22日 第二国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 主要讨论了工人阶级对待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态度问题，反对了无政府主义。
- 1892年9月 法国工人在马赛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机会主义的土地纲领。
- 1893年8月6—12日 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主要讨论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问题。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演说。
- 1893年12月26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在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 1894年10月 恩格斯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
- 1894年11月 恩格斯为反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政策写了《法德农民问题》一文。
- 1895年8月5日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伦敦逝世。
- 1895年秋 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 1895—1897年 印度爆发了提拉克领导的反英民族主义运动。
- 1896年7月27日—8月1日 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问题，以及殖民地问题。大会把无政府主义者开除出第二国际。
- 1896—1898年 菲律宾发生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
- 1896—1899年 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借口时代变了，公开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1899年他抛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贩卖变节作品”，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和“修正”。修正主义思潮开始泛滥。
- 1898年3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 1898—1901年 菲律宾爆发抗美斗争。
- 1899年10月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 1900—1901年 中国人民发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中国。
- 1900年9月23—27日 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针对米勒兰入阁事件展开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考茨基的调和主义的“橡皮性”决议。
- 1900年12月 列宁在国外创办《火星报》。
- 1902年3月 列宁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斗争著作《怎么办？》一

书发表。

1903年7—8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由此产生。

1903年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形成革命的“紧密派”和机会主义的“宽广派”。

1904年2月 日俄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激化。

1904年5月 列宁为粉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

1904年8月14—20日 第二国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革命派同机会主义派就“社会主义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05年1月22日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

1905年7月 列宁发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路线，批判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在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

1905年12月 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

1905—1909年 土耳其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5—1911年 伊朗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5—1911年 越南人民进行反法斗争。

1906年1月 德国汉堡10万工人举行第一次政治总罢工，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

1907年8月18—24日 第二国际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出席了国际大会。列宁团结左派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会在反对军国主义问题上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

1907—1911年 朝鲜爆发抗日的“义兵”运动。

1908年4月 列宁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揭露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1909年5月 列宁的光辉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发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1910年8月28日—9月3日 第二国际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团结左派在关于合作社等主要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斗

爭。

1911年10月 中国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

1912年2—3月 英国百万煤矿工人举行全国性大罢工。

1912年11月24—25日 第二国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危险问题，通过了著名的巴塞尔《反战宣言》。

1914年8月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第二国际宣告破产。

1914年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

1915年5—6月 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1915年9月 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16年4月 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经过列宁和左派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一项批评社会和平主义和机会主义活动的决议。

1916年1—6月 列宁写成划时代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述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和历史地位，彻底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1917年3月 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

1917年4月4日 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给党和无产阶级制定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路线。

1917年4月24日 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制定的革命路线，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1917年7月26日—8月3日 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七月事变”后的形势，通过了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

1917年8—9月 列宁写了不朽著作《国家与革命》，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

1917年11月7日 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诞生,组成以列宁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917年11月 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土地法令》、《和平法令》、《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法令和决议。11月23日通过了国家工作人员最高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工资的法令。

1918年1—2月 列宁缔造的红军和红海军在战斗中诞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法令。

1918年1月27日 芬兰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工人政权,后遭失败。

1918年2月 俄国革命经过从城市到农村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1918年3月3日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18年3月6日 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正确路线,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8年—1920年 苏维埃政权为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进行了三年半艰苦的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1918年—1920年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德、英、法、意、美等国都先后爆发了声援俄国革命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斗争。各国共产党相继建立。

1918年8—9月 日本爆发“米骚动”的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席卷日本三分之二的地区。

1918年10—11月 列宁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痛斥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动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1918年11月 德国爆发革命,推翻了德皇威廉第二的反动统治,但革命果实被右翼社会民主党所篡夺。

1919年3月1日 朝鲜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人民起义。

1919年3月2—6日 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

1919年3月21日 匈牙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存在了133天，被帝国主义武装颠覆。

1919年4月13日 在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慕尼黑工人经过英勇斗争，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1日被反革命军队所扼杀。

1919年5月4日 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19年8月—1920年9月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放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和权利。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的这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没有得到实现。

1920年3月 德国鲁尔10万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一度占领了全鲁尔区。

1920年4月 列宁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写了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光辉著作。

1920年7月19日—8月7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

1921年2月 为了反对第三国际、破坏各国革命运动，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包括俄国的孟什维克在维也纳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即“第二半国际”。两年以后，它与第二国际合并。

1921年3月8日 俄共（布）召开了“十大”。列宁作了关于党内统一等问题的报告。大会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大会决定从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等。